

中國社會史論戰
叢著第七種

中國農民戰爭之
史的研究

册 上



者著
山農薛

神州國光社刊

上海

河南路一三六號

本書限閱
讀者台鑒
檢閱

限期表



碼如有錯誤請在還書時
明以便更正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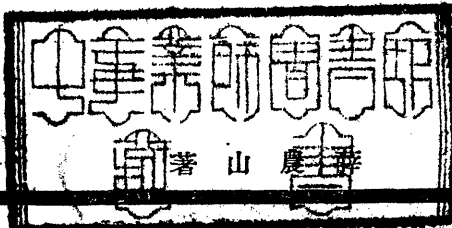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5 4315B

中華業餘圖書館

分類	編號	借期	重量
登記號			

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



中華書局發行



神州國光社刊行

自序

近幾年來，「農民運動」的聲浪，幾幾乎震聳了一般人們的耳鼓，但是關於農民運動之歷史分析的創著，簡直可以說是和「鳳毛麟角」一般的很少見到！

「中國是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大家都是異口同聲的說着；根據這種論調，那麼，農民問題當然是中國革命問題中重要部份之一了。中國的農民戰爭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牠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怎樣？當中又經過了一些什麼階段？爲什麼古代的農民戰爭與近代的農民運動有質量的差異？在農民運動中又有些什麼急於要解決的問題？農民運動的前途怎樣？

這些都是目前一般人們所急於要瞭解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之具體的答覆，誠然是目前必要的工作，然而這一工作的完成，需要我們巨大的努力，因爲有許多當前的困難，主要的是各地農村生活狀況的調查，非實際參加農民鬥爭是難於解決的。

這本書不過是一個嘗試的開始，當然談不上什麼收穫。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의 浪濤，將

著者捲入於農民運動的漩渦之中，因此，對於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有個很簡單而模糊的概念，這在一年以前，即企圖將個人對於農民運動的經驗與認識，具體的彙集起來，加以有系統的整理，以供社會人們的討論與參考；可是因為生活的不安，以致屢寫屢輟，直到現在才完成這種企圖。

但是著者認識的淺薄以及文字技術的粗劣，所以相信缺點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因觀點錯誤而引起讀者諸君嚴肅的指示與正確的批評，著者除了熱烈的歡迎與誠懇的接受而外，並且還十二萬分的希望！

末了，我還要說及的，就是我寫這本東西的時候，關於材料的搜集，的確是承很多的朋友如石凡張吉珊諸君的幫助，尤其是神州國光社同人主要的是王禮錫先生的幫助，特在此地向他們致革命的敬禮！

龍山，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於上海。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導論……………一七

第一節 商業資本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一

第二節 中國歷史發展的途徑……………六

第三節 帝國主義給與農村經濟的影響……………三

第四節 農民鬥爭與土地問題……………一五

第二章 中國古代農民戰爭的意義與教訓……………一九—三九

第一節 中國社會的轉形期……………一九

第二節 秦漢的農民戰爭…………… 六五

第三節 隋代的農民戰爭…………… 八四

第四節 唐代農民戰爭…………… 一〇九

第五節 宋代農民鬥爭與王安石變法…………… 一四〇

第六節 元代農民戰爭…………… 一六七

第七節 明朝的農民戰爭…………… 一八八

第八節 古代農民戰爭的總結與精神…………… 二三三

第二章 清代的土地制度與初期的農民暴動…………… 三三—二八六

第一節 土地佔有的形態…………… 三三一

第二節 大清帝國的經濟結構…………… 三五五

第三節 初期的農民暴動…………… 二六四

第四節 統治階級關於消滅農民暴動的對策…………… 二七五

第五節 滿清政府的供狀與農民革命失敗的餘波…………… 二七九

第四章 太平天國……………二六七—三三三

第一節 大革命的前夜……………二六七

第二節 革命的動力……………二九六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政治戰術……………三〇六

第四節 太平天國政治經濟的建設……………三二二

第五節 反革命的聯盟與太平天國的天亡……………三三一

第六節 馬克斯論太平天國……………三六四

第五章 義和團……………三五—三六七

第一節 義和團的形成……………三五

第二節 義和團的組織……………三四二

第三節 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展開……………三四八

第四節 鬥爭的轉變……………三五三

第五節 八國聯軍與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 三六一

第六節 義和團的失敗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演習…………… 三七四

第七節 烏里雅諾夫論義和團…………… 三八一

第六章 帝國主義的深入與中國殖民地式產業革命的形成…………… 三六九—四三六

第一節 產業革命思想的先驅——康有爲變法…………… 三六九

第二節 交通網的新建設…………… 四〇〇

第三節 帝國主義的刺激與中國產革命的萌芽…………… 四一〇

第四節 官僚資本及舊式工業的蛻化與民族工業之形成…………… 四三三

第五節 銀行資本…………… 四三七

第六節 殖民地產業革命與農村經濟…………… 四三三

第七章 一九一一年革命中之孫中山的農民運動…………… 四三七—四七九

第一節 接受歷史上的教訓——革命…………… 四三七

第二節	黨的組成	四四五
第三節	農民暴動	四五六
第四節	策略的轉變與辛亥革命	四六五
第五節	一九一一年革命是不是解決了土地問題？	四六九
第六節	孫中山與農民	四七四

第八章

中國農村經濟的崩壞

.....	四八一—五五九
-------	---------

第一節	怎樣的去把握中國農村經濟？	四八一
第二節	土地分配的形態與農業人口之階級結構	四八九
第三節	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	五一二
第四節	苛捐雜稅與高利貸的剝削	五三三
第五節	農村中的階級矛盾——租佃形式與僱傭勞動	五三七

第九章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與農民

.....	五六二—六二二
-------	---------

第一節	中國農民運動的先驅……………	五六一
第二節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農民運動政策的確定……………	五六七
第二節	五卅運動對於中國農民運動的領導……………	五七〇
第四節	農民運動對於國民政府北伐的幫助……………	五七五
第五節	農民運動的深入與階級矛盾的展開……………	五八〇
第六節	各省農民運動概況……………	五八五

第十章 一九二七年以來的農民騷動與中國共產黨的盲動政策…………… 六三三 六四六

第一節	形成盲動主義之中國社會的前提……………	六三三
第二節	八七會議與農民暴動……………	六三八
第三節	六次大會後的盲動精神……………	六三四
第四節	什麼叫做「立三路線與國際路線的對立」？……………	六三三
第五節	馬克斯列甯主義呢？還是斯大林盲動主義呢？……………	六三八
第六節	所謂「紅軍」到那裏去？……………	六四三

第十一章 農民運動中幾個重要問題……………六四七—六七二

第一節 土匪問題……………六四七

第二節 會黨問題……………六五四

第三節 富農問題……………六六五

第十二章 結論……………六七三—六七九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商業資本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農村經濟之劇烈的破壞和農民鬥爭之繼續不斷的向前發展，這是一般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但是，對於這些現象之歷史原因的把握，却有許多不同的觀點；不是說這是封建經濟統治之必然的產物，便是說由於地主豪紳之過分的剝削。其實，這種答案之淺薄，不僅是毫無邏輯和缺乏生氣，甚之，還沒有窺着問題的項背！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衰頹與夫農民鬥爭的爆發，比任何一個國家都早，遠在耶穌基督紀元以前，在中國已經產生過廣大的農民暴動了；當然，每一次的事變都有牠的綜錯而複雜的客觀的因素，而商業資本之早熟實是一個主要的經濟的原因。

商業資本在中國歷史上早熟的痕跡是異常的顯明，在商朝牠已經是開始形成，如貨幣制度之草創，而周朝則更迅速的完成牠的進展，其表現於貨幣方面的如『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這時候的商業資本牠已經起了媒介的作用；因此，管子亦說：『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爰

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管子的觀點，很明白的說出貨幣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這種商業資本在農村經濟中的作用，第一，因為貨幣關係的發展，破壞了自然經濟的體系；第二，市場的形成，使生產品離開了物物交換的狀態而走向商品經濟的領域；第三，無情的摧毀了封建社會的紐帶，使土地也變成了商品——即是說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在封建社會內部所誕生的商業資本，牠雖然侵蝕了農村經濟的後方，使廣大農民的生活陷於窮困，然而就其在歷史發展的順序上估量，並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換言之，牠完全與歷史發展的階段相適應。馬克斯曾經說過：

「商業以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變成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為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的作用。」（資本論三卷一部二十頁）

但是，牠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之內雖然是起進步的作用，彷彿和資本主義在整個社會進程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實際上當然不及資本主義之廣泛和深刻——著者），而一方面，却又產生新的矛盾；使廣大的農民破產和窮困，使社會的裂痕更加擴張，使階級對抗的形勢更加明顯，換句話說，他是推動農民鬥爭的動力。很多的人們，尤其是許多從事於農民運動的專家，他們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農民戰

爭的爆發，不一定受商業資本發展的規律所限制，在所謂純粹的封建社會內面同樣的可以爆發廣大的農民戰爭。這種觀點之錯誤，一方面固然由於他們沒有看清楚問題的實質而妄下斷語，而對於經濟的變動以及由此變動所引起的政治和社會的變革之缺乏了解，實是主要的原因。我們勇敢的承認，在封建社會內部必然不可避免的會發生反抗諸侯與領主之奴隸的或者是農奴的騷擾，但此種騷擾的範圍是偏於一隅而異常狹小，根本就不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因為在封建社會的體系之內，生產關係的紐帶還是非常的薄弱，而交換的方式還是陷於『以物易物，以有易無』的狀態；關於這種情形馬克斯的女婚——拉發格會加以這樣的說明：『古代貴族與家庭，正同中世紀的諸侯一樣，是使人在他們的土地與作坊裏，生產生活品，衣服，武器等等……一句話，幾乎是他們所需要的全部。交換則只把他們消費後的剩餘，在一年內的某個時期舉行。』（見中文本劉鳴初譯經濟決定論二七四頁）

社會處在這樣情況之下，農村中的關係，依然是『老死不相往來』，為什麼會產生廣大的農民戰爭呢？這豈不是奇蹟嗎？當然，人們否認古代社會內所發生的奴隸和農奴的騷擾，同樣的也是為事實所鞭撻的錯誤的觀點。至於商業資本為什麼攘奪了封建的自然經濟的王位？為什麼與近世資本主義社會有不可分離的有機的聯系？為什麼與封建剝削有大不相同的內容？所有這些問題，馬克斯在很久以前已給了我們具體的答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期（即在中古時代的西歐）是商業支配工業，在近世社

會中是工業支配商業。商業對於他實行營業的諸社會間自然有多少反響；他使生產愈加屈伏於交換價值之下，並且，使享樂與生活的維持，愈加倚賴販賣而不倚倚生產物的直接使用。因此，商業使舊來的諸種關係解體了。他使貨幣的流通增加，他不獨是僅僅擒住生產的剩餘，並且，次第蠶食生產自身，使全體生產部門都附屬在他的下面。」（資本論三卷一部二十二頁）

很顯然的，中國的商業資本在春秋戰國以來，在農村中間，已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已經取得了對鄉村的統治。牠將牠的觸鬚伸張到農村經濟的五臟六腑，在最初，牠以貨幣的威權和高利貸方式和農民見面，地主對於農民的征收租稅企圖以貨幣來代替穀產的繳納，更幫助了牠的發展。農民們爲的需要貨幣，不得不受商人的控制；同時，政府亦需要農民以貨幣繳納賦稅，於是更加使農民投入商人和高利貸資本的羅網！地主的封建的剝削已經令農民不能忍受，再加上兇殘無厭的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壓榨，祇有逼得農民走上暴動的道路。中國歷史上許多次朝代的更迭——農民戰爭，商業資本會給以很大的影響！

牠爲的要在農村中間盡量的開拓和發展其前途起見，在古代曾經贊成農民的解放戰爭，因爲地主的剝削是有礙於他的發展；但是，牠并不是徹底的解放農民，這一點在土地問題上表示得非常清楚，牠始終是擁護土地私有制度。一般的講來，商業資本在農村中間的威權，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到

近代因帝國主義經濟的侵入，牠的獨立的作用已經喪失，附屬在資本主義系統之下，成了資本主義在農村經濟中間的代理人。並且，牠自附屬於資本主義以後，其對於農村經濟破壞的程度，比以前更加兇殘，遠在一八四七年已經有人說過：『有產階級得了權勢，那封建的，家長的，田園生活的種種關係，便到處被它消滅了。結合人和他的「生來的長上」的封建線索，也被它盡情翦斷了。人和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胆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現金主義，再也找不出什麼別的聯結關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國際工人同盟宣言）

誠然，中國農村中的『封建的，家長的，田園生活的種種關係』，到處都爲資本主義消滅了！甚至，牠還在農村中間起了分化的作用，使農村階級簡單化呢！

現在，我們可以綜結起來說，商業資本在農村中間的地位，自帝國主義的侵入以來，牠失掉獨立的立場而附屬在資本主義之下，爲帝國主義作農村中間的代理人。牠過去在農村中間對於封建的自然經濟會盡了長期腐蝕的作用，刺激了農民戰爭的興起，然而，農民戰爭之失敗，與牠也有深切的聯系；當農民暴動的開始，首要的任務便是反對商業資本，因此，逼得牠不得不參加反農民革命的末座。最近，牠的作用除了爲資本主義開闢道路以外，另外一點，便是牠本身變成地主（即投資於土地方面）以及介紹地主走向蛻化於資本主義的道路。

第二節 中國歷史發展的途徑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

我們中國人之缺乏歷史智識幾幾乎成爲社會上普通的現象。其實，如果就歷史而研究歷史，當然會和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的「目迷五色」而找不着出路。其實，中國的歷史書籍雖然是浩如烟海，但絕對不會是解釋無從的，祇看人們從什麼地方去把握啊！

我們深信中國歷史上存在過原始共產制度的以及血族和氏族共產制度的社會，因爲這是從經濟觀點去分析社會演進所必然得着的結論。繼承氏族共產社會的當然是封建制度，這時期也就是「國家」的或者說是「政權」的形成。

中國國家的序幕從什麼時候開展呢？答覆這一個關於考古的問題，人們便有許多不同的見解：從夏禹治水說起，接着便是堯舜啦，神農軒轅啦，伏羲啦，天皇，地皇，泰皇啦，盤古啦，中國歷史上不知堆積了多少神話！本來，關於堯舜的有無？我們姑且不論，僅就夏禹說起，他也不見得能夠代表中國社會開幕的象徵；如果就他的所謂「治水」的事件而論，這未免沾有奇怪妄誕的嫌疑。生產方式的原始，交通關係的梗塞，不僅不能使他處理那泛濫的洪水，甚至僅僅巡視一次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據最近的可靠的材料，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認為在商朝才是中國社會序幕的開展，就生產技術和地質學的發現，這答案是比較合乎科學的規律。

不過，事實絕不像郭沫若先生所解釋的那樣簡單，以為商朝還是『原始共產制』的社會，還是『沒有階級的政權』！實際上商朝那龐大的軍事組織和相當發展的農業，已給郭先生以正面的答覆：商朝的經濟結構不成問題的是封建經濟。周朝爲什麼取得商朝的統治？這似乎有解答的必要：考周民族發源於陝西，自然的環境對於這一民族有很大的幫助，而肥沃的土地，灌溉的河流，在客觀上使其農業經濟的上昇，發展到『深耕』的程度；而商朝的農業經濟雖有相當的發展，但此種發展仍處於『廣耕』的狀態；農業經濟發展到高度的周民族，來代替商民族的統治，在一般社會鬥爭中實是很自然的現象。周朝統治的初期，社會仍然是封建的外形與實質，如對於同姓的分封，土地依然是『采邑』的形式，並且，還規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由封建的經濟形態所反映於政治方面的如『周初八百國』，這才表示十足的建封建社會的氣焰。

自此以後，封建社會的母體逐漸開始衰弱，其衰弱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她懷孕了商業資本的胎兒；到春秋戰國的時候，經濟的上昇，把八百多個小國竟連結成七個大國，最後，秦國的生產力突飛猛進的向上，於是便造成了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基礎。秦朝的統一，在一般社會中顯示的：不僅沒有如郭沫

若先生所期望的什麼「集封建之大成」，恰恰相反，牠表示中國的商業資本第一次走上統治的地位；在這種「質」「量」轉變的局面之下，封建經濟已受着這政府嚴厲的鎮壓，而土地之成爲商品——土地自由買賣的擴大，更將一般農民都引誘到商人和高利貸資本的羅網。在農民反對商業資本和爭取土地的解放戰爭中，又形成了漢朝的農民政府——由農民暴動中所產生的政府，但是在商業資本佔優勢的社會中，農民在經濟上沒有獨立的前途，加之，缺乏先進階級的領導，農民政權便形成內部的轉變而過渡到另一個階級，並且，還和農民的利益對立起來。王莽的變法，主要的是受着農民暴動的威嚇，企圖在農村中間遏制商業資本的發展，可是，經濟之向前發展好比奔流似的是再也不同！結果，爲要求土地的定期的農民戰爭又重新爆發了，而漢朝的統治也從此解體。魏蜀吳三國的鼎立以至於晉的統一，這一時期可算是地主豪紳以及商業高利貸資本因瓜分農民革命的果實而引起的分贓戰爭；晉朝最初牠在經濟上企圖復古，換一句話說，牠企圖以農業經濟爲統治社會的基礎，且因黃河流域自然環境之關係，水深土厚的確宜於農業經濟的開拓。然而自東晉渡江以來，經濟發展的路線又有一新的變革，商業資本又重新活躍起來，牠跟着移民的發展而走到窮鄉僻壤；那時的商人如王愷和石崇們的力，居然可以左右政局。

南北朝的劃分，在經濟上很顯然的形成兩個集團：南朝代表商業資本，北朝代表封建殘留；當然，

這並不是說南朝沒有封建遺骸的痕跡，同樣的，在北朝也有一部份商業資本的成份。這裏，關於隋朝之統一南北朝，許多的朋友曾經提出這樣的責難，說：『隋承北朝篤實之風，棄南朝浮華之習』，彷彿在經濟上這是個難於解答的問題；其實，有兩件事實已經答覆了這樣的責難：隋煬帝的開關連河與隋朝的國際貿易的發展，關於隋朝之代表那一個階級？我想在這兩件事實當中一定會求得個明白的概念。

隋朝既然代表了商業資本，而運河的開關，主要的爲的溝通南北的商業，同時，國際貿易的發展，如所謂『陳百戲於端門』，實際上是開了一次招待國際商人的展覽會。然而農民的膏血與商業資本發展交流，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又從這社會母體中產生了！在農民大革命的過程中，那班聰明的貴族都想乘火打劫來掠取未來的革命果實，而李世民因爲得着農民革命背叛者以及外族——突厥的帮助，竟獨吞農民革命的果實。唐朝商業資本的發展，更達到驚人的程度，開關了三處大規模的國際貿易港（即廣州，揚州，泉州），每年由國際貿易所得的關稅，竟爲當時政府公共收入的大宗；商業資本的發展，並未解決農村中間的矛盾，反之，使農民更快的失掉土地，使農村中間的鬥爭緊張到異乎尋常的程度，而黃巢的暴動，於是便在農村經濟劇烈破產的時期舉行了。唐朝的統治階級一方面雖然鎮壓了黃巢的暴動，而牠自己也從此開始解體了！宋代雖然繼承五代的混亂而趨於穩定，並積極的發展國際貿易，企圖在國際貿易港的收入下面建立堅固的政權（指南宋），可是外族的侵入，特別是遼金元的

侵入，使牠無法抵抗；最後，蒙古的商人以遊牧民牧的資格又搶得了統治中國人民的寶座！

元朝是中國商業資本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時代，所有全亞洲的財富幾幾乎完全集中在蒙古人的手裏；當時的國際貿易之驚人的程度，就是歐洲商業資本最發展的國家——意大利——的代表馬可普羅也爲之聳肩咋舌！這位意大利商人——馬可普羅在他的遊記中間對於中國國際港的繁盛以及商品種類之多和流通之速，曾認爲中國是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但是，因爲自然條件之限制及缺乏蒸汽機的發明，這種發展仍然不能過渡到工業資本的階段，換言之，這時期的客觀條件尙未形成中國的產業革命。在沒有出路的社會內面，固然談不上土地問題的解決，而殘酷的剝削勢必又要引起農民的叛亂！我們看元朝政府的顛覆，被壓迫的農民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線，他們用『鋤頭鐮刀』的力量，切斷了蒙古民族統治中國的線索。然而勝利並不是屬於農民，狡猾的朱元璋，在所謂民族革命的旗幟之下，掩蔽了農民的利益！他把民族的利益放在農民階級的利益之上，實際上不要農民們爲地主商人白充一次苦力。當然，在明朝統治的初期，那農民大革命的恐怖，的確是統治階級精神上的創傷；牠爲的要摩撫農民暴動的創傷起見，於是不得不作一些暫時的無恥的欺騙，可是對於農民暴動的最中心的問題——土地問題，仍是置諸高閣。

其實，這個問題是農民暴動的關鍵，牠——土地是束縛農民的鐐銬。明朝的農民以及千百萬的勞

苦羣衆，他們爲求得自己的解放，曾聯合了手工業者爆發了一次最偉大的農民戰爭。這一次的戰爭，彷彿和霹靂一樣，幾幾乎震碎了統治階級的心弦；爲了要鎮壓那所謂『殺人不可眨眼』的『流寇』起見，他們不惜出賣了民族的利益而與滿洲人勾結，歷史上有名的張獻忠和李自成領導的暴動；便在滿洲貴族與中國的地主官僚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刀槍之下葬送了！

滿清的政權，極乎明顯的，牠是代表滿洲貴族與中國地主商人的利益；同時，國際資本主義在這個時候也開始輸入中國，並且以大炮作先導：『在英國炮火之前，滿洲皇帝的權威，掃地無靈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全然打破了；封鎖未開與所謂文明世界未曾接觸的孤立，驟被侵入了；東西交通的開發，從此以後，在加利佛尼亞州及澳洲的黃金引誘之下，很快的進行。同時這個帝國的銀錢，——他的生命膏血——開始流出於大英帝國的東印度了。』（馬克斯）

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已經造成了中國的革命』，因此，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國』的革命，帶着極利銳的兩層性；他不僅反對滿清皇室，甚至，這個帶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牠還企圖從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下面解放出來。但是，白種人特別是英，法，美三國，對於中國少年的太平天國，認爲牠是妨礙國際資本主義的侵掠，而加以瘋狂似的摧殘，以致使這個少年的太平革命夭折。但是，反帝國主義的任務仍然擺在中國民衆的面前，義和團的暴動便是企圖解決這假任務的嘗試。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舊中國復興的象徵，四萬萬落後的亞洲人民已經走上政治鬥爭的舞台；佔全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他們已經從酣睡的狀態當中抬起頭來準備走向光明的道路了。可是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之下，牠（帝國主義）以大借款幫助中國德謨克拉西的仇人——袁世凱。因此，又壓平了中國的革命！烏里亞諾夫說：「在亞洲還能從事歷史進化學業的資產階級，他的主要代表或社會基礎祇是農民。和這種農民並立的，還有自由資產階級，他的活動家如袁世凱一流人物，是慣於變節的，昨天他們畏懼專制皇帝，便俯伏奴顏的表示服從，後來看看見革命力量起來，覺得革命德謨克拉西快要勝利，便棄了專制皇帝，明天又要背叛了德謨克拉西為與守舊的或新的「立憲」君主派結合以實行其陰謀。」

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粹派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支流。牠的興起，好似大海中的浪濤一般，有一百千里的趨勢！這個革命牠不僅要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並且還要澈底的動搖舊社會的一切制度，雖然，在半途發生了變化，不過我們在這些事變中間已經看見未來的遠景。

中國社會之歷史發展的路線，換句話說：也就是農民鬥爭的路線，不過，近代的農民鬪爭如果缺乏先進的革命階級及革命政黨的領導，那麼，仍然要走一次錯誤的「循環路」！

第二節 帝國主義給與農村經濟的影響

「有產階級既急激的改良了生產手段，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的利器，於是把一切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盡數牽入文明隊裏。它那價廉物美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炮，中國城壁爲他所摧毀；極端排外的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爲它所降伏。世界各國因爲要免得滅亡，都被迫得採用資本家生產方法，即將所謂文明的輸入到它們的社會，使自己也成了有產階級。要之，有產階級按照了自己的模型，造成了世界。有產階級已使鄉村屈伏於都市支配之下，它已建設許多都市，又將都市增加了比農村更多的人口，因之使多數人民脫離了樸素的田舍生活。它既使鄉村屈伏於都市，又同樣使野蠻和半開化的國民屈伏於文明國民，農業國民屈服於資本國民，東洋屈伏於西洋！」（國際工人同盟宣言）

帝國主義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遠在一八四七年已經爲握社會科學最高權威的卡爾·馬克斯道破了。誠然，中國的萬里長城被那價廉物美的商品的炮彈所摧毀，而整個的社會亦復融化於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系統之中；很多的人們，企圖把中國資本（即民族資本）和國際資本（即帝國主義）簡單的對立起來，這種觀點不僅爲理論所嘲諷，并且還受事實的抨擊。在分析帝國主義給於農村經濟以若何影響的過程中，我們首先便遇到兩個蒙蔽事實的敵人：即認爲帝國主義侵入以前

的中國社會，是所謂純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是揚棄了商品的經濟而需要自然經濟；中國自牠侵入以後，社會的結構不僅沒有改變，甚至牠——帝國主義還在妥協和維護中國的封建制度，與封建制度互相勾結，因此，在農村中間造成了長期的中世紀的剝削，並障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另外一個從左邊來的敵人則說：自帝國主義侵略以後，所有的一切的封建關係，彷彿和秋風吹落葉一般似的已經一掃而空，就有一些殘留的成份，都爲資本主義的洪濤洗刷得乾乾淨淨！

這兩種不正確的觀點，同樣的都是有害於我們對於帝國主義具體的分析，同樣的都是沒有抓着問題的中心。

帝國主義依據於砲艦的掩護，在造成商品的形式之下，在中國開拓了大規模的交通網：建設了鐵路和輪船，那巨大的工業資本經過了這些交通利器的介紹，便和那窮鄉僻壤的農民見面，遠處在太平洋彼岸的煤油大王以及歐洲工業資本的領袖，此刻也和素不相識的朋友——中國農民握手言歡了！在此種情況之下，帝國主義的作用不僅不是很簡單的把中國變成他的市場，甚至把中國的農村經濟也牽入於世界商品流通的漩渦之中。我們從海關統計的材料當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大量輸出，在每隔十年牠的輸出額總有兩倍以上的增加；自從農村受國際市場監督以來，而農村工業化的現象是異常的普遍：在北方以滿洲爲代表，黑龍江流域一帶，大荳的輸出佔出口總值百分之八十，

黃荳等糧產，已成爲國際貿易重要的商品。在沿海一帶墾植公司的林立，棉花的種植把稻田和鹽池的範圍排擠到異常狹小的程度；在黃河流域我們可以看到的，煙草的密佈幾幾乎有代替高粱以及麥類的趨勢；而長江流域不用說「絲」和「茶」是有大規模的發展，沿京滬滬杭兩條鐵路附近，桑園彷彿遮蔽了農田；珠江流域特別是以廣東爲代表，這個地方的農民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誠然是有點像「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情形！同時，農村的副產——養雞業，牠在對外貿易中亦佔有很大的作用：「中國雞之生產物（包括鷄毛，羽，鷄蛋，蛋白，蛋黃——著者）的輸出：一九二三年爲二九·二百萬兩；一九二四年爲三一·百萬兩；一九二五年爲三三、四百萬兩；一九二六年爲四〇·三百萬兩。」（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四六〇頁）最近，養雞業更比以前發展，僅就鷄蛋一項對菲列濱輸出而論，其總值每年竟達「菲幣二百五十萬元」（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九日申報）

於此，我們深切的相信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影響彷彿和細菌對於人體的影響一樣，牠的發展是異乎尋常的迅速，祇有澈底的採用猛烈的革命的注射劑，才能消滅這一毒害人類的細菌！

第四節 農民鬥爭與土地問題

根據農民鬥爭之史的發展的路線觀察，我們有權利可以說土地問題是農民鬥爭的關鍵；歷史上每

次的農民暴動其主要的原由厥惟農民失掉了土地，土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地主和商人他們依據於「土地所有權」（即土地資本）對使用土地的農民，加以極殘酷的剝削，其兇殘與無恥可以說是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當然，這種有目共覩的社會的矛盾，勢所必然的會引起在表面上站在被壓迫階級與壓迫階級之中間而實際上仍是代表壓迫階級的政府所注意，而把這一問題置入議事日程。例如在春秋戰國的時候，那所謂儒家的孟子曾提出過一種反動的什麼「井田」制度以作土地問題的對策；其實，凡是受過新興科學洗禮的人們，誰都會了解所謂「井田」制度是和上帝一樣的同是奇蹟，就當時畝的面積的狹小和生產技術的落後與夫政治組織紐帶的鬆懈，的確是不能形成什麼「百畝之田」和「八口之家」的「井田」制度，這完全是所謂儒家的幻想。中國的孔子之徒——士大夫們之唯一的技術便是「託古改制，而「井田」制度也就是託古中的一斷插話。王莽的「王田」，南北朝及唐初的「均田」制度，王安石的「方田均稅」，很多很多的關於土地問題的答案，都沒有打通中國歷史上土地問題的道路。

土地對於農民，好像枷鎖一樣的束縛了農民。

近來因為農民運動的發展，逼得那班溫情主義者不得不採取改良的政綱企圖在農村中間建立起理想的樂園，但是改良的藥方，終於不能治療這一歷史上根深蒂固的痼疾。

依據於上面這些關於土地問題之歷史的敘述，必然的會迫得我們每一個研究農民問題的人們自問：目前的中國究竟是需要土地革命抑或是土地改良？

此页空白

第二章 中國古代農民戰爭的意義與教訓

第一節 中國社會的轉形期

(一) 中國社會之史的演進

中國社會史發展的形式，一般的講來，和西歐各國同樣的屬於一個社會進化的範疇；如由原始共產社會推演到血族共產社會的階段，循此階段繼續的演進，經過氏族共產社會而踏進封建社會的大門。當然，這祇不過是指過去社會發展之一的趨勢，至於那些『東方式』的民族的特點，仍然是含有牠的內在的特殊的意義；並且在某些重要問題上，還引起一般人們的爭執。

中國國家起源的問題，便是人們對於中國社會發展史爭論的中心。很多的人們——特別是歷史學家，都想企圖根據他們的認識來參加這一理論的戰爭；在這裏關於含有神祕性的論調，我們在這裏不層多所列論，祇舉出那表面上帶有科學而罩的觀點來加以分析。例如德國的歷史學家馬克士·韋伯爾

他肯定的說中國國家的起源由於「治水」，而中國的熊得山也異口同聲的喊叫「治水」是中國國家的起源！在所謂東西洋學者企圖決定這一歷史爭論的時候，而蘇聯的赤色教授——馬札亞爾又復手舞馬克斯「亞洲式生產方式」的盾牌（實際上他已經是修正了馬克斯的意見）衝進戰場來發揮他自己的觀點；他說：「中國的官僚制度（即國家的起源——著者）不僅是在和游牧人鬥爭的場合上產生，而且也在和水的鬥爭；並且也不僅在和水（洪水）爭鬥，如拉狄克之了解韋伯爾——而且是爲着求水的取得（灌溉）。」（見馬札亞爾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中譯本六十九頁，神州國光社出版）這理論的實質，與韋伯爾熊得山的觀點並沒有原則上的區別，不過是說法不同罷了。

而拉狄克他關於中國國家起源的分析，便和他們有很大的不同；他很無情的駁斥了「治水」的觀點。他認爲這種觀點不能算清歷史上賬目，反之，祇有模糊歷史的階級性：從來歷史上沒有超階級的政權，因此，他的結論是：「中國是在和游牧人鬥爭中產生」。他這理論的正確，誠然是抓住了東方國家的鑰匙。

很顯然的，中國民族的誕生，並不是出於「一元」的系統，如：商出於玄鳥，周出於姜嫄，任宿須句出於太皞，郟出於少皞，陳出於顓頊，六蓼出於皋陶庭堅，楚夔出於祝融鬻熊（恐是一人），據此，他們是各自有祖，何嘗有「一元」的痕跡呢？可見在上古的時代，中國的民族是異常的複雜，其

中當然要有一種民族，牠能夠發明生產工具，並依據於生產工具的發明，使農業經濟有了新的發展。這種發展其勢必影響到其他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甚至，游牧民族牠不懂得農業的生產，也往往的侵犯到經濟發展較高的民族，如赴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帶從事牧畜等等。彼此都爲着種族的利益，不可避免的要舉行很劇烈的鬥爭！在鬥爭以前，這些種族的內部，彼此勢必至於都要推舉一個戰爭的指揮者，指揮軍事的行動，這是我們可以推想得到的。當然，這鬥爭的結果，農業經濟發展較高的民族，勢所必然的是佔着優越的地位；那些游牧民族在經濟上沒有相當的供給，特別是食料的缺乏，是要遭受很殘酷的失敗！勝利的民族，牠們一方面擁有龐大的軍事組織，另一方面又得着大批的俘虜——奴隸，在這兩個條件之下，推動了牠們的領袖走上支配的地位，建立了表面上彷彿是處理事務而實際是統治人民的政權，而形成了中國的國家。

中國社會的序幕究竟從什麼時期開始的呢？

歷史上所謂『三皇五帝堯舜』的故事，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最可靠的材料詩經的曠原中，並沒有牠們的涉跡；在東周初年（詩經是東周初年的東西）祇有一個禹是被人們公認爲歷史上第一個支配者；如『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商頌長發）『是生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續禹之緒。』（閟宮）到了東周的末年，才有所謂堯舜的發現（堯舜的故事從什麼時代發生？這

是很難判斷的！就我們現在的材料所知道的：左傳是戰國時的著作，尙書中的堯典，皋陶謨也靠不住，論語是比較的可靠，因此，論語中數稱堯舜，我們才斷定牠爲東周末年所發現。到了戰國時因爲秦文公夢黃牠的關係，經過方士們的鼓吹，馬上又建立了一個想像中的人物——黃帝。從此以後，人們把許行所假託的神農立在黃帝之上，接着更從易繫辭中找着了庖犧，而把牠放在神農之前；到了秦始皇的時候，李斯們又創造了一種歷史理論的體系；說什麼『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迨至漢朝，問題更是越說越遠，因爲他們在經濟上和苗族溝通的關係，把關於苗族始祖傳說的影響接受過來，又承認所謂『盤古』爲開天闢地的元勳！

這種情形，誠然如汲黯所說：『譬如積薪，後來居上』啊！

實際上，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禹並不是中國社會序幕開展的時代，因爲禹是神話。很顯然的，詩經上說『洪水茫茫，禹敷土，土方』，禹簡直是上天派下來的神，並不是處理了九年『水災』（？）和『三過家門不入』的偉大人物！這是過去統治階級欺騙民衆的神話。因爲照當時的生產技術與交通梗塞的形勢來講，禹非但不能治理那氾濫的洪水，就是假以九十年的時間要他親自去巡視一次也是不能的事情！

那麼，禹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據顧頡剛說是從九鼎上來的。他認爲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

物，并根據「說文，禹一蟲也，從內，象形。」內，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顧先生這種判斷，誠然是合理的分析。並且，禹如果是存在的話，商對於牠的敷土的恩澤應當是感謝尙且不遑，爲什麼又要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而要殺戮牠的子孫呢？可見歷史上並沒有禹這樣的一個始祖，同時夏與禹也沒有什麼血統上的關係。

中國社會的開幕，就我們現在所有的材料，祇能夠判斷牠從商代開始！據詩經長發說：「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又說：「相土裂之，海外有截。」很明顯的，商代已經建立了鞏固的政權！

我們爲結束歷史上這些爭論問題，因此，不能不答覆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幾個成問題的觀點：

(A) 郭先生認爲中國有過長時期的趨階級的政權，並且說「西周以前」是「原始共產制度」的「氏族社會」（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十三頁）！而他的主要論證之觀點是：「堯皇帝的兩個女兒同時嫁給舜皇帝，舜皇帝和他的兄弟——象，却又公妻這兩位姊妹。孟子上有象說的話，要「二嫂使治朕棲」；楚辭的天問篇上竟直說是「眩弟並淫」。所以舜與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與象的公妻。她們或是他們正是互爲「彭那魯亞」。（見同上書第十六頁）可是，郭先生這種巧妙

的說辭，並沒有找着問題的本質，反之，祇有頭顱顛倒暴露自己的矛盾罷了！

我們假使承認中國史上有堯舜的話，那麼，問題就不能一次決定了。西周以前是無階級的原始共產社會；假使認為楚辭上的「眩弟並淫」便判斷其為公妻社會的象徵，同樣的也是自欺自欺人之談！就楚辭的本身來說：牠是描寫某一地方的風俗作品，並不是研究中國歷史的文獻，並且楚辭一書是否後人的假託以及秦漢以前是否有屈原其人！目前尙成爲爭論未決的問題？！（參考胡適文存第二集）

退一步講，我們把這些一時不解決的關於考古學上的爭論，保留到以後重行討論；茲就唯物史觀的ABC來說，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什麼超階級的國家！

恩格斯說：『國家絕不是從社會外加於社會的一個強力，也絕不是如黑智兒所肯定的是「道德思想之實質」，「理性之外形和實質」，他是社會發展到了某個階段時的產物；牠是社會到了本身有不可解決的矛盾，和不可調和的衝突而又無法擺脫時之體現。而且爲使這種矛盾，使這些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段不致互相破滅，爲使社會不致破壞於沒出息的鬥爭當中，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實際則用以緩和衝突，而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之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須了。這個由社會產生而超出於社會之上且逐漸與社會脫離的一種力量，便是「國家」。』（見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德文第六版一一七至一一八頁）

恩格斯這一段關於國家政權的意義及其歷史任務的分析，的確給我們研究國家問題以許多基本的觀念。并且，還把郭先生那種超階級的國家觀，打得粉碎！因此，任憑郭沫若先生怎樣的帶着唯物史觀的面罩，但是這面罩就是不爲恩格斯從他的臉上取下來，也是不能掩蓋他曲解歷史的原形！

(B) 郭先生說：『中國歷史是從商代才開幕，商代的農業是以牧畜爲本位，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共產社會，』（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十二頁）關於這一問題似乎有討論的必要，因爲郭先生既否認歷史上堯舜和蚩尤們的存在，爲什麼又說那時不是中國的歷史？如果說從地質學的發現來證明那時的生產工具是『金石並用的時代』，但是一九二八年於殷墟中掘出來的『鐵』爲什麼就令郭先生感覺得『一聲霹靂』而要加以遲疑呢？『鐵』的掘發當然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牠能夠解決人們對於中國古史上的重要爭論；可惜得很，這掘出來的『鐵』，據郭先生說恐怕牠是在地質的浮面（？）；在我們未有新的材料來繼續證明殷墟中的『鐵』爲可靠外，因此，對於這個問題祇好擱着不談！

不過，商代的社會是否爲原始共產制度的社會？牠的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否以『牧畜爲本位』？這都是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如果受着新興科學洗禮的人們：誰都知道歷史上絕不會有超階級的政權！那麼，商代的社會就其龐大的軍事組織來說，也絕不是什麼原始共產制度的社會！至少牠已經離開了氏族共產制度而走進封建的初期。我們看了『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和『邦畿千里』的這些象徵歷史

的話，更爲商代社會離開了氏族共產社會範圍的旁證。如果商代的經濟真是以牧畜爲本位的經濟，那麼，牠也絕對不能維持着這樣一個『邦畿千里』的政權！並且就地理而論，商民族建立統治的地方——河南，牠處在黃河流域，有豐富的水源，有肥沃的土地，這些自然環境都是有利於農業經濟的發展。其實，這些簡單的事實，是會逼得郭先生承認商代也有農業的發展，可是，那種『超階級』的學說終於遮住了他的眼睛！

這一類屬於考古的問題，當然還值得我們繼續的研究與探討；然而對於原始共產制度最後階段——農業共產體經濟發展的形態，在歷史的和經濟的意義上，仍需要我們作一番比較簡明的申述。

不幸得很，像這類的材料在中國歷史上實是稀少，因此，我們引用盧森堡的話，來指明牠與國家形成的聯系。

盧森堡說：「集約的耕作，在當時農業技術的階段上，只能由更集約的小經營來達到。以同一的受分地，依各個農家，更加長期利用的這件事，是成爲細心處理分配地的前提條件。尤其是土地的施肥，成了不常分解的原因；在德俄二國，都正如出一轍，無論在何處，都是一樣可以看得出在「瑪克」公會的生活中，改分的期間，漸漸變爲延長的特徵，這就是到處由分配地的所有遲早變爲世襲所有的結果。由公有向私有的移動，與勞動的集約，可以同一步調整理，我們由此可以研究以下的事

實：即森林與牧場經濟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附帶長期的共用地；及之，集約的經營的農業，那是最初開闢了到共有地分割的路。接着就開闢了到世襲所有的路。」（見經濟學入門）

我們根據她的分析，農業經濟的發展，是破壞了原始共產社會的均衡，並且，在這發展的過程中，還開闢了未來的不平等的道路！本來，在中國從原始共產社會過渡到國家政權形成的這一過程中，歷史材料的搜集，其困難已如上述，而這段話的徵引，大可為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借鏡。

於此，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結論：國家政權的形成，使社會發產很大的裂痕，而階級對壘的戲劇亦從此展開於歷史舞台！

（二）中國封建社會形成的內容與特質

封建制度，牠是歷史車輪向前發展所必經的階段，牠是整個社會進化的一個過程；形成這一歷史過程，當然，有許多很複雜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而絕對不是突如其來的變化：就是說，這時期農業經濟的上升，催促了剩餘生產品的出現，推動了那班上層份子——特別是諸侯領主離開了直接生產的領域，而憑藉其身分特別是宗法血統的關係，榨取廣大下層的農奴。

同時，封建社會之經濟的紐帶是異常的薄弱，因為剛纔離開了那「物物交換」的狀態，一時不能

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經濟中心，所以在封建社會初期形成的時候，除掉了農業經濟而外其他的經濟成份是很少表現其作用！

拉發格說：『封建的財產，並與封建財產相適應的社會組織，是為家族集產主義，更正確的說來，乃是從血族集產主義到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一個橋梁。』（見財產進化史）這分析誠然是找着封建社會形成的中心。不過，民族間彼此互相掠奪的戰爭，也是促成封建社會的建立與削弱的一個政治上的酵母。

歐洲方面，關於這彼此互相掠奪的戰爭的事實，在希臘英雄歌中有一段很好的描寫：

英雄歌：

我有長槍和利劍，

並且還有盾，

把我的胸膛做戰壘，

為的要發財！

我用這些東西耕，

我用這些東西穫，

我用這些東西製造甜蜜蜜的葡萄酒，

我用這些東西使奴隸們——

叫我做領主！

並且還要使那些不敢荷槍帶盾的人們——

跪在我的面前如跪在主人面前一樣，

我還要使他們叫我做大酋長！

（見蔡和森著社會進化史）

我們從這一段描寫當中，封建社會的政治內容，是可以想像的。不過在中國是有一點和西歐不同：這不同點特別顯著的就是宗教。

支配着歐洲整個世紀人類精神生活的宗教，在整個的西洋史上是佔了不少的篇幅，在封建社會中起了不少的作用，然而牠（指宗教）在中國純封建社會裏起的作用是很少，設若和歐洲比較起來，那麼，真是滄海之一滴！

現在，我們用物觀的顯微鏡，對於中國純封建社會加以詳細的檢查：

（1）生產方式：我們檢查封建社會的首要任務，應當側重在對於該時期生產方式的觀察；因此，

對於古代中國的農業生產技術，的確有指明之必要。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探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見文獻通考）

很顯然的，這種生產技術，已經帶着深耕的性質，比氏族共產社會的生產技術進步，不過，這種方式還是指着封建初期而言，當然，牠在發展過程中，還會繼續的進步。

(2) 剝削關係：封建社會的剝削，其對象是廣大的奴隸和農奴，而其最初的方式亦是強制的掠奪自然物；可是農業經濟的上升，使生產離開了物物交換的狀態，更加刺激了統治階級奢侈程度的增加；於是在整個農業經濟的體系之內，逐漸的產生了剩餘的勞動，而加重對於農奴的剝削。最顯明的，如殷代的剝削，歷史曾有這樣一段插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營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亦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史記卷三第五頁）從這段插話的反面，可以看到的，是那班奴隸及農奴被剝削的痛苦。

迨至周代，剝削的關係更加發展，甚至還有類似土地法的頒佈：『載師，掌任地之法。凡任地，

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見文獻通考田賦門）這土地上的剝削近輕而遠重的原因，據鄭康成說：「近者多役也，園廩亦輕，廩無穀，園少利也。」我想，這話是當相的近理。到魯宣公的時候，其剝削關係越發苛刻；不僅征取什麼「什一之稅」，還要更進一步來稅畝。據穀梁傳載：「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於此，我們姑無論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而其實對於農民之剝削則異曲同工也。

(3) 土地分配的形態：在封建社會中，所謂諸侯，領主這一封建階層，他們是不參加生產，並且還對參加生產的那些奴隸和農奴加以無情之壓榨。現在我們除了敘述封建統治的剝削而外，再來進一步的審查，當時奴隸和農奴的生活——特別是土地分配的情形。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廩，田百畝，菜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廩，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廩，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

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此係周代之授田制度。我們如按大司徒及遂人之說，則田肥者少授，田瘠者多授。如按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要之其授田則一。不過，一以人口爲標準，一以土地肥瘠爲標準。然而據食貨志所說：「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再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也。若山林藪澤，宗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授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上，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則又不免與上說稍有出入，究竟誰是誰非呢？據我們的觀察，以食貨志的敘述較爲可靠也。

(4) 土地所有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見詩經）這一古代的歌謠，常爲孟子所引用，牠的主要的意思，係指當時土地所有權之屬於國家。本來當時的所謂國家與君主，並沒有什麼嚴格的區別，而「天子」的名稱亦即是國家與君主的混合體。關於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的這一類史蹟，我們還可以找着很多的材料；如「初服於公田」（見夏小正）一語，即係表明所謂夏代以前土地制度的轉變，亦即是開始由氏族共產社會轉變到封建初期的描寫。并且，土地關係發展到這

一階段，已經有個明確的決定，如：『田里不鬻』（見曲禮）。便是對於土地所有權有一肯定的概念，即規定土地所有權之屬於國家。

雖然，土地關係還是繼續的轉變。

所謂天子常常把牠『所有』的土地，根據自己的喜怒，用封建的形式——『錫之山川，田土增庸』（見詩經閟宮文）——轉移於諸侯之手，而諸侯亦以此土地贈之於自己的走狗——公卿大夫。這種詳細的情形是：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位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之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見孟子卷五萬章篇。

諸如此例之「采地」和「食邑」的事實，在中國封建史上的確是數見的不鮮的事情呀！

(5) 階級意識的劃分：在封建社會中，階級對壘的形勢雖不若資本主義社會之簡單和明晰，然而因生產關係和政治結構的聯繫，根本是不能消滅這階級意識的存在，甚至只有使牠逐漸離開模糊的狀態。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見論語第二卷里仁篇）

很顯然的，「富貴」與「貧賤」這兩個名辭在封建社會中不僅是不能混合，並且還是很森嚴的對立着。由這個對立，甚至還影響到統治階級內部的所謂「身分」問題，而加以嚴格的區別；如周時魯大夫季孫氏以大夫之資格而用天子的禮樂，引起孔老夫子大發雷霆，他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見論語卷二八佾篇）由此可窺測到當時階級與閥限的森嚴了。孔老二的門徒——子貢，他是個商人，他他知道當時階級對抗的危險，所以時常發表他「折衷主義」的理論；如他在孔子面前提出什麼「貧而無詬，富而無驕」（見同上書卷一學而篇）的話去問孔子，實際上這類階級調和的意見，並沒有阻礙被壓迫階級意識的發展。

所以，像孔老二及其門徒，這班封建階級意識非常濃厚的人們，時常受着羣衆的咒罵：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

丘」。曰：「是魯國之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者？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見同上書卷九微子篇）

我們以這一段歷史上封建階級的自己供狀當中，已經發現了羣衆意識是怎樣的與封建階級的不同了。

代表被壓迫階級意識的材料，在詩經上則更有如下的記載：

「坎坎伐枌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殮兮！」（見詩經代枌）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見同上碩鼠）

被壓迫羣衆之對統治階級的責難，的確使統治者無可反駁。誠然，階級意識對壘的發展，不得不

使統治階級有這樣的感覺：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以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宜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見國語周語）

（記召公語）

現在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內容和特質，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總結：中國封建社會，牠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中間，社會組織的形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另一方面，奴隸農奴與領主諸侯的鬭爭以及領主諸侯之間相互的鬭爭，亦是構成這時期政治活動的內容；其經濟成份，農業經濟（自然經濟）是佔主要的支配地位，大部份的生產品生產目的仍然是爲滿足一己的需要，而並不是商品的形式。特別是土地所有權操之於君主諸侯以及士大夫之手，而不能自由買賣，亦即是說，土地關係上也沒有商品的形態。同時，宗教的作用，其支配政治的成份是非常之少，如和歐洲衡比，的確是有天淵的不同！但這並不是說『神權』和『迷信』在古代沒有一點歷史的影響，如『神道設教』以及歷史上許多神話的傳說，都是這些影響的表現；不過，因爲中國社會組織的複雜，所以和西歐的宗教是有很大的差異。

(二) 商業資本的抬頭與自然經濟的沒落

中國的商業資本並不是偶然形成的，牠經過長期的封建社會——特別是自然經濟的孕育，而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了某一適當的階段，始從牠的母體——封建社會——中誕生出來。這個母體——封建社會——自誕生此胎兒以後，已經不復像過去那樣的康健，而逐漸的開始衰頹；當然，這種衰頹過程的長短，還是要靠當時的生產力來決定的。現在，我們首先來檢閱中國的商業資本吧：構成商業資本的主要條件，是生產品離開了物物交換的狀態，而代之以貨幣流通的形式，也可以說貨幣關係的發展是商業資本形成的主要動力！關於貨幣發展的歷史形態是這樣：「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管子曰：「……夫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太公立九府圖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

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貧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是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苦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以上統見馬端臨著文獻通考錢幣門）

以上這一些關聯於貨幣關係發展形態的歷史的敘述，可以使我們從中找着許多基本的概念；這即是說貨幣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已經起過了作用，起過了媒介的作用，如「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這些話是媒介作用很好的證明。迨至周時，則更有明白的決定，所謂「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買賣之」，又爲貨幣流通之旁證。但這些不過是指明中國貨幣關係之早期存在，而

尙未涉及中國商業資本之具體的事實。現在我們再來看歷史對於商業資本是怎樣的描寫啊！

『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柚，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璣，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較大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教發徵期會者？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兄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大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買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之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災，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越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居高者，安歸乎？傷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兼并，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歸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魚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虎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竭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云：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

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麋；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陵蜀江漢千樹橘；准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濟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干畝厄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井市，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至若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醴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身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未富，貧者之資也。食賈三之，廉賈五之，此皆誠壘之所致。由此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封素哉耶？非也？』（見史記貨殖列傳）

司馬遷這一段關於商業資本的冗長的敘述，我們所可把握的是：第一，各地方的經濟已帶有類似「分工」和「部門」化的色彩，如「山西饒材竹……」「山東多魚鹽……」「江南出柚梓……」「龍門碣石多馬牛……」。第二，許多的貴族官僚都被吸引到市場來，寧願冒着「市儈」的名義而從事於市場上的商業戰爭；如范蠡「之陶爲朱公，……以陶爲天下之中心，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遂至巨萬」。第三，指明一般社會的人們，爲市場所吸引而怎樣的「唯利是圖」？如「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兼併，……不避法禁……皆爲財用耳」。第四，指出都市繁華和娼妓制度的發達；如「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揄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第五，在商業資本發展的過程中，統治階級的社會組織和行政系統，已經是篡亂不堪；如「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總括的說，這些現象都是瓦解封建社會的象徵；所謂「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誠然是商業資本在封建社會中抬頭，及活動的寫照。

此外，關於商業資本抬頭的事實以及手工工業崛起的情形，我們還可以檢出一些材料：

『司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敝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辦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度量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爲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餘。』（見周官）

在周代爲商賈之事，專門設一種『司市之官』，其商業繁盛之程度，可見一斑！並且這種所謂『司市之官』的性質，不僅在於處理一般的商業上事務，甚至還含有一種有計劃的帶教育性的內容。

在商業繁盛的條件下面，手工工業也有相當的發展；據考工紀所載：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鞣，韋，裘。設邑之工：畫，績，鍾，筐，篋。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瓶。』

這種手工工業分工的程度，雖中世紀的歐洲，亦無如斯之發展！並且，據劉師培說：『周代之工，必諳數學，如百工審曲面執（曲句股也，面平方也，執立方也），及磬氏之度句股，匠人之度日景是也。即車人梓人之製物，必度其廣與崇方，非深於數學者能之乎？』（見史地學報第三卷一期）
周代教育之研究一文）此種推論，似乎近理，更可爲周代手工業發展之旁證。

因此，關於蘇秦所說『臨淄七萬戶，車轂繁八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見齊

策），這一點，於市場繁盛的描寫，我想他決不會是主觀的形容與想像，而是一定的客觀事實的反映。商業資本抬頭的另一方面，很顯然是表示自然經濟的凋殘；其分崩離析的情形，在周代已異常明顯。現在，我們可以審查牠——自然經濟崩壞的情形及其影響於統治階級的政治組織。詩經載：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日而微，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燂燂震電，不甯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正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子，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塞，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小旻）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租，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母，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甫田）以上見詩經。

從這些詩句中，我們可以找着很多自然經濟凋殘的象徵；例如所謂『燂燂震電，不甯不令，百

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這段話，豈不是充分的暴露了農村組織的變化嗎？並且，這種變化的迅速，使這些被壓迫羣衆彷彿和觸電一般似的感覺得震驚！在這種情況下的被壓迫的勞苦羣衆，祇有艱難困苦的去與命運掙扎；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便是牠的真實的意義！在與命運奮鬥的過程中間，偶爾得着溫飽便喜不自勝；如「籩彼南畝，田峻至喜」。實是一個最好的例。其自然經濟的崩壞情形，在當時是非常劇烈，而我們所徵引，不過是其一端而已。由經濟結構的凋殘，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引起牠的上層建築物——政治組織的混亂和崩潰；其反映到政治形態上面的，如初八百餘國，殆至春秋戰國時所存者不過七國，而過去其他的小國，悉爲七國所吞併；當然，吞併並不是「和平轉變」的名辭，牠是含有很殘酷的流血的戰爭的內容。

關於流血戰爭破壞自然經濟的情形，據詩經的記載是：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狄來無棄！』」（陟屺）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見小雅采薇）

「肅肅鴟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見唐風

鴟羽）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見小雅何草不黃）

『中谷有藿，曠其漙矣！有女卍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其及矣！』（見王風中谷有藿）

『有惡爰爰，離雉於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吽！』（見兔爰）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慣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見若之華）

長期的戰爭，不僅在政治組織上，會使那些小諸侯的統治趨於沒落，並且還催殘了自然經濟的後方；我們在這些徵引的詩句中間，充分的看出那班被壓迫的農民因受戰爭的災禍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當然，在戰爭爆發的前夜，統治者何嘗不以『弔民伐罪』的口號去欺騙羣衆，可是這種欺騙的宣傳當然是不能解決問題！因經濟的矛盾而聯系到政治上的鬥爭，這完全是歷史發展很自然的現象，而亦爲統治階級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不過，我們看到的，這一時期的統治階級及其御用的學者，他們都幻想解決這些矛盾的問題，因此，他們之間都是互相『鉤心鬥角』而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從另面去爭取農民羣衆。

統治階級爭取羣衆方式，至戰國時已經知道從經濟方面着手；因爲羣衆在整個的混戰期間，受着戰爭的影響，使農村經濟破壞不堪，聯帶又影響則農民生活的痛苦。當時農民們因征役的苛繁和壓迫

的加緊，時常寧願拋棄國家而到比較安靜的國度去；這點，特別是在那些農奴逃避中表現得利害：如『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見論語卷七子路篇）其實樊遲因爲他農奴逃跑了，向孔子請假回去種田，這本是人情之常，而孔老二偏不相諒，竟大發牢騷，說他自己『不如老農』，并責備樊遲是個『小人』！像孔老二這種不正確的觀念，在現在中國思想界還有相當的影響；即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把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分開，因此，使一般人們都到書中去求『黃金屋』和『顏如玉』了！總之，在這段歷史插話當中，關於農奴逃跑的情形，我們可以推論想得到的。同時我們在孔老二的說話中，關於農奴逃跑的事實我們還可以找着一點痕跡：如『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見論語卷二里仁篇），在孔老二的意思，要想以倫理的觀念去遏止農奴的逃跑，殊不知這一個倫理的空殼決不能代替很實際的經濟的要求。

繼孔子而後的，便是孟子。孟子他是企圖解決這些矛盾的一個。他在和梁惠王對策中，他曾說：『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梁惠王聽了他這一段

話，不禁打動了他內心深處，所以他便要孟子告訴他達到此目的策略，而說『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善於雄辯的政客——孟子，認爲梁惠王可以支配，因此，便滔滔不絕的發表他的對策，說：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終歲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贍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見孟子梁惠王）

孟子他以爲解決當時的矛盾，一方面要行『仁義』，另一方面要解決那些農奴問題，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不過，這種論調祇可一時市僧人心，而決不能醫療統治階級的『大欲』！

歷史進化的車輪，推翻了孟子的幻想，而封建社會的上層亦日漸削弱，特別是閹閹的破產和一般

平民的抬頭；如飯牛的甯戚和賣作奴隸的百里奚，這一班人，過去是爲封建閥閱所不齒，這時期都爬到社會的上層——做了很大的官。在平民闖進政治舞台的時候，封建社會不僅消蝕了他的內容，就是外觀也迥非昔比，經濟中心都建築在幾個商業和手工業的領袖手中；如猗頓之以鹽鹽起家，郭縱之以冶鐵稱富，烏氏僕爲牧畜首領，寡婦清之僱工穴礦；他們雖是平民出身，可是他們的生活竟與王者埒富！他若鄭國人——弦高犧牲少數商品，居然能紓國難，而鄭子產也說其國君與商人世有盟誓。政治舞台上既是這樣的五光十色，怎不使那班封建階級的閥閱們感慨流涕而訴之於詩呢？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見詩經小雅)

以落後階級的意識和閥閱的眼光而從消極方面去咀咒政治，其不爲歷史所克服者，「未之有也」！這裏，緊接着便在封建社會開始崩潰的廢墟上誕生了一位偉大的時代產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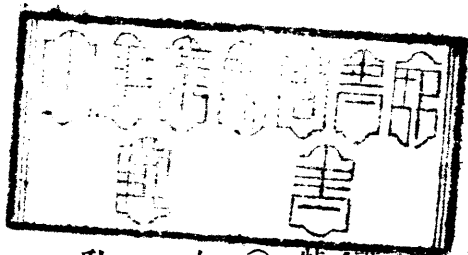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再來敘述這時代的一位偉大的產兒——商鞅吧。

商鞅的變法一般的講來並不是離開客觀環境的幻想，却却相反，他的意識完全是當時經濟發展的反映！他在歷史上的偉大和不和磨消的地方，不僅在於堅持他的主張從理論上戰勝了當時的反動勢力

——孔子老子和墨子，并且還開闢了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使秦國強大起來以至於造成秦始皇統一的

客觀基礎而推動歷史前進。關於商鞅的生平，史記曾有一段簡單的記載：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地廣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策。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我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咸陽，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必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公子印，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爲秦立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行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師傅，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



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見史記卷五秦本記第五，及第十頁）

我們看了這段歷史，商鞅的生平及其對秦國經濟上政治上的幫助，可以概括的明瞭；總之，這一變法之客觀的進步意義，任何人都是不能否認的。所以連杜氏通典也說：「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寡人廣，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莫敵！」可見歷史的事實，是不容人們的抹煞！不過，關於商鞅變法的學說及其中心主張，在這裏的確要有比較詳細介紹和指明的必要，否則，對於這變法便是機械的形式的了解。第一，商君以辯證法的立場來說明他的變法的觀點：如「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見商君書更法篇述商君語）這一觀點的確立，不成問題的是針對着歷史的進化；但是他也知道一般人們——特別是守舊的人們的心理是「畏難苟安」而不肯前進，所以很堅決的說：「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見定法篇）祇有相當的採取政治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他在和秦孝公討論推行新法時，曾決定如下的辦法：

「公（秦孝公）——著者）問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且欲使天下之吏民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爲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法令之謂即是法律講的是什麼的意思

——著者），以爲天下正。……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各皆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按此句當有訛脫）。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見定分篇）

雖然，這還沒有涉及到問題的中心。關於發展農業經濟和爭取羣衆之『富國強兵』的政策，據商君書說：『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興徒重者名當名（此三句有譌字——著者），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則草必墾矣！』（見墾令篇）這種理論，誠然是帶了很濃厚的重農主義的色彩，驟然觀之，未免與秦之富國強兵之商業資本的前途有所抵觸，實際上，這個複雜而必須解決的問題，列甯在俄國問題上他已經先我們而解決了。他說：『因爲要測定資本主義的影響，首先就要努力去區別農業的自然經濟和商業經濟，所謂自然經濟，如一般所知，不是以市場爲目的的生產，而是以經營者家族的消費爲目的的生產；這種生產在農業方面，雖有較大的作用，但是牠漸漸的把牠的地位讓給商業的農業。』列甯這種分析是非常確當的，商君所認爲發展的農業是商業資本的前途，換句話說，是商業的農業！其原因由於秦處西陲，開化較晚，天然產物，雖甚豐富，但地廣人稀，主觀上不足發展商業的

農業，於是方面吸引鄰國的破產的農奴來參加生產，造成農業的大量的發展，另一方面，藉此以統治別國而發展自己的前途。所以說：『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財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此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已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者，……後之三世，無知軍事。……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敵戰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見來民篇）這些議論，更可爲商鞅發展商業農業之另一證明。

（註）爾君書有人疑爲魏是後人所假託，如胡適之即是一個（見中國哲學史大綱二百六十三頁）。我以爲這書不見得全部假

託，當中有很多是商鞅自己所發表過的意見，不過免不了被後人滲雜一些不倫不類的東西，所以對於該書的惡度，應該辨其異同，求其是非，決不能全部棄之而擲頭不顧！並且滲雜的時間，依著者推想大概仍在戰國，最長也不過

秦朝吧！

自然經濟沒落的情形及其原因，我們已經有了很長的敘述，在此可以相當的告一結束了。然而這時期的封建階級爲要挽救他們那頻於沒落的命運，不特不積極的反動起來！此種封建階級對於商業資本的反動的事實，從老子孔子孟子的學說中間，我們可以找着很充分的證據：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

老子因受商業資本萌芽的刺激，感覺得社會的混亂，完全由於牠——商業資本的作祟，所以不禁聯想到過去原始的無階級的共產社會的美滿，而主張『還淳返樸』，提出『烏托邦』的意見於人民之前；並且，他爲要保證他的意見能夠在羣衆中發展，不得不竭力的攻擊當時的統治階級。因此，他便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這些話的作用，是鞏固了他在羣衆中的影響。孔子嗅着老子這些祕密，況且他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比老子更加惡劣（也即是說商業資本的影響，比前更加廣泛）；所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普遍現象，使他異常的痛心！但是，對於這些現象的由來，他比較老子是更加認識得深刻；他認爲這些原因完全由於經濟的分配不均，如其所說什麼：『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見論語季氏篇）實際上，這些話是針對着已在發展的商業資本而發的，他企圖以這樣的論調去博取羣衆的歡心！可是在當時均產主義是不可能的。迨至孟子他反對商業資本的態度比老孔更加明顯，更加堅決；如『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鬻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見孟子卷二公孫丑章）他一方面無情的詛咒商業資本，而別一方面又迴想所謂「井田」制度的恢復，所以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不過，中國思想界很多的人們——特別是胡適之和梁任公這班前輩，他們都把老孔這類的議論，當作異常劇烈的革命主張（見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五十頁及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九三——四頁），甚之，最落後的國家主義派也捧孟子爲民權革命家（見正義進化與奮鬥）。其實，這類「不正確的理论，遠在一八四七年以前，已被唯物論的大斧作了類似的糾正」：

那些貴族因想得世間的同情，於是只好在面子上裝出忘記了自家利害的樣子，專替被掠奪的勞動階級向資本家聲罪致討。由是他們對於那新主人翁唱了些譏諷的歌，發了些將來必然破裂的預言，藉以替他們自己復仇。封建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起來的：一半是悲哀，一半是譏諷，一半是過去的反響，一半是將來的威嚇；雖然有時用痛快銳利的批評，刺擊資本家的心胸，但因全然缺乏了解近世史前進的能力，結果，總不免稽滑。那班貴族要想人民再歸附他們，就用救濟無產者這名義做軍旗。但人民和他們常常接近，便看出他們裏面還穿着封建的武裝，都呵呵大笑的散去了。（共產黨宣言）

馬克斯這種精密的分析，壓倒了唯心派的胡說；不過讚揚孔老的胡謬哲學，在中國還有相當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的實際作用是最後的掙扎！牠的地位在不久的將來會被羣衆所攘奪。

其次，我們更要說明的，便是商業資本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并確定此種關係，來解決中國目前一般人們關於商業資本爭論的問題。

「商業以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變成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爲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的作用。商業對於舊生產方法所加的解體作用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這首先是以這種生產方法的堅固的程度及其內部的構造如何爲轉移的。這種解體的進程究竟歸結到何處，就是，那一種新的生產方法起來代替舊的生產方法，這不是以商業爲轉移的，但是以舊的生產方法自身的性質爲轉移的。」（資本論三卷一部二十頁）此種商業資本之進步的意義，是不可磨滅的事情呀。至於這種發展，很顯然的，與資本主義的社會有密切的不可分離的聯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期（即在中古時代的西歐）是商業支配工業；在近世社會中是工業支配商業。商業對於他實行營業的諸社會間自然有多少反響；他使生產愈加屈伏於交換價值之下，並且使享樂與生活的維持，愈加倚販賣而不依倚生產物的直接使用。因此，商業使舊來的諸種關係解

體了。他使貨幣的流通增加。他不獨是僅僅擔任生產的剩餘，並且，次第蠶食生產自身，使全體生產部門都附屬在他的下面。然這種解體的作用大部份是以生產社會的性質如何為轉移的。」（同上）

不過，這裏有個問題是必須解釋的，就是商業資本的發展，完全按照某一國家之特定的產業發達的狀況為轉移，因此，他所表現的形式，往往是不甚一致。如「古羅馬在後來的共和時代中，商業資本的發達高於古代世界中以前的狀況，但却沒有何種產業的發達與之並進；然在確靈茲及歐洲和小亞細亞其他希臘城市中一種顯著的產業發達伴着商業的發達而興起。在他方面，在和城市發達及其條件恰相反之處；在居無定所的游牧民族中常有商業的精神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同上）馬克斯認為：從封建的生產方法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推移，有三種方法：第一，商人直接變為工業家；在由商業變成工業的地方是如此的，特別在奢侈品工業中是如此的，此等奢侈品工業由外國商人從外國輸入原料與勞動者，如十五世紀從君士坦丁堡輸入意大利是。第二，商人使手工業小主人變成他的居間人，他或者又直接從獨立生產者購買生產物，他在形式上是聽這種獨立生產者獨立行動，並且使後者的生產方法仍舊不化。第三，工業家變成商人，並且為着商業從事大規模的生產。（資本論）馬克斯這種適當的分析，的確給我們研究商業資本以最有力的武器，特別是答覆了人們關於中國商業資本自秦以後長期停滯的責難。

(四)秦始皇在歷史上代表的是些甚麼？

歷史的變革，從來沒有過所謂偶然的現象，牠每一次的蛻變，都是有很深刻的內在的原因；由生產關係所決定的社會紐帶，牠是聯系這種變革的中軸。因此，關於秦始皇吞併六國而形成君主專政的統治，同樣的，我們要從多方面——特別是經濟方面去解決這一素來爲人們所爭論的問題。過去一切歷史上的封建支配的關係，發展到戰國時代，已經是老態龍鐘而失却了支配的作用，商業資本此刻就攘奪了牠的王位；秦始皇之闖進政治舞台，在很久以前，商鞅已經爲他築下了很堅固的經濟基礎，他不過是承繼了這份遺產而擴大其前途。這轉變不僅反映了過去各階級間的矛盾，牠還無情的破壞了一切封建的關係，而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當然，這國家不是代表廣大被壓迫的農民，恰恰相反，而是建築在代表商業資產階級和貴族的經濟基礎上面，牠是倚靠商業資本與貴族來反對割據的諸侯。舊的「采邑」制度，是束縛商業發展的工具，所以反映於政權形式上，就是廢除了這些羈絆採取郡縣的方式，不成問題的，這在行政上是有進步的意義。當時行政區域的廣大，超出中國以前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其廣袤有如下表：

郡名 現在所在地

內史 陝西中部

山川 河南黃河兩岸各地

河東 山西西南部

上黨 山西東南部

太原 山西北部

代 山西東北部

雁門 山西西北部

雲中 察哈爾西南部

九原 綏遠中部

上郡 陝西北部

北地 甘肅東北部

隴西 甘肅東南部

穎川 河南中部南部

南陽 河南西南部湖北北部

碭 河南東部山東西南部江蘇西部安徽北部

邯鄲 河北北部及直隸西南之一部

上谷 直隸西南中部

鉅鹿 直隸西南部

漁陽 京兆

右北平 直隸東北部熱河南部

遼西 熱河東南部奉天西南部

東 直隸南部山東西北部

齊 山東南部及東北部

薛 山東南部及江蘇東北部

瑯琊 山東東南部

泗水 江蘇北部安徽東北部

漢中 陝西南部湖北西北部

巴 四川東部

蜀 四川中部

九江 江蘇安徽北部一帶及江西境內之地

鄣 江蘇西南部安徽東南部浙江西北部

會稽 江蘇東南部及浙江東南部各地

南 湖北東南部

長沙 湖南東南部及廣東一部

黔中 湖南西半部

閩中 福建全境

南海 廣東全境除西南部外皆是

桂林 廣西全境

象 廣東西南部及安南北部

綜觀上表所列行政區域，其幅員之大，誠爲過去一般天子們所夢想不及！其經濟的發達，祇就『賦鹽鐵之利』已『二十倍於古』（文獻通考）他若『徙十二萬戶於咸陽』（史記）也可以窺着秦始皇所代表階級背景的祕密。關於秦始皇的政策——尤其是『焚書坑儒』的政策——從來歷史上的毀譽并

無定論，我們覺得要確定這些毀譽如何，那麼對此種政策必須加以檢討！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易也。今陛下創大業，建不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守舊博士淳于越——著者）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并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時，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諸侯（侯字當作儒字——著者）并作，語皆盜古以害今，實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諭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者，以吏爲師。』（見史記秦始皇本記及李斯列傳）

秦始皇爲什麼竟如此的大胆，居然幹得出這樣毀經滅典的勾當呢？就我們目前一般的觀察，這種政策的確定，完全有牠的現實的政治意義；一方面要打擊那些落後的所謂儒家的思想，而另一方面，更企圖以這種手段來維持牠的統治。

至於『坑儒』這總要算是一件最殘酷的事情吧？不！以秦始皇的統治者立場來看，這也是必須的。歷史告訴我們關於坑儒的事實是：

『候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併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能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貧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聞過而日驕，下儒伏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遂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有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使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謠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從邊。」（見史記秦始皇本記）

同時，史記儒林列傳也說：『秦之季世坑術士！我們看着這歷史的記載，很顯然的，秦始皇當時所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一班求仙方望星氣的術士。這批『爲謠言以亂黔首』的方士，就是多坑

殺數百人也值不得什麼悼惜！不過，我們認爲與反動思想做鬥爭，如果簡單的採取肉體懲罰辦法，仍然是皮相之談而不能達到很圓滿的目的。但是現在的焚書坑儒的現象，已經成爲司空見慣了！這一點又何足驚訝呢？其他如築長城（實際上長城遠在始皇以前已經存在，始皇不過加以修葺和聯系——著者）營宮室，這也不過是爲維持政權與繁榮市場的舉動，是一種代表商業的資本的國家主義的建設。

對於秦始皇的毀譽，已經成爲批評的焦點，現在我們可以舉出郭沫若的批評以及對於這批評的答覆：「秦統一天下以後，在名目上雖然是廢封建而爲郡縣，其實中國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都是很巍然的存在着的。我們不要爲文字所拘泥了。周室在古時雖號稱封建，但事實上在周官有「鄉」「遂」「縣」「鄙」之分，并不是全無郡縣。秦以後雖然號稱爲郡縣制……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我們到了現在假使要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在秦時就崩潰了話，那簡直是不可救藥的錯誤！」又說「秦始皇不愧是中国社會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勳！」

依照郭先生的說法，中國的封建社會不僅在秦時沒有崩潰，并且秦始皇還是「封建制的元勳」？我們不知道郭先生根據什麼來判斷秦始皇是代表封建？恐怕是根據他的腦海吧？須知腦經是靠不住的：「唯物史觀認爲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二種原素決定當時社會中財富的分配，因此，更決定構成此社會之階級及其中各層的形成。所以如果我們要尋求

即決定某種社會變化或某種社會革命之原因時，則不應到人類的頭腦中到人對於永久真理和永久正義的最高智識中去尋求，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去尋求；總而言之，那不應到所研究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求，而應到這個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求。」（恩格斯——反杜林）郭先生說：中國古代社會的變革，是「由王而伯」，所以「一直到最近百年，中國僅管在更換朝代」，但是「社會的組織依然是舊態依然」！這是很顯然的，把歷史進化的一個階段——商業資本的階段抹煞了！不過事實總是事實，那些想抹煞實事的人們，同樣的，也是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

第二節 秦漢的農民戰爭

（一）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農民戰爭

秦始皇的統治，雖然能夠戰勝封建諸侯，但牠終敵不過被壓迫農民的「鋤頭鐮刀」！這並不是秦二世的「低能」，而是由於經濟矛盾在當時之無法解決；因為秦代雖從政治上屈伏了過去的封建諸侯，但同時又造出大羣失掉土地而離開生產過程的農民，換句話說：秦代是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如「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羣，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圈是我

加的——著者）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見史記秦本紀第六）從這段片材料中間，很充分的看出了當時因商業資本的發展已使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而造成土地集中的現象，所謂「始皇帝死而地分」，很顯然的，這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對始皇的咀咒；他們不認識土地集中之過程的加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的趨勢，而單純的指斥爲秦始皇之主觀的罪惡，然又不敢公開的反抗，因爲『偶語棄市』的淫威是籠罩了一切。所以祇好諉之於熒惑的力量藉以擴大要求土地的宣傳；這種極原始的農民意識，如果就現在觀察未免令人失笑，要之，在鬭爭最初階段中，這是免不了幼稚行爲。因此，任憑統治階級怎樣的採取『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的手段，終不能挽救未來的厄運。

中國歷史上排山倒海似的農民大暴動，便在土地集中的條件下面產生了。換句話說：農民暴動是土地集中之必然的產品！因此，以陳勝爲領導的中國第一次的農民大暴動便開展於歷史舞台！

關於這位偉大的農民暴動的領導者——陳勝，歷史曾授他以光榮的聖圈：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夏陽人也，字叔。陳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至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苦爲傭耕，何富貴也？」陳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關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陳勝吳廣乃謀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

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王。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置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旦日，卒中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羣。尉果苦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應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銍，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家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

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見史記陳涉世家）

這次暴動的領袖——陳勝，他的英勇的精神與堅決的意志，的確是值得我們的紀念；他的英勇的精神與堅決的意識是從他那飢寒交迫的環境中煅煉出來的，因為他的出身是一個失掉土地的破產的傭耕的雇農，這更顯示出這次暴動的特殊意義。雖然，在暴動以前，缺乏發動羣衆的工作，沒有在廣大的被壓迫農民中間建立起政治威信，而以「篝火」「狐鳴」的行動來代替階級的鼓動，未免含有神祕的意義。然這足是表示原始的農民意識，并且是極其濃厚的農民意識。但是從另一方面他們也感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真理，并把這法寶去做號召羣衆的軍旗。不過，這次暴動一開始就帶了很多不澈底的成份，如掛出扶蘇和項燕的招牌，把自己的真正面目隱藏起來，并且隱藏在這種過時的外衣中間；迨至後來，這個由暴動而創造的政權，漸漸與參加暴動者分離，那些過去參加暴動的羣衆，都被認為「客冤無知，顛妄言輕威」？而排斥於暴動政權之外，很自然的，在商業資本發展的過程中，由農民暴動而建立政權是必然的會腐化蛻變爲另一種東西！

在農民暴動的過程中間，時常有一些新的事實去刺激那些被壓迫的農民羣衆，要他們從麻醉狀態當中抬起頭來，陳涉不過是一個先導。農民從麻醉狀態當中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握起他們相暴的拳頭來奪回自己的天下；所以「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這現象在當時誠然是

普遍得很。

從階級爭鬥的決鬥場中，農民暴動幾幾乎普遍了全國：『元年，七月，戍卒陳勝吳廣等反故荆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循起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相立爲候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武臣自立爲楚王，魏咎自立爲魏王，田儼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起兵會稽郡。』（史記二世本紀）中國歷史家往往說『陳涉爲難』便『豪傑竄起』！便推翻了秦朝的統治！實際上，那些野心家和日漸衰弱的閱閱——項梁項藉等人，往往『乘火打劫』來掠取農民革命的果實；他們之所以參加反統治階級的戰線，一半是發洩怨憤而爲自己復仇，一半是爲鬥爭所威脅，而企圖攫取未來的寶座，再慢慢來鎮壓和肅清這批造反的叛徒！

因此，這次鬥爭的結果，不但爲難的陳勝吳廣消蝕了他們的踪跡，就是那代表封建頑逆的項藉亦受淘汰；所謂亭長出身的小市民的劉邦竟全部的攫取了農民革命果實而走上政治舞台！此種轉變，并不是由於劉邦之生而『隆準』『龍顏』，反之，完全由階級關係來決定其命運；當劉邦備受封建頑逆——項羽威脅的時候，即嗅着經濟背景的祕密，他寧願犧牲由戰爭中所得來的一切的利益，忍受一切的侮辱，而走到秦始皇吞併六國之起點的地方。結果，他在這地方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了。當他發展的時候，也就結束了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農民暴動。

劉邦之所以能夠戰勝一切的：一方面固然是他欺騙羣衆手腕的高妙；另一方面，他又依靠了廣大的被壓迫的農民羣衆以『鋤頭鎌刀』去和統治階級肉搏，爲他建築了很堅固的基礎。但這位歷史上的投機家——劉邦，他並不是農民真正的朋友；最初那些被壓迫的農民以粗暴的拳頭扶他上馬，迫他手拉着繮繩高坐馬鞍之上的時候，便對着羣衆猛踢一脚以做回報的敬禮！如他在奪取政權以後，便趾高氣昂的說：『威加海內兮歸故鄉！』這是公開的與羣衆分離的歌唱！

漢朝的統治形式，在總的路線方面，仍是和秦代一樣的同是束縛和壓迫農民的工具；不過，有些地方，統治者亦有『覆車當戒』之感！如『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獻通考）。因爲這種政策可以緩和羣衆的鬥爭情緒，可以蒙蔽羣衆的階級意識，換句話說，這政策並不是爲的羣衆利益，恰恰相反，而是爲的安定自己的統治。漢文帝時，國內沒有戰爭，國民經濟比較發展，而執行此種政策更爲堅決，如『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年，除民之田租。』（文獻通考）同時還有一位政治家——鼂錯，他認爲單純的從政治上去解決農民問題，其收效是比較遲緩，因此，他的中心意思是要從經濟方面去處理統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所以他和漢文帝說：『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水旱，而蓄積未及，何也？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地著，不

地著則離鄉輕家，不能禁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今而暮改：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同上）這位政治家以爲獎勵生產祇有提高農產品的價格，而另一方面則以官爵的名義去博取富人的財富以充行政經費，殊不知俗諺說『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切財富都是生產者自己所創造，所謂富人，也不過是剝削剩餘價值者之一種名稱而已。

鼂錯既然解決不了經濟的矛盾，而土地集中的危機又復一天天的加深；到漢武帝的時候，這危機已經暴發成爲社會的裂痕，甚至令守舊大臣董仲舒都看下去而提出限田的主張，他說：『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然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同上）可是這種『限田』的主張，敵不過事實的一擊，牠便烟消雲散了！

(二) 王莽變法

土地集中過程的加速，使農民破產的速度和牠成爲正比例的前進，無論雷錯怎樣的提倡貴粟，無論董仲舒怎樣的提倡「限田」，但其結果仍不能彌縫這一社會的裂痕：王莽抓住了這一裂痕，在階級內部起了一次很劇烈的鬥爭，並在鬥爭過程中很順利的完成了他的「宮庭政變」。王莽自「宮庭政變」以後，即企圖以政治的力量來彌縫社會的裂痕，因此，就決定了歷史上有名的所謂「王莽變法」。很多的人們——尤其是現在許多革命青年關於王莽變法動機的分析，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這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企圖；我們要知道「宮庭政變」的發生，絕對不是革命的結果，恰恰相反，而是少數官僚貴族的陰謀勾當。歷史上每次的革命都是階級鬥爭，是被壓迫階級拿着長槍大刀去對付壓迫階級的流血行動，是廣大羣衆以暴力去推翻統治階級政權的表現；而「宮庭政變」不僅與革命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至多也不過是階級內部矛盾之最劇烈的表演！牠的基本路線是摒棄暴力而採取溫和的手腕，其最終的目的仍是在維持舊的政權。這兩者中間的區別是異常的明顯，不僅僅距離着一道「鴻溝」，而是隔着很寬遠的「萬里長城」；這種區別，誠然是階級的「分水嶺」呀！那些幼稚的人們，認爲王莽的土地政策就是「社會主義」的實施，這不但近於武斷，而且也未免滑稽！須知王莽他并不是社會主義者，他不過是

儂狡猾而具有陰謀的政治家；這位政治家的特長不僅僅限於具有「謙恭下士」的虛偽手腕，而主要的他還認識解決土地問題是當前的任務。其實解決土地問題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任務，而社會主義的革命也決不是單純的去處理土地問題！本來，「社會主義」這一名辭的內容，有很多不同的解釋，這裏用不着什麼爭論，不過，王莽變法的實質一方面雖宣佈「土地國有」而別一方面仍然維繫社會的「私有」制度特別是「生產工具」的私有，這種現象與革命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其意義截然不同。

這次變法的動機，很顯然的，因為商業資本的流波激蕩了自然經濟，使農民們陷於窮困和破產的深淵；這一大羣破產的農民他們是社會上一種偉大的力量，他們會推翻過極專制的秦代統治，他們會經爲劉邦做過苦力而擁他走上政治舞台！狡猾的王莽一方面是受着這種潛伏着的力量的威脅，所以他想拿着這個問題來欺騙羣衆！因此，他的解決土地問題並不是爲謀農民的解放，而是企圖維持和鞏固他自己的政權。

關於這變法的內容，最好可以參看他的詔令：

「秦爲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而貪鄙生，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頃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文獻通考）

王莽在變法令中說得非常的堅決，可是在商業資本佔統治作用的社會內面，就是鋼鐵般的意志，也會被這經濟的火爐銷燬得乾乾淨淨！何況在工業資本尚未形成的社會中，如果不按照經濟發展的趨勢而強迫的執行土地國有的政策，這誠然不僅是一種超時代的冒險的嘗試。並且，還是烏托邦的幻想！結果，這轟轟烈烈的『王田制』的運動，祇好爲當時經濟條件尚未具備的絞繩所絞殺！

在施行王田制的過程中間，統治階級所獲得的成績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道』，處在這種情勢之下的王莽，就是再要堅持自己的主張也不可能！所以祇好再下詔說：『食諸王田及私屬皆得買賣』而撤回變法的意見，無恥的屈伏在商業資本的面前！

本來，這種由上而下的改良運動——土地國有的運動，牠本身就包含了許多矛盾，並且這些矛盾亦爲統治階級所無法解決，故其前途祇有失敗！自王莽撤回變法的命令以後，過去的貴族統治又重行抬頭，那班地主階級經過此次的事變，更兇殘的在農民身上發洩他們階級的積憤，而土地集中的現象更是繼續的發展，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已經埋伏了未來的農民暴動的種子。

(三) 赤眉暴動

新莽變法的失敗，那土地國有運動的企圖，已經爲事實推翻得乾乾淨淨，並且使牠的發動者很可

憐的跪在商業資本的面前，而委曲求全的懺悔自己的錯誤。政治上既有這樣一種的轉變，當然，這轉變的影響很快的會傳播到一般社會生活中間，尤其是農村中間；因為王莽在經濟上既找不着新的出路，仍然投到商業資本的懷中而加緊對農民的剝削，如『設六筭（鹽一酒二鐵三名山大澤四均賒貸五銅治六）之令，用富賈督之，復下詔每一筭申明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蝗旱相仍；富者不能自別，貧者無以自存。於是并起爲盜賊，吏不能禽而覆敵之，浸淫日廣！……荊州飢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見御批通鑑輯覽第二十卷四十四頁）這些情形，都是加速了土地集中的過程，在客觀上是把大批的農民，趕出了生產領域以外，使他們過着飢寒凍餓的生活。這客觀的政治的經濟的矛盾之繼續的發展，是推動農民走向革命怒潮的基本條件！從此，又產生一次翻天覆地的農民戰爭！

『赤眉』的暴動便是這時代農民戰爭的主要骨幹！

當王莽統治的時候，誠然是外患頻仍，如『匈奴寇邊益甚，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使民奴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以秩爲差。』（見同上）另一方面又是內憂不已，如『臨淮瓜田儀依阻會滑長州，琅雅呂母聚黨數千人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而『天災』『飢民』又復相偕而至，如『秋霜殺菽，關東大飢』『關東人相食』

『流民數十萬入關』。新莽的統治對於這些情形，的確是倉皇失措而無法應付！當然，參加內亂的井不僅是清一色被壓迫的農民，甚至那些封建的餘孽也借此復仇。新莽他在主觀上是企圖剋伏這些困難；於此，第一步他便想拉攏封建餘留來緩和對自己的鬥爭，如『授諸候茅土於明堂』，可是『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著第四色之士，用慰喜封者。』（見同上）第二步，便是從行政上沒收官吏的財產以供給軍需，去鼓勵士兵們屠殺羣衆的情緒；如『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吏以不得俸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增產致富者，收其家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見同上）但是，這兩種的方式，都不能解決當前的困難，於是便異想天開的玩一套欺騙羣衆的滑稽魔術：如『莽見盜賊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紀歷，六歲一改之，書布天下，自言當如黃帝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人皆笑之。』（見同上）

關於所謂『赤眉』的起源，當中曾有一段農民暴動史上的趣話：先是瑯琊人樊崇他在山東的莒縣領導農民暴動起來；最初參加莒縣的農民暴動也不過百餘人，在暴動中羣衆看到樊崇非常地勇敢，於是爭相歸附，一歲之間，吸收一萬餘人；而他的同鄉——農民羣衆的領袖——逢安以及東海人徐宣、馮遂等都領導大批農民羣衆前來參加，在青州徐州一帶，形成了割據的局面，其聲勢之雄壯與浩大，幾乎震碎了統治階級的肝胆！當時王莽曾派遣王匡、廉丹統率大批軍隊前來進攻這一農民暴動，企圖以

軍事力量來挽救統治階級垂危的生命；樊崇恐怕參加暴動的羣衆與統治階級的軍隊混合起來而發生互相殘殺的慘劇，於是皆以赤色塗眉，以資識別；自此以後，中國歷史上又平添一段所謂「赤眉」的插話。

與「赤眉」同時崛起的，尚有很多原始的農民的秘密組織，而這且組織有的是自動的起來，有的是受「赤眉」暴動的影響，其內容固然複雜，而名稱也極不一致；如什麼銅馬，大銅，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等。要之，這些組織的名稱，或是以山川土地爲名，或是以軍容疆盛爲號；每個組織都有一個特定的領袖來統率，不過，大部份在總的行動方面是受赤眉的指導，其羣衆約百餘萬人；故一舉一動，都影響整個的社會。甚至，在暴動的初期，即注意於軍事紀律，尤其是注意於農民的生命的保障與安全；如「樊崇等衆既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見同上）因此，一般被壓迫的農民羣衆都說：「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見同上）在整個的農民暴動的過程中，新莽的統治是被這班所謂叛徒用暴力推翻了！但代替新莽統治的并不是個強有力的政權，恰恰相反，而是羣雄割據分崩離析的局面；如劉續劉秀的復興帝室，暴動的農民領袖各據一方；甚至還從斜刺裏殺出一枝農民隊伍。

● 這隊伍便是王郎的暴動！

王郎的出身是邯鄲縣的一個破落戶的智識份子，他操着卜卦的生涯，時常往來於農村中間和那些

被壓迫的農民接近，甚至，他還倚靠他的職業技術——卜卦的地位，向農民羣衆們經常的作一些帶有神祕性的鼓動與宣傳。他感覺得自己是個破落戶的子弟，一時不能在羣衆中建立很大的威信，便披着貴族的外衣——冒充成帝的兒子——子輿——來吹噓自己。他的策略的中心，不是提出暴動的綱領於被壓迫的農民之前，而是一味的拉攏所謂趙國大豪（？）李育來做暴動的骨幹。雖然，他們也曾以農民暴動的方式奪取了邯鄲，並且在暴動以後建立過臨時的部份的政權，立王郎爲天子。這暴動所得到的回聲，如廣陽王子接在薊中的倒戈而趕走劉秀，未曾不是聲勢雄壯閎動一時！可是沒有很好的戰術與策略，缺乏與各地農民鬥爭的聯系，所以，雖掩有二十餘縣，終敵不過那班復辟的人們瘋狂似的摧殘，在暴動過程中，被壓迫的農民的膏血不知流了多少，據官場的報告，大將以下被斬首的有三萬餘人！

以這樣廣大的農民革命，本來可以推翻舊的統治階級而建立一種新的革命的政權；可是這些參加革命的農民，在暴動過程中，他們不僅缺乏堅強的組織性，如在行動上是南轅北轍，並且，在政治觀念上亦是同床異夢！因此，有的是爲統治階級所壓平，還有一部份爲貴族們所收買，極積的參加「復辟」的工作而在革命的內部起分化作用，所剩下來祇有樊崇。本來樊崇在當時所處的環境誠然是孤軍獨戰，與光武的統治作過長期的鬭爭，并在軍事上獲得相當的進展；如掩有洛陽，河南，潁川諸郡，與新的統治階級光武交分庭禮形成了對峙的局面！但是長時期的遊擊戰爭，雖獲得軍事上的進展，然

終不能拯救參加暴動的羣衆那已經疲乏了的魂靈；如『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虛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見同上）所以想攻取經濟比較發展的區域——長安稍事休息。這種保守的傾向，就是導引地主商業資產階級意識於暴動隊伍中間的媒介，使暴動隊伍的上層逐漸動搖；如『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弟陽乃說樊崇等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爲諸賊，不可已久！不如立宗皇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乃於軍中求城陽景王章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遂共立爲天子。』（見御批通鑑輯覽二十一卷第四十八頁）據漢書所說當時的盆子年齡很小，祇有十五歲，不過是一個『披髮跣足』的小兒；他看見很多的人們向他稱臣下拜，嚇得他倉皇無措，幾至於啼哭！

但是，任憑怎樣的『師出有名』，宗室的偶像總不能變更階級的對比，樊崇把他當着『救世金丹』，實際上，他仍是不能充飢的畫餅罷了！

在遊擊戰爭的過程中，農村經濟已經是破碎不堪，使一般社會的物質生活都降低到水平線下；因爲過去那參加生產的農民，一半是拿着『鋤頭鎌刀』去對付他們的敵人，一半是在過着流亡的生活。因此，『赤眉』最後的失敗，也就是在大饑饉的年頭，參加暴動的羣衆，經常的忍飢挨餓度着那擋刀搶冒矢石的生活，如他們曾兩度的佔領長安，都因爲屢受糧食恐慌而退却，故這遭一歷史上有名的長

時間暴動，終不免在崑底爲新興的統治階級所撲滅！

(四)黃巾的暴動

光武掠取了『赤眉』暴動的果實而走上政治舞台，并且結束了這一農民暴動而鞏固自己的政權。當然，這個政權一開始是要做一些敷衍農民的事情；如『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文獻通考)，企圖要那些破產的農民與『不毛之地』發生經濟上的聯系，以削減在大革命的時代——『赤眉』暴動的時代所遺留的恐怖。不過，這些欺騙的手段，是不能解決農民鬭爭的根本問題！而祇是一時的和緩罷了。

因此，到桓帝的時候，農民與地主商業資本之間的階級矛盾又逐漸緊張起來！如『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見文獻通考)，超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而加緊的剝削農民。迨至漢靈帝統治的中平二年，剝削農民的方式，更加苛刻；如『稅天下田，畝十錢，名修宮錢』(同見上)！並且，賣官鬻爵，擴大地主和商業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威權，把賣官鬻爵的担負轉嫁到農民的身上。這許多經濟的原因，的確是促成黃巾暴動的導火線。關於這一點，當時統治階級的臣僚——中常侍呂強，他爲忠於主人起見，所以很坦率的上疏說：『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厰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

輒有導引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害！」（見後漢書）呂強雖有這樣的諍論，但空言終不能刺擊統治階級的心胸。

革命的風暴，展開了「黃巾」暴動的軍旗。黃巾暴動的領導者——張角，他的出身是鉅鹿縣的一個所謂道人；因此，他對於農民暴動的方法，是含有很濃厚的原始的神祕的宗教的成份，如自稱「太平道」和以符水治病等等。但這並不能削弱牠革命的意義，因當時經濟發展的遲緩，落後的意識會反映於一般社會中間而起牠的作用；加之符水治病是吸引農民和鼓動羣衆的方式之一種，就是在現社會的農村中間也往往有這種現象的發生，如「大刀會」「紅槍會」等農民組織便是最顯明的例子。張角他很懂得農民羣衆的心理：并鑑於過去農民戰爭的失敗，所以他小主張速成；從艱難困苦的環境當中努力於自己的事業，十餘年間，竟號召農民至數十萬人之多！如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的人民，大部份都與張角有組織關係。在暴動的前夜，他很注意於暴動中的組織工作，他感覺得這是過去一切農民暴動失敗的共同原因；他認為如果沒有很好的組織，就是暴動起來也不過是一閃而來一閃而散似的很容易的爲統治階級所消滅；所以他對於暴動軍隊的組織，係採取很有秩序的軍事部勒，置三十六方（註：方猶如現在的三十六路指揮）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都產生一個領導者——元帥。舍此以外，他更注意於宣傳工作，縱然是迷信的宣傳；但并不因此而減低牠的宣傳的意

義。當時的宣傳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并且把這種口號用白土寫在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的門前，下面皆註『甲子』二字。彷彿和現在的在野政黨在牆壁上以及電燈桿上所寫的『打倒……』『擁護……』『推翻……』『建立……』一類標語的意思相近，不過時空與組織的內容不同罷了。

當時大方馬元義等，集合荊陽農民羣衆數萬人，積極的準備暴動，以中常侍封諱徐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爲總暴動的日期，內外俱起，企圖推翻統治階級而建立暴動的政權。可是張角的弟子唐周，他非但不忠實於革命而爲暴動嚴守祕密，甚至更進一步的積極的反動，把這次暴動所有的計劃與祕密，很詳盡的報告於統治階級，以致變生倉卒，在暴動尙未開始，便爲統治階級所破獲，而馬元義等首先爲統治階級所捕殺，做了暴動的殉難者。張角見事機已洩，即刻調動諸方，一時俱起，皆着黃巾以爲標幟；并推張角爲天公將軍，張寶爲地公將軍，張梁爲人公將軍；暴動未及一月，其影響已遍於全國，各地農民紛紛的響應這次的暴動，往往殺掉壓迫他們的官吏，爲加入暴動的敬禮！

暴動影響的擴大，使統治階級最上層的皇帝也在牠面前發抖！爲要討論消滅這所謂下賤人民的造反，特召集了一次羣臣會議來決定應付的方針；本來因爲所謂黨禁的鬥爭，的確使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非常尖銳，但爲的是要對付農民的暴動，首先便要來緩和內部的鬥爭；這一點，在其羣臣會議

上面表現得特別明顯：『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中常待呂強亦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赦宥，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見後漢書）這會議的總結，就是擴大階級內部的『德謨克拉西』，用全階級的力量來對付暴動的農民！

統治階級內部的『德謨克拉西』的擴大，引進了三位農民暴動的屠夫——孫堅，曹操，劉備。這三人同時都做了黃巾暴動的僧子手！

關於孫堅屠殺暴動農民的事實很多，如『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餘人，與雋并力奮擊，所向無前。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入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雋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見陳壽三國志吳志卷一第一頁）便是一個顯然的例。

其次，便要說到曹操的抬頭與發展；『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穎川賊。很顯然的，他的發跡是由於征討黃巾，并且，這次農民革命更給他們以充分發展的機會；如『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送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若不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註：太祖即曹操）領兗州牧，遂進互擊黃巾於張壽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三國志魏志第一卷第三頁）他如劉備亦復從黃巾暴動中發跡起來。如『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三國志蜀志卷二第一頁）

這三位投機家，他們掠取了黃巾暴動的果實，使這次暴動仍遭受怨慘的失敗；并且，自結束這農民革命以後，他們代替了舊的統治階級鼎足而三似的統治了廣大的農民。雖然，農民革命還要繼續的重演啊！

第三節 隋代的農民戰爭

（一）南北朝經濟形態的追述

曹操，劉備，孫權這幾位歷史上的暴發戶，他們都是乘農民革命最激烈的時候才抬起頭來；這抬頭的動機很顯明是看到自己的階級瀕於危亡，不得不乘火打劫來掠取革命的果實，以便繼續的統治農

民。當然，他們在反革命勝利的第二天，因為地理的及經濟的許多原因，又爆發了他們內部的矛盾；並且，爲着獨吞革命果實起見，彼此之間又重新爆發了一種反革命的戰爭，形成了鼎足而三的割據的局面。因此，我們可以說：三國的時代是一種反革命混戰的時代；不過，一方面他們雖舉行內部的反革命的戰爭，而別一方面却時時刻刻的注意到從經濟上去發展自己的前途及改善農民的生活以和緩農民革命的情緒。如曹操在戰勝黃巾以後，馬上即舉行屯田的工作；募百姓屯田於許都，一年之間得穀百餘萬石，并招撫關中的流民，給他們以很多的牛犁，勸農民耕種積粟，甚至命令劉馥賈逵這班官僚，積極的治理屯田水利。而代表劉備的諸葛亮也努力於勸農講武的工作，且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於斜谷口，以吐出蜀地大量的農產品於市場，而溝通農村經濟。他若孫權亦於黃龍元年命令四方郡守開墾荒田。迨自晉武統一以來，階級內部的敵人已經打倒，而那廣大的被壓迫的農民，亦復是暫時的俯首帖耳任統治階級的宰割！

這時候也就是統治階級與高彩烈的時候！

爲的是企圖永久的屈伏農民，不得不變更土地佔有的形式，因此，晉武帝便頒佈「戶調」的法令，以確實土地關係：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

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謀田者輸義米，戶三斗，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這種土地關係的轉變，是含有很濃厚的公有性質。

東晉以後，南北朝對峙；南朝宋，齊，梁，陳皆襲東晉之餘業，其一般經濟是有上昇的趨勢；如『宋孝文帝大明初，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資之家於餘餘，鄞，鄞三縣，墾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山陰豪族富室，傾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又綠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田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文獻通考）很明顯的，這段事實，不僅暴露了，『戶調』的弱點，即是說：『戶調』的法令，並沒有很完善的解決了農民的問題，反之，要經濟的發展，也祇有使貧困的農民把勞動力消費於土地方面。及至梁武帝他更加鼓勵農民的生產，曾下詔說：『食乃民天，農爲治本，垂之千載，貽諸百王。莫不敬受民時，躬耕帝藉，是以稼穡爲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多難薦臻，干戈不戢，我則未暇，廣田之令無聞於郡國，載師之職有陋於官方；今元惡殄殲，海內方一，其大庇黔首，庶拯橫流，一塵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烏鹵無遺，國富刑輕，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所在蠲免。』（梁書本記卷五第九頁）又詔：『……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

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卽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卹。」（同上書）誰都知道，統治階級在牠的根本立場上，是人民的朋友，而這些現象，不過，是企圖發展自己的前途。當然，商業資本在梁代也有很大的作用，如國家經營河東鹽池而引起御史甄琛激烈的反對，他說：「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這句話是商業資本發展的一個很好的證例。

至於北朝元，魏，周，齊，承十七國之大亂，所謂中原文明，就是魏晉遺風。并且，當時的土地關係，因爲地主們的侵奪，又復發生變化；即是說土地時常集中到大地主的手裏。因此，均田制度乃應運而生，而李安世便是均田制度的首倡者。他上孝文帝疏說：「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制，致治之本，井稅之興，由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旣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改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晉魏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遠，鄉老所感，郡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據，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役，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入獲資生之利，豪右靡

餘地之益，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耕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文獻通考）

孝文帝便根據他的意見於是乎乃下均田之詔：「富強者兼併山澤，貧弱者絕望於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身，或因飢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爲斷，勸課農商，興富民之本。」（見同上）此種土地制度變更的內容，即在調劑貧富而側重土地分配問題；據太和九年所制定的均田法是：

諸男夫十五以上，授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授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二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人倍分田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士，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八還。分諸桑田，皆爲代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實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把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疾者，

各受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制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倍，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從倍之田，放爲此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所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如坐律。

（見文獻通考）

現在我們可以把均田法的要點，綜結如下：

（一）男子十五歲以上能賦貢調，則人受露田四十畝（即普通耕地），婦人則受男子之半——二十畝。

（二）老而免課及身沒還田；按魏書孝文帝紀詔文：還田以生死爲斷，然食貨志所記，實際雖身未

死但既老免課則所受田還公，若夫寡婦守老者，雖免課而仍受婦田者，例外也。惟關於此疑問宋劉恕已論及之；通鑑問疑載道原答司馬君實之語曰：『詔書言其略，故云還受以生死爲斷，本老言其詳，故有還不還之別也。』此說頗近理。

(三) 奴隸亦與良民同給露田，有牛者一頭，別授三十畝，但以四牛爲限。

(四) 露田之外，別有桑田，是爲代業，終身不還公；惟桑田已有定額以上者，則儘置之，其不足定額者，如法給授，又定額以上而有餘者，得賣其所餘，而不足定額者，亦得買其所不足。但僅符定額者不得售賣。

(五) 田之還受於年之正月行之，顧於授田之際，有先貧者後富者之規定。

(六) 構新居者，爲充居室，計每三口給地一畝，奴婢則五口給地一步。

(七) 遠流死謫無子孫者及絕戶者，其墟宅桑榆則盡爲公田供授受。

要之，後魏的土地制度，大概如此。

至於北齊及後周的土地制度，在原則上，大部份是與後魏相同，但給田之額稍有異別耳。茲揭北齊河清三年的田制如下：

(一) 男子達十八歲則受田，同時並使之輸租調，年至六十六則還田，同時亦免租調。

(二) 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受半額——四十畝。

(三) 奴隸亦與良民同給田，但因所有者之身分其數有限制；親王限以三百人，其以下之階級有等差，八家及庶人限以六十人。

(四) 牛一頭給田六十畝，但以四頭為限。

(五) 每丁於露田八十畝外，別給桑田二十畝為永業田，不在還受之列；但土地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之法（其時官及百姓之墾田亦有為永業田之規定）。

統治階級這種均田制的目的，是在調和貧與富之間的對抗形勢，實際上，貧富的對抗仍然存在，而貧苦的農民並沒有受着均田制的利益；所以這均田制度對於農民的關係，不過在歷史上留一個強烈的影響和憑吊的痕跡罷了。如北齊文宣帝天保年間宋士良上書請以『富家牛田先給貧民』，因為當時的豪富有牛田，佔地甚廣，實際上貧苦的農民往往得不着土地。故通典曾說：『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者連畛亘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於此可見地主豪紳壓迫農民的一斑。又說：『河渚山澤有司耕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所謂均田制度，此時僅剩一個空壳！並且，這時候土地還可以自由買賣；如『露田雖有不聽買賣，亦有重責貧戶，因王課不濟，多貸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臧走；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

課，比年額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暫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山縣聽其賣沽田園故也。」（見通典）

總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在歷史上是有轉變的意義，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不過，這轉變的趨勢並不是土地革命的前途，而是改良的嘗試。

同時，南北朝的經濟成份，亦有很大的不同；南朝的剝削形式的中心，不一定限於地租；所謂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象犀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需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隋書食貨志）這誠然是側重商資本業的描寫。人們說宋齊梁陳一般社會的生活是：「人競商販，不為田業」，并非是無的放矢之談。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南朝的經濟成份是商業資本佔着優越的地位；同時，北朝也并不是純封建的社會，不過就經濟的衡比來估量，牠所包含的商業資本的成份是比較的微弱！

隋文帝統一南北朝以後，在歷史上即開始了一個新的建設時期，這時期的工作，一方面是治南北朝經濟於一爐，並為商業資本開闢了一條繼續向前發展的道路，別一方面商業資本之繼續的發展，客觀上又造了成了一次帶有全國性的農民暴動。

現在，我們先來檢討關聯於商業資本發展的一些基本問題：第一，隋代統一南北朝之後，便建設大規模的交通網，以溝通南北的經濟；因為自晉魏以至六朝，為中國分裂最久的時代，就當時的形勢而論，其道路梗塞運輸維艱的程度，我們是可以推測的。且自永嘉南渡以後，所謂衣冠文物，麇集於揚子江流域一帶，實際上，這裏也就是當時的經濟中心。隋朝建都關洛，為的是要發展和鞏固他的政治影響，不得不變更當時全國的交通；故於開皇四年下詔說：「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盈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闕！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惑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籍人力，開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不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淤沂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勤殷，然不有暫勞，安得永

逸？宣告入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見隋書食貨志第六頁）這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建設交通。

迨至煬帝大業元年，又復進行第二次的大規模的開河；如「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隋書帝紀第三卷第三頁）大業四年又復繼續作第三次的開河，如「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河」，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見同上書第五頁）此外更開「江南河」「廣刊溝」積極的建設南北的交通，加速商業資本流通的過程。這種交通網的建設，是商業資本發展有力的幫助，誰個否認了這開河的意義，他就不會了解隋代政權階級的性。

第二，關於隋代商業資本發展直接的描寫，隋書食貨志有以下的記載：「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見隋書第二十四卷第七頁）但是，這僅僅限於都市的繁榮，至於一般商業資本之發展，我們可以從隋代所舉行的一種類似商業展覽會中充分的表現出來：「庚午（大業）六年正月，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諸蕃入豐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幃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邀入飽酬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感之，見以繪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如？」市人慚不能答！」（見

袁王綱網合編第十八卷三十六頁）這不僅是歷史上一段滑稽的插話，誠然是忠實的代表當時的經濟形態。在這種所謂『酒食例不取直』的展覽會未開以前，楊隋帝已經着手尋找國外的市場；他『以西域多諸寶物』特任黃門侍郎——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唯恐一時不能很快的建立中國和其他亞洲小國相互間的商業上的關係，特『啖之以利，勸令入朝！』並且，深恐他的臣僚得罪了這班外國的顧客，於是通令臣僚對於這批外國顧客要妥為保護；關於這種情形，歷史說『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隋書第二十四卷第八頁）很顯然的，隋煬帝他是個富於理想的人，為甚麼要犧牲大批的金錢去招待那些小國的商人呢？問題當然沒有這樣的簡單吧！他固然是要吸收這些國家奢侈品，而另一方面之借此吐出國內的大量生產於國際市場。也是一個主要關鍵。並且，他為防範異族侵入起見，曾『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不僅在國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從建築史上看也是很偉大的勞績。

很多的人們論說隋煬帝這些政策的不當，特別是開闢運河彷彿是窮極奢侈的事情，須知道隋煬帝的一切政策，是走的秦始皇的道路，我們看這許多政策裏面，包含着很多進步建設的成份，例如開闢運河，並不是為的視察南朝金粉，恰恰相反，而是溝通南北的經濟。當然，運河的開闢，在某種條件之下與農村經濟是有相當的幫助，可是農民們却因此更加遭受高利貸商業資本的統治。但是從相反的

方面，交通是商人的命脈，當時的商業資產階級，在生產技術上是百尺竿頭再也不能前進一步，他們這時候祇有靠經濟的流通；來維持自己的存在，所以揚州一班商人對「龍舟」的歡迎，實際就是擁護自己階級的利益啊！

(三) 農民戰爭

隋代的商業資本雖有很大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並沒有推動統治階級去解決土地問題，恰恰相反，牠祇有使農民捲入商品經濟的漩渦而更加破產；并且，因為戰爭的關係，徵調大批農民去冒矢石擋刀槍，離開了農村生產，故其影響，不僅使農村生產量降低，甚之，能使整個農村經濟的毀滅！這種經濟的矛盾，也就是農民暴動的酵母。同時，那些橫征暴斂的剝削以及嚴刑峻法的壓迫，都是助長農民鬥爭的情緒，使他們離開麻痺的狀態而活動起來！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上的罪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作一最後的戰爭。

舊世界打他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在隋煬帝統治之下的農民，彷彿是聽着現在的這種聲歌似的，他們爲着本身的利益，爲求得自己的解放，所以，統治階的一切威權——屠殺和恐怖都從他們腦海中排除得乾乾淨淨。

農民暴動烈焰，終於燎燒了隋場的天下。

關於當時各地農民暴動的情形，據隋書所載如下：

(一) 杜彥冰 王潤等陷平原郡。

(二) 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

(三) 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

(四) 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爲羣盜。

(五) 濟陰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萬。

(六) 北海人郭方頂聚徒爲盜，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

(七) 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寇掠城邑。

(八) 餘杭人朱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

(九) 吳人謝變 晉陵人管崇 擁衆十餘萬，自稱將軍，寇江左。

(十) 陳瑱 等衆三萬，攻陷信安郡。

(十一) 濟陰人吳海 流東海人彭孝才 並舉兵爲盜，衆數萬。

(十二) 梁慧尙 率衆四萬陷蒼梧郡。

(十三) 東陽人李三兒 向但子舉 兵作亂，衆至萬餘。

(十四) 呂明星 率衆數千圍東郡。

(十五) 齊人孟讓 王薄 等率衆十餘萬，據長白山 攻剽諸郡。

(十六) 清河賊張金 稱衆數萬。

(十七) 渤海賊帥格謙 衆十萬，自號燕王。

(十六) 孫宣雅 自號齊王，衆十萬。

(十九) 扶風人唐弼 舉兵反，衆十萬，推李弘 爲天子，自稱唐王。

(二十) 彭城賊張大彪 衆數萬，保懸薄山 爲盜。

(二十一) 宋世謨 陸瑯琊郡。

(二十二) 劉迦論 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 大世 六月。

(二十三) 鄭文雅 林寶 護等衆二萬，陷建安郡。

(二十四) 司馬長安 破長平郡。

(二十五) 離石胡 劉苗王 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第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

(二十六) 王德仁 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

(二十七) 賊帥楊仲緒 率衆萬餘攻北平。

(二十八) 上谷人 王須拔 自稱漫天王，衆十餘萬，國號燕。

(二十九) 賊帥魏子兒 自稱歷山飛，衆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

(三十) 淮南人 張起緒 舉兵爲盜，衆至二萬。

(三十一) 彭城人 魏騏驎 聚衆萬餘爲盜，寇魯郡。

(三十二) 賊帥劉明月 聚衆十餘萬，寇陳汝間。

(三十三) 東海賊帥 李子通 擁衆度淮，自號楚王建元 明政，寇江郡。

(三十四) 樊子蓋 發關中兵，討絳郡 賊敬盤陀 紫保昌 等，經年不尅。

(三十五) 譙那人 朱榮 擁衆數十萬，寇荆襄，潛稱楚帝 建元 昌達，漢南 諸郡，多爲所陷。

(三十六) 鴈門人 翟松柏 起兵於靈丘，衆至數萬，轉攻旁縣。

- (三十七) 東海賊盧公暹率衆萬餘，保於蒼山。
- (三十八) 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爲盜。
- (三十九) 高源遁守洗瑤，徵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
- (四十) 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
- (四十一) 東海人杜伏威起兵，衆萬餘。
- (四十二) 楊州沈覓敵等作亂，衆至數萬。
- (四十三) 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
- (四十四) 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陸豫章。
- (四十五) 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盧降郡。
- (四十六) 渤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洛間之長壽，自稱長樂王。
- (四十七) 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
- (四十八) 弘化人到企成聚衆萬餘人爲盜。
- (四十九) 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
- (五十) 王子英破上谷郡。

(五十一) 賊帥李密、翟讓等陷洛倉。

(五十二) 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振，羣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

(五十三) 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

(五十四) 賊帥李通德舉衆十萬寇廬江。

(五十五) 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

(五十六) 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梁王，建元安樂八月。

(五十七) 太原梁世洛聚衆萬餘人，寇掠城邑。(《隋書卷四帝紀》)

這種或大或小的農民暴動，統計有五十七處，普遍於全國，參加暴動的農民不下數千百萬人！統治階級在當時對於這空前的農民大暴動，誠然是手忙腳亂而在牠前面發抖！關於這暴動的原因，他們也感覺不是偶然的一旦的發爆，而是由於沒有解決土地問題，所以牠下詔說：『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經策，所以宅土甯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居人放逸，田疇無伍，鄆郭不修，遂使遊惰實繁，寇讎未息！……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強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姦宄，萑符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爲事條，務令得所。』(見同上書第五頁)

隋代的統治，雖然在農民大暴動顛中覆了，可是勝利的仍然不是屬於農民，并且他們仍和以前一

樣，依舊是受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的統治。

農民大革命的果實究竟被什麼人掠取了昵？

(四)地主商業資產階級掠取了農民革命的果實

在隋代末年農民暴動的範圍誠然普遍了全國，不過這些領導暴動的領袖，往往有些是非貧農的出身，如果是有的話，那麼，也這是竇建德。關於這位代表貧農的革命領袖的出身及其在整個農民革命過程中的作用，歷史會有這樣的敘述：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爲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材力絕人，少重然許，許俠節；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建德乃自縻，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由是益知名，爲里長。犯法亡，會赦歸，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贈予皆讓不受。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飢，羣盜起，乃謀曰：「往文皇帝時，天下盛強，發百萬衆伐遼東，猶爲所敗！今水潦爲災，民力凋敝，主上不是恤，而親駕臨遼；且往歲西征，

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大丈夫不死，當建功於世，渠爲亡命虜乎？我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藪阻奧，可以遠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斃，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高鷄爲盜，安祖號摸羊公。時郇八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舊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鄙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閭。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卽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衆亦盛，至萬人，猶保高鷄泊。然傾身接物，其執苦與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鄧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仍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亦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略幽州，戰死，其下魏刀兒號義山飛，壁深澤，衆十萬；建德以計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末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見唐書第八十五卷第五頁竇建德傳）

誠然，農民暴動在隋末有五十七處之多，我們之所以舉出竇建德來代表農民暴動，一方面固然因他曾建立過規模較大的革命政權，而另一方面他那刻苦耐勞的精神以及代表貧農無產者利益而奮鬥的事實亦比較其他農民暴動的領袖顯明而積極。在統治階級因農民暴動而瀕於崩潰的時候，企圖掠取成

熟的農民革命的果實的人們，的確是比比皆是。

楊玄感就是第一個企圖掠取農民革命果實的人物。

楊玄感他是貴族的出身，在農民暴動的過程中，他看到自己的階級已瀕於危險，如果不以「宮庭政變」的方式來轉變羣衆的視線，那麼，這個壓榨人民的統治機關很快的會被農民們用鋤頭鐮刀把牠捶碎。因此，他在農民暴動的初期，即企圖作冒險的嘗試；如「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綱紀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見隋書第七十卷第一頁，楊玄感傳）及至農民暴動幹得轟轟烈烈的時候，他看到有機可乘，因此，馬上便舊事重提，在「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的當兒，揭起了反對隋煬帝的軍旗；他於倒戈的過程中間，那班壓迫的農民，真的認爲他會解決人民的痛苦，所以紛紛的來參加這一種「宮庭政變」式的暴動；如「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漚洛父老，競致牛酒。」（見同上）聰明的楊玄感，他看到羣衆並沒有識破他自己虛偽的面目，於是乎便很莊重的裝着解除民衆痛苦的模樣！「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見同上）。實際上這很明顯的是模糊

羣衆階級意識的把戲！

並且，我們從他給樊子蓋的書信中間，就可以充分的看出所謂『爲天下解倒懸之急』的祕密是欺騙人民的鬼話，而其所要的仍然是那些『取而代之』的老把戲；他寫信給樊子蓋說：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治，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歷，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頒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明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仇，民庶相趁，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又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譖誣，言無所具。」見同上書第一頁至第二頁）這封信對煬帝統治崩潰的分析雖然有比較確當的地方，可是，他的結論却離開了羣衆而針對着自己。

因此，這一次的『宮庭政變』式的暴動，固然，一方面因楊玄感之離開了羣衆，而在戰略上犯了妥協猶豫的錯誤亦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並沒有完成，故其結果使被壓農民的鮮血，却又白流了不少，據史書所說，大將以下被斬首的有三萬餘人！

當然，這種『宮庭政變』式的暴動的失敗，並不是說從此就取消了地主商業資產階級掠取農民革命果實的企圖，恰恰相反，牠更是開闢了未來的地主商業資產階級掠取農民革命果實的道路；並且，這一次的事變留給他們許多的經驗與教訓，而使他們從容不迫的展開階級鬭爭的陣容，以完成在歷史轉變關頭他們所負的階級的任務。

李淵和李世民便是這個任務的徹底的完成者。

他們對於農民的暴動，感覺得牠有很深刻的社會的原因，是當時社會上一種偉大的力量；這個力量如果任其繼續的發展下去，那麼，不僅會使隋朝的統治顛覆，甚至，他們這班官僚地主的統治亦復會被農民們推翻得乾乾淨淨；因此，所以他們在農民革命浪潮高漲的時期，爲未來的命運所威嚇，逼得他們採取兩面進攻的策略來繼續維持地主商業資產階級對農民的統治。如：

『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和，欲以情告，懼不見聽；高祖留守太原，領晉陽宮監，而所善客裴寂爲副

監。世民陰與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酒酣從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爲宮人奉公，事發當誅爲此耳。」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陽不許，欲執世民送官，已而許之曰：「吾愛汝豈忍告汝耶？」……」（見唐書高祖本紀第一頁）

本來李淵在最初他是不願意走這條冒險的途徑，因爲他年事已高，腦海中充滿保守的意識，輕舉妄動是老年人最討厭的一件事情；但是，李世民却比他有更深刻的見解，他認爲祇有抓住歷史的事變，才可以發展自己的前途。所以他很堅決的在他父親的面前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說「……」今主上無道，百姓窮困，陽晉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苦守小節，下有盜寇，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舉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見袁王綱鑑合編第十八卷等三十九頁）

這種鐵一般的掠取農民革命果實的事實，是不容人們否認的；然這一次，農民革命的果實爲什麼居然竟會被李世民所掠取而創造了唐代的統治呢？這的確需要我們作詳細的解釋；就階級對比的關係而論，主要的原因是暴動的隊伍內部沒有很好的團結；當時農民暴動的範圍雖然是普遍了全國，可是

牠的弱點不僅由於彼此相聯系，甚至還是互相吞併。在互相吞併的過程中間，很多農民領袖感覺得沒有前途，因此不得不背叛羣衆的利益而投降到李世民的懷中，就是那些倔強的所謂「瓦崗諸盜」，看見環境與自己不利，也祇好拋棄鬥爭的生活爲新的統治階級的收買與屈伏！

其次，李淵的勾結外族——突厥，也是他佔據寶座和鎮壓農民暴動一個很重要的客觀原因；他感覺得如果沒有外族給他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幫助，那麼，對暴動的農民之懲罰仍成問題。所以，他允許突厥經濟上政治上種種特殊的利益，以應付當前的困難；可是突厥要他稱帝，認爲祇有李淵稱帝才可以保障這些特殊的利益。關於這種祕密勾結的情形，史書記載得異常明顯；如「李淵遣使如突厥，與之相結，突厥欲淵爲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裴寂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旗改易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所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見同上書第十八卷第四十六頁）又突厥於「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見同上書第十八卷第四十三頁）

這兩種主觀客觀的原因，已經是決定了當時農民暴動的命運，不過，李世民更善於利用環境，所以能夠很順利的用反革命的方式結束了這一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暴動。

第四節 唐代農民戰爭

(一) 唐代一般的經濟形態

唐代自代替隋朝統治農民以後，其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商業資本的發展，竟超過隋代的紀錄；這種商業資本發展的趨勢，是異常明顯，一方面是有很完整的國內市場，而另一方又有大規模的國際貿易。現在我們首先來檢討關於當時幾個主要的產業部門的發展，從這些發展中間，可以充分的看出了這時期國民經濟的活躍。唐代主要的生產可以分作如下三種：

(一) 鹽 鹽在日常生活中間所起的作用，比較一般生產品要佔重要的地位，在隋朝這個產業還沒有爲統治階級所重視，可是到了唐代開元元年的時候，統治階級已經注意到牠在一般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檢校鹽課，依式收稅。」但是這還不過是開始，到了肅宗乾元年間，又重新改變鹽法，於山海井的區域，添置「鹽院」，吸收大批脫離生產的農民，要他們從事製鹽的工作，這很顯然是國家壟斷了的生產。他們爲的是提高鹽的生產量起見，把那些從事製鹽工作的游民，編入於所謂「亭戶」釋名云：「亭，停也，人所停集；」而風俗通則說：「十里一亭，亭留也，古者鄉有鄉亭，市有市

亭，鹽民所集之處，謂之鹽亭。』今淮南蘆東謂之亭場，停戶者卽業鹽之戶，彷彿現在的鹽丁。——著者註——之列，而免掉這些『亭戶』的徭役。並且還提高鹽的價格，以前每斗鹽價僅僅十錢，此時竟漲至十倍，每一斗鹽可得一百一十錢的代價。及至代宗朝的時代，又產生一位長於理財的政治家——劉宴；他在鹽務行政方面，更有一些新的改革，他認為『官多則民擾』，所以廢除了『鹽院』制度，僅於產鹽區域置一處理鹽務的官吏，收鹽戶所製之鹽，再轉售於商人；甚至，爲獎勵這些商人起見，取消了各地的稅收，任憑鹽商們自由的去銷售商品；當劉宴開始治理鹽稅的時候，每年國家經常的收入不過四十萬緡，但到大歷末年每年鹽稅的收入竟超過十五倍以上，而達六百餘萬緡，就整個公共財政收入而論，鹽稅之收入居然占其半數。迨至憲宗時代，以李巽爲權緡使，又變更了鹽務行政的系統，將鹽利的收入劃歸度支（卽如現在之財政部——著者），最初一年的收入卽有六百六十五萬緡，達到劉晏末年的成績，以後收入的衡比，竟超出劉晏時代三倍以上。

很明顯的，鹽稅的收入爲唐代統治階級公共收入唯一的大宗，於此，可見鹽業在唐代一般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二)酒 酒雖爲帶有麻醉性的飲料，但是在一般經濟生活中，牠也起相當的作用；唐代關於酒的生產，曾有兩個系統：第一個系統，釀酒事業由政府所壟斷；如德宗建定之年，制定禁止私人酤酒的

條件，由政府置店經營酤酒的事業。第二個系統，就是由私人釀造，政府徵取相當的額稅，並且爲鼓勵這些私人釀酒事業起見，凡是釀酒商人，一概免掉他們複雜的差役。不過在武宗會昌年間，關於酒的生產這兩位系統曾經被同時採用，這採用的原因是根據各地情形不同而決定。據太和中年的統計，酒稅的收入，每年有一百五十六萬餘緡！因此酒在唐代經濟中的重要，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一件事實。

(三)茶 在唐朝以前，茶在經濟生活中還沒有起普遍的作用，所以唐以前並沒有什麼茶稅的名稱；到了德宗建中元年，因爲採取了趙贊的建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其一，這時候茶在一般生產品當中才占了一個位置。以後，茶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始逐漸推廣，迨至真元九年，茶的生產更有大量的發展，幾幾乎成爲一般社會所必需的商品，祇就當時統治階級徵收茶稅（每年經常收入有四十萬緡——著者）之鉅大，就可以推測到茶在當時經濟地位的重要。

穆宗統治的時代，因爲宮中要建築百尺的高樓，需要大宗的建築費，擬增加茶稅百分之五十，爲建築這百尺高樓的基金；但是，這一個動議却引起茶商們的代表——左拾遺——李珣劇烈的抗議；他上疏以爲增加茶稅有三不可，他說：「權茶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一不可；茗飲人之所資，重賦稅則監必增，貧弱益困，二不可；山澤之饒，其出不費，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希，三不可。」實質上，這三不可的原因，完全是代表茶商們的論調。大中初年，茶在市場上的銷路

更加盛旺，因此，在產茶區域的農民們，往往把他們的生產品——茶，私自直接的賣給那些消費者，而避免茶商們中間的剝削；此種舉動引起了茶商們很大的恐慌，於是便經過統治階級的手派遣了很多的官吏於出茶的山口，以保護茶商的利益。當然，這些官吏爲忠於他的間接的主人起見，便特別的關心，凡是正式茶商的貨物，一概給以顯明的證據——帖子；執有此種證據的貨物——茶，聽其銷售於各地，如果那些產茶的農民缺乏這種證據，而企圖直接將茶售於消費者，一經統治階級所發覺，那些，便認爲私販，馬上就加以嚴重的處罰——如私鹽條例一般的處罰。

以上這三種主要的生產，爲唐代統治階級經濟的中心，其國內市場一般發展的形態，由此可以窺測其內容的一斑。

至於唐代的國際貿易，那更是超出以前一切的紀錄；因爲有很多國際貿易的海口來證明唐代國際貿易規模的宏大：

第一個國際貿易港便是廣州。

本來關於廣州在唐代爲國際貿易港這一事實，截至現在，尙未爲一般所重視；在外國學者中間最初發見和解釋確當的當推日本石橋博士（見明治三十四年九月史學雜誌五十頁——五十一頁），因爲廣州（亦稱廣府）在當時波斯及其他的國家都稱之爲「坎富」（坎富的名稱，最初見於索來萌氏的紀

錄，易逢柯達貝氏的地理書中，也有坎富的名稱；不過歷來學者對於坎富的位置，有很多不同的解釋；如勒諾兌氏最初譯述下紀案來萌氏關於印度及中國之紀錄，即說坎富爲廣州（番禺縣），其後得金氏亦採用此說；至元 普洛特氏時，始將坎富認爲與馬可波羅氏所稱之干浦爲同一地方。即假認干浦爲杭州（干浦與杭州相近，故以杭州擬之），自克拉普洛特氏以後，有賴諾德氏，優爾氏，利希陀芬氏，日本那珂博士以及最近之科第耳氏都主張坎富爲杭州。但是石橋博士，坪井博士（史學研究法第二百一十四頁——二一五頁），伯希和氏以及籐田博士等則主張坎富爲廣州；因根據新舊唐書及當時之紀錄，則有唐一代，廣州的確爲中國南部之唯一國際市場。並且，激浦（即杭州），在唐時並不甚重要，此說較爲可靠。——著者註，實際上，『坎富』即係廣府之譯音。當時廣州國際貿易的情形，是非常的繁盛，可是在某一時期因地方官吏的貪橫，使這個國際市場趨於相當的衰弱；誠然，牠過去繁盛的痕跡，現在還留在我們的面前：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泊，歲至終四五。……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棺。……』（見新唐書第一百三十一卷李勉傳）一年中間，使已趨衰弱的廣州市場之入港海船，增加到千倍以上，其繁盛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第二個國際貿易港是現在安南的交州。

易逢柯達貝氏的地理書中，曾經列舉過西歷九世紀的初期，中國於阿刺伯商人通商有四個很大的貿易港口，而交州是其中的一個；不過他因為譯音的不同，而稱交州爲『勞京』，後來斯普棧革爾關於『勞京』的位置，更加有個明確的擬定，他說現在法領的河內，即是過去唐代的交州，或其附近的地方。這種關於『勞京』位置妥當的診斷，在研究歷史學的人們中間，並沒有表示什麼原則上不同的意見，但在『勞京』名稱的解釋方面，日本石橋博士更有一些新的補充：他說『勞京』或即是『龍編』諧音之輾轉的訛譯（見明治三十四年九月史學雜誌三七——三八頁）。據史書所載龍編縣在交州東南四十五里（見元日郡縣志第三十八卷），約當十二英里；牠臨松科伊大河而傍近大海，誠然是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的港口。我們看唐沈佺期詩題中，有『度安（指安南）海，入龍編。』的描寫（見石印本全唐詩卷四），而陸龜蒙的詩句中，復說及『路入龍編海船遙』（見同上卷廿三）的事情；並且，唐將高駢在回雲南牒（全唐文卷八百〇二）敘述平定安南之事蹟當中更說：『比者親征海裔，克復龍編。』同時，在陸宣公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中：有『有嶺南節使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陸宣公奏議卷十八）查此事在唐德宗貞元八年（西歷七九二年），由此可見交州國外貿易的發展。唐李肇也說：『南海舶外國船也，每至安南廣州。』（見唐國史補津祕書本卷下）

這雖然是一些零星斷片的材料，關於交州國際貿易港貿易的情形缺乏具體的說明，但是龍編在當

時爲海船輻輳和萬商雲集的地方，這是我們可以把握得到的，並且是毫無疑義的事實！

至於福建的泉州，在唐代亦是第三個國際貿易港。

歐洲的歷史學者——夏德及洛克喜爾二氏，他們認爲在西歷九世紀間，或者是更以前的時代，阿刺伯商人已來泉州通商。但是，這兩位歷史學家並沒有舉出可資我們直接參考的證據，因此，祇好把他倆的言論當作研究唐史的參考意見。

明朝人何喬遠在他的閩書卷七當中，曾經說回教傳來中國的歷史：『摩罕穆德聖人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西歷六一八——六二六年）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傳教泉州，卒葬此山（即在泉州東南郊外之靈山）。』這雖屬於敘述回教傳教的歷史，不過，可以從這裏間接的證明泉州在當時已有很多伊斯蘭教徒與中國通商的事實。唐會要說：『唐末天佑元年（西歷九〇四年）三佛齊國使者——蒲河栗曾來福建』（見唐會要卷百），而文苑英華亦載有『乾甯三年（西歷八九六年）授王潮威武軍節度使（福州節度使）』制，並說：『閩越之間，烏夷斯雜。』（見文苑英華第四百五十七卷）在五代史中又復述及閩王王審知（王潮之弟）施政文中有『招來海上蠻夷商賈』之句，足見唐自中世以來，福建——尤其是泉州已成爲國際貿易很重要的港口。明朝陳懋仁也說，『唐設泉州……參軍事四人，掌出使導贊。』（見泉南雜誌〔學海類編本上卷〕很顯然的，這時

候的泉州已經爲普遍出入海外的門戶了。

在當時成爲第四個國際貿易的市場便是揚州。

關於揚州成爲國際市場之最初的證據，實見於新唐書幾個私人列傳中間；如：『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涉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見新唐書第一百四十一卷一——二頁鄧景山傳）又：『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爲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降於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將其兵，詔拜鴻臚卿，襲敬釭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貲產，發屋剔竅，殺商胡波斯數千人……』（見同上書第一百四十四卷第二頁田神功傳）

按此事係在肅宗上元元年（西歷七百六十年），則我們可以充分的了解在當時以經商爲目的伊斯蘭教徒，已經於很早以前即集於揚州經商了。

並且，在文宗太和八年（西歷八三四年）又曾經頒佈過關聯於揚州成爲國際貿易市場的上諭：

「南海番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達於殊俗。况朕方寶勤儉，豈愛遐琛！深慮遠人未安，率稅猶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蕃客當然指大食及波斯等處之胡商——著者），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船舶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爲交易，不得加重率稅。」（見全唐文卷七十五）

這一個上諭是非常明顯的不僅證實了揚州在唐代爲很大的國際貿易的市場，並且，我們還可以看出得出當時的統治階級對於國際貿易的態度；牠爲的使國內生產品能夠有大量的輸出，以及在國際貿易過程中間想獲重要的地位，所以儘量的減輕商品入口的稅率，以保證這些市場不致趨於衰弱，那些「接以仁恩」，「思有矜恤，以示綏懷」的話，實際的作用不過是自己吹噓自己罷了！

這些外國的商人，他們在揚州經商，並不是流動的性質——海上貿易，甚至還有設有固定的規模宏大的商店；如「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見明謝肇淛著五雜俎卷十二）

除掉這些商業資本有長足的發展而外，在唐代關於重工業——五金工業亦有相當的進展；如關於銀，銅，鐵，錫的鑛坑，已經開採的有一百六十八所，而伊陽五重山的銀錫鑛坑，在當時鑛坑中間，規模亦較其他鑛坑爲廣大，因此，引起了統治者的垂涎；那戶部侍郎——韓洄，曾向皇帝建議，說：「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以後，關於鑛坑開採的所有權，都屬於龐大的國家機關。據官場的報

告，關於鑛坑每年生產的統計：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六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一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見胡鈞著中國財政史第一百六十一頁）；很顯然的，這些鑛坑的生產，未必僅如此數，因為在官場統計中間，並未有把那班官僚們所中飽的數目列入啊！

同時，在唐代因為海上貿易的發展，還有機器發明的事實；如唐王臯為洪州觀察使，多思巧，嘗為戰艦，挾以二輪令踏之，颶風（？）破浪，其疾如掛帆席。（見冊府元龜卷九百〇八）又「嘗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踏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見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李臯傳）而新唐書卷八十又復載同樣的事實：「教為戰艦，挾二船踏之，鼓水疾進，駛於障馬。」查王臯之名，未見於新舊唐書，而唐太宗有子，曹王——明之玄孫，有名李臯者，太宗之五世孫也（見新唐書卷七十六之宗室世系表）。他在德宗時代，曾為江西節度使，而江西節度使，本為洪州觀察使，在建中四年（七八三年）所改稱（見新唐書卷六十八方鎮表）；故冊府元龜稱他為王臯，想係他襲曹王之爵而誤傳，但這個發明機器的事實，當然是不能因人名誤傳而成問題的。我們知道這種機器並不是如現在一般輪船所具備的蒸汽器一樣，而是一種很簡單的推進機；然這推進機的發明，並不是某一個天才在主觀所能做到的事情，而是生產力發展到某一特定階段時的體現，所以在海上貿易發展的時代，便有一種與生產力適應的東西——推進機的發明。

由此，我們可以從唐代一般經濟生活當中找着幾個重要的事實：第一，商業資本在唐代是普遍的發展，並且牠——商業資本在一般的經濟成份中間是佔着優越的地位；第二，國際貿易發展達到很廣泛的程度，並因經濟上有高度的發展，所以還直接間接的統治很多經濟落後的民族；第三，工業已經脫離了原始的狀態而萌芽向上昇漲，致有關聯於適應國際市場之簡單的推進機的發明。現在我們可以

把唐代的國際交通的國家彙列如下，以供研究唐代國際關係的參考：

國名

現在的地方

日本

日本

高麗

朝鮮半島北部吉林東南部奉天東部

新羅

朝鮮半島東南部

百濟

朝鮮半島西南部

靺鞨

黑龍江及吉林東境

渤海

吉林奉天二省及東海濱省南境

奚

熱河南部

契丹

熱河中部奉天西南部

雲 熱河北部

室 章 黑龍江西南部外蒙古北部

蒙 兀 外蒙古東北部

東突厥 內外蒙古

西突厥 阿爾泰山以西至俄屬中亞細亞

回 紇 外蒙古

鐵 勒 外蒙古

流 鬼 西伯利亞勘察加半島

黠 戛 斯 西伯利亞中部

骨 利 幹 西伯利亞偏北部

高 昌 新疆土魯番縣

龜 茲 新疆庫車縣

黨 項 甘肅西南邊外

吐 谷 渾 青海

焉耆	新疆焉耆縣
疏勒	新疆疏勒縣
于闐	新疆于闐縣
印度	印度
罽賓	印度克什米爾
吐蕃	西藏
康國	俄屬中亞細亞中部
波斯	波斯
大食	阿拉伯半島
拂菻	東羅馬
甘棠	裏海之南
朱俱波	葱嶺之北
尼婆羅	尼泊爾國
石國	俄屬中亞細亞北部

南 詔 雲南

林 邑 安南中部

驃 固 緬甸

真 臘 安南南部

東 謝 蠻 貴州西部

南 平 獠 四川東南部

婆 利 婆羅洲

雖然，這個表在表面上好像是有點瑣碎，然而對於唐代國際貿易的發展以及唐代統治版圖的擴大，的確可以許多的暗示。

(二) 唐代的土地制度

現在我們再來敘述土地制度吧！因為這個問題與唐代的農民戰爭有密切的聯系，所以，我們將這個問題應作比較詳細的研究。

關於唐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可以分作兩個時期；前一個時期是租庸調的時期；後一個時期是兩稅

制度的時期。不過，在租庸調制度未頒佈以前，那時唐代的統治還在開始建立的時期——卽武德二年，因為要緩和農民鬥爭的情緒和在農民羣衆中間散佈一些欺騙的影響起見，曾經頒佈過這樣一種租稅政策：『每丁出租二石，絹二疋，棉三兩；出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但這只是臨時欺騙農民的策略，以後客觀的形勢給統治階級以穩定的機會，此種制度馬上又爲統治階級所取消！

唐書食貨志對於唐代前一時期的土地制度——租庸調制度有如下的紀錄：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少者爲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彼鄉，縣有餘以給彼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緇二丈，布加五之一，棉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

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見唐書卷五十一食貨志第一頁）

但是，在某些地方，仍有特殊的情形，如嶺南諸州則稅米。據文獻通考載：「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住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蝗蟲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見文獻通考卷二第二頁田賦考）

並且，統治階級爲使租庸調的制度普遍的施行起見，所以首先就要戶籍明確和簿計詳瞻，否則，這個制度的施行會遇到許多的障礙；故當時有兩種辦法輔助牠的施行。

第一種辦法就是「戶籍」：「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十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

第二種的辦法便是「計賬」：「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需，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衆知之。」

可是租庸調的制度，並沒有解決農民與地主的矛盾，因爲雖在這種制度下面，而土地還是可以由的買賣，並且，自武后統治以來，牠已漸漸的暴露了無法彌縫的矛盾？如「代宗寶應元年，租庸使

——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責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藉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爲羣盜（袁晁曾在浙東因此而領導農民暴動，攻陷了很很多的地方，參加這次暴動的羣衆，近二十萬人，經二年之久，始爲李光弼壓平——著者註），縣不能制。」（見同上書第九頁）因此，關於租庸調的制度遂不復爲統治階級所採用；到了代宗大歷元年，更「詔天下田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卽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爲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畝稅六升，荒田畝稅二斗五升。」並且，於「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稅畝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見唐書食貨志卷五十一第三頁）

自是以後，以畝定稅，并以貨幣納稅，不問丁戶，而租庸調之制度實際上已掃蕩無餘！

至於後一時期的兩稅制度，是開始於德宗建中元年；那時德宗的臣僚——楊炎，創造了所謂兩稅制度，其法是：「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

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役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惇獨不濟者，敢加斂，以枉法論。」（見文獻通考田賦考第三卷第九頁）

這種制度，誠然是針對着當時的土地問題；牠有五個特點：（一）稅制簡單，如果和租庸調的制度比較起來，的確是免除了戶籍不實和計賬虛浮的積弊，並且，還把那些租庸雜役一概廢免，這對於農民是有相當的利益。（二）合於租稅以財產多寡爲徵收標準的原則，摒棄了以人爲單位的徵稅方式；因此，貧困農民直接負擔租稅義務很輕，甚至如『鰥寡惇獨不濟者』這一概免掉他們直接的負擔。（三）合於租稅普及的原則，決定商人亦須納稅三十分之一；本來，在唐初按丁授田，商人於租庸調以外，無特別負擔直接租稅的義務，這不僅失之公平，且亦與租稅以普遍爲原則的標準對立。（四）以貨幣納稅，是適合於商業資本社會進化的齒輪；在唐初，租以粟；調以綾，絹，緇；庸以絹？而兩稅制度則於徵米而外，其餘概以貨幣計算。（五）因出量入以爲租稅的標準，是切合於十八世紀以來新的財政學理，在中國古代財政史上，就一般慣例而論，均以量入而出爲原則，而楊炎却把這個原則倒轉過來，的確爲中國財政史上放一異彩！

當然，一種進步的事業，往往遭受了許多意外的阻礙而引起落後人們的反動，因此，楊炎的土地

政策在決定的時候，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當時反對楊炎土地政策最烈的首推守舊的宰相——陸贄，他上疏給他的主人——皇帝，竭力的發揮他瘋狂似的論調；他說：

『國家賦役之制，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役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際，海內板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爲之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隱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埋，法無弊而己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奮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禁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困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慮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縉，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姦，歐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上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以示月平，至京與歷相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雖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肥瘠產物多少爲二等州；下等者

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見宣公奏議集）

反對的無理，我們是可以作這樣的肯定。在陸贄的觀念當中，認為土地政策的實施，不能把人民與土地分開，殊不知受田制度已經為商業資本尤其是貨幣交流的影響所束縛，而沒有存在的可能！

（三）農民生活之詩人的描寫

我們在上面所敘述的，不過是指明唐代農民所處的客觀的經濟環境，至於唐代農民之直接的生活狀況，現在，再來作一番必須的考察吧。在唐朝農民生活中間，起最大的摧殘作用的，有下列幾個毒似蛇蝎的制度：

（一）貢獻 這是搜括農民血汗之祕密的名辭。唐朝中葉以後，統治者的首領——皇帝，往往有許多出人意外的宣索，逼迫那班臣僚們從農民身上敲骨吸髓而作「無名」的進奉；祇就唐代宗的生日而言，臣僚們的貢獻竟達數千萬緡之鉅！敬宗時代，這種進奉更是變本加厲，除掉詔勅經常的貢獻以外，復詔諸道上脂盞妝具盤條繚綾千匹。貢獻制度的弊害，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是：上層的皇帝既有不法的誅求，而下層的臣僚，當然，不成問題的除掉進奉之外，會有大批的截留。

（二）捉錢 隨着商業資本發展而發展的剝削制度，在唐朝是非常的複雜，捉錢制度，是這些複雜

制度現象中的一環。在貞觀初年，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廩田，這公廩田的收入，供給各個官僚機關的公私費用；最後，因為用度不足，在京的官僚除掉受皇帝的賜俸而外，沒有其他正常的收入。於是，這些京司的官僚便異想天開的把公廩的五萬本錢（是這些官僚的賜俸——著者），交於那班市僧手裏，要他們每月納息錢四千。這一批市僧——捉錢者，政府給他們以特別的保障，免掉他們的徭役，甚至，就是有罪府縣也不敢懲治；從此以後，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以此為經常的職業，此制度主要的弊竇，是在於捉錢者倚賴政府的勢力而狐假虎威去剝削農民，所動甯願不請本錢而白納利息，官僚機關也是利用這個制度去剝削民衆（所徵收的利息常超過本錢十倍——著者），因此，農民在官僚與市僧互相勾結的局面之下，已經是彈動不得了！

（三）借錢 借錢制度，彷彿和現在的所謂國債相類似，在唐朝這個制度也是農民的死敵！這制度並不是唐朝所獨創，遠在南朝宋文帝時，因魏人南侵，軍旅大起，——就決定在富人和僧尼身上借貸大批的金錢（如富民家資滿五十萬，僧滿二十萬者，徵借四分之一即還——著者註）。

在唐肅宗治的時期，曾派遣御史——鄭叔清等，向江淮蜀漢富裕的商人借貸，就他們所有的資產，收其，謂之率貸，這是唐代最初向人民的借錢。以後德宗討河朔及李希烈，因為庫空如洗的關係，又繼續了國債政策；以他寵臣——趙贊管理度支，頒佈借錢的命令，約以罷兵為償還的時

期。當時對於這借錢工作的執行，的確是雷厲風行，派遣了大批的爪牙往農村中間直接搜刮，農民彷彿和遭遇盜劫的一樣；甚至在貧苦農民中間，搜劫的時候，他們的所有，往往全部（本來他們財產是很少的）都被官吏所掠奪，逼得他們必須的生活都難於維持，因此，有許多破產失業以及意志薄弱的農民，時常發生同羣結伴自殺的現象。但是，借錢工作的另一方面，對於都市的豪富，却有很大的讓步，綜京師豪富田宅奴婢的估計，僅僅得着八十萬緡。本來國債的性質，絕對沒有直接強迫搜取的成份，很顯然的，這是直接掠奪農民的行動，與國債的誠意誠有天上人間的距離！並且，所謂「罷兵乃償」，更無確定的時期，究竟以後履行了償還的義務與否？歷史並沒有明確的答覆我們。

（四）僦置納質錢 這個制度的內容，主要的是保護高利貸資本的利益，其次，便是於農民銷售農產品的時候，徵收他們很高度的所得稅。關於保護高利貸資本的部份，如農民以物向高利貸者——典當商人質錢，迨至贖物的時候，於母錢之外別還子錢（即利息），在應還的子錢當中，政府取出其一。如果農民們以粟麥到市場上銷售，同樣的，也要在他們所得的代價當中徵收四分之一的所得稅；這制度在當時曾引起農民竭力的反抗，在反抗的過程中間，長安城曾為之罷市！

（五）稅間架 間架稅彷彿類似現在的房屋稅，其制度以屋二架為間；上間稅錢二千，中間稅錢一千，下間稅錢五百。在徵收稅錢的時候，官吏執筆握算侵入農民的住宅，計其間架之數，即責令農民

們繳付應繳的數目，或有房屋很多而無其他資產的人們，出錢嘗至數百緡之鉅。並且，還規定很嚴厲的賞罰細則；如果農民們敢匿一間即受杖刑六十，告發者給賞錢五萬。

(六)算除陌 最初算商賈緡錢，於諸道津會設置官吏，檢閱商人經常的收入，錢每緡算二十。以後更將算的範圍擴大而採取除陌的制度。凡公私給與和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如果這些買賣和給與摒棄掉貨幣的方式，而採取物物交換的話，那麼，還是就貿易者約錢為率以抽取固定的算錢；都市的牙行，各給以政府規定的印紙，人民如有買賣，隨日署記，到明天由政府合計抽算。如有貿易而不用市牙，凡隱百錢者，即罰款二千，杖刑六十；告發者，賞錢十千。

關於這些制度為害之烈，我們從下面所引證一段事實當中，看得清清楚楚：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詔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李希烈暴動），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冀得厚賜遣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澠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餒，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乎？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儻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見中國財政史講義一百六十八

在唐朝我們很明顯的看出這些束縛和剝削人民的制度，好比緊箍一般似的繼續不斷的向農民頭上箍來；並且，除掉這些直接剝削以外，戰爭也是擾亂農村秩序和破壞農村經濟的惡魔！

杜子美他生在這個時代，他的詩完全是農民生活之最具體的反映，他把強征暴斂，苛損雜稅，拉夫封差以及戰爭給人類精神上的創傷都做了有力的描寫，所以後人讀他的詩，往往把自己都溶化在他的詩中。茲錄數篇如下：

A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一篇詩雖然是單純的描寫在戰爭時期農民的生活，可是，拉夫竟拉到老年婦人的頭上，與現在戰爭區域有很多相類似的地方，祇就這一點講，過去統治階級自己所宣傳的什麼「仁義道德」，不待旁人去揭破，他自己就把牠撕得乾乾淨淨！

B 兵車行

「車轆轆！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行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返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值秦兵奈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收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唐代的農民們既然過着這樣艱難困苦顛沛流連的生活，他們是不是如絳羊一般的屈伏了呢？不！祇有統治階級是這樣的想，而被壓迫的農民們是絕對不會屈伏的。我們看：歷史已經到了轉變的關頭，一切的矛盾已經公開的暴露，社會各階級都在準備着自己，而農民們同樣的也舉起了粗暴的拳頭，繼續他們過去在歷史變革期中所未完成的任務。

（四）黃巢暴動

每一次的農民暴動，都是歷史變革的動力，牠是受當時經濟的政治的因素所決定，絕不是什麼從

天而降的東西；不過，牠的發展的趨勢並不是完全的一致，在歷史上表現的往往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暴動的農民推翻了舊的統治，同時又建立一種新的政權——農民政權；但是此種農民政權——小資產階級的政權，在生產力未有進入更高階段——資本主義的社會，缺乏先進階級的領導，必然的會接受商業資本的影響而將農民革命的實質腐化，蛻變為另一種社會成份的代表機關。第二種方式是交戰的兩個階級同時並倒，那種由市民蛻變的力量，受着大批農民的掩護而跨進政治舞台！但是，這事實在中國歷史上沒有見過，就世界農民革命史觀察，也祇有法蘭西的大革命把牠表演得如火如荼。第三種方式是農民與統治階級激戰的時候，統治階級的左翼，為的是拯救自己階級和模糊農民鬥爭的觀念起見，於是在他們的內部舉行了一些改良式的鬥爭，並乘機掠取農民革命的果實，把廣大的農民暴動鎮壓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數見不解的事情啊！

黃巢暴動究竟是走那條道路呢？

以黃巢為領導中心的農民暴動，在乾符元年（即西歷八百七十四年）才爆發成為廣大的農民戰爭；最初發動這次暴動的，要推濮州人王仙芝。關於養成這位暴動領袖的客觀環境，據史書記載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遇盜遇，官軍多敗！……王仙芝聚眾數千人，起於長

垣。」（見御批通鑑輯覽卷六十二四十九頁）在這材料中間，除了發覺了這位歷史家對於歷史敘述之不忠實，把歷史進化的意義和土地問題之未爲統治階級所解決，因此，關係到農民爲求得土地及澈底解放而暴動的真相完全抹煞而外，還可以看出在王仙芝暴動以前，已經有部份的農民騷動，不過，此種農民騷動進展到王仙芝揭起暴動的旗幟以後，已經改變了他的內容，那些很小的伏流都匯合起來而成爲泛濫舊社會的洪水。

當然，統治階級對於這洪水的泛濫，事先已經看到一些象徵：「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植，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代木，雇妻鬻子，祇可供所由（即督催之吏卒——著者）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見同上）可是，他要消滅這革命的象徵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是統治階級自動的沒收地主官僚的土地，並把這些土地分給貧苦的農民，但這是統治階級自己所不願意的舉動。另有方面，祇有殺盡千百萬貧苦農民，才可以把這個問題作了所謂痛快的解決。

農民革命的火焰，燃燒出一朵奇葩！

從農民大革命的環境當中，煅煉出一位傑出的領袖——黃巢。這位領袖的出身是非常的奇特，他

是個富於貲財之鹽商的子弟；他不僅有很好的軍事技術，還有相當的智識基礎與煽動天才，他和王仙芝在暴動以前就有了私人間的友誼的聯絡，及至王仙芝公開的向統治階級樹起了革命大旗以後，他便拋棄了自己的階級立場，而認為這種行動才是唯一的真理。因此，他也顧不得那些落後人們的毀謗，以八個基本幹部（連他自己——著者）去號召羣衆，居然於很短時間號召了數千農民；這種情形，誠然是「登高一呼，四方響應」啊！

暴動給統治階級以巨大的打擊，使那班官僚地主在鋤頭鐮刀的面前發抖！如宋威在奉命討伐農民而與暴動農人接觸的時候，他和曾元裕說：「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黃巢傳）統治階級最上層的皇帝，也知道這種情形，但他以爲暴動的農民不過是想求得「一官半職」，彷彿沒有什麼經濟的及社會的背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分析農民暴動，很自然的會得出了農民暴動的對策——上層農民領袖的收買，以企圖消滅千百萬貧苦農民解放的鬥爭：

『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詣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詢曰：「君降獨待官，五千衆且奈何？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卽不受命……」（見同上書）

很英勇的黃巢，他以堅強的被壓迫階級農民的意識，克服了千鈞一髮似的統治階級收買的危機，他站在羣衆利益的立場上，不惜與『患難與共』的老友決裂，把感情拋到九霄雲外，這誠然是革命家光明磊落的行爲。及至王仙芝在黃梅因軍事上的失敗而爲敵人所乘，竟犧牲自己的生命！統治階級以爲農民失掉了領袖，暴動可以從此消沉下去，殊不知廣大的下層羣衆，早以接受了黃巢的影響；關於領袖的選擇，當然是以衆望所歸的黃巢最爲適當，所以如尙讓這一類的人便推黃巢爲衝天大將軍。那班河南和山南的民衆，聽說黃巢正式的做了暴動的領袖，都爭先恐後的來參加解放自己的戰爭，在非常短促的時間，號召了十餘萬農民，的確爲王仙芝領導期間所不及。雖然，因軍事上的失敗，特別是高駢對於暴動的組織以很大的打擊，逼得黃巢在策略上不得有所變更，即是說放棄了進攻的陣容，而採取暫時防禦的策略，如表面上與統治言和等等；可是這個時期是非常的短促，客觀形勢給暴動隊伍以便利，馬上又踰江西，攻破虔吉，饒信等州，並開七百里的山道直趨福建；他以為福建是南中國經濟中心之一，企圖抓住這個經濟中心的區域再繼續向外發展，掩有整個的南中國而與統治階級形成對抗的局面。

黃巢從這認識出發，所以很積極的攻取安南和廣州；當時右僕射——于琮，見到這問題的嚴重，曾向皇帝作這樣的建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見同上）黃巢以義軍的資格，

取得了這些地方以後，立即向人民申訴統治階級的罪惡；牠指斥統治階級慘無人道的壓迫羣衆，指斥政治組織的卑鄙貪污，換句話說，把統治階級所有的罪惡都向羣衆公衆的揭發，使民衆對於革命的同情。但是，因為南方的氣候，尤其是安南和廣州的氣候，不適宜於暴動羣衆的生活，而遭受空前未有之瘟疫的災禍；瘟疫的傳染是異常的可怖，差不多所有的暴動隊伍十分之四都在此種自然災害當中犧牲了生命！

黃巢以爲與暴動羣衆不相宜的地方，是不可久留的，因為假使繼續的留戀，那麼，病魔會把這批久經煅煉的英勇的革命羣衆，悉數置之死地，因此，祇好回過頭來奪取統治階級的基礎。同時，統治階級的內部更是非常的動搖，如劉巨容在和黃巢作戰的過程中，深深的感覺得：『國家多負人，厄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見同上書第二頁）這種現象，客觀上與黃巢的北返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他能夠很順利的從采石渡江，長趨直入攻陷了東都！當時暴動的軍隊的確是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如『巢陷東都，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見御批通鑑輯覽卷六十三第二頁），這一點事實已經答覆了人們對於暴動隊伍之造謠！暴動的隊伍經過了潼關以後，很順利的佔領了長安，使統治階級最上層的皇帝倉惶出走！

從此，社會上便起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

那所謂『賊骨頭』的黃巢，現在居然拿到了政權，并有數千宮女迎拜而稱他爲黃王，怎不令士大夫們氣死；在遺老遺少和士大夫們悲痛聲中，又稱『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更令士大夫們怒髮衝冠！並且，這個政權，牠對於民衆的敵人——官僚採取很嚴厲的態度，嘗以極刑去處治他們，這種不妥協的精神縱然是他後來失敗的原因之一，然奮鬥的精神光輝更從此處流露於民衆之前了。

可是，這個政權是非常的短命，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鄭畋，積極的向牠進攻，各地雖有農民鬥爭，不幸缺乏總的聯系，而使他不能穩定。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整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軍士釋兵入茅舍，掠金帛妓妾……』（見同上書）這一紀錄，除掉暴露地主階級之瘋狂似的進攻農民而外，更揭破他們那種所謂弔民伐罪的原形。

最後，李克用調來大批沙陀軍隊，在軍事技術上屈伏了黃巢，如以有訓練的騎兵攻擊密集的暴動隊伍，使長安再度的落到舊官僚手中。暴動既然失掉了根據地，游擊生活是很難找到出路！

在長時期的農民游擊戰爭中間，使農民們感覺到沒有前途而逐漸的離開戰線，回復到以前飢寒交迫的生活！下層羣衆既有這種趨勢，很迅速的會反映到暴動隊伍的上層；因此，如朱溫們首先向統治階級投降，企圖保證未來的地位，而黃巢多年的戰友——尚讓，亦復對革命背叛，並且，統治階級還

經過他的手結束了這次廣大的農民革命！

綜自動暴以來，延長了十一年之久，但是不確定的農民階級的革命，經過這次事變，愈加證明！牠如果缺乏領導是沒有單獨的前途啊！

第五節 宋代農民鬥爭與王安石變法

(一) 一般的經濟形態

凡是相信歷史進化的人們，都應該承認中國社會自殷周以來是繼續不斷的向前發展；當然，這發展的途徑在表面上並不一定是這種或那種的突變的直線形式，而往往是走的迂迴曲折的道路。在黃巢暴動失敗以後，統治階級雖然對農民施行了很慘酷的懲罰，可是，這懲罰並沒有解決了社會本身的矛盾，反之，只有使牠們（統治者）內部的矛盾格外緊張起來。如五代的大混亂，延長了五十餘年，在那分贓的悲慘的戰爭中間，不知流了多少農民的膏血！

於這種狀況之下，社會的生產力之向上的發展，必然的要遭受很大的障礙，同時，上層的建築物——政治組織也會有一番更替。於是乎宋朝就在這樣的環境當中產生出來！這個統治建立的初期，不

成問題的要來整頓經濟而發展自己的前途，并在形式上還帶着與民更始的面具，以欺騙廣大的民衆。不過，宋代的經濟形態究竟是那種成份佔着優越的地位呢？這是值得我們詳細的探討：這裏我們首先要指出牠幾個主要的生產，其次，在一些經濟的重要的材料上面，從複雜的經濟成份中間來找其比較明確的結論。

第一個重要的產業是鹽：宋朝鹽制，最初是非常複雜，很多的地方沿用五代的方式，如所謂「蠶鹽」（即於育蠶時期，以鹽俵散給農民，限期納稅的意思——著者），即是一個顯明的例。以後才確定官賣與通商兩種同時存在的方式；通商的內容，即是任憑商人們自由的運鹽於各地去銷售，不過要納相當的稅額，每一斤徵稅一錢；此法多行於京西，陝西，河北等地。而官賣則係由政府經營專賣，一般人們稱之爲官鹽；在淮，浙，京東，南廣諸地，這種制度是普遍的施行。仁宗末年，又變行鈔法，令商人以錢購買鹽鈔，持鈔赴產鹽區域領鹽，任其運售於各地；此法最風行於陝西，商人們以錢四貫八百買一票，可以請鹽至二百斤。最後，蔡京又變更了此種制度，改爲長引短引的辦法，凡鄰近於產鹽區域的地方，准許商人們赴場輸鹽，運於附近州縣售賣，並給他們以短引，期限一季；那些距離產鹽區域遠的商人，則給他們以長引，期限一年，現在所謂鹽引的制度，實發源於宋代。當時的鹽稅是政府收入的大宗。

第二個比較重要的產業便是茶：關於茶法，在宋朝比鹽法尤爲重要，凡是官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處死刑！太平興國二年，曾下詔說：『凡是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四年又下詔『鬻僞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統治階級爲什麼這樣的注意於茶的管理，因爲每年茶稅的收入竟達二百八十餘萬二千九百餘貫；從這個收入的統計數目中間，茶爲宋代重要產業之一，我想人們不會有異議吧？

宋朝除掉鹽和茶有長足的發展而外，更有很簡單的機械的發明；在南宋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年），岳飛征伐洞庭湖中湖匪的時候，這批所謂『天生的賤骨』——湖匪，曾使用輪船，如『以輪激水，其行如飛！』（見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岳飛傳）又『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見南宋末吳自牧著夢梁錄卷十二杭州西湖之車船）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看整個宋朝國際貿易的情形：在北宋初期關於國際貿易已經開關了三個規模宏大的貿易港口；這三港口全部開關的時期，則在真宗咸平二年（西歷九九九年）。這三個港口位置是：廣州，泉州，杭州。

廣州是當時第一個國際貿易港，如『崇寧初（西歷一一〇二年），三路（廣南東，福建，兩浙）各置提舉市舶司，三方唯廣最盛。』（見朱彥著萍洲可談卷二）同時，關於廣州外國貿易的統計，清朝

人梁廷柵著粵海關志卷三，其所引用的北宋畢仲衍之中書備對亦有如下的說明：『漢按備對所言，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內明州（泉州）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廣州所收者則有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雖三處置司，實祇廣州最盛也。』

泉州是第二個國際貿易港。『元祐三年，……置密州板橋（山東省膠縣）市舶司，而前一年增置市舶司於泉州。』見宋史卷百八十六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而馬端臨亦說：『熙寧中始變市舶法，泉人賈海外者，往復必使東詣廣，否則沒其貨！海道歸遠，竊還家者過半歲，抵罪者衆。太守陳侗奏疏願市舶於泉，不報，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詔泉置市舶。』（見文獻通考六十二職官考十六提舉市舶條）很明顯的，泉州在宋朝的國際貿易港地位上是非常的重要，在元祐以前，牠已成爲重要的通商口岸，如『太平興（西歷九七九年），京師營權易院，乃詔：「諸番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於官庫者，不得私相貿易。』（見宋會要）並且，這時候泉州不僅成爲通商口岸，還有很多外國商人居留於此：『雍熙間（西歷九八四——九八七年），有僧囉護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國人。番商以其胡僧，競持金繒珍寶以施，僧一不有，買隙地，建佛刹於泉之城南，今寶林院是也。』（見趙汝适著諸蕃志上天竺國條）。由此，我們更可以推測當時番商之僑居泉州，當然不在少數。

其次，關於南宋時代泉州市場的繁盛，更超過北宋的紀錄；『福建（泉州）廣南（廣州）皆有市

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惟兩浙冗蠹可罷」（宋史卷百六十七職官志七提舉常平茶馬市舶職條）。同時，吳自牧也說：「苦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見夢梁錄）知不足齋叢書本）卷十二）。觀此，泉州之爲國際貿易的重要港口，這是件白日經天的事實！

杭州是第三個國際貿易港。關於杭州之成爲國際貿易港的事實，就我們現在的材料，還不能搜集更充分的論證；不過，從一些零星斷片的紀載中間，看出牠過去發展的痕跡罷了。張闡之說：「兩浙，閩，廣三市舶司，歲抽及和買約可得二百萬緡。」（見李心傳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三）這材料是說明杭州爲國際貿易港口之有力的明證，並且，耐得翁也說：「自高宗皇帝駐蹕於杭，而杭山明水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即汴京）其過十倍矣。……况中興行都（即杭州）東南之盛，爲今日四方之標準。」（見耐得翁著都城紀勝序言）所謂「民物康阜」，「東南之盛」，「四方之標準」，異常顯然的，是描寫杭州市場的繁盛。

宋代既然有三個大規模的國際貿易港，那麼，統治階級究竟採取何種態度以處置這複雜的國際貿易呢？因爲此種政策的決定，在國際貿易史上有嚴重的意義，這是值得我們的注視。

宋朝對於國際貿易是採取獎勵的政策。

從獎勵政策之總的路線出發，對於國際商人的待遇，便演出很多複雜的方式；如「遣內侍八人，

齋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番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牛，眞珠，龍腦。每綱齋空名詔書二道，於所至處賜之。」（見宋會要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年）條）我們看這是第一次獎勵國際迪商的辦法，所謂「招勾進奉」，「齋空名詔書」等文句，更十足的證明牠遣使的目的是在吸引外國的商人。第二種的方式，便是以名位去籠絡那班外國商人；「紹興六年（一一三六年），和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船舶，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見宋史卷百八十五食貨志香條）所以，如大食（即阿拉伯）蕃商——蒲囉辛及蕃船綱首蔡景芳等，均根據上述的褒獎命令，做了所謂承信郎（從九品）的官職。第三種方式即是每年十月外國商船歸國的時候，中國官吏爲之設宴送別，即所謂犒設：「歲十月，提舉市舶司大犒設蕃商而遣之。」（見周去非著嶺外代答（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三）。又「每年於十月內，做例支破官錢三百貫文，排辦筵宴。係本司（即市舶司）提舉官同守臣犒設諸國蕃商等。」（見宋會要紹興十四年（一一四四年）條）而萍洲可談卷二亦曰：「嘗因犒設，蕃人大集。」

在獎勵政策的總路線之下，國際貿易的收入，的確是統治階級經濟上的大宗來源之一，據宋史卷二百六十八張遜傳紀載，認爲自太平興國元年創設權易署以來，第一個年頭政府即收入三十萬緡之利益，未幾更增至五十萬緡云。而李心傳亦說：「自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至紹興四年（一一三四

年)前後凡七年間，泉州市舶司之利得達九十八萬緡。』『紹興末期，廣州，泉州市舶司，由抽分及和買所得之利益，每年達二百萬緡。』(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函海本〕甲集卷十五)同時王應麟對於這類數目字也有相當的答案，他說：『海舶歲入，犀象，珠寶，香藥之類，皇祐中(西歷一〇四九——一〇五三年)五十三萬有餘；治平中(西歷一〇六四——一〇六七)增十萬；南宋中興歲入二百萬緡。』(見玉海卷一百八十六)於此，足徵宋代由國際貿易所收入的利益是逐年增加；所以，明朝人朱健說：『渡江之初(西歷一二一九年)，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紹興末(一一六二年)，合鹽，茶，酒，算，坑冶，權貨，糶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見古今治平略卷三)國際貿易的收入，對於南宋統治有很大的幫助，如果缺乏了這巨大的收入，那麼，南宋的統治，是不能支持那樣很長的時間。另一方面在海上貿易有長足發展的宋代，航海術又有很大的發明，如『高麗圖經』及夢梁錄所載，不僅有設備完美規模宏大之中國商船，並且還有航海借鏡的『指南針』(即『羅盤針』)的發明；這發明並不是偶然的現象，牠完全與生產關係相適應；這時期中國商船時常到波斯灣及印度一帶，因此，勢所必然的，這班航海商人要積極的闡明磁石指極性。一般人們認為中國的羅盤針係傳自地中海或阿刺伯海，但是並沒有充分的根據！

關於宋代一般經濟的形態，我們根據上面一些材料，可以從這些敘述當中，找着相當的結論：就

是說，宋代的經濟並沒有倒轉車輪向復古的道路，而是紆迴曲折的向前發展，牠在某些地方，與唐朝的經濟有很多類似之點，但是，絕對不是和唐朝一模一樣，那些『中國歷史數千年來一成不變』說的先生們，企圖抓住表面上某種類似的事實，而貿然的反對歷史的進化，實際的結果祇是徒勞無功！當然，宋代經濟的本身，並沒有發展到了產業革命的程度，牠在經濟上最高領導的成份仍然是商業資本。不過，這商業資本的內含，與前一個時期就有很大的不同，牠那大規模的國際市場，牠那設備完美的海上商船，實為前一時期所不及，因此，這種經濟發展的波浪及於以後的影響是非常之大，換句話說，牠已經為元朝登峯造極的商業資本開闢了一條很順利的道路。

(二) 土地制度的鳥瞰

宋代的土地制度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公田制度的形式；該制度的內容包括官田，莊田，屯田，營田四種，換句話說，這些土地是屬於政府所佔有。政府佔有這些土地的原因，是五季變亂的結果；當五季混亂的過程中間，長期的戰爭不僅使農民破產和逃亡，同時，就是那些所謂『閥閱』的地主，也顛覆了不少；過去的貴族，現在變作平民，過去度着養尊處優的甜蜜生活的人們，現在也要飽嘗艱難困苦的味道。宋朝既然繼續五季而統治人民，那麼，對於這批失掉了原主的大塊土地，當然要為政府

所沒收。政府對於這批由沒收所得來的土地，是直接租與農民，要農民繳納相當的租稅；在統治階級的意思，以爲這是一舉兩得的辦法，既不會使土地荒蕪，把農村生產量提高，而同時又安插了一大羣失掉土地的貧農，殊不知事實上，貧農們所得到的利益與統治階級的利益恰恰成爲反比例，在這種制度之下不知絞盡了多少貧農的膏血！所謂『私租額重納輕，官租額重納重，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廩爲執事之人，皆得爲侵凌之道。』公田制度權壓貧農的內容，以這簡單的幾句話當中，已經赤裸裸的道破了牠的原形。

與公田制度同時存在的還有『民田』制度的形式。所謂民田卽是人民私有的土地，照例要向政府繳納大批的地租；此種土地面積的數量究竟有多少？因爲現在還沒有可發的統計材料供我們參考（當然，宋朝的統計以及會計方式已比較以前精確——著者），不過，就宋代所開墾的土地數字當中，大概的情形是可以看出一些；如『開寶末年，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墾田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墾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而『治平中四百四十餘萬頃』（見馬端臨文獻通考田賦考）。墾田數目之逐年增加，在牠的反面完全顯示出大批的土地集中到地主官僚的手中。並且，有一件事實我們就可以了解所謂民田之集中到地主官僚手裏這一現象之普遍化；如淳化四年皇帝

的詔書說：『戶口之數，悉載於版圖，軍國所資，咸出於租調；近年賦稅減耗，簿書糾紛，州縣之吏非其人，土地之宜不盡出，小民因以多辟，下吏緣而爲姦，乃有匿比舍而稱逃止，挾他名而冒耕墾，征役不均於苦樂，收歛未適於輕重，宜示詢求，以究情僞。』（見前揭書）地主官僚們在農村中間的確是『乘火打劫』來掠奪農民的土地。

土地集中的現象既然是普通的發展，那麼，對於土地問題的爭論，必然會排到一般政治家議事日程當中：

陳靖便首先發表他對於土地問題的意見。他說：『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地理曠遠，雖加勸督，未能遽獲其利；左者墾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圍三二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一二，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逃亡既衆，則賦稅歲減，而國用不充，歛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至矣。……擇其膏腴不耕之處，申以勸課。……嘗奉使四方，深見民田之利害，汗萊極日，膏腴坐廢，立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稅調，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損益；况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

亡遷，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則望備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墾，未計賦稅，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鷄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俾咸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戀家懷土，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以司農新墾之名籍，令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量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折估，納之於倉，以成數開白戶部。」（見同上書）

陳靖這觀點在當時是比較嚴重，值得人們深刻的注意，牠除掉包涵『耕者有其田』的成份而外，還提出很多具體的辦法，如招致大批的貧農來耕墾荒閑無主之土地，以提高農業經濟的上昇，使牠與正在發展的商業資本相適應，而另一方又顧慮到貧苦農民之缺乏生產工具和維持生活的食料，所以復主張由政府貸款給那些勞苦農民，在秋收的時期，依照市場價格以生產品折還於政府。此意見雖經採納，但是當時的政府因缺乏大批的金錢，同時，更顧慮到水旱天災的到來，使政府的貸款遭受意外的損失，因此，對於陳靖的主張祇好置諸高閣。

地主豪紳他們是『幸災樂禍』，在陳靖的主張未見諸實行以後，那土地集中的過程是更加迅速，

而成爲社會上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譬如守舊的政治家——蘇老泉，他看到此種現象都惴惴不安，而力竭聲嘶的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周之時用井田（本來井田制度在中國歷史發生過沒有？現在是值得的研究，依我個人的意見，這井田制度是儒家的假託，在本書導論裏面已經說了，希讀者諸君參看——著者），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苔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回顧，指麾於其間，而屬役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而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尤且不可，而况強富之民，輸租與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這完全是代表地主的思想——著者）！……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詭辯哲學——著者），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一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即董仲舒）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以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兄同上書）

蘇詢『限田』的主張，他的出發點完全是根據『緬懷往昔』，他絲毫不了解社會進化之必然性，

他把脊背朝着歷史的發展，認為限田就可以解決土地問題的矛盾。殊不知他的理論不僅與事實背道而馳，甚至，有些地方自己還和自己矛盾。他這種復古的反動的土地問題的對策，在商業資本比較發展的社會裏面，不但統治階級不能採納他的意見，就是在羣衆中間同樣的得不着什麼回聲！

但是，土地問題是否永遠的攔着而不能解決呢？不！飢寒交迫的農民們將自動的起來企圖解決這些問題。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無情的摒棄了咬文嚼字之儒怯行爲，很坦率的採取「暴力」來解放自己。

警鐘響了！叛亂的農民又在准備着演流血的慘劇！

(三)一段農民暴動的插話

土地關係隨着商業資本的發展而更容易集中到地主豪紳手裏，這是不容置喙的事實，反之農民們的生活也就日趨於低下的狀況連必需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了。因此，暴動是貧苦農民唯一的出路。促長這次暴動的客觀因素，便是統治階級的苛捐雜稅，把廣大的中農和佃農都帶到暴動的隊伍中來；當時苛捐雜稅的名目很多，如「宅稅」「地稅」「丁口稅」以及「土產稅」即「牛革」「蠶鹽」「食鹽」之類，都抽很重的賦稅。最後，又有所謂「支移折變」之法，更是鯨吞農民膏血的制度；什麼是「支

移」呢？統治階級由歲賦所徵收的物產，輸納本有一定的地方，而以有餘補不足，不特不移此輸彼，移近輸遠，在最初本係通融便利的辦法，可是它的實在的內容是竇弊繁興，那班徵收賦稅的官吏，往往借口於支移而創立「腳錢」的名目，每斗須輸錢數十，對於貧苦的農民尤肆行壓迫，這班被壓迫的農民，時常賣掉耕牛土地而猶不能饜官僚爪牙們的大慾。至於「折變」的名稱，更是剝削農民血汗的最可怖的象徵，本來政府徵收農民所繳納的賦稅是有一定的慣例，譬如繳納米穀，但是因一時所需：政府要農民改納麥菽或其同類的東西，便根據彼此之價格多少以定折算之標準；但問題并不是這樣的簡單，官僚們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循環增加，務使農民們遭受很大的損失，所謂「苛政猛於虎！」這話是有苦的真理啊！

被壓迫的農民們，從悲慘而嚴肅的空氣當中，已經揭起了暴動的大旗：

「青神（即周縣今屬眉州）民王小波作亂，神，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趨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傳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青神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病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影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死，其黨李順，擁衆寇掠，州縣多陷！四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射中之，玘

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衆至數十萬。」（見御批綱鑑輯覽第七十三卷第四十一頁）

暴動既然開始，農民與官僚地主豪紳的衝突，當然是達到短兵相接的程度，就他們懲罰反動縣令齊元振的行動來觀察，如『剖腹實之以錢』這一事實，很充分的表現農民革命情緒的怒焰了。這一羣向爲人們所賤視的被壓迫的農民，他們也曾以粗暴的拳頭奪過了成都，也曾建立過臨時政權，這政權是以李順爲中心的領導。

暴動是失敗了！悲慘的歷史戲劇又重演了一次！

當農民建立了臨時革命政權以後，雖然也曾以二十萬羣衆去圍攻梓州，但缺乏與各地農民鬪爭的聯系，所以結果終爲統治階級的走狗——農民暴動的劊子手——王繼恩所消滅。不過暴動雖然是失敗，而他們所提出來的政治上如『吾病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的這一非常有意義的口號。牠的確是染遍了鮮紅的農民要求的顏色，是當時社會各階級矛盾最顯明的反映。

農民們對於暴動雖感覺得失望，而統治階級又以很慘酷的方式結束了農民暴動——戰敗了農民，但是經濟上的矛盾並沒有解決，政府與人民間的仇恨祇是一天一天的加深，不過在新的農民革命失敗以後，人民鬪爭情緒是異常的消沉，要馬上再來一次革命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羣衆的鮮血並不是白流的，他多少都會給社會一些影響，至於影響的程度如何，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王安石就是受影響最深刻的一個。

(四) 王安石的變法

中國歷史上的改良運動者很多，而王安石也是其中的一個。不過，過去那些改良運動者的政治主張多半偏向於空想，就是說沒有現實的精神；而王安石則力矯前非，掃除過去一切空談政治家的積習。而積極的提出自己的具體主張。他不像王莽那樣的懦弱，遭受些微的挫折馬上就修改或者是放棄自己的意見，他是不拘小節，不畏譏諷，他在主觀上既然感覺自己的主張正確，那麼，他就以很堅強的意志勇往直前，與那些反對派做理論上的鬭爭。

現在我們首先分析王安石的變法究竟是受那一種因素所影響？其次我們再敘述他的變法的綱領。

他的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就是變法的導火線，換句話說，在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已經勇敢的撞起了變法的警鐘！這篇文章的內容究竟是寫了些什麼？的確值得我們詳細檢查的必要。他首先說：「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

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很明顯的，此時社會的上層建築物並不是絕對的穩定，雖然，牠在不久以前還是鎮壓了農民的暴動。但是王安石的見解畢竟比當時一般的臣僚高超一等，因此他只認爲這是形式上的解決；我們看他說：『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王安石爲什麼要變法？在這一段話當中，很直率的爲的是要消滅農民戰爭。同時，他又埋怨那班在朝的臣僚不去注意這些重大的問題，而祇是『尸位素餐』：『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并且，他還責備皇帝說：『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最後，他認過去一切的變亂以及目前統治有動搖危險的原因，是由於沒有根本去解決一般人民的要求，所以他認爲唯一當前的任務便是變變更社會上層建築物的某些部份——特別是與國民經濟有密切聯系的法制：『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心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

以征誅。……」他深深的感覺得變法的困難與障礙之不易克服，所以他主張用政治力量來擁護變法的實施。但是，他唯恐人們攻擊他的變法主張之標新立異，所以，他在皇帝面前，對於他自己的理論特罩上一件古代的外衣；如什麼：『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詩曰：「豈第君子，遐不作人！」……』（以上統見王臨川集）實際上，這些話都是他爲自己開脫『標新立異』罪名的步驟。

英勇而雄辯的政治家的王安石，在理論決鬪的場中終於戰勝了一切的反對派而確定了變法之思想上的基礎。

現在，我們把王安石對於變法之具體的實施的意見，加以一番的搜列，以做我們研究王安石變法的提綱：

A 經濟系統的變更：

王安石他是個飽經世故而邁進的政治家，他認爲社會上的一切的混亂以及農民的騷擾，這些都是根據於經濟的原因，就是說：國民經濟的系統如果混亂，而社會上各階級對抗的形勢亦復因經濟系統的混亂愈加嚴重與顯明。因此，第一點，他對於糧食市場的價格曾提出相當調劑的辦法，即所謂『均輸法』也。什麼是均輸法呢？條例司（即變法的參謀部——著者）言：「諸上貢，歲有常數，年豐可

以多致而不能盈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共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官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而民財不匱！」（御批綱鑑輯覽卷七十六第二十八頁）第二，便是國家對於市場的管理。如「王詔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直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次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同上書第三十五頁）

除掉這些組織的有計劃的調劑和監督市場而外，在整理和改革經濟系統的過程中，王安石他是首先又注意到農村經濟組織的改變；於變法的意見才爲皇帝採納以後，他馬上就派遣很多官吏去視察全國農田水利與賦役的實際狀況；如「遣劉彝，謝卿材，候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這完全表示王安石的變法並不是憑藉於主觀的想像，並且，恰恰與此相反，他是側重在實際調查，根據調查所得的材料再加以有系統的整理，然後，才確定處理問題的方向。

他根據從事調查的臣僚們實地的報告，認為在『治標』方面應當取消和防止高利貸資本之殘酷的剝削農民，基於這一認識，故立即訂出代替私人高利貸資本之『青苗法』。本來『青苗法』的起源，由於陝西轉運使——李參，因該地戍兵很多而糧儲不足，所以要人民自己測度未來的麥粟的盈餘，先貸以相當的金錢，俟穀熟還官，政府在農民繳還貸款的時候，抽以適當的貸息，號為『青苗錢』。而王安石便根據此遺跡條例司援例實行並普遍此種制度：『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年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出納有以赴時趨事，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前揭書卷七六）

但是，王安石仍感覺得這并不是澈底的醫療了農村經濟，如果澈底的醫療農村經濟，祇有整頓水利——即是開浚河道與夫變更許多小塊耕地為『方田』。所以他一方面開浚綿延數百里之漳河，使沿河流的農氏土地得着很好的灌溉，可以提高農村生產量之上升；而另一方面，則雷厲風行似的重訂『方田均稅』的制度，以提高國家對於土地稅的收入及確定耕地之畝的面積，而預防地主仍侵佔貧苦

農氏之土地和轉嫁土地稅於他們的身上。所謂「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壩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盛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涓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方田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煙拆產典賣割移，官給以契，縣置簿，皆以令所方之田爲正。……」（同前揭書）

總之，王安石對於經濟系統的變革，在當時的環境當中，是含有進步的意義。

B 從政治上預防和鎮壓農民的暴動：

農村經濟的改善，在某種程度之下，統治階級可以用弛緩和農民鬥爭的情緒，但這並不是說：因爲經濟上的改善，統治者對農民就放棄統治的形式。恰恰相反，統治者還是要更進的從政治上統治農民；所以王安石在提出了農村經濟改善的意見和具體辦法以後，又更進一步的從政治上立下一道緊箍——「保甲法」——向農民頭上箍來。他說：

「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

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太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矢，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不干已，又非敕律所聽到，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干法鄰保令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人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者，權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同前揭書）

我們從這個「保甲」制度的內容中間，充分的看出王安石變法之是何居心？不僅在軍事方面糾正了募兵制度并給農民們以軍事智識的訓練，而主要的還是側重在如何糾正和預防農民們的叛亂。所謂「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及「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人雖不知情，科失覺罪」等語，其預防農民叛亂的動機是異常的明顯。

可是農民的叛亂並不是「保甲」制度所能克服，祇有澈底的沒收地主的土地并把這些土地分給農民，才是醫療叛亂火焰的聖水。這一點是王安石所不了解并且是不願意了解的。

但是，後人往往拾取王安石的牙慧，如對於處理曾經發生過農民叛亂的地方的政治，每每採取王

安石的『保甲』制度以極殘酷的手段去懲罰農民。其實，『保甲』制度是擁護土地私有制度的大旗，是維持農村中所謂『秩序』的利器；然而一些與他同僚而落後的人們，對王安石的變法固屬不去參加與擁護，甚至，還是極積的反對呢？

（五）變法運動中的反對派

凡是一種進步的主張，必然的會引起落後人們之竭力的反對，王安石在他提出變法的意見以後，却也遭逢同樣的命運。第一個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便是呂誨。他在王安石登台的第一天，即向皇帝提出這樣的抗疏：

『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說其才辯，久而倚毘，亂由是生。臣究安石本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文言飾非，罔上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

可是這個抗疏，祇是指斥王安石個人的行動，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政治意見，所以皇帝便認他們爭的是個人問題而置諸不理。但反對變法運動的人們，並不因此而鬆懈他們的工作，而反對變法的文件還繼續不斷和雪片似的飛來；如范純仁向皇帝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寧！』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他此種反對的理論已經比呂誨較勝一籌而找着政治的線索；可是皇帝帶着責問的態度問他，什麼叫做「不見之怨？」他便支吾其詞而重複杜牧的話，說人們對於安石的變法是敢怒而不敢言！」當然，這是不能成爲充分的理由。

那些王安石的反對派，覺得過去和王安石爭論之無原則的錯誤，於是便轉變鬥爭的方向，而漸漸的涉及到事實問題。因此，劉琦和錢觀便共同上疏斥責王安石在某些政治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安石執政以來，未逾數月，操管商（即管子和商鞅——著者）權詐之術，與陳升之之合謀三司利權，開局設官以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更張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前揭書）本來，在這個所謂「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的問題的爭論上，反對派的立場我們相當的可以看到一些：先是有婦人名阿雲，許嫁於某一男子，因爲嫌她的丈夫容貌醜陋，使她時常的感覺得「彩鳳隨鴉」的痛苦！由痛苦而生憤恨，並且在憤恨之際即發生殘殺的動機。最後，同她的丈夫寢於田舍，便懷刀向其猛斫，結果，並沒有殺死她的丈夫，而僅僅的砍斷他一個指頭。她在家庭慘劇發生以後：立即向政府去自首；王安石對於此案認爲殺傷自首依律可以從減，而司馬光，富弼，文彥博們則認爲這是謀殺，非嚴懲不可！其實，在這點上即可看出

一方面如（王安石）之尊重個性，別一方面（司馬光富弼文彥博）則過分的側重於倫理。

在理論決鬥的場裏，蘇轍對於『青苗法』又來發表他的意見，他說：『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與富民，能逾限，如此，恐鞭笞必用，卅縣之事繁矣。……』（見前揭書）他為什麼反對『青苗法』呢？很顯然的是由於受地主高利貸資本意識之決定。理論鬥爭的陣容既然展開，而司馬光也不顧一切公開的在皇帝面前逞其辭鋒和他的敵人（變法派）作戰；他說：『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至今猶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

這是司馬光反駁變法的意見。

可是呂惠卿對於司馬光的意又加以反駁：『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君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也。』但司馬光對於呂惠卿的話又作如下的解釋和反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利新國用輕與亂國用重與，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同時，他又說明『青苗法』的弊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太宗平河東，立

糶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經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

這一場爭論，並沒有動搖皇帝變法的信心，換句話說，仍是王安石的勝利。

青苗法是動搖地主和高利貸資本在農村剝削農民的基礎。當然，它的施行一定會遭接二連三的反對；如韓琦說：『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列條約，乃令卿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

關於反對變法的理論，在當時完全爲王安石所駁倒，甚至於說，在羣衆中大部份擁護變法的意見，那些落後人們處在這種情況之下，誠然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想。可是，這時候來了一位技術人材的鄭俠，它對於攻擊變法運動可算是一枝生力軍。他把因年歲飢荒而逃亡的農民生活，加以有力的描寫，繪成一幅包括農民殮風宿露賣兒鬻女的『流民圖』，它并且指斥農民流亡的原因是由於王安石的變法。這一幅圖畫勝過那班所謂知名之士的洋洋數千言的奏疏，使皇帝有深切的感動，使皇帝『寢不能寐』的要修改變法的主張；據說這幅圖畫很有藝術的價值，那繪聲繪色的表情，的確能給

一般人們以非常刺激的暗示。

(六)王安石變法的新評價

王安石變法雖然經過長時期的實施，并且還獲得相當的效果，但其結果在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不能保證其必然的勝利，因為澈底的實行王安石變法的主張，是會起到反對統治者自己本階級的利益。同時，地主高利貸資本之對於變法的仇視和多方面的進攻，也是使它不能繼續的澈底的施行；所以當神宗皇帝逝世以後，那班守舊人們遂利用此種機會把過去王安石一切變法的主張都推翻得乾乾淨淨，而歷史上有名的王安石的變法運動亦從此壽終正寢了！

不過，關於王安石變法的評價，是人言人殊，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適當的批評；很多人們都是這樣的說：王安石的變法，是『標新立奇』和『好勝矜奇』並沒有含着什麼嚴重的政治意味，而他一切的主張都是『功利』出發，掠奪人民的財富，這不是政治家的行爲；他一方面追述古人，而一方又『謬解經典』，所以他的變法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同樣，那班向『左』跳的朋友，雖極端反對此種見解，但是自己的理論又陷入於不可原恕的幼稚的錯誤；他們認爲王安石的變法計劃就是社會主義的實施，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世界革命運動史上

並沒有從上而下的『社會主義』的運動，如果真有此種運動，也決不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的運動。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商業高利貸資本和農民暴動的交流中逼迫出來的；他一方企圖想遏止高利貸資本之狂瀾，而一方又去改善農村經濟組織以及從政治上去防止和鎮壓農民的叛亂，實是『一箭雙鵰』的政策。

這種政策充分的暴露了商業資產階級左翼智識份子的幻想，顯示了異常濃厚的改良主義的色彩，他的真正的作用，並沒有革命的酵母，僅僅是暫時帶一些刺激性而麻醉羣衆的意識！但是，欺騙羣衆之改良的面具，一直到十九世紀才最後受科學的社會主義宣告牠的死刑！我們從王安石變法運動的失敗當中，堅決的相信：中國現在的改良主義要想求到他和平的發展，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一切留戀於改良運動的人們！快點圓頭肥！因為在這條路上已經堅起了一塊很大的警告牌，上面寫着四個大字：『此路不通』！

第六節 元代農民戰爭

(一) 登峯造極的商業資本

『元代統治的時候，亦即是中國經濟發展最高的時候！』

拉狄克在他所著中國革命運動史中關於元代經濟分析的結論，曾經是這樣的肯定。

蒙古民族乘着宋朝統治衰弱的時候，以遊牧民族的資格一方面代替宋朝的統治，另一方面又以種種的方式——極端的反動和相當的改良（欺騙）——屈伏了農民。在表面上，這一統治的民族——蒙古民族，牠們是過慣了遊牧的生活，牠們入主中華彷彿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其實，問題不是這樣的簡單，因為祇要能夠征服人民，統治階級是不擇任何的手段；所以，當蒙古人入主中國的時候，牠爲的要適應於中國正在發展的商業資本，因此，便不惜與中國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互相提攜，以鞏固這一開始建立的政權。當時，經濟發展的根本路線，就是市場範圍的擴大，蒙古民族佈滿了整個的亞洲；所有中國一切手工作坊以及農產品——特別是絲和茶，都是經過蒙古人的手而推銷到中國國境以外，換一句話說，全亞洲的財富都集中在蒙古人的手裏。

● 這種經濟發展的觸鬚，首先便表示於國際貿易：

『自世祖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麤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廻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

（元史卷九十四食貨志第十頁）

這是首先敘述元朝自入關以來即注意於南中國之海上貿易。但是，經過戰爭以後，宋代統治的崩壞，南中國海上貿易的市場，不免受着相當的影響，因此，統治階級便積極努力於海外貿易的恢復：

「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忙古解領之。立市舶三於慶元，上海，澈浦，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船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廻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見前揭書）可是，事隔一年，才更明白的規定與南海諸國互市交通的計劃：「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八月，詔行中書省 唆都，蒲壽庚等曰：「諸蕃國列居東南 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船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見元史 卷十世祖本紀）並且，推定唆都全權負責處理國際貿易的任務：「帝（世祖）以江南既定，將有事於海外。陸（唆都）左丞，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同前書卷一百二十九唆都傳）

同時，上海市 船司提控——王楠還發明一種海關稅則——即「雙抽」「單抽」的制度，所謂「雙抽」者即是徵收外國商品以相當的稅額，「單抽」則係指中國商品出口而言。因為國際貿易的收入，是當時公共收入的大宗，所以統治者——皇帝亦逐漸採取集中的政策，以預防臣僚們的壟斷。如：「（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設市舶都轉運使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番為買。犯者罪

之，仍藉其家產之半！」（元史卷九十四食貨志）並且，還規定『金銀銅鐵』以及『男女人口』不准私販入番。

關於當時最大的國際貿易港，仍然要推泉州爲第一；甚之，從泉州市場的繁盛和重要，我們就可以推測到元代經濟發展到商業資本最高峯的程度，並不是騙人的誑語。如元史卷二百十外夷傳爪哇條云：『至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同書馬八兒條也說：『海外諸番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自其國約十萬里。』很明顯的，有元一代，泉州爲與南海諸國交通互市的主要門戶，我想這樣說法不會引起人們的反對吧？！

有一位意大利的商人——馬可普羅在他的遊記上面說得好：『凡印度之貿易船，來泉州入港者極衆，且輸入香料及其他高價之物品；中國南方商人多來集於此，凡由外國輸入中國之大宗寶石眞珠及其他貨物，均籍彼等之手，分布於南中國一帶。余敢斷言：如供給耶穌教各種貨物之亞歷山大里亞及其他諸港，僅可駛入胡椒船一艘，而泉州之港，則雖百艘或百艘以上之胡椒船，亦可駛入之也。此港誠可稱爲世界最大貿易港之一焉。』（見馬可普羅記行二百三十四頁——三十五頁）同時，易逢巴圖塔更說：『泉州誠世界最大港之一。或逕稱爲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無不可也。余曾目睹有大帆船百艘，輻輳其地，至於其他小船，則更不可勝數矣！』（見易逢巴圖塔記行第四百二十二頁）

馬可普羅不但很忠實的敘述泉州之國際貿易的繁盛，並且他還說明當時中國一般的經濟發展的情形。他說：「一切的人民到處都願意接受這種紙幣，因為他們不論到那裏，無論購買什麼東西，珍珠，寶石，金銀等——都可以拿紙幣付價。紙幣可以購買一切的東西，牠也可以支付一切。」元朝經濟的發展，使這位遊歷的意大利人——馬可普羅異常的驚訝，因為他數不清中國商業的都市，也不知道商品流通量與商業的種類。他在描寫山東兗州府的城市說：「這裏的商人都是富有的！他們貿易的繁盛，他們的絲織品真多極了！這裏有十一個城市，都是富有美麗的與匯款浩大的，他們儲藏着計算不清的絲織品。」

本來事實就是這樣，並不是馬可普羅誇大其辭啊！

商業資本牠本身雖有很高度的發展，可是這個發展因為缺乏「蒸汽機」的發明，是不能夠渡到產業革命的階段；同時，生產技術又沒有積極的改革，所以，這個歷史的過程——商業資本——此時也駐足不前而停滯起來！

但另一方社會勞動力之無限制浪費，社會上的財富都為統治階級耗廢於享樂的奢侈生活之中，而不能創造重複生產的價值，因此，必然的要引起這個社會本身內在的矛盾——經濟危機！

(二) 經濟的危機

有些人以為元朝經濟的危機主要的是暴露於它的財政政策，即是說國家壟斷了一切的財富（王桐齡——中國史）。其實，這種說法，不僅是含義模糊，并且是充滿了矛盾的精神；因為經濟危機是一回事，國家壟斷財富又是一回事；政府對於一切財富的壟斷這并不是表示牠在經濟上發生了什麼嚴重的危機，而經濟的危機也不一定由於國家對於財政的壟斷？

什麼是元朝經濟危機之具體的表徵呢？

我們所見到的首先是貨幣制度的混亂和紙幣價格的低落。關於貨幣制度混亂的情形，據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所載是異常的明顯：在元世祖中統元年，始明白規定交鈔制度，以絲為本位，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一切商品的價格，都依絲為比例；即是說某種商品的數量若干，等於絲鈔若干。在同一年十月又造所謂『中統元寶』鈔的輔幣，以流通於各地；於至元十二年更添造『釐鈔』，即是說此種『釐鈔』乃為輔幣之輔幣。至元二十四年更改造『至元鈔』，至至大二年又以『至大銀鈔』來代替過去一切的幣制。統治者為什麼要時常變更幣制呢？據左司都事——武祺的意見以為：『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

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偽鈔滋多。」（元史卷九十七食貨志第二頁）同時吏部上書傑哲爲更補充他的意見：「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而錢爲子。」（同上）由此，我們看出統治者變更幣制的原因係根據於「偽鈔滋多，不與轉撥致民間流轉者少」的兩個條件，但是呂思誠對於他們的主張又加以反駁：「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爲子，是終爲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爲父而以銅爲過房兒子者乎?!」『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錢分爲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至元鈔非僞，人爲僞耳，交鈔若出，亦有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反滋之耳?!』（見同上）

可是這樣的反對，並未能使皇帝同情他的意見，空留一場爭論的痕跡而已。貨幣制度既然是如此的混亂，那麼，在社會上所得的結果我們是可以推測的。如因紙幣混亂的影響使紙幣的價格不能保持均衡，而人民亦時常有紙幣價格「一落千丈」的感想以致不敢接受，而引起物價的高昂，一般社會人民生活費的指數，竟超出經常數十倍以上。況且，以後因軍需的供給和賞賜與犒勞在在都需要大批的款項，故每日加工印造這些不兌現的紙幣，以流佈於一般社會中間，最後的結果，市場上對於這些不

兌現的紙幣加以堅決的拒絕，甯願以物貨相貿易，無論票面數額多寡，人們都以為是不值一顧而視若廢紙。

(三) 土地與農民

經濟的危機當然會給農村經濟以很大的影響，但農民們認為與他們有休戚相關生死存亡的仍然是爲土地問題。蒙古人他們是過慣了遊牧民族的生活，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和土地問題，彷彿是不會注意的；其實，這種推想是沒有根據的。當蒙古民族入關的時候，牠們見到中原有很肥沃的土地，物產是異常的豐富，如果不適應這種經濟發展的階段，固然是不能在羣衆身上榨取更多的膏血，就是自己的統治也是很難於長期的穩定。所以元朝統治者入關的時候，看到中都田野久荒而兵後無牛可耕，馬上即在盧溝橋抽回大批的軍牛以分給農民；要他們即時耕種，不要任肥沃的田園趨於自然的荒蕪。在元世祖的時候，他特別的注意於農村經濟，曾經屢次的頒佈妨害農村經濟的禁令：如禁止諸道的戍兵以及豪富之家之毫無限制的放縱畜牧，以免侵犯桑棗及禾稼的田園；同時，更嚴戒蒙古軍人不要以中原民田爲牧地，如果違抗這個禁令，就要加以嚴重的處罰。并且，他另一方面更勸諭僧道，以及尹囉勒 昆達實密人從事於農田的耕種，甚至在至元七年，還頒佈一種所謂『農桑』制度：

「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年高曉農事者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一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檄於田側，書某歲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姓名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病災者多，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早曠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教之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飢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及蒔，蓮，藕，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給餘戶。每年十月，令卅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見元史卷九十食貨志第二——三頁）

除此而外，更排斥於農民田地中進行芻牧的工作，認為秋耕與土地施肥是提高農村生產量的唯一的辦法。他為見好（實際是欺騙）於農民起見，還做了以下一些改良工作：

『（至元）十三年十二月詔：「凡軍將校及宋官吏有以勢力奪民田廬產業者，各還本主；無主則以給附近之無生產者」。』

『（至正）十五年八月詔諭：「凡軍民官毋得占據民產」。』

『十七年十二月勅：「擅據江南逃亡民田者，有罪」！』

『十九年四月勅：「覈阿哈馬特佔據民田給還其主」！』

二十二年勅：「權貴所占田土，量給各戶」！』（以上統見續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第五頁）

雖然，像這樣表面上彷彿代表農民利益的話曾五合三申的頒佈過不止幾次，可是，結果僅僅是紙上空談，終敵不過貴族官僚以及地主高利貸資本之頑強的反抗。所謂行臺待御史——程文海，他首先把官吏剝削農民的事情向皇帝申述：『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尚書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同前揭書）但是，他關於貴族官僚以及地主高利貸資本之剝削農民的程度的程度，未免言之不詳，於是乎更有所謂『東平布衣』的趙天麟，他上皇帝一篇文章——名叫太平金鏡策，更詳盡的敘述和分析農村中貴族官僚地主豪紳之強佔

農氏土地的程度及其佔有的原因，同時，並提出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對策。他說：

『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枉爲，靡所不至。貧家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於死亡，荆楚之域，至有傭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家兼併故也。方今之務，莫如復井田，尙恐驟然騷動天下，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幾百頃；巨族官民之家，限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爲主，凡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第一年免租稅，次年減半，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制有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以下俱以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恆產，官足養廉！如是行之五十年後，井田可復興矣！』（見續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第六頁）

他在敘述農氏土地被官僚地主強佔的這一點，固然是很忠實的描寫，可以刺擊貴族豪紳的心胸，但是，他的結論則又掉過頭去迴想那渺茫無稽的所謂『井田』的制度，未免離題太遠吧？！誠然，死灰未嘗不可復燃，可惜中國歷史上並沒有這樣一種所謂『井田』制度的餘燼啊！

文不對題，無怪乎統治者對此意見之未予採納，而另闢途徑轉其他的念頭：『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行檢覈法，當益田畝累萬計』。』此種『檢覈法』，很顯然是地主豪紳分肥的計劃，在未執行此種計劃以先，無豪紳地主的代言人——吳元珪首先就要激烈的反對。他說：『江南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但有所謂平章的張律，又給吳元珪的意見以迎頭痛擊：『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尙多未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權差而拆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衛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均從實自首。庶幾歲入無隱，差徭亦均。』這議論在表面上彷彿是堂堂之鼓振振之旗，所以皇帝便根據他的意見做成如下的結論：『限民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佔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田主及管幹田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畝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爲查勘致有漏脫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見同上書）像這樣的解決土地問題，實際上祇是與地主貴族官僚高利貸資本分肥，並未給農民以絲毫利益。

因此，在元朝的土地政策下面並沒有解放農民，反之，農民要求得本身之徹底的解放，祇有堅決的爲獲得土地而鬥爭！

舊的土地制度，等於套在農民身上的枷鎖！

(四)農民身上的幾重鐐銬

土地問題固然是農民身上主要的枷鎖，但是，除掉這個枷鎖而外，更有其他的許多的鐐銬。

第一，種族上的壓迫，使戰勝民族——蒙古民族與戰敗民族——漢族——彼此互相仇視的程度達到空前的狀態，換句話說，蒙古民族對漢人的摧殘是無所不用其極！如牠乘戰勝的餘威，不僅剝削了一般人民參加政權的資格（當然，少數上層的漢人，因為做牠的走狗，做牠更活潑更熟悉的欺騙民衆的工具，不成問題的牠會給這類人披上一重所謂「官」的外衣——著者），如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元年（一九七^年）四月條云：『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甚至，還把當時所有的民族，區分爲四個階層；A蒙古人；B『色目』人（包括西藏及歐洲各民族份子）；C漢人（包括契丹，女真及黃河流域人）；D南人（即宋人）。凡是負稍爲重要責任的官吏，都是以蒙古人充當，而漢人彷彿是這個舞台上的配角而已！此種情形，明朝人葉子奇他說得非常詳盡：『（元朝）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爲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爲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見草木子卷三上克漢篇）并且，就是這卑小的小官

與他同僚的蒙古人，都沒有什麼平等可言；所謂『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這并不是故意刻薄的描寫。當蒙古人，色目人勢力全盛的時候，他們紛紛的移居到南中國富庶之區，如『今回回皆以中原爲家，江南尤多。』（見元朝人周密著：癸辛雜識續集）因此，鄭所南也說：『（韃人視）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江南。』（見心史大義略敘）最後，江南的財富幾爲蒙古人搜括殆盡，所以韓山童暴動的討元檄中，也曾抓住這個問題去鼓勵農民：『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草木子卷三上克漢篇）

本來，戰勝民族之壓迫戰敗的民族，在世界史上是經常的現象，並不是什麼希罕的事情；如蒙古民族之表現比任何戰勝民族爲複雜，的確是一個奇蹟。牠壓迫戰敗的民族，並不僅僅限於上述的數點，更進一步的去防止這些戰敗民族的叛亂；如世祖至元三年曾頒佈過沒收漢人，南人，高麗人的軍器和馬匹，甚而至於服裝的顏色與日常生活所需用的器皿與夫民間乘坐輿馬都有一定的限制。最後，民族間的仇視竟達到駭人聞聽的程度！如順帝五年十二月，丞相伯顏竟有這樣的建議：『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元史卷三十九順帝本紀第五頁）這個建議雖然經皇帝給他以否決，但是一般漢人已經是『唇亡齒寒』而人人自危了，尤其是當時一般宋朝的遺民，更爲憤慨，曾唱出『復國』的詩歌：『縱遇聖明始堯舜，畢竟不是真父母，千言萬語只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

這些歌謠，在表面上彷彿是不會動搖統治階級的社會，可是，牠在一般社會中間已經煽起了民族革命的火焰！

第二，宗教的壓迫——即喇嘛的壓迫，也是當時農民頭上的一道緊箍。喇嘛在社會上之所以成爲一種壓迫農民勢力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係由於統治階級——蒙古人之迷信宗教，而另一方面喇嘛們又授統治者以男女性交關係的祕密；如授順帝以『延徹爾』（舊作『演撲兒』華言『大快樂』即房中運氣之術）法以及所謂『善祕密法』（亦名雙修法），在喇嘛的指導之下，統治階級不知強姦了多少青年婦女！由此，喇嘛更得着統治階級的寵暱。這寵暱喇嘛的具體事實，便是以詔令來保他們的安全：『自今凡民歐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我們從這兩句話當中，關於喇嘛在社會上的特權是可想而知道了！這些喇嘛們往往掛着金字圓符，往來於西藏和中國之間，每到一個地方，不僅是那班慣於逢迎的地方官吏殷勤的在着照料他們，給他們以很精緻的館舍居住，甚至至於他們還撞入人家作那些尋花問柳的勾當；驅逐農民家中的男子，成羣結隊去強姦婦女，以宣洩他們的獸慾！

最討厭的，莫過於那時所謂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真那），他是任意的戕殺農民，他爲的要解決性慾問題曾擄過大批美麗的青年婦女，同時，更掠劫了人民很多的財富與寶物。中國的地主豪紳以及高利貸資本對於這位魔王不惜卑躬屈膝的與他勾結，共同的去強佔農民的土地。

其次，還有一些數說不清的苛捐雜稅，據食貨志所載共有三十二種，農民處在這種環境之下，誠然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被壓迫的農民們，在當時如果要求自己徹底的解放，祇有捶碎統治階級架在他們身上的架鎖和解除這一些附帶的鐐銬！並且，當時的客觀環境已經為他們埋伏了這個可能。

樸列哈諾夫說：「突變是漸變的前提，而漸變必然會走到突變！」

警鐘響了！現在已經是突變的時期了！

鬭爭的序幕展開了，各階級都在奏着交響樂，歷史又要預演一幕悲喜劇！！

(五) 上層建築的崩潰

歷史上凡是一種革命運動，牠的醞釀，生長和爆發，都要經過一個特定的過程，即是說，產生這個運動必然有牠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因素，絕對不是什麼突如其來的行動。因此，關於元朝統治的顛覆，在很久以前的一般社會生活中間已經埋藏了這個顛覆的前提，換句話說，如廣大的被壓迫的農民羣衆因不堪蒙古人鐵蹄蹂躪之下的生活，已經準備斷殺，統治階級自身因經濟的危機，所以發展其統治的前途也是異常的困難，在這兩個條件之下，農民們揭起『鋤頭鐮刀』來反對站在他們脊背上面

跳舞的蒙古人，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啊！

『順帝三年正月，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石昆山，鍾大明率衆從之，僞稱大金國，改元亦符。』（元史卷三十九順帝本紀第三頁）

這是農民暴動的一個號炮！

這個號炮發出去，在羣衆中經過五年之久才得着巨大的回聲：台州方國珍的暴動！方國珍他以販鹽浮海爲業，因爲政府指其通寇，遂入海糾合羣衆與統治階級對抗，當時他曾經戰敗了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並生擒這一壓迫農民暴動的罪魁！暴動的第二天，牠就使統治階級異常的驚訝：如監察御史——張禎言：『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鬪師敢於玩寇，若不鎮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御批通鑑輯覽卷九十八第二十九頁）可是，這農民暴動又因種種關係竟使暴動如缺乏與其他各地農民的聯系，一時不能求得很大的發展，而令農民暴動的伏流又延長了三年之久，一直到順帝十一年才匯合而成爲一個軒然大波！這個年頭，災荒迭見，水旱頻仍，統治者仍聚集二十萬山東飢民來開黃河故道，要他們做無報酬的勞動，這也是暴動擴大的一個原因！

被壓迫的農民們，果係如綿羊一般的馴伏嗎？不！他們已經拿着『鋤頭鐮刀』反上皇帝的『金鑾殿』，甚之，他們自己還要創造一個『金鑾殿』呢！而韓山童就是這次反上『金鑾殿』的領導者。按

韓山童他是欒城（河北欒城縣）人，自他祖父以來，即從事於『白蓮會』——秘密結社的組織，後來因其有燒香惑眾的嫌疑，為政府處罰謫徙於永平。迨至韓山童達到成人的年齡，他目覩元朝統治的腐敗與農民羣眾的疾苦，而感覺得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推翻統治階級。他根據這感覺，於是便倡言天下大亂，那所謂『彌勒佛已經下降』的謠傳，竟在河南及江淮一帶落後的農民中間起了很大的影響；這些農民認為自己的痛苦祇有上天——菩薩知道，彷彿菩薩是救苦救難的主宰，牠必然會指示被壓迫者一條光明的道路。這時期韓山童的黨人——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更進一步的向農民宣傳；他們說韓山童是宋徽宗的第八世孫，應當為中國的主人，在暴動的過程中，於是乎他們便糾合農民屠宰烏牛白馬做盟告天地的儀式，預約以紅巾為號來共同的推翻統治階級，可惜事機不密，竟為統治者覺察，在未發動以先，韓山童已被統治者處以極刑。但是羣眾已經起來，他們的行動并不因領袖犧牲而中止，反之恰和狂風暴雨一般似的向統治階級逼來，以十餘萬農民之雄壯的聲勢，連克名城！最後，他們竟建立臨時的政權：『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大清真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元史卷四十四順

與劉福通同時并起的，還有蕭縣人李二（號芝蔴李）以及羅田人徐壽輝，他們都以燒香的方式來領導農民鬪爭，而當時的聲勢亦復與劉福通不相仲伯；因為徐州及蕪水黃州一帶，都給他們所佔有。最奇怪的，這些暴動的軍隊都以『紅巾』為號，因此，社會上一般人們都稱他們為『紅軍』（這個紅軍並不是現在中國農村中間正在發生的所謂『紅軍』，讀者諸君希不要誤會——著者）。從整個農民暴動的營陣裏，更產生了好幾枝新的隊伍：如郭子興在濠州糾合農民羣衆與統治階級對壘，泰州張士誠以為人賤視的鹽販的資格進據高郵；并且，在這些隊伍裏面還煅煉出一位未來的統治者——朱元璋。

這位未來的統治者——朱元璋的身世，是非常的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在他過去的身世當中，就可以確定他於跨進政治舞台以後，對於農民生活的改良。當他十七歲的時候，那一年正值大饑疫的年頭，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哥哥都在饑疫當中犧牲了生命，家庭的變故使得他孤苦無依！在這種環境之下，會逼得他祇有到皇覺寺去，『摩頂受戒』，否則，便不能遊食四方來維持其生活。後來他看到當時社會外形漸漸失去了過去統治的作用，歷史已經替他蒙上了死滅的象徵。適值郭子興所領導的農民暴動於這時佔據了濠州，於是他便效班定遠的故事而投筆從戎，以戰袍來代替『袈裟』，脫離了『清磬木魚』的寂寞工作，而積極的參加農民戰爭之火與血的生活。以後，他和郭子興因政見不同，遂分開戰線與徐達湯和等獨樹一幟。

當時暴動的隊伍是非常的複雜，而暴動的地域也是非的廣泛，茲將此種情形列如下表：

暴動的領袖	暴動佔據的區域	名稱
朱光卿	廣東增城	大金
方國珍	浙江溫台慶元三郡	
韓林兒	淮北	
劉福通	河南	宋帝
李二	徐州	
趙均用	初據徐州後據濠州	
徐壽輝	湖北，江西	天完帝
陳友諒	湖北，江西，安徽	漢帝
郭子興	濠州	
朱元璋	安徽，江蘇，浙江	吳王
張士誠	江蘇北部，南部，浙江西部	吳王
明玉珍	四川	夏帝

在整個的反統治階級農民戰爭過程中，這些領袖不成問題的都是一些『英雄』式的領導。因此，內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張士誠之吞併了遺民復國的韓林兒，陳友諒之劫掠徐壽輝等等事實，充分的反映了農民戰爭的特殊性。像這樣的紛紛離析的結果，祇有讓朱元璋獨吞革命的果實。

爲什麼朱元璋能夠獨吞元朝農民革命的果實；這不是一個奇蹟嗎？其實，我們如果詳細的考查其動因，那麼，這實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第一點，當其他許多農民隊伍，因爲長時期的游擊戰爭累得他們精神上非常的疲乏，而朱元璋恰乘人們疲乏之餘方才崛起，尤其是他的參加作戰的農民羣衆，與生產關係脫離未久，所以，他這枝隊伍并未消蝕了革命的鋒芒！第二點，他在政治上能夠樹起民族革命的旗幟，并拿這旗幟來號召廣大的農民。如他於吳元年（一三六七年）諭北中國檄說：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見皇明通紀卷二）

第三點，他所代表的經濟基礎，是比較一般人們堅固；如建都金陵，即是抓住了當時經濟中心的位置，不僅因金陵是東南財富之區的喉嚨，同時，在這裏他還可以找到新的靠山——發展到高度的高利貸商業資本，以做其建設政權的起點；因此他很順利的屈伏和消滅了過去的同盟者與友軍。

雖然；朱元璋政權形成的根本路線，是依靠農民暴動的浪濤，廣大的被壓迫的農民用鋤頭和鐮刀替他殺開一條到政權的血路，使他毫無阻礙的走上政治舞台！但是，他建立政權的第二天，因為階級利益的衝突，就與被壓迫的農民隔離了，并且，還變成另一階級壓迫農民的工具。

第七節 明朝的農民戰爭

(一) 摩撫農民暴動的創傷

朱元璋他乘着農民大革命的浪濤奪得了統治人民的寶座，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們在上面已經指明過他有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他在經濟上抓住了東南財富之區的喉嚨——金陵，依據這個區域及其經濟基礎來反對其他的一切；第二，他在政治上掛起了民族革命的招牌，比較一般人們更容易發展其暴動的影響；第三，對農民暴動的同盟者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這些都是他獨吞農民革命果實的原因。

但是，他在羣衆的面前并未公開的暴露這些祕密，甚之，還把事實的真相隱瞞起來，將自己裝成一種吊民伐罪的神聖模樣；他說：『元政瀆擾，干戈蜂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士吾

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民！」（明史卷一太祖本紀）并且，他爲市僧民心起見，更相當的給農民以減輕苛捐雜稅的機會：『東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憫之，且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煩勞久矣！今比戶空虛，有司急摧科，重困吾民，將何以堪！其賜太平田租二年，應天，鎮口，甯國，廣德各一年。』（見同上）他也深深的覺得如果不擴大對農民改良的影響與範圍，那麼，過去農民暴動恐怖的象徵，始終是精神上的創傷；爲摩撫這些創傷起見，不得不在一切政策的決定上充分的給農民以改良的機會，以麻痺他們的意識。故於洪武五年五月下詔說：『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爲人奴隸者，復其民；凍餒者，里中富室假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毋失所；鄉黨論齒相見，拜揖毋違禮；婚姻毋論財；喪事稱家有無，毋惑陰陽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復業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爲限；僧道齋醮，雜男女恣飲食，有司嚴治之；閩粵豪家，毋闖人子爲火者，犯者抵罪！』（見明史卷二太祖本紀）在這詔令中間，很顯然的關於改良農民生活已逐漸趨向於具體化，就是說，朱元璋的政策已經與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接觸。

他除掉在這一方面直接的對農民作一些改良工作如復奴隸爲平民，要地主高利貸資本貸款對於凍餒的平民使他們脫離飢寒交迫的狀態，很嚴厲打擊所謂閩粵豪家而外，更企圖以政治力量去遏制國際貿易；他以爲國際貿易港口的開闢與擴大，間接的就是農民膏血的外流，所以他對於外國商人企圖恢

復通商關係的時候，曾加以嚴厲的拒絕：如「占城，三佛齊，暹邏，爪哇，真臘入貢，高麗使五至，以嗣王（？）未立却之！」又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占城，爪哇，暹邏，日本，安南，高麗入貢，高麗貢黃金百斤，白金萬兩，以不如約却之！」（以上統見明史卷二太祖本紀）他在拒絕和外國貿易的第三個年頭——即洪武十五年，有廣平府吏——王允道請開磁州鐵冶以發展當時的手工業和增加國家的收入，而朱元璋認為這個建設同樣的是妨礙他的改良農民生活的實施；因此，他的回答說：「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未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而民業已定，無益於國，且重擾民！」結果，給王允道以嚴重的處罰——「杖之，流嶺南！」（明史卷三太祖本紀）

自從堅決的處罰了王允道以後，再也沒有一個人在朱元璋發表反對改良農民生活的意見，而朱元璋的主張，也是一帆風順似的貫徹下去；如他於洪武十九年六月復繼續的下詔：「有司存問年高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練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同上書）最後，他又變更農村組織的系統：「戶部編民，百戶爲里；婚姻死喪疾病患難，里中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耕秋穫，通力合作，以教民睦！」（同上書）他以爲這樣的變更了農村組織，便可以使農民生活安定，而自己的統治亦可長治久安！

同時，他更積極的注意於農村經濟的整理，更認爲灌溉是農村經濟之骨幹，所以經常的派員修理

黃河，運河，淮河，沔河，衛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乾河，膠萊河的水利，以發展中國的農村經濟。

可是，他在另外一方面爲要在思想上鎮壓農民暴動，又復承認蒙古人的統治爲合理。他說：「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流離相望，故令將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遠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毋肆焚掠妄殺，元人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報！」同時，他又想羅致那班爲農民暴動所嚇跑的士大夫——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代表，於是乎又下所謂求賢之詔：「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岩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疎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見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矛盾的圈，終於套住了統治階級的手足。換句話說，統治階級之左手拉農民右手拉地主的勾當，畢竟是不能同時舉行，如果能夠同時舉行的話，那麼，歷史上真會有如郭沫若先生所說的超階級的政權了！這些矛盾之具體表現的地方，首先便是土地問題。

(二) 明朝的土地制度

土地的佔有在明朝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官田」；在官田的内部包括很多種類：1 舊有的官田；這種官田是從宋元以來遺留下來的，於官田中佔很大的數量。2 還官田；即是前一時代貴族豪紳的莊園，因為牠的主人隨朝代而沒落，其土地即付還於公家，而一般人們對於這類的土地便稱為還官田。3 沒官田：所謂沒官田者，即人民犯罪後由政府所沒收的土地。4 絕斷入官田：這類土地，因為牠的主人戶口斷絕，沒有繼承的人以從事耕種，最後為政府所沒收。5 學田：此類土地據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說：「天下郡縣並建學校，帝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凡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以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以後，對於此種學田更加以明確的決定：「詔為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見續文獻通考卷六田賦考）6 皇莊及皇族勳舊賜田。7 牧馬草場地。8 城壕首畜地。9 園陵墳地。10 公占隙地。

在各種官田佔有的形式中間，最重要的莫如皇莊及皇族勳舊賜田；當朱元璋統治的時候，賜勳臣公候丞相以下的莊田多者百頃，至少亦七八十頃，其賜親王莊田嘗有千頃之多！以後，到神宗時代，

每一莊所佔有土地的面積，有達兩萬頃之多，尤其是在福王分封的時候，搜刮河南，山東，湖廣的土地以爲皇莊的事實，僅就他一個人而論，竟達四萬頃之多！皇莊之佔侵農民的土地，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不僅是農民對於此制度之怨聲載道，就是政府的內部也是議論紛紛。反對此種制度的首先是刑部郎中——彭韶，他向憲宗皇帝說：『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卽爲恆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同時，李森亦繼彭韶以後來發表他的意見：『先朝勅皇親強佔軍民田者，罪無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宏奏絕權貴，請乞，亦既俯從，乃外戚周彧，求武強武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詔皆許之，何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甸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尙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請，實豪奪而已！』（見同上書）

這班貴族，不僅掠奪農民現有的熟田，就是黃河淤塞的土地，他們也思染指；如河南吏部侍郎——原傑說：『黃河遷決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就淤墾種，今姦徒指爲園場屯地，獻王府邀賞，王府輒據而有之。請自今獻者譴戍，并罪受獻者。』可是這種申請，統治階級對之等於春風過耳，牠並沒有遏制貴族們佔農田的潮流。因此，在孝宗弘治二年，戶部上書——李敏，他便很詳細的調查了貴族

官僚之佔據農民田地的面積：畿內皇莊有五，其他一萬二千八百餘頃；管莊官校，召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斂財物，稍與分辯，輒被誣奏，民心傷痛入骨！李敏說五個皇莊，侵佔農民土地已經達一萬二千八百餘頃，我們看這個統計的數目大概不至於誇大失實吧！

關於莊田制度之來源及其剝削農民之具體的情形，最好我們可以參看夏言的奏疏：

『各官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曹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估過軍民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估過民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年間侵佔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惟增寶抵縣王甫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間祇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八年十月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深見澤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婆婆營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以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甯晉縣則有舖頭村皇莊，大劉莊皇莊，在降平縣則有大灰窰皇莊，在新河縣則有偃江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皇莊村皇莊，此皆止德元年之所設也。又安東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燭口皇莊，五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

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一處，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一處，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驕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九年則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討之旗校，有跟隨之名色，每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姦用事，朝廷大壞，於是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之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架搭橋樑，擅立關隘，出給票帖，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采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近土地，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址，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頭莊，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掎克，獲利不資；輸之宮闈者，尙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囊者蓋不啻十之八九矣！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今讀勅旨，猶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蓋謂今四海九州之賦貢，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非所以奉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非以奉重闈慈闈四宮乎？祖宗以來，宮闈一切供用，自有成規，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畝之業，辱宮壺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

之利，其何以示天下以訓後世也哉？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姦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之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曰皇鹽；卽此三言，足以傳笑天下，遺譏後世！仰惟陛下！一切掃除，敕該部大臣查照臣等勸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等地方各宮田莊，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改爲各宮親蠶廠公桑園名額，今有司種植桑根，以備宮中蠶事，其餘一應莊田盡弛以利民，或勒歸田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糧，以爲在官地土，仍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則一洗四朝之積弊，永垂百代之體矣！」（續文獻通考卷六田賦考）

這奏疏，的確是比較詳盡的說明皇莊之來源及其佔據農田之類數與夫對農民剝削的真相，但是他不敢說出『土地歸農民』的話來，而結論僅僅是『勒歸戶部，造入版籍。』這樣當然是不能解決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所以，以後到了天啓六年對於貴族的賞賜莊田，更是有加無已！僅就魏宗賢一人而論，政府賜給他的地每次都有千頃之鉅！

綜觀上面關於皇莊田地的一材料，那麼，我們有權利可以說這制度是農民的死敵！（在明朝所謂官田，除上述十類而外，還包括了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軍民商屯田；這些土地，通常都謂之官田。——著者）

第二種形式便是民田。

明朝的初期，因為經過元季廣大的農民暴動以後，關於農民土地佔有的形式，誠然是面目模糊而不可復識；洪武初年，政府曾派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去調查浙西的田畝，以便從這些土地上面徵收賦稅，以後，復命戶部覈實天下的土地；可是兩浙的一般地主豪紳，因為要避免徭役，往往以土地寄於他戶（此種行爲，俗稱鐵腳詭寄——著者），至洪武二十年，才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而定出區糧的制度；每區設糧挑四人，一方面度量田畝的方圓，另一方面又記錄田主的姓名以及田畝之丈尺，彙編成冊，第因為其冊形狀如魚鱗，所以即稱爲「魚鱗圖冊」。當時調查民田本有兩種表冊，除了魚鱗冊而外，還有所謂「黃冊」，牠以記載戶口賦役爲單位，牠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目，也可以說是魚鱗冊的附冊。而魚鱗冊是以田土爲單位，如土地性質之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等各種性質，靡不詳載無遺。最初，這個政府，因為在戰爭以後，田園荒蕪，所以關於民田是計民授田，要農民們努力去耕種和墾屯，甚至，政府還給以相當的農具及耕牛，并且，時常向農民做一些免租和免稅的鼓勵。以後凡民田以近郭爲上地，迤遠爲中地下地；其規定畝的面積，以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一百畝爲頃。

在這許多土地制度中間，還有一種「里社」制度；這制度雖是元朝的遺蹟，可是當時在河北諸州

縣仍是很普遍的存在：土著的農民，以社分里甲，移民屯墾的地方，以屯分里甲；凡是社民都有優先權去佔領田畝，所以社畝很廣，而屯民新佔的田畝則甚狹小，因此，以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但是，民田仍大部份操之於地主豪紳之手；據明史食貨志說：『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湘，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能撥給於王府，則欺穩於猾民！這論調誠然是針對着當時的實際情形！』

其次，關於屯田，我們在這裏也要約略的說及，因為牠實關聯於農民政府與政府的未來的鬥爭。查屯田訓本係統治階級供給士兵餉糈的一種制度，在魏代曹孟德已經倡導於先，而朱元璋則集其大成於後；朱元璋除掉軍屯而外更有民屯，換句話說，這就是他自詡為寓兵於農的得策。此種制度確立的經濟原因，完全由於明朝政府調劑土地佔有的動機；牠將戶口繁殖之區的農民，移向荒僻的地方，一方面固然讓出許多土地於無地及土地很少的農民，而另一方面復可冀此調集大批的農去開闢那荒蕪的土地，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可是此種制度又發生牠內在的矛盾，即是說，政府的官僚要來直接掠奪這個地方，把一大羣勤苦的農民，趕出生產領域之外，使他們過着飢寒凍餓的生活。張獻忠李自成暴動的基礎是那裏來的呢？還不是很久以前的統治階級已經替他們安排好了的經濟矛盾嗎？

最後，與土地問題有密切聯系的賦役制度——即剝削農民的形態，我們也必須加以說明，否則，

對於未來的農民暴動的內容更使我們無從了解。明朝的政府，雖說是在農民暴動中產生出來，可是這個政府對於農民的剝削，並沒有澈底的廢除，反之，仍是繼續過去的方式。牠在土地問題上，認為有了丁丁丁丁丁，田有租，換言之，就是每個農民都必需為政府作無報酬的勞動，同時，還要經常的繳納一定的租稅。故明朝的租稅制度是分兩期繳納，即是說有『夏稅』與『秋糧』：夏稅是以每年八月為期，秋糧之繳納也是無過於明年二月。并且，其徵收夏稅秋糧的形式，除掉繳納農產品如米，麥，絹，麥收，絲棉，荒絲，稅絲，棉花，苧布，土苧，米穀，棗子而外，更須交納錢鈔；這更顯示出商業資本在社會生活中所佔有的作用！當時交納租稅的標準，官田每畝五升三合，而民田則須交八升五合五勺。有所謂廣西布政使周幹者，他在巡視蘇常嘉湖諸府以後，關於農民之苦於賦稅的情形，曾有如下的談話：『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輒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况盡取乎？取盡則民必凍餒，欲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甯，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同時，顧鼎臣也向政府條陳錢糧在農村中間的積弊；他說：

『察理田糧舊額，請責州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等做洪武正統間魚鱗風旗之式，編造圖冊，細列元

額，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坍荒，成熟，步口數目，官爲覆勘，分別界址，履畝檢踢丈量，具開墾改正豁除之數，刊刻成書，收貯官庫，給散里中，永爲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立爲定規，取每歲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處補暫徵，帶徵，停徵等件數目，會計已定，張榜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姦欺，而小民免賠累科擾之患！……催徵歲辦錢糧，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辱面，糧戶不敢攙雜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扑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鷄犬爲空！弱者爲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於箠楚囹圄者，幾數百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同上書）

他們雖然都是痛陳時弊，可是統治者對於他們的意見並沒有表示首肯，說得確切的，大有認爲是『事尚可行，容緩辦理』的神情。但賦稅制度之不良，在當時差不多成爲白日經天的事實，因此，徐俊民便繼續顧鼎臣之後來發表他的主張：『今之田賦，有受地於官，歲供租稅者，謂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溝勝淹沒者，謂之坍江，有流移亡絕田棄糧存者，謂之事故。官田貧民佃種，畝入租三斗或五六斗

或一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十石或百餘者有之；夫民田之價，十倍官田，貧民既不能置，而官田糧重，每病取益益，以坍江事故虛糧，又令攤納，追呼敲扑，歲無甯日，而姦富猾胥，方且詭寄那移，并輕分重，此小民疾苦，閭閻凋瘵，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請定均糧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官民田爲一，定上中下三則起科以均糧；富人不得過千畝，聽以百畝自給，其羨者則加輸邊稅，如此，則多寡有節，輕重適宜，貧富相安，公私俱足。」（見同上書）此種主張，實是企圖遏制當時正在發展的土地集中的趨勢，然結果統治者竟以各地民俗不同以作答覆的理由。

末了，關於租稅問題統治者因受各方的責難，爲應付這些責難和轉變羣衆的視線起見，於是，曾頒佈了一種所謂「一條鞭」的制度；這制度的真實內容，據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所載爲：「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很顯明的，這種方式已經含有適應一般社會生活以及經濟發展的新的內容，把剝削農民的規模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切力役之征都代替以徵收貨幣的形式，而開後世賦稅折銀徵收的門戶。貨幣的作用，在社會的比重上一天天的增高其地位，而農民們的生活也是一天天的受着牠的控制而趨於劇烈破產的過程；當然，其他的剝削制度很多，不過，土地問題是一個主要的形式！

(三) 暴動的前夜

農民暴動之受一定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條件所決定，這是我們在上面屢次說及的；明朝的農民暴動，其主要的原由，當然是基於農民之不能忍受舊的土地制度之束縛，而積極的要求脫離牠的羈絆，換句話說，就是農民企圖完成土地革命的歷史的偉大任務。但是，在這暴動的前夜，關於一般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生活，需要我們加以詳細的說明，否則，如果抹煞了這些客觀的基礎，那麼，暴動的真正面貌會因此而失掉牠的顯明性。

第一，經濟發展的階段，已經恢復到元朝興盛的狀態。當然，在最初——特別是洪武初年的時期，他因為與農民分離未久，在決定對農民政策的意識上，因為受了農民暴動的威嚇，所以，關於經濟的發展，有一種遏制商業資本及手工業發展的企圖；異常顯明的，是朱元璋拒絕了外國商人對於國際貿易恢復的請求，以及嚴厲的懲罰呈請開礦的廣平府吏——王允道，並且，他還堅決的說：『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明史卷八十一食貨志）但是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進化，並不是某一個人所能遏止，何況商業高利貸資本之有力的要求呢？所以，朱元璋很快的在社會生活的逼迫之下，不得不放下了他的強項，而恢復對於國際的貿易。國際貿易恢

復之表示於一般社會生活中間的，首先便是『市舶司』與『茶馬司』，這些帶國際貿易性的機關的建立；市舶司仍和前代一樣的處理海上的國際貿易，不過，以後把範圍擴大起來；并規定一般的通商口岸如太倉，上海，黃渡，甯波，泉州，廣州等處，以招徠外國的商人；建築很精緻的房屋以爲外國商人的館舍，如福建之『來遠館』，浙江之『安遠館』，廣東之『懷遠館』，這些都是海上外國商人的宿舍。其時，來中國海上貿易的國家很多，如日本，安南，朝鮮，琉球，呂宋，合羅里，美洛居，沙瑤，峇哩，雞籠，婆羅，麻葉，龜，古麻刺朗，馮嘉，池蘭，文郎馬神，占城，賓童龍，真臘，暹羅，爪哇，蘇門答臘，和蘭，三佛齊，意大利，羅馬，錫蘭等處，綜計不下四十餘國，其繁盛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並且，因爭奪中國的市場，曾引起日本和中國的戰爭；其戰爭的遠因，先是嘉靖二年，有日本商人的代表——宗設，宋素卿，彼此分道入貢，互爭通商的權利，而市舶中官——賴恩，因爲收受宋素卿的賄賂，便取消宗設在中國貿易的資格，而宗設便借此機會大掠甯波。自此以後，日本商人便自由貿易於中國沿海各地，同時那班貴族官僚更與外國商人互相勾結，把外國商人的貨物全部的購買下來，轉運各地銷售，以獲取更豐厚的利潤；但是，他們倚賴政治上的特權，曾企圖吞沒日本商人的貨款，因此，遂爆發了中日的海上戰爭。日本派來很多的軍艦向中國沿海各地進攻，其動機一半是爲過

去復仇，一半是乘此機會載來大批的商品向中國沿海各地兜售。

甚至，在這一時期，因國際貿易發展的關係，東西文化也開始接觸，意大利人利瑪竇等來中國傳教，竭力介紹歐洲文化於中國；思想界之受其影響者，如上海（徐家匯）人徐光啓以及李之藻輩努力翻譯其學說，特別是天文學最受政府所歡迎。而明朝政府為發展其在國際貿易上的威望以及調查各國商業情形，曾派出很多國際貿易調查的專使，尤其是鄭和之赴各國調查，曾經費了好多光陰，參觀了很多的國家；茲為便於了解明朝之國際貿易的發展，特列鄭和出使各國的參考圖表如下：

次數	首途時	迴航時	西歷	所歷地
1	永樂三年六月	永樂五年九月	一四〇五——七年	占城三佛齊
2	永樂六年九月	永樂九年六月	一四〇八——一一年	印度錫蘭島
3	永樂十年十一月	永樂十三年七月	一四一二——一五年	蘇門答臘加滿刺等十國
4	永樂十四年冬	永樂十七年七月	一四一六——一九年	
5	永樂十九年春	永樂二十年八月	一四二一——二二年	
6	永樂二十二年正月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一四二二——年	

至於『茶馬司』的範圍則限於中國西部及北部的亞洲小國。最初僅僅是以茶易馬，以後，始及於一般商品的貿易，關於輸出與輸入的對比，因為沒有精確的統計，不能下肯定的斷語，不過，從『經營互市，往來不絕』的字句中間，可以看出牠的發展的形態。

第二，經濟有上昇的趨勢，特別是手工工業有長足的發展。這種手工工業發展的具體情形，首先便是開墾：在天順四年第一次派了很多的官吏大舉穴礦，如羅永赴浙江，羅珪赴雲南，馮讓赴福建，何能赴四川，一年之中，採礦銀十八萬三千餘兩，而成化中年又開湖廣金礦以及武陵等十二縣的礦坑，這一年因開礦的關係曾調集了五十五萬的農民去參加無報酬的勞動。在世宗的初年又復派遣大批的開礦專使，去考察礦脈；而戶部上書——方鈍因為受了商人們的賄賂曾向皇帝作這樣的建議：『請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一體搜訪，以稱天地降祥之意。』（明史卷八十一食貨志）自此以後，關於採礦的情形，幾等於到處皆礦無地不開，而開礦問題更成爲農村中的重要問題；如明史卷八十一食貨志所說：『姦人假開礦之名，乘專橫索民財，凌轢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時中官多橫暴，而陳奉尤甚；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爲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依照這種情形，農民們不僅沒有享受開礦的利益，甚至還使

農村生產量降低，結果，使大批的勞動力白流！

那廣大的離開農業生產而去參加手工業勞動的農民，處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要找他們的出路；於是乎從經濟的矛盾出發不可避免的要引導到政治的焦點。感覺敏銳的河南巡按——姚思仁，他看到這個問題是未來事變的徵兆之一，便發表他對於此問題的意見而想挽回既倒的狂瀾：『開礦之弊，大可慮者有八：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催民糧缺，飢餓嗷呼，四也；礦洞遍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鬪死；及今不正，集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存亡矣！』（見同上）

可是，此種最後掙扎的意見，並不能挽回統治階級在羣衆中已經墮落的威信，而事變的發展仍然按照牠的路線進行；當然，在事變進行的過程中間，還有很多綜錯複雜的現象，不過，上述的諸種原因，是暴動前夜的主要象徵！

（四）流寇騷擾呢抑是農民革命呢？

土地集中與高利貸資本的發展，是農民暴動的前提。我們根據上面的敘述和分析，異常明顯的可

以預測農民革命的大風暴之必然不可避免的到來。這一農民大革命風暴到來的信號，最初是表現於天啓二年；在這一頭就發生範圍廣大的所謂『白蓮教』的農民暴動，被壓迫的農民對於自己生活痛苦的原因，於是便認『白蓮教』為救苦救難的菩薩的體現。領導『白蓮教』運動的領袖為山東人徐鴻儒以及武邑人于宏志，他們以燒香和禮拜菩薩的方法來做農民暴動的綱領；當然，這個運動在最初還能吸引大批的窮苦農民，可是，因為缺乏積極的鬭爭生活的內容，所以很迅速的差不多不上一個年頭便為統治階級鎮壓得土崩瓦解，第一個農民革命的浪花過去了！

接着，便湧出了翻天覆地排山倒海似的農民大革命的浪濤！！

暴動開始於崇禎元年，陝西便是這個革命的策源地。當時，陝西的環境是非常的複雜：一方面有廣大的三邊飢軍，即過去從事屯田的戍兵，另一方面又有數十百萬饑民以及數十萬失業驛卒和礦工，這些廣大的被壓迫階級是埋藏在社會內部的瓦斯，而統治階級於此時復投以苛捐雜稅——所謂新餉，均輸，間架——的砲彈，使牠更快的爆發成爲偉大的農民戰爭。但是，暴動的開始他的內部的組織是異常的複雜，首先是延綏的兵變，其次，這些變兵與農民結成密切的聯系，而將暴動的隊伍密佈於陝西及其他各處；如所謂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州賊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安塞高迎祥，米脂李自成，王大梁，王子順，苗美，清水木瓜，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

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延安張獻忠，王自用，老獬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場天，閻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上天龍，蝎子塊，過天星，混世魔王，姬關鎖，翻山動，掌世王，顯神通，金牛星，劉宗敏等，當時號稱爲十三家，十八寨，三十六營，參加暴動的農民羣衆，不下數千百萬人。最後，因客觀形勢所威脅，把此種零星的農民隊伍，集中起來，形成了兩個中心的領導——李自成與張獻忠。

李自成他的出身是非常的寒微，他在童稚的時候卽出賣他的勞動力，在米而一家姓艾的大地主家裏作牧羊的僱工，及至達到成丁的年齡，感覺得牧羊實在是不能夠維持一家的生活，於是乎便去充銀川驛站的夫役！一般人們因爲他善於騎射鬪很，便目之爲無賴，并因此，曾一度爲米脂知縣——宴子賓將他逮捕，準備處以死刑，結果，爲他越獄逃脫！在暴動的初期，因他的舅父高迎祥積爲闖王，他與張獻忠等便號爲闖將，以後高迎祥犧牲於暴動，而闖王的位置便落到他的肩上。崇禎十一年，他和張獻忠關於暴動進行的策略上，意見不能夠一致，遂各帥羣衆而分開陣線；因此，張獻忠曾一度變節去投降統治階級。而李自成也因長期戰爭與屢次受創而異常消極，這時候有藍田的手工業工人——劉宗敏給他很大的幫助，於是乎把瀕於失敗的農民暴動又中興起來，當然，這并不是由於劉宗敏主觀力量所能致此，而是『河南大旱斛穀萬錢』的客觀原因所推動。李自成在河南暴動的過程中，他所表現

的精神，完全是被壓迫的農民意識的反映；他把從地主豪紳手中所奪來的財物，悉數贈給飢餓的農民，因此，李自成在農民羣衆中間的信仰的確是口碑載道：『迎闖王，不納糧』的歌謠，幾幾乎是家喻戶曉。那以前掠奪農民最多的福王，曾被暴動農民加以極殘酷的報復，如『灼福王之血雜鹿醜嘗之』，名之曰福綠酒，可見失掉土地的農民他心中對於統治者是怎樣的怨恨！

同時，這暴動的軍事組織也是有條不紊，如『分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先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髮大纛銀浮屠；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黃，纛隨其色。五營以序直晝夜，次第休息、巡徼嚴密，逃者謂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爲兵，精兵一人主駕，掌械執纜者十人。』（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傳）在李自成軍隊中間，主要的作戰隊伍爲馬隊，因爲這是衝鋒陷陣的利器：『一兵倖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籍其蹠，剖人腹爲馬槽以飼馬；馬見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則出較騎射曰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崇岡峻坂，騰馬直上；水惟憚黃河，若准，涸，涇，渭則萬衆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蹠所壅闕，水爲不流。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返顧，後者殺之，久戰不勝，馬兵倖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刺如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見同上）暴動的農民，除了軍事有健全的組織而外，關於一般的軍事紀律也是格外森嚴，如勸說士兵們身上『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並

且：『諸營較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銳者，次之，幣帛又次之，珠玉爲下。』（見同上書）於此，可見暴動的紀律森嚴，並不是如士大夫們所宣傳的什麼『殺人放火』和『姦盜邪淫』。並且，這位領導暴動的領袖——李自成他個人的生活是非常儉樸，不僅不好酒色，甚至還與士卒同甘苦，他極端的鄙視腐化了的農民領袖，爲建立羣衆對於暴動的信仰以及顧及整個農民革命前途起見，他不惜以嚴厲的手段來懲罰這些腐化的農民革命的叛徒：如『羅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女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嗤鄙之！……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之；晨以三十騎斬汝才於帳中。』反之，我們再看那班所謂王者之師的『官兵』紀律呢？他們不但沒有絲毫的改良事實給農民以安慰，甚之，還乘此機會去屠殺農民，如『官兵沿途擄掠，所得婦女，號爲官眷。』這種現象，誠然是『恣行搶劫，慘暴過賊！』（見明季稗史續編第二卷三十一頁）討伐叛亂農民的左良玉，他的軍隊比一般軍隊更加腐化：『其部下皆子女玉帛充盈，所謂數萬者，婦女老稚，居其過半！……飽掠客商，焚劫百姓，居然一叛賊矣！』（見同上書）爲什麼士大夫們對於這些現象視若無睹而對於農民革命便加以瘋狂似的仇視呢？一則曰『闖賊』，再則曰『流寇』，其實，我們從李自成的暴動的宣言中間，便可充分的答覆了士大夫們惡意的宣傳：

『上帝鑒觀，實爲求莫，下民歸民，祇切來蘇。命旣靡常，情尤可見；粵知往代，爰知得失之

由，鑑往知今，每知治忽之故；茲爾明朝，久居太甯，浸弛綱紀：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佐之脂膏殆盡。肆昊天罪窮乎人愛，致逃民爰苦於侵災！朕起布衣，日擊憔悴之形，身切痲痺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於恆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志；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嘉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幾茲百百，勉保乃辟，抑商孫之厚祿，慶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猶，臣誼靡忒。惟今詔令，允佈腹心，君其念哉！罔怨恫於宗宗，勿危於臣庶，臣其慎哉！當孝忠於君父，廣詒穀於家聲！永昌元年，謹詔！（見清代通史上卷）

同時，他還對於這個詔書的內容，加以以下的補充；如說：『公候皆食肉，紈袴則倚爲腹心，宦官悉齡糠，犬豚則借其耳目！獄囚壘壘，士無報禮之思，徵僉重重，民有偕亡之痛！』（明季稗史續編第一卷第八頁）農民暴動，不但在軍事組織上予統治者以巨大的創傷，并在政治上揭起了代表被壓迫平民革命的旗幟，更是致統治階級於死命。在這情況之下，統治階級爲的要緩和羣衆革命情以及轉變他們的視線起見，因此，不得不承認暴動的原因由於他們政治組織的缺點，所以，在鬥爭尖銳的當兒，崇禎皇帝曾頒佈了所謂『罪己』的詔書；他說：『朕爲民父，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子，不得而襁

襍之；坐今秦豫邱墟，江楚腥穢，貽耻宗社，負疚黔黎，罪在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權鋒鏑，陷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稅粟，居送行齎，加賦急無藝之徵，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縣罄，田盡汗萊，望煙屋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師旅頻仍，疫癘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用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終夜以思，跼蹐無地！用是大告天下，痛加剋艾，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人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用兵徵餉，原非得已，各撫按官，亟飭有司，多方勸諭，無失撫字；倘有擅加耗羨，朦混私徵，又濫罰淫刑，致民不堪命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盡豁逋賦，仍加安插賑濟，毋致失所！至於文武罪廢，才果堪用，著吏兵部確核推舉；若草澤豪傑之士，有能恢復一部一色者，與分官世襲，卽陷歿脅從之流，有能反正來歸者，准與赦罪立功，有能擒斬闖獻，仍予通候之賞！」（見明季神史續編第一卷第十頁）

像這樣的婉轉而狡猾的申訴，企圖在羣衆面前博得相當的好感，可是，這種帶脂粉性的假面具的言論，羣衆已經將他看成一錢不值的東西。在農民革命的過程中，那班代表地主高利貸資本的士大夫們，當然是極端的仇視這一運動，而時時刻刻的都企圖設法消滅農民的革命，因爲革命對他們好似芒

刺在背，使其感覺坐臥不安；於是乎這班士大夫們除了在思想上散佈一些毒害革命的煙霧而外，更積極的從組織上組織鄉勇（即現在的民團——著者）來破壞農民革命，因此，李自成之大批的鏟除土劣，這完全爲的是保障革命的前途，並不是什麼希罕的事情！如果對於土劣之反動不加以嚴厲的處置，那麼在客觀上等於削弱了自己。革命的進展，誠然有『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的形勢，攻陷了北平，並沒有絲毫的阻礙；人民對於農軍是成羣結隊的歡迎，他們在重重壓迫之下，對於暴動的態度，真是若『大旱之望雲霓啊』！如梁兆陽在農軍佔領北平的第二天，他便向李自成說：『先帝……失德，只因剛愎自用，致使君臣之誼，否隔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并起！……我皇上（指李自成——著者）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恆岱，抵燕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箠食壺漿以迎，可謂神武不殺，比隆堯舜，苦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千載之知遇。』（明季稗史續編第二卷第十四頁）而一班羣衆，尤其是貧苦人民對於這位暴動的領袖曾三次勸進，并且說他『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那些士大夫對於革命的造謠與破壞，縱然用盡了卑鄙醜惡的手段，可是歷史的事實是不容人們抹煞啊！本來，所謂『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是中國歷史家分析事變的千篇一律的論調，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歷史觀。我們從這一農民革命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所有真實的材料在在都顯示農民革命的光輝和反駁士大夫們誣牠爲『流寇』的胡說！

(五)地主豪紳對農民革命的反動

大革命的進展，階級鬥爭的緊張，一切落後的人們特別是地主官僚以及高利貸資本對於這一革命的感覺，簡直是痛哭流涕而如喪考妣！認爲這個革命政權之一舉一動都與他們有休戚相關，於是乎在悲痛之餘，對於革命便作積極的反動，企圖從農民手中奪回其反革命的天下。

吳三桂便是反革命的第一個渠魁。

先是農民革命進展至於北平，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爲民衆所逮捕，本來羣衆要處他以極刑，但吳三桂自成因吳三桂屯兵山海關，如果不能吸引其來降，那麼，他就會變成反革命的主要的軍事力量；因此，他要吳襄作書致於他的兒子，想借血統的倫理的關係，來減輕革命政權的困難。吳襄致書三桂說：『汝以君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真累戰功歷深資也！今汝徒飾軍容，怯懦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既無批吭搗虛之謀，復乏刑格勢嚴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幸存！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及今早降，不失通候之賞，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屠戮，身名俱喪，臣子均虧，不大可痛哉？！』（明季禪史初編卷二十六西王吳三桂傳）

但是，階級的意識終於克服了倫理的觀念。吳三桂非但不能接受他父親的勸告，甚之，還責備他父親不應該與革命政權妥協，他答覆他的父親的信說：『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於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甯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即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吾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萬雉，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失墮，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期，可怨可恨！側聞聖主晏駕，臣民僇辱，不勝眦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槌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絕，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明季稗史續編第一卷第十三頁）

這封信對於農民革命不啻留下了挑戰的手套。當然，吳三桂他自己也感覺得軍事力量薄弱，不能夠戰勝革命，於是乎便報定了『甯贈異族，勿與家奴』的決心，致書與多爾袞要與滿洲政府結成反革命的聯盟。他致書於多爾袞說：

『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蟲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敢未通名，人臣之義，諒王亦知之！今我國以甯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甯遠而鎮三

海，欲思堅守東陲而固京師也。不意流賊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衆，何能成事？奈京師人心不固，姦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稱仁累德，謫思未泯，各省宗室爲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兵，羽檄交馳，山左江恩，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原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貴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貴朝應惻然念之；且亂臣賊子，亦非貴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取威定霸，大功也；義兵一至，皆爲所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帥所部，全力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庭，示大義於中國，則我國之報貴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土以酬，決不食言。本應上書貴朝皇帝，但未悉禮制，不敢輕瀆聖聰，乞王轉奏。」

（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

爲的是要應付共同的敵人，不僅可以放棄民族間的深仇宿恨，甚之，就是屈膝在滿洲人的面前亦所不惜，滿洲人過去本來是磨拳擦掌時時刻刻的企圖侵略中國，現在居然有這樣一個很好的嚮導的人物，的確是『誠難再得之時也！』何況躲在仁義的旗幟之下而進行『一箭射雙鷗』呢？所以他立刻便

給吳三桂以圓滿的答覆：

『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明國君臣，不計國家喪亂，軍民死仁，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三次進兵攻略，蓋示意於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帝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為嘉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尙復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鈞，後桓公用之為相，以成霸業，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公，一則國仇得復，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矣。』（見同上書）

同時，在中國的南部，那班官僚地主豪紳因為受着革命的威嚇，也不約而同的起來向農民進攻，與吳三桂多爾袞們形成聯合的戰線。不過，向革命攻進是需要大批金錢，如果缺乏了經濟，他們在社會上會失掉作用；基於這個理由，官僚和地主們不特不廣募討伐農民的公債。他募債的宣言首說消滅暴動的必要，次言輸款之正當，茲為便於參考起見，特附錄如下：

『擄塵未殄，寇餓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九，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知漢天子

自有神靈；兵執無常，豈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宦游，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賤若金張，或子虛之資起，或輓輅之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橐爲里雄，合行共抒壯謀，各國義旅，仗不需於武庫，糗無壘於郇廚，飛附天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魂類立殲，普天犬醜，此則萬代所由瞻仰，亦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及戎，必議且先助餉，多或抑小國之賦，少則割千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卽非長物，亦曹洪之馬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雖陽瞿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如蠶輸令在，極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稱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佳緣，毋忘善誘。譬以濟川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乏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尙有崇韜，出塞本徼倖之圖，漢武乃逢下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從？！不惟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于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旣入樊籠，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老弱之受工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執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此中金穴，何止一

家，無數牙籤，不勝其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乏，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哀哉！欲圖穩，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卽是一家，破巢必無完卵，何不思之又重思之哉？法（卽史可法——著者）等智不足以効謀，憤何辭以卽死，實切執爨之原，輒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霹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回指之旂，封章尙達於北辰，奮筆敢駕於南史，是爲過計，亦見癡衷，見起君親，約臨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捶心泣血之至。」

（明季禪史續編第二卷）

在全國反革命勢力聯合包圍的中間，這一個農民革命的政權牠的一一切的政策，又是鋒銳異常，對於官僚豪紳地主高利貸資本，不但沒有給以絲毫的情面而加以保留；甚之，還連根斬絕！同時，在這一時期歷史上並未出現一個最前進的最革命的階級，來做農民的領導；因此，牠是陷於困難的狀態，『前無進路，後有追兵。』這個革命的政權要起獨立的作用，卽是說在這個農民基礎上面長期的統治下去，誠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反革命的形勢逐漸緊張，地主官僚以及高利貸資本他們已經準備好了一條反革命的絞繩，企圖絞殺這誕生未久的革命的嬰兒。

(六) 農民的失敗與滿清統治的完成

滿洲政府得着吳三桂的投降，以龐大的軍事組織，以養精蓄銳的士兵，以傾國來犯的力量，以中國官僚地主的從旁資助，這些都是客觀上農民政府必然倒台的因素，反之，在主觀方面既缺乏先進階級的領導，而內部的意見亦復龐雜而分歧，如張獻忠之進據四川，不受這農民政府的指導，而拱衛北平的軍隊也是腐化異常，一般士兵羣衆生活雖然相當的改善，而廣大的農民所迫切需要的如土地問題却擱置不題。當然，革命的初期，社會本身經過巨大的破壞之後，並不是短期即可恢復這個社會的健康。并且，士兵在戰爭的勝利以後，以爲從此所向無敵，對於滿清的軍隊，便存輕傲的心理。

在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生活中間，都決定了農民政府之必然的死亡；因此，山海關一敗，馬上就會令這個農民政府退出北平，而實現了多爾袞一箭殺雙雕的政策來完成滿清政府的統治。

滿清政府之所以能夠取得統治中國的資格，並不是一件偶然的和簡單的事情，在某些地方他固然是借重於軍事力量，而政治上的影響却是主要的關鍵。佔領北平的第二天，即在羣衆面前發展其欺騙的影響，例如他申討農民暴動的檄文說：

「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者，鄰國之義；洪維爾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剪

我仇凶，永世宥民，代有哲王，迄乎未造，吏偷民竊，羣盜滿野。然大行崇禎皇帝，秉恭謙之心，宏仁孝之義，德高執替，維日不甯；蠢茲逆賊李自成，狗盜之雄，鴟張獸視，忘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惡，喋血京師，逼殞帝后，焚燒宮寢，流毒縉紳，以金銀爲營窟，視百姓如草管，皇天震怒，日月無光！大清皇帝義切同舟，用伸吊伐；六師方震，衆蟻忽奔，斬馘擄遺，川盈谷量，遊魂西遁，指日擒夷；子因息馬燕京，撫茲黎庶，爲爾大行皇帝縞素三日，喪祭盡哀，諡曰：「思宗皇帝」，陵曰：「思陵」，梓宮聿新，寢園增固，凡諸后妃，各以禮葬，諸松柏勿採勿樵，惟爾率土之臣民，所欲請致於大行皇帝者，我大清無不曲體斯忱，有崇靡缺，宗藩之失職流離者，爲爾存恤，士紳之忠義死難者，爲爾表揚，輕徭薄賦，用賢使能，苟濟生民，惟力是視，深痛爾明朝嬌息無遺，執孤難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請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爲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之間，諸勳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銜恩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舊異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與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聖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我朝，永懷繼絕之恩，共敦睦鄰之誼，其有量力不敵，北面歸誠者，當各搜勁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屬，用以自劾，無不開懷延納，樂共功名，來歸之下，蠲復二年，與民休息。凡諸恩典，俱俟後詔舉行，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

憲弱；實肆跋扈之本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姦宄，此皆民之蝥賊，國之寇仇，予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殲彼鯨鯢，必無遺種，嗚呼！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眷，佈告天下，咸使聞知！」（明季稗史續編第二卷）

多爾袞一再的在羣衆面前誇耀其統治爲合理，并爲迎合低能的民衆心理起見，盡量的發揮其欺騙羣衆的理論。如爲明朝帝后發喪，鼓勵投降的走狗，保護明朝忠室，追悼爲農民們殺掉的貪官污吏，錄用地主官僚，并且爲市僧農民心理起見，減輕與豁免田賦，這種種的行動，對於地主官僚豪紳高利貸資本的利益，可算是保護不遺餘力。因此，一般豪紳貴族對牠是『歌功頌德』而感謝不遑！

其實，滿洲政府是異常的聰明，他懲於元朝在中國的一切措施，如果不給中國人以些微的改良，那麼，這統治立刻就會動搖，所謂『殷鑑不遠，覆車當戒』也。

但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終於把猙獰的面孔暴露出來，凡是讀過揚州屠城記人們，都應該對於慘無人道的屠殺大聲疾呼的反對，以揭破歷史上統治階的虛偽的面具。我們看農民暴動也沒有這樣的慘酷吧？！

然而，人們對於李自成和張獻忠輩所領導的農民革命，都呼之爲『流寇』，這是什麼原因呢？很顯明的，階級利益障礙了他們的眼睛！

所謂『流寇』，所謂『盜賊』，他們真是『天生賤骨』和『解釋無從的怪物』嗎？我想，凡是受過新與科學洗禮的人們，都不應該對此問題加以武斷的定論，而必須去追求產生他們的物質的客觀環境，換句話說，他們是某一特定階段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結晶。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除掉澈底的變革社會制度和經濟的組織而外，就是用肉體消滅的方法去殺盡中國數萬萬貧苦的農民。不僅在中國，就是在任何一個國家，牠們歷史篇幅上都有農民的血漬！

在滿清政府打敗了革命以後，牠祇會使農民暫時的屈伏，而不能澈底的消滅；因此，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之下，農民革命的浪濤還會繼續的到來，不過，牠是愈演愈烈，比前一時期的內容要廣泛得幾知幾倍。如果，我們要帶上科學的望遠鏡，那麼，就可以看見這個必然不可避免的會到來的農民革命的遠景！

第八節 古代農民戰爭的總結與精神

(一) 商業資本是毀壞農村自然經濟的動力

生產技術的進步，生產量的提高，不僅使古代的原始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彼此之間發生了有

機的联系，甚之，她還造成剩餘生產品的出現，使這社會本身分裂成許多的階層。在純封建社會的母胎內，爲適應經濟關係而發展的商業資本，牠——商業資本實際上已經成爲社會本身的內在的矛盾，就是說，牠在生產品交換的過程中，已經起了媒介的作用；牠在農村自然經濟的體系之內，既然發生了作用以後，那麼，他的影響決不會如一般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第一，他的發展的觸鬚首先及于物物交換的狀態，而對於物物交換的現象加以排斥；第二，在排斥物物交換的方式以後，牠在經濟上取得了統治地位；第三，依據于貨幣經濟的形式在一般社會生活中間發生了人剝削人的高利貸的資本；第四，貨幣經濟作用的擴大以及高利貸資本之深入農村，使土地也成了商品——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在這許多複雜的條件下面，反映于一般政治形態的，如奴隸之解放，農奴反地主的鬥爭，最後，便形成農民爲要求土地而鬪爭。

異常明顯的中國第一次農民戰爭：牠的暴發什麼不在秦代以前而適逢其會的發生於秦朝末年呢？這并不是偶然的無從解釋的現象；凡是受過新興科學洗禮的人們，對於秦始皇之代表商業資本的事實，都不會加以懷疑和否認，當然，中國在秦以前已有商業資本之發展，不過，至秦朝始形成一種偉大的和經濟的力量。伴着商業資本發展而發展的土地集中的現狀，在秦朝誠然是達到驚人的程度，廣大的農民因爲牠的影響之深入農村，使農民們與土地分離而度着飢寒凍餓的生活！一般農民睜眼看着

土地爲別人奪去是自己生活痛苦的泉源，於是乎處在飢寒交逼的狀況之下，不得不堅決去作要求土地而鬥爭！

譬如在秦始皇的末年，土地集中的過程是非常的迅速，那班失掉土地的農民們，他們不認識這是社會發展必然的現象，而責備這只是秦始皇統治的結果；因此，農民們便竭力咀咒秦始皇之速死，以爲如果秦始皇真夠死了，那麼，關於土地的佔有將會重新分配。他們在所謂『殞石』上面會鑄着以下幾個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就現在看來，這種行動彷彿是帶着很濃厚的原始的滑稽性質，但是，在那時的確是反映了廣大農民的要求。在此種事件發生未久，接着歷史舞台上便出現了中國第一次的農民暴動！領導這次有名的中國第一次的農民戰爭的領袖，他的出身是異常寒微的所謂『傭耕於隴上』的雇農。他們曾經利用了『鋤頭鐮刀』去戰敗了銅牆鐵壁似的貴族和商業資本的統治。但是，封建殘餘與所謂『小市民』的成份都乘時崛起，企圖掠取農民革命的果實；結果，那所謂『亭長』出身的劉邦，他能夠揚棄農民的立場而代表地主與商業資本的利益，完成了這一歷史的事變。

在漢朝雖然是主觀上企圖復古，并在思想方面傳播復古的影響，如漢武帝之尊崇儒術，董仲舒之罷黜百家；但是歷史進化的車輪并未如某些個人的願望而停滯，仍然是繼續向前發展；最顯著的是王莽變法的失敗，土地仍是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裏。赤眉與黃巾的暴動，牠形成的主要條件仍然是基於

農民們之乏缺土地，并且，爲土地的獲得而爭鬥。迨至南北朝——特別是南朝商業的繁盛，使人們駭異，所謂南朝金粉，其實，即是商業資本繁盛的反面，而隋煬帝更依據這個基礎開運河以溝通南北的經濟，因此，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又重演了一次；唐朝和宋朝更將經濟的範圍擴大到國際貿易，而「均田」制度同樣的受市場的影響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元朝關於商業資本的發展，在中國可算是登峯造極的時代，全亞洲的財富，差不多完全集中在蒙古人的手裏，使農村經濟破碎不堪；然而，農民的鬥爭也因此而展開大規模的戰線；至明朝即所謂「流寇」之亂的農民暴動，亦是貴族官僚地主和高利貸資本重重剝削的結果。總之，商業資本的發展，牠的作用是能夠破壞農村自然經濟的「處女膜」，使農民受高利貸資本之統治，雖然，牠是不能澈底的掃蕩農村自然經濟，那些封建殘留之最後解體，必須要經過最後的一次大革命。

商業資本之最初的發展，固然是農民戰爭的推動力，但是，牠在某種的特定的條件之下，同樣對於農民革命也盡了劊子手的作用。

(二) 必然腐化的農民政權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度的農民政府，這一點也是中國歷史的特色；在世界上以農民來統治國家

(即由農民暴動的力量建立的國家)彷彿是一個奇蹟，其實，這個政權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已經發生了內部的轉變，離開了農民利益的立場，而變成另一階級統治農民的工具。這一轉變的原因，並不是單純的由於一部份上層的農民領袖對於革命之背叛，在商業資本佔主要經濟形式的社會裏，這政權實在是無法來保障農民的利益，貨幣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魔力是神通廣大，誠然是和古代希臘人所說：『得有最堅固的城牆，也擋不住載滿黃金的驢子』一樣！漢朝的劉邦和明朝的朱元璋，他倆都是依靠農民的力量而取得政權，但是，在取得政權的第二天，他們對於農民的利益便握手告別，當農民起來反抗他們的時候，那長槍大刀同樣的也會加到農民的頭上！

(三) 中國歷史的真面目

『過去社會(指氏族共產社會以後——農註)的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古代我們可以看到貴族，武士，平民，與奴隸，在中世紀我們可以看到諸侯，臣僕，行會老板，學徒與農奴；并且，在這些中間，我們還可以分出不同的層次。』『……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東和僱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斷的互相仇視，敵對，明爭，暗鬥；這種鬥爭每一次不是達到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便是達到參加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馬克斯和恩格斯——共產黨

(宣言)

遠在一八四七年以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始祖——馬克斯和恩格斯已經爲我們指出關於歷史分析的途徑，我們拿着一個唯物的武器，才能走出這紛亂而復雜的中國的歷史的『迷宮』。過去那些建築『迷宮』的匠徒，他們把中國歷史裝製成爲帝王的家譜和英雄的紀錄，他們把一切上層建築物——政治結構的經濟基礎，如生產方式和生產品交換的形態皆加以揚棄，而僅僅說是某些個人的表演。例如中國歷史上繼續不斷所爆發的農民戰爭，這當然有牠的內在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因素，如凱勒斯克勞茨所說『一切社會現象都染有一定的階級彩色，而整個社會於某一定時期，在其每一次運動，乃是各種互相影響的階級傾向所構成的合力。』(凱勒斯克勞茨——經濟的唯物論是什麼)而那些製造迷宮的匠徒們，偏說參加暴動的農民是擾亂秩序的叛賊，是毒害人類的『流寇』！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的說，一部中國古代的歷史，每一個字都是農民鮮血寫成的，也可以說，中國歷史是一部農民暴動的歷史。

『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

一般人們都說中國是個『以農立國』的國家，我想凡是看不清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作用的人們，他們的眼睛上都生了『白盲』！

烏里亞諾夫說：『農民敗北了！但是，他們將無數次的奮起來吧！他們決不會因最初的敗北而意氣沮喪！』

中國的事變，完全證明了他的分析的正確。

此页空白

第三章 清代的土地制度與初期的農民暴動

第一節 土地佔有的形態

滿清統治的完成，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經說過：以李自成和張獻忠所領導的農民暴動，替牠開闢了一條統治中國的道路，而豪紳地主與高利貸資本對於農民革命的反動，以及以吳三桂代表這個力量與牠結成鞏固的反革命的同盟以後，更澈底的取得統治中國的地位。這一個政權在牠開始建立的時候，因為懲於過去蒙古人——即元朝政府在中國的失敗，所以在決定一切政策方面不得不相當的帶一些欺騙的色素，以緩和民族間的惡感；可是，欺騙的面罩很容易被事實先生扯碎：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便是牠自己扯碎面帕的初步。

在鎮壓了農民革命以後，那民族間的矛盾以及階級內部的糾紛又重新爆發，所謂清初三藩之亂，便是這些矛盾之具體的表現；但是結果使民族的聯盟變成漢族的屈伏，而這一個政權也竭力保護地主豪紳以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利益。在這一種轉變的局面之下，滿清的政府似乎會有一個長期的穩

定吧？其實，千百萬勞苦的農民所視爲生死存亡的土地問題，在滿清政府的議事日程當中，並沒有牠的位置。

滿清的土地制度，內容極爲複雜；凡地之開墾者爲田，而有時田亦曰地。其土地類別很多，如民田，更名田，屯田，竈地，旗地，莊田，恩賞地，牧地，監地，公田，學田，賑田，蘆田等等，綜其大要，可分爲以下四類：

A 民田：

民田範圍，異常廣袤，其包括成份如：

- 1 民賦田，係普通民田，可以自由買賣轉移。
- 2 更名田，亦名更名地，爲明朝藩屬之領土，至清代而改爲民田者。
- 3 農桑地，適宜於農桑之地，因氣候及土宜之別。
- 4 蒿草籽粒地，係指劣等旱田，如礮确之地。
- 5 蘆課地，即沮洳生葦之地。
- 6 歸併衛所地，即明末清初爲衛所管轄之地，其後改爲民田者。
- 7 河淤地，如各種河沿淤積之地。

- 8 退園地，卽已圈給於旗丁而以後又退還人民之地。
- 9 竈地，卽製鹽之土地。
- 10 山蕩縷灘地，山坡水灘沙漲之地。
- 11 草地，刈草之地。
- 12 田塘，卽蓄水之地。
- 13 官折田園地，係明代職官沒入之田以及廢寺所有之田，準折穀價，改爲民田者。
- 14 熟田，卽普通種植穀物之土地。
- 15 泥溝車池地。
- 16 土司田，卽苗族土司所轄地。
- 17 番地，番人所有，計戶納糧。
- 18 回地，回族所有地。
- 19 苗田，苗族所有地。
- 20 獠田，獠族所有地。
- 21 狼田，狼族所有地。

22 種田，獐族所有地。

B 官莊：

此種土地爲清兵入關時所有王室八旗圈占之地，大別之可分四種：

1 皇室莊田，爲清室所有之地，直轄於內務府，故爲內務府一種官莊。

2 宗室莊田，此種土地係賜於王公貝勒子以及將軍者。

3 八旗莊田，八旗有京營與駐防之別，京營環衛京師，而八旗莊田，卽分給於京營屯駐之八旗人民，此種土地皆定爲世業，而不屬於州縣管理。

4 駐防莊田，駐防有在畿輔盛京以及各省者，故或區爲三類，要之，皆爲旗產，與八旗莊田同一性質。

C 官田：

此種土地完全爲公共性質，其最重要者如：

1 牧地，始於順治初年，以供馬糧之用；凡荒田使壯丁開墾之。而以開墾之餘地爲牧場，其後牧場之地質，漸適於耕種，乃許開墾者爲田地，以溝爲界。同時，開墾地須依一定稅率，納稅於官。

2 學田，以該土地的面地收入，專充貧苦人民的教育費用。

3 藉田，卽皇帝親耕之地，如先農壇，卽藉田也。

4 祭田，以賜所謂聖賢之後裔，使充祭祀之費用也。

D 屯田：

該項土地本屬於政府，而兵卒商人屯墾之者；其制興於明朝，其內容蓋欲減少兵糧之支出，故對於防守之兵，給以月糧，使開墾荒地，以助軍實，因拾取寓兵於農之遺唾也。清撤屯軍，以屯田歸州縣管轄，惟漕運尙存，故各省尤留運丁，使之耕作屯田；及漕運改由海過，運丁遂以耕種爲業，日久與農民無異，此屯田沿革之大概。及新疆劃入滿清的版圖以後，而西北的屯墾事業遂爲統治階級所重視，並且在政府的指導之下發展起來；如以地方爲標準，可區分爲四種：

1 直隸屯田。

2 新疆屯田。

3 西路屯田。

4 北路屯田。

以上四類的土地，爲滿清政府土地制度之基本的形式。並且，對於畝的面積滿清政府亦會有個明確的決定，如丈地以五尺爲弓，二百四十弓爲畝，百畝爲頃。

同時，關於滿清歷朝的土地面積，也可以說是一天天的增加，一天天的擴大；其原因很明顯的是由於統治階級在主觀上企圖擴大土地稅的收入，而另一方面去強迫農民開闢荒蕪的土地，我們從下列統計中間得着一個簡明的概念：

滿清歷朝土地面積表	
年 別	總 數
順治十八年	田地小蕩畦地共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 頃四十畝
康熙二四年	田地共六百零七萬八千四百三十頃零一畝
雍正二年	共六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一十四頃二十七畝
乾隆三一年	共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五十畝
嘉慶十七年	共七百九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
光緒十三年	共九百一十一萬九千七百六十六頃

當然，這些數目字是官僚政府的統計，是不甚可靠；不過，我們對於滿清政府歷朝的土地面積及其增加的趨勢可以得着比較簡明的概念。

土地面積雖然是逐年增加，但是農民們的土地却一天天的喪失，僅就所謂官莊和官田的面積看來，就會使我們驚訝！茲將這些所謂官莊和官田佔有土地的形態，列如下表：

1 宗室莊田面積表：

旗別	整莊	半莊	園	莊	整園	半園	合	計
鑲黃旗宗室	四所	一所	一所	所	所	所		三六頃，六〇畝
正黃旗宗室	五所	一二所	三所	四所				一六〇，五六畝
正白旗宗室	四所		二所	一所				三六，〇〇畝
正紅旗宗室	一四五所	三所	四所		五〇所	一〇所		一二四四，一六畝
鑲白旗宗室	一七六所	五所	二〇所	八所	八所			一七一七，一四畝
鑲紅旗宗室	二七九所	二三所		五所	一一一所	二所		二六三〇，〇一畝
正藍旗宗室	五四四所	一五一所	七三所	二二所	〇三所	一九所		一五三一三，二四畝
鑲藍旗宗室	一二三一所	六三所	三所	九所	一〇二所	二所		一二五四，七四畝

2 旗職授地表：

職別	授田數目	附記
王	大莊四二〇畝至七二〇畝半莊二一〇——三六〇畝	親王園十所郡王園十所係順治七年定
貝勒	大莊四二〇畝至七二〇畝半莊二一〇——三六〇畝	園四所
貝子	大莊四二〇畝至七二〇畝半莊二一〇——三六〇畝	園三所
公子	大莊四二〇畝至七二〇畝半莊二一〇——三六〇畝	園三所
內務府總管	園四八畝	
親王府管領	園三六畝	
郡王以下府管領	園三〇畝	
王以下各府所屬丁壯	地三六畝	停止口糧
副都統以上官	園一八〇畝地六〇畝	
參領以下官	園六〇畝	係給二名壯丁每名三十畝
本家公侯伯	園各三〇〇畝	以下係順治五年酌定
子	園二四〇畝	

男	園一八〇畝	
都統上書輕車都尉	園一八〇畝	
副都統侍郎騎都尉	園六〇畝	
一等護尉侍尉參領	園四二畝	
二等侍尉護尉	園三〇畝	
三等侍尉護尉雲騎尉	園二四畝	
督府布按總兵	園三六畝	
道員副將參將	園二四畝	
府州縣遊守等官	園一八畝	
新來壯丁	地三〇畝	
公主	園三六〇畝	以下順治七年定
郡主	園一八〇畝	
縣主郡君縣君	園一五〇畝	

輔國將軍	地一八〇畝			
鎮國將軍	地二四〇畝			
奉國將軍	地一二〇畝			
奉恩將軍	地六〇畝			
佐領	地三〇畝			康熙二年定
領催	地一八畝			
守衛陵寢宮內大臣	園九〇畝			總管副管有差

3 八旗莊田表：

旗名	軍名	初次之給地	二次之給地	三次之給地	合計
鑲黃旗	滿洲	一・二六三・六畝	三五八・九畝	一三三・〇畝	頃 畝
鑲黃旗	蒙古	一七四・三〇	一七〇・一〇	四三・九〇	
鑲黃旗	漢軍	三〇〇・四〇	一八・三〇	一〇五・〇〇	
					二・六三三・〇四

正黃旗	滿洲	四四〇六・五〇	九一七四・九〇	一八七三・八〇	
正黃旗	蒙古	七五六・九〇	一一二七・一〇	一八八四・六〇	
正黃旗	漢軍	一二七四・二五	一八七八・七八	一一六七・一五	二・三五四三・八五
正白旗	滿洲	五七七・三〇	三三三六・九〇	四三五四・一〇	
正白旗	蒙古	一二九三・七五	一一四七・五五	一〇九四・八五	
正白旗	漢軍	八六七・六〇	一四六五・二〇	一四三九・七〇	二・〇七九六・四八
正紅旗	滿洲	二二九・八八	二二一九・八八	二二二〇・七〇	
正紅旗	蒙古	三五・六八	九六五・六〇	五五五・三〇	
正紅旗	漢軍	二七八・一〇	六四〇・八〇	三〇〇・二〇	三三〇七・八〇
鑲白旗	滿洲	六二六・五〇	二六七四・二〇	二二九〇・二〇	

鑲白旗	蒙古	1014.30	一八六一.九〇	九五六.一〇	
鑲白旗	漢軍	六〇九.〇〇	三〇三.三〇	四六八.八〇	
					一.六四四.三〇
鑲紅旗	滿洲	1100.70	五七八七.一五	二六一三.三八	
鑲紅旗	蒙古	三五.四〇	三四五.五	六四三.二〇	
鑲紅旗	漢軍	三〇七.八〇	六三〇.〇〇	五九三.七〇	
					一.三〇五.七〇
正藍旗	滿洲	六二九.七五	三九九二.七〇	二〇七九.四〇	
正藍旗	蒙古	1103.00	七三三.九〇	七一一.六〇	
正藍旗	漢軍	八八三.九五	七三三.九〇	四一〇.四〇	
					一.七二六.六〇
鑲藍旗	滿洲	六五二.八〇	二三四〇.九〇	四六〇.四〇	
鑲藍旗	蒙古	1548.30	二四〇.七〇	三三三.三〇	

4 駐莊田表：

所	在	地	面	積
鑲藍旗漢軍			九五八七	四三・六
				一・四三二・三八
盛京與京圍原遼陽界內之兩黃旗以內務府三旗所屬壯丁地			一八〇四步，二七九〇頃畝	
盛京與京遼陽鐵嶺秀岩界內禮部六邑官所屬壯丁地			五〇〇〇，九九三	
盛京界內之製造庫匠役人等之地			二二，二二〇	
盛京界內盛京工部倉官莊之地			三二二四，一一〇	
盛京界內盛京禮部莊頭壯丁地			四七，〇五，五	
盛京界內盛京兵部站丁地			六二，七四，八	
盛京界內盛京工部莊頭壯丁之地			七六，五六，三	
盛京界內八旗所屬王公大臣及官員閒散兵丁地			一七八三，二二五	
撫順內左翼四旗所屬王公大臣之地			一七〇二，五〇，三	

開原界內八旗莊屯地

五三三，六四，〇

遼陽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

八八八，五五，〇

鐵嶺界內左翼四旗莊屯地

八六七五，四四，二

法庫邊門莊屯地

六七八，五五，〇

威遠邊門莊屯地

二二八，八七，〇

英額邊門莊屯地

一二六，七二，二

鳳凰城八旗巴爾呼地

一九四八，六四，〇

鳳凰城正黃旗屯地

六〇一〇，九，〇

唐河邊門分種地

二四，三四，〇

四台門屯地

六一，五九，〇

復州界八旗分種地

一七二九，四〇，〇

熊岳城界內八旗蒙古滿巴爾呼官軍莊屯地

二八八三，三九，〇

金州界內八旗屬蒙古漢軍官員兵丁地

三三四一，〇四，〇

水師營地

二六，一八，〇

山海關界官員兵丁寡婦閒散人等之地

一〇三，五七，七

正白正紅鑲紅三旗下閒散人等之地

三，六七，〇

秀岩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

二二二，〇二，七

蓋州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

四六，三八，〇

牛莊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

二九二三，〇〇，〇

廣寧城所屬巨流河白旗堡之界內八旗官員閒散人等之地

一五一九四，九八二

錦州界內王公宗室額駙馬之地

二七一七，〇七，八

錦州界內八旗兵丁閒散人等之地

一〇五七，五〇，四

義州界內八旗莊屯地

五四七一，二五，〇

清河邊門總屯地

五三四，二三，〇

九關台門總屯地

二三二，一八，〇

吉林烏拉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

二七三四，九四，〇

寧古塔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	二九三六，三〇，〇
王戰春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	五三三，六四，〇
三姓地方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	六六〇，六〇，〇
伯都納界官員兵丁開墾地	一一三四，一〇，〇
阿勒楚喀界官員兵丁開墾地	二九四，四八，〇

5 牧地面積表：

旗 別	所 在 地	面 積
鑲黃旗	武清縣寶坻縣	東西七〇里南北九〇里
正白旗	天津	西北至東北四二里西南至東北六五里
正紅旗	甕山 1 蘆溝橋(2)	(1)一五頃(2)二七頃六〇畝
鑲白旗	通州	二四頃八〇畝
鑲紅旗	順義縣天竺馬房村	三五頃二八畝
正藍旗	豐台王蘭莊	東西三〇里南北五〇里

鑲藍旗	落草橋(1)廟房(2)	(1)一〇里(2)一八里
揚糧木牧場	錦州廣寧縣屬彰武台邊門外	東西一九〇里南北二五〇里
御馬廠	獨石口之東北搏羅城	東西一三〇里南北一九七里
元部牧廠	張家口之西北察喜爾圖察罕城	東西四六里南北六五里
太僕寺左翼牧廠	張家口之東北喀喇呢	東西一三〇里南北五〇里
太僕寺右翼牧廠	張家口之西北齊齊爾罕河	東西一五〇里南北六五里
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牧廠	張家口之西北諾穆罕搏囉山	東西一三〇里南北二五〇里

我們看了上面一些統計，關於「官莊」和「公田」的面積的廣袤，真會令我們咋舌！很顯然的，此種土地占有的形式，是一種集中的形式，這些數目字不過表示土地集中在貴族和官僚的手裏罷了。當然，還有一部份土地是集中在高利貸商業資本和地主的手裏，然而，這些數目的多少，是沒有精確的統計。但是，土地的自由買賣的過程因着商業資本的發展而加速，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關於這土地買賣——即土地所有權讓渡的方式，在清朝有兩種不同的形式：即是說有「永久」的和「暫時」的區別。所謂永久的讓渡，即是出賣的意思，而暫時的讓渡，則係指典與租而言，性質完

全不同；茲錄其土地買賣的形式——契券形式如下：

A 賣契書式：

立杜絕賣房文契契人○○○今因乏用，願將自置（或祖遺）房一段共若干畝坐落在○

○○○地方憑中說合出賣於

○○○名下永遠為業言明時值○平銀若干兩整其銀即於筆下交足並無短少亦無拖借折準等情自賣之後任憑置主營業倘有親鄰爭競有賣主一面承當恐後無憑立此賣契永遠存照

四至東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原賣老契幾紙並交新主收存（或原賣老契日後尋出作為廢紙）

立賣契人○○○押

中 人○○○押

保 人○○○押

經 紀○○○押

年 月 日

B 典契書式：

立典契人○○○今因正用不足情願將自置房屋（或田地）坐落○○○地方○房○○間
廳門俱全煩中說合出典於

○○○名下言明典價○○○銀若干兩（或錢若干千文）自此典後以○年為限年滿之日照價回
贖倘年限不滿須給某姓按年包租自典之後倘有族人爭競違礙者有業主一面承管恐後無憑
立此存照

立典契人○○○押
中 人○○○押
年 月 日

C 租契書式：

立租地基人○○○今有自置（或祖遺）坐落○○○地方水旱地一段計○畝○分四至地○
姓憑中說合情願租與

○○○名下造房營業言明租價每年交租地價銀○○兩永無漲落按年（或四季）交納如租價
不納即將地退回其房或拆或賣認租主自便惟租價不欠業主不得索退此係三面言明兩相情
願各無返悔俟後如有地鄰或本族子姪出頭爭競違礙情事由地主一面承管不與租主相干恐

後無憑立此租契存照

立租地基人○○○押
中 人○○○押
地 保○○○押
年 月 日

此三種契約形式的存在極乎明顯的表示了農民爲商業高利貸資本之束縛而陷於破產失地的悲慘的命運之中；換句話說，在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貧苦的農民們，縱然極艱苦的與命運奮鬥，終不能擺脫商業資本的羈絆！

同時，那騎在農民身上與土地結成不解之緣的賦役制度，也是使農民們陷於破產和窮困的一種動力！在滿清統治階級之下有三件最利害的剝削農民的法寶，這三件法寶也可以說是滿清政府毒螫農民的利器。

第一件法寶名字叫作『火耗』：本來，在明朝已經形成了這個所謂『火耗』的制度，而滿清政府繼續明代統治以來，不但沒有從農民身上除去了這種鏹鏹，甚之，還繼續的擴大牠對於農民壓榨的作用；先是一些官僚臣僕們，以爲農民交納來的膏血——銀子，由本色變成折銀；解部的規則有一定的

成色，鎔銷的時候，當然免不了許多的耗折；可是對於這些耗折他們不僅不認這是自己的損失，並把這種損失加到農民的頭上，而滿清皇帝，復認爲這種剝削是公共收入中的一種正額而加以批准，從此以後，便爲那些『狐假虎威』的臣僚們，開闢了一條剝削農民的新途徑；他們往往遇着一些所謂公事，便加派私徼去搜刮農民身上的血汗，以飽自己的私囊，但是却肩着一面所謂『火耗』的大旗，企圖用這面旗幟以掩蔽牠那兇殘的面貌，其實，這個旗幟的本身就是殘酷剝削的象徵：

第二件法寶叫做什麼『平餘』：按所謂『平餘』的制度，最初並不是普遍的存在；牠的起源祇是四川地方政府一種特殊的剝削。並且也祇是四川一省施行而已。在乾隆的初年，四川的巡撫——碩色，他爲充實自己的錢囊起見，便不惜採取一種敲骨吸髓的所謂『平餘』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在奏章中說：『川省恆例相沿，火耗羨餘外，百兩提解六錢，名曰『平餘』！』

任何一隻貓子都是喜歡吃魚腥的。卽所謂『皇帝』之貪得無厭的情形，彷彿和貓子吃腥魚一樣的，凡是能夠使牠收入增加的計劃，縱然是極殘忍的，牠總是笑逐顏開的採納；

因此，皇帝是毫無問題的批准了這個建議！

從此以後，在各省的農村中間，於賦稅的正額之外，又平添了一種所謂『平餘』的制度；『苛政猛於虎』！我們相信這種制度對農民的毒害，等於猛虎生翼，牠不知吞盡了多少農民的膏血！

剝削農民的第三件法寶叫做『漕折』。

『漕折』這個名稱彷彿是新鮮而特別，如果我們詳細的去考察這個制度的內容，那麼，牠真夠集殘酷，苛刻，卑鄙和齷齪的大成，設與以上兩種制度衡比，其毒辣的程度比上兩種高出不知幾百倍！

這制度的形成是在嘉慶道光之間，當時的各省漕糧多收折色，每担漕糧折銀或錢若干，這是因為政府之需要貨幣，從反面觀察，也就表示農民受商業資本統治之深刻。如各省的『漕折』並不一律，每一石漕糧折錢自十數千至三四千不等，要之，隨臣僚們的意智而決定，故其所折之錢，往往超過了當時的漕糧價格數倍以上。這些一切的剝削的具體的徵收的方法，可以分作如下四種：

1 分限：據大清會典載分限之法，謂『州縣按全書所編賦額，分爲夏秋兩限，及期榜諭，俾約戶週知其數，二月開徵，四月輸半，五月停徵，八月續徵，十一月完徵。若物土異宜，四月未能輸半者，督府察所屬農事女紅，收成早晚，以定徵輸之期。』按此即所謂『上忙』和『下忙』也。夏限謂之上忙，秋限謂之下忙，至於時期則各省不同：有以二月至七月爲上忙，八月至十二月爲下忙者，如江蘇，陝西，四川等省，有以七月至八月爲上忙，十二月至一月爲下忙，如廣東等省，亦有九月至十二月爲上忙，一月至三月爲下忙，如雲南，貴州等省，但大部份皆依政府定例，即以二月至五月爲上

忙，八月至十二月爲下忙也。

2 輸催：輸催之法，係以滾單記糧戶之姓名，田畝，賦稅銀米之定額，分發於各地方之團保，使其催促農民繳納，其性質等於一種通知書。

3 印票：印票用三聯單之法，名曰聯票，票面寫明納戶所完賦額，編號鈐印，分而爲三；一附簿，一留縣，一給納戶，比限查截，以備檢對之用，給納戶者，卽爲收款之憑證，其格式如下：

票 根	
某州	爲徵收地丁錢糧事今據
甲花戶完納	郡 里
康熙 年分	月 限銀
收明入櫃給照合存票根以候查對須至票根者	已經
康熙 年 月 日	收吏
正堂押	里字號

合同三聯糧券

4 親輸：此種方式，係置儲銀錢團於縣署門前，聽農民們自己封銀親自投納，以戶部規定的權衡，平准繳銀的輕重，關於零碎數目，准許農民以錢代替，其決定每十錢當銀一分。

關於有清一代土地佔有的形勢以及統治階級依據於土地關係對於農民的剝削，上面已經作了比較簡明的說明，這裏可暫時作一結束。至於整個滿清政府的經濟結構如何？這似乎是需要我們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第二節 大清帝國的經濟結構

大清帝國這架統治人民的機器，牠的構成當然是非常複雜，可是牠的主要的成份是什麼？換句話說，這個政權究竟是代表那一個階級呢？關於這一問題，實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牠與清代的農民暴動有密切聯系，如果忽視了這一問題的探討，那麼，對於農民暴動的真實原因的確是很難把握。

滿清經濟發展的路線，仍是將歷史向前推進；我們祇就商業來說，關於商業資本的發展，在滿清曾有長足的進步，主要的如關稅的收入，幾乎成爲當時財政的基本柱石。查滿清的關稅，即現在所謂常關稅，其名稱有「正稅」，「商稅」，「船料稅」三種：正稅的性質，即係按出產地方就地徵收，彷彿和現在的落地稅相類似；而「商稅」則按物價定額徵收，此二種稅則，均爲貨物稅——即商品稅。

至於船料稅則按船之梁頭太小爲徵稅之標準，而以船舶爲課稅的容體。我們爲要檢查滿清的經濟成份以某種經濟站在領導的地位，那麼，關於各省關稅的收入以及商品之進出口的統計，特別是一八五〇年以前的——即太平天國以前的經濟統計，是需要我們的注視。茲將這一時期滿清各省的重要關津以及這些關津收入的總額，分別列如下表：

A 乾隆朝各省關稅表：

省 別	關 別(尙有分關繁多不具列)	徵 收 總 額
京 師	崇文門，左翼，右翼，通州，	一三，四八一五
直 隸	天津，張家口，山海關，龍泉關，紫荆關，獨石口，古北口	一四，三六八八
盛 京	奉天關，湖納湖河，輝發莫欽，白都納，中江關，	二，四一一九
山 東	臨清關，東海關，	四，三二〇五
山 西	殺虎口，歸化城，	一，六九一九(?)
江 蘇	江海關，揚田關，潞墅關，淮安關，廟灣口，西新河	一二二，九七二一
安 徽	鳳陽關，蕪湖關，	六〇，四七四五

右翼	1,0000	1,1100	1,0581	862,70
坐糧廳	1,2339	1,2387	2,2419	8914,09
淮安關	3,8679	2,5560	14,6916	14,6916,91
沂墅關	44,151	27,2570	34,0180	34,0288,49
揚州關	16,3790	16,3808	11,4853	11,4853,63
蕪湖關	23,9919	27,2947	27,4339	24,3043,53
西新關	7,4376	4,2622	4,1892	儘數撥支
鳳陽關	10,7259	10,7299	10,6303	儘數撥支
江海關	6,5980	5,7041	7,2997	儘數撥支
天津關	6,8256	8,3618	5,3547	4,4897,57
臨清關	4,8376	5,9739	8,5441	6,8397,28
九江關	53,9381	45,1740	57,9013	儘數撥解
贛關	8,5470	9,3844	9,3771	85314,874

江西	九江關，贛關，			四四，四九一六
福建	閩海關，			三三，七八一三
浙江	浙海關，北新關，			三〇，四二一六
湖北	武昌關，荊關，			九，五五八四
湖南	辰關，			一，六四二二
四川	夔關，打箭鑪，			一八，二七八九
廣東	粵海關，太平關，北海關，			六五，二四八五
廣西	梧關，尋關，			一〇，八八二九
合計				四三二，四九七七

B道光時代的各省關稅表：（據石渠餘記填錄）

戶部二十四關	定額	道光二十一年實徵	二五年實徵	二九年實徵	留支歲出
崇文門		一〇・二五兩	三・三六	三・三七元	三・五〇三・五兩
左翼		一・〇〇〇	一・二〇八	一・〇六三	八六三・六一

北新關	一八·八〇五三	一八·八五六六	一八·八五二五	一八·八四九六	一五·八九五五·九三九
浙海關	七·九九〇八	如額	七·八〇八	如額	儘數撥支
閩海關	一八·六五四九	一九·九四六五	一八·五九五五	一九·三〇二二	一八·六〇二二·八〇八
太平關	一三·八一七五	一三·五三四五	一三·五三三三	一一·八六四三	一·五〇六三·一六四
粵海關	八九·九〇六四	八六·四三三三	三三·二二六四	一四三·九七六六	八〇·七七六八·六三
山海關	一一·一三三九	六·一七六〇	六·一七〇三	六·二六九五	四·一四九四·一三七
張家口	六·〇五六一	二·〇〇〇四	六·一七〇三	六·二六九五	二·〇〇〇〇
殺虎口	三·二三三三	一·六九一九	六·一七〇三	六·二六九五	一一八·三
歸化城	一·六六〇〇 又錢九〇〇〇串	二·三五六六	二·三四一八	二·二七四九	六〇五〇·二二
共計	三九八·九二三兩 又錢九〇〇〇串	三九一·五一〇六	五三三·八八九七	四四〇·一五〇八	三三三·五三六一

C 道光時代江部五關收入表·(註)

關名	定額	道光二一年實徵	二五年實徵	二九年實徵
黑龍江	一一·二六〇七	九·五七四〇	一〇·〇九〇〇	一一·〇三九七

蕪湖關	一三・六八五	10・1011	11・七1九六	11・七〇八1
宿遷關	五・六六八四	五・九四二六	二・六九三四	二・七六四八
臨甌版關	一八七三	六五五	七三七一	七四五三
南新關	四・九四六九	三・〇二四七	七三七一	七四五三
共計	三六・三九八五	二九・三五八九	二七・三五四八	三〇・三三六六

註：據大清會典載『凡天下之關津，戶部掌之；其隸於工部者，專稅竹木，若商旅輻輳之地，因地制度。』

我們根據上面的一些數目字，極乎明顯看出了清代初期商業的發展，尤其是在江蘇，廣東，浙江，福建以及江西等省，那關稅的收入超過以前一切的紀錄；這表數目字的反面，充分的表示了農村之倚賴城市和農民破產，如因國際貿易的發展以及歐洲資本主義的侵入，其結果農民的膏血又不斷的外流。

歐洲資本主義侵入之具體的形態，在經濟生活中首先表現出來的便是入口貨的增加；茲據英美兩國政府對外貿易的報告，在一八五〇年以前，鴉片與棉花的輸入是不斷的擴大其數量，茲將這時期輸入的商品的國家以及商品的名稱列表如下：

商品的名稱	一八二九年			一八三四年		
	英	美		英	美	
棉花 担	七四三八五	—		四四〇二〇五	—	
鴉片 箱	一一〇〇四	一二五六担		一七一一二	三八〇担	
棉布 包	三五二八〇	—		四八三六九		
棉紗 担	六三〇			三八四八六金		
細呢 包	二五一九	五二〇〇		五九七二包 九九八一五碼	一〇一八九	
檀 担	九七一八	一八二〇六		三二三〇	五六〇〇	
水銀 担	五五	六三七四			一〇一五四	
珍珠 美金	二〇六七〇〇			二五一一六〇		
烏木 担	六三七八					
鐵 担	四〇一	九四〇七		七九七四	七〇六一	

魚	担	四二五五		一四七二	
鉛	担	一一九三	一三一一九	一九五〇	二九三五六
銅	担		三二三七		九七八九
錫	担	五七三七	七〇〇	五七六一	
皮毛	隻		七五六〇三	三三三六一	二八〇〇〇
Komrotz (布的名稱)		六〇〇	三九〇〇	五三〇五	一九一二
米	担			六二二三六	

我們綜括上面各種統計的材料，牠已經反駁了人們估量大清帝國爲所謂『封建社會』的錯誤；當然，這時期封建殘餘的成份并不能說牠沒有，不過，在經濟上牠實是一種附屬的作用罷了。滿清政府很顯然的在經濟上牠并不是單純的代表滿洲貴族的利益，而是更深一層的與中國地主和商業資本結合。

要解釋這兩問題，我們不願再從經濟材料方面，作煩瑣的徵引，僅舉幾件與滿清政權有關聯的事實加以補充吧！

第一，從雍正皇帝的口中對於商人——主要的是鹽商們生活的形容，便可以做我們測驗該社會內容的一般標誌，如他在雍正元年的諭旨裏曾經這樣的說過：「……節儉之風，貴行於閭里，奢靡之習，莫甚於商人；朕聞各省鹽商，衣物屋宇，窮極華麗，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妓樂，恆舞酣歌，宴會嬉遊，殆無虛日！金錢珠寶，視爲沙泥！甚至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於仕宦。……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處鹽商皆然，而淮揚尤甚！……」

當然，這種議論實有牠的客觀的事實，絕不會是過分的形容啊！

當時的商人生活的豪奢，與現在的銀行資本家以及交易所大王們的奢侈生活，縱然有時間空間的不同，而其享樂則一也。上面我們引的雍正的諭旨，不過是形容當時商人的生活，至於這個政府和商人們的關係，在乾隆時代，政府幾乎完全蹲伏在商人——鹽商的錢囊面前；當時鹽稅的收入，已經成爲政府收入的大宗，每年有五百餘萬兩之庫銀的鹽稅，如果與滿清最初入關時候鹽稅衡比，那麼，乾隆時代已增加了十倍以上了。

這種鹽稅收入增加的現象，並不是偶然而致，而是滿清政府赤裸裸的摟抱着鹽商的結果；如乾隆時代對於鹽商有所謂「投効」和「帑息」的規定，實際上，此種規定，等於賣淫婦人勾引顧客的柔媚的秋波。

商人與政府既然結成不解之緣，牠們彼此的關係，當然是異常的親密，從那所謂「召對賜宴」和「頒給殊典」的八個字當中，充分的流露了滿清政府與商人「度蜜月」的情況。因此，我們從一觀點出發去分析乾隆的屢次南巡是爲的什麼？便不難得着結論了。

但是，地主階級與封建殘餘他們對於此種現象不禁是醋海興波，這班人以曾國藩和胡林翼爲代表，在釐金（註）問題上，他們會流露了那忍耐不住的「醋勁」；他們怨憤的說：「嘗謂軍餉無出，與其專加農人之担負，莫若令商人分担之！……」（見胡鈞著：中國財政史三五六頁）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是無的放矢嗎？

由此，關於滿清的經濟的結構，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結論：即是說：這個政府是滿洲貴族和中國商業資本互相提攜的結果！

（註）所謂「釐金」者，就是標明百分之一的稅率的意思，這個制度是防害商業的發展的。

第三節 初期的農民暴動

經濟的矛盾，加深了事變的發展！在清代的初期，統治階級雖然鎮壓了「三藩」的復辟運動，可是牠并未解決那所謂「民生國本」的土地問題。所以，這個政權在相對的穩定之下又開始動搖，換句

話說，這種穩定是建築在慢性的事變上面。

臺灣的農民暴動，就是這個慢性事變的開展。

考『臺灣』在明朝的末年，仍係個很散漫的部落，而不是什麼集中的或者是統一的地方政府；不過僅以鷓籠山一地著名而已。關於這個地方的位置和風俗，明史曾有如下的記載：『因其在澎湖島之東北，故號曰北港，或稱東蕃，距泉州甚近；地多深山大澤，聚落星散，未有君長，有十五社，每社多者千人，少者五六百人，亦無徭賦，以子女多者爲雄，聽其號令。雖居海中，畏海殊甚！不善操舟，老死不與鄰國往來！永樂之時，鄭和偏歷東西洋，無不獻琛恐後，獨東蕃遠避不至，和惡之，每竄遣一銅鈴，使懸頸際，蓋以狗國擬之也。其後人反以爲貴，富者綴鈴數個曰：「此祖宗之所遺也！」俗尚勇，暇則習走，日可數百里，不讓奔馬，足皮厚數分，履荆棘如平野，男女推結，裸逐爲常……！』在明朝因爲國際貿易的發展，這個地方幾乎成爲倭寇的世界，并且因此時常引起國際間的交涉，特別是與日本的交涉。

此種情形，歷史紀載得非常顯明；如『嘉靖之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此，其黨林道乾從；己而又恐爲官兵追擊，揚帆直抵淨泥，攘其邊城以居，號道乾港，而鷓籠遭倭焚掠，國遂殘破。初居海濱，既遭倭難，避居山後，至萬歷末，紅毛（即現在的荷蘭——著者）蕃泊舟於此，因事

耕墾，且設關閘，稱曰臺灣！」（明史）觀此，則臺灣當其開闢之初，已成爲荷蘭人的殖民地了。當然，這種雛形的殖民地，并未排斥中國人種的移動，因此，有很多的商人與流民紛紛的向這一濱海的地帶——臺灣移動；這些移民，不僅來自南中國，甚之，就是距離很遠的山西商人，亦曾開墾臺北平野。因此，東瀛記事曾評論說：「臺灣者，雄視東海，橫互千餘里，土地膏腴，家多殷實，民氣易動難靜，土性鬆脆，民族浮囂，草間求活之徒，無藉可歸之氓，趨之若鶩，無妻子之戀，無田宅之安，聚卽爲羣，動輒滋事。」云云。

在中外商人共公投資的條件之下，臺灣已經成爲各國的殖民地了，這種殖民地的象徵，首先是日本人因爲濱海接壤的關係，時常虎視眈眈，而荷蘭人的東航，西班牙人對於臺灣的渴望，更是其欲逐；因此，僅僅一個臺灣問題，已造成了各國商人鉤心鬪角的衝突。但這複雜的衝突，至一六六一年始經鄭成功加以武力的解決了。以後，因滿清政府對於臺灣的垂涎，用種種方式如勾結荷蘭軍艦與收買臺灣的上層份子，終於攘奪了鄭成功的基業而將臺灣劃入於滿清的版圖之內。

大清帝國既然得着這樣一塊肥美的土地，爲的要使這個地方羣衆之屈伏於牠的鐵蹄之下起見，不得不加緊其對於人民的壓迫，以作鎮壓羣衆反抗的示威，因此，臺灣剛被大清帝國劃入版圖以後，而這個地方羣衆的一切自由，立刻就被宣判死刑；那所謂臺灣知府——王珍，在這種路線之下，不僅限

於殘酷的摧殘農民的自由結會，并且還幫助中外商人對於森林利益的壟斷，把砍伐山木的農民成千成百的屠殺，以被壓迫農民之鮮血和頭顱，去博取商業資本家的歡心。

然而臺灣的農民，他們對於統治者的高壓政策并不發生絲毫的畏懼心理，反之，只有更積極的來和他們的敵人作戰！而那農民出身的黃殿與朱一貴，便是這次作戰隊伍的領導者；他們在政治上的旗幟主要的是『反清復明』，并以朱一貴這明代後裔的招牌去號召。

中國歷史上每一次農民暴動的爆發，在最初都是『一呼百和』，所以一次的反抗鬪爭一開始就給統治者以嚴厲的打擊，於七月之內就佔領了全臺灣，聲勢的雄壯，的確令統治階級發抖！但是，臺灣是新開闢的地方，加之暴動的組織之非常複雜，內部的意見之極不一致；如廣東人和福建人以狹隘的地方觀念出發而互爭雄長，在客觀上使統治階級充分的準備，故其結果，一次的劇烈戰爭便瓦解了這個農民暴動。

第一個革命的浪花過去了，接着第二次農民鬪爭的浪濤又緊逼而來！

這次鬥爭的浪濤與前一時期不同，因牠含有一種原始組織性質，此種農民原始的組織——所謂『天地會』的組織，當中曾蘊蓄着一斷奇怪的故事。

傳說『天地會』（或稱『三合會』）之最初的形成，是在福建福州府浦田縣九連山（也有人稱九

龍山（著者），這個地方這山中有名叫『少林寺』的寺院，便是天地會的發源地；這寺院的和尚他們在誦唸經籤之暇，更從事於技擊的練習，因此，在武藝方面頗獲得社會的贊譽。康熙時代（或曰乾隆時）有名叫西魯國的國王，引兵來犯，滿清軍官雖屢次征討，但是都殺得大敗而回！因此，皇帝會懸重賞，不論貴賤男女僧道，如果能夠戰敗西魯國，便給他升官晉爵；少林寺的僧徒當中有鄭君達其人，會偕和尚一百二十八名，大敗西魯國的軍隊，并因此將少林寺武藝超羣的聲譽傳播得遐邇咸知。後有陳文耀與張進秋者便因忌成恨而在皇帝面前建議，以為如果這些和尚造反，國家將窮於應付；結果，皇帝接受了他們的建議，要他們以火藥去焚炸這個寺院。曾有馬儀福者，因引誘鄭君達之妻郭秀英及其妹鄭玉蘭而為僧衆所不容，驅逐於九連山之外；因此，他懷恨在心，便為官軍的先導，焚毀了少林寺，絞殺了鄭君達，而郭秀英與鄭玉蘭則因官兵所逼投『三合河』而死！所剩存的僧徒僅有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五人，則遠走天涯，企圖一雪少林寺之恥；其時適有朱竹洪其人，自言係明朝崇禎皇帝的嫡孫，在反統治者這一點上，與以上五位僧徒情投意合，遂決定共同担起『反清復明』的任務。當時他們會經過很多的磨折，并因此紛紛的隱遁於江河山澤之間，在羣衆中作猛烈的反清復明的宣傳。這種『天地會』會員主要的證名，便是一首很通俗的詩句：

『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此事傳於衆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註）

(註) 這一段材料，主要的是參考商務印書館版中國秘密社會史一三頁——二二頁

當然，關於形成「天地會」的這種傳說，我們是不能加以全部的接受，不過，我們從這些傳說中間是可以把握此種組織發展的過程。很顯然的，在農村經濟急劇破產的地方，農民受着經濟發展的激蕩和地主官僚的壓迫，他們在無路可走的時候，不得不幻想一個冥冥中的主宰——神來拯救自己，在此種情況之下，那失意的官僚便利用這個力量來達到復辟的目的，天地會組織的最初形成，我想一定是屬於這種公式。試看他們的口號：「反清復明」就可以解答了！

而林爽文便揭起「天地會」這面農民暴動的大旗！

林爽文他是天地會重要分子之一，并曾經在臺灣各縣的農村中間作過很長時期的煽動工作，而官僚與地主的貪橫，客觀上更是促成他們組織發展的動力；如果就組織的數量而論，牠的確達到驚人的廣泛的程度。可是這一原始的農民組織，在牠各種準備尚未充分以前，不幸得很，其內容竟為統治階級所發覺，故於乾隆五十一年時候，臺灣的總兵柴大紀與孫景燧等便企圖以武力來消滅農民的反抗運動。其實，革命的火焰已在每個臺灣農民的心中燃燒着，這種武力的壓迫，對於農民的反抗運動不啻火上加油！

在林爽文領導之下的農民暴動，竟於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開爆發了！當時暴動的隊伍

是採取突擊的戰略，將鎮壓農民反抗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許多統治階級的走卒，都抱頭鼠竄而逃。全臺灣三分之二已落到農軍的手裏；參加這次反抗運動的農民，竟達十餘萬之多！但是，局部的農民暴動如果缺乏與各地農民鬥爭的聯系，如果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如果不取得政治經濟的中心區域，其失敗的命運歷史是不乏先例。這次暴動雖然支持了半年之久，雖然過着艱苦鬥爭的生活，然而終爲統治階級殘酷的鎮壓了！統治階級縱然用很大的力量鎮壓了臺灣農民的反抗運動，但是就整個中國範圍來說，農民鬥爭總是此起彼伏的爆發！

『白蓮教』的暴動，就是緊接着臺灣農民反抗運動的革命潮流。

所謂『白蓮教』的名稱，係起源於元代的末年，樂城人韓山童便是創造這個祕密組織的首領；他們的工作方式是以燒香的名目去接近農民羣衆，在和農民們見面以後，即進一步的作帶煽動性的宣傳，不是說『天下馬上就要大亂』，便是說『彌勒佛已經降生』。在河南及江淮一帶，接受此種宣傳的農民很多，於是乎他根據這個廣泛的農民革命的基礎，來做政治鬥爭的營陣。因此，他的黨徒如杜遵道羅文素等便向羣衆解釋，說什麼韓山童實係宋徽宗的第八世孫，而應當作中國的主人；他們會刑烏牛白馬以誓告天地，并以紅巾爲暴動的信號準備奪取元朝的政權；第事機不密，這所謂宋徽宗的八世嫡孫的韓山童，爲政府所捕殺，而元朝大規模的農民暴動亦從此時演於歷史舞台！以後劉福通便

推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爲『宋帝』，肩着這塊招牌去號召各地的農民，當時，白蓮教暴動的軍隊，因其以紅巾爲號的關係，一般人們都說牠是『紅軍』！然而復辟的幌子，終敵不過朱元璋的欺騙政策，所以白蓮教的勢力與張士誠陳友諒們同時都爲朱元璋所打倒。

在明朝的末年，事隔二百年以後，這個運動又復死灰復燃，在天啓五年白蓮教的運動乃重行復活，當然，其復活的主要原因是統治階級沒有解決農民問題。

以後有薊州人王森，他又努力於白蓮教之復活運動，其組織的內容，分設大小頭目及會主的名稱，而王森則自稱爲『聞香教主』，以總理白蓮教的一切事務。當時組織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了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等許多省份，其潛勢力的雄厚，使統治人民的皇帝聞而胆寒！但是這位白蓮教中興運動的首領——王森，因遭統治階級的妬視，於暴動尙未爆發以前便爲他們所逮捕。

然而，這個運動是有社會的基礎，所以并未有『人存政舉人亡政熄』的現象，他的兒子——王好賢繼承乃父的事業，與鉅野人徐鴻儒，武邑人于宏老等依舊作反對明朝政府的宣傳，在天啓二年的時候，這種潛伏的運動便公開爆發，以徐鴻儒爲首領曾攻克了許多縣城，當時徐鴻儒自稱爲『中興福烈帝』，而參加這次鬥爭的農民。竟有二百萬人之多！但是因爲糧食的缺乏，復受政府軍隊長期的包

圍，各地農民鬥爭又沒有親密的聯系，所以這反抗運動在李自成張獻忠們暴動以前，便爲政府殘酷的鎮壓了。

滿清的初期，對於農民各種祕密結社尤以白蓮教的取締，是異常的注視，但是白蓮教的反抗運動仍不絕如縷的爆發；當乾隆統治第四十年的時候，安徽人劉松，對於此種反抗運動又復『老調重彈』；他恢復這種運動的方式，仍然是以祈禱天地和符咒治病爲名，并派遣其教徒於中國西部各省，而從事白蓮教的活動；然事機不密，此種行動復爲統治階級所發覺，當劉松在河南鹿縣進行反抗運動的時期，便爲政府的走卒所逮捕，并被放逐於甘肅爲苦力。在滿清政府的意思，以爲『渠魁就逮』，這種反抗運動彷彿會從此消滅，而政府的統治，亦可長治久安；殊不知這種認識是敵不住事實的一擊，我們看羣衆革命的火焰已經是燒得烽火連天了。

在劉松被捕以後，白蓮教的運動經過了劉松的門徒——劉之協和宋之清的整理，更重新開展了牠的陣容，於四川，陝西，湖北等省，吸收很多新的幹部，遂又與政府作猛烈的鬥爭；這次鬥爭的範圍，當然比以前廣泛，而鬥爭的口號，又有一新的變更。鬥爭的領導者——劉之協和宋之清們，感覺得所謂『教匪』的名稱，是異常的刺耳和不雅，於是乎便掛起民族革命的大旗！乃詐稱同教王姓的兒子——王發生爲朱元璋的嫡裔，企圖利用這青年幼童作政治上的招牌。但是在鷹犬密佈的滿清社會裏

面，此種運動還處在地下已經遭受統治階級的破壞；雖然，劉之協因逃走得免於難，惟緝捕甚嚴，往往因此而牽累到許多無辜農民之犧牲生命，例如於荊州宜昌等處，統治者曾挨戶搜查，并且，他們的走卒爲邀功起見，往往將無關的農民加以株連，乘機敲詐，如果不遂所欲，那麼，被逮捕的羣衆立刻就會有生命的危險！

於此種全國恐怖的局面之下，被壓迫的農民，皆是人人自危，爲求得保障自己的安全起見，不得不和統治階級再作猛烈的鬥爭。這種反抗運動首先便爆發於恐怖中心區域的湖北，被壓迫的農民們都異口同聲的喊出了『官逼民反』的口號，且以此種口號去調動了湖北和四川兩省的農民，當時有二十萬衆的農民在此種口號之下拿着鋤頭和鐮刀舉政府的軍隊作殊死戰；而政府的軍隊亦時常爲農軍解除其武裝。領導這次農民暴動人物，除了劉之協以外，還有姚之富及一位被壓迫婦女的先覺者——王女，她們在每次的行動中間都表示其特殊的作用，而以暴動的方式佔領的地方亦復很多，如荊州，宜昌，襄陽，鄖陽，施南五府，均劃入白蓮教暴動的範圍。其時中心目的是在奪取漢陽，因此，他們會調動數十萬農民去實現這預定的目的，可是受自然地理的限制，如長江天險之隔，縱然是犧牲了近十萬的農民，也不能實現其迫切的企圖；尤其是在江陵十五里名叫龍山的地方一次殘酷的肉搏以後，把整個的暴動隊伍劃分爲兩大部份，一部份向河南推進，一部份則趨四川。

四川省的農民過去已經受白蓮教的洗禮，在思想上是同意於其他各地的農民解放運動，而現在由農民所組織的白蓮教軍隊，又復光臨於四川，在內外互相策應與互相影響的條件之下，四川省的農民勢所必然要抬起頭來以發洩歷來所受的積憤；在鬥爭的過程中，很快的煅煉出三位農民領袖，徐天德與王三塊冷天祿。當時的暴動不僅是集合了農民，并且還與那班潰散的兵士和素爲士大夫們所不恥的所謂「無賴悍民」的「嘯匪」形成一條反抗滿清政府的聯合戰線；暴動的隊伍雖然闖進了四川，但是他們的總目標還是注視在奪取大清帝國的政權；因此，他們並不以四川自守，而農民隊伍經過一番補充和訓練之後，又復整裝向外發展。

在這時期，四川的農軍亟圖與他們過去分手的戰友匯合，於是在行動上總是彼此互相策應。故其所採取的戰略，與政府軍隊實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以數百人爲一組，忽分忽合，忽南忽北」。像這樣的戰略，固然是含有很濃厚的游擊戰略的意味，而其主要的作用仍然是在於牽制政府的軍隊。最後，暴動的隊伍又重新匯合起來，使湖北與四川的農民隊伍又復打成一片，并經過一度的會議，遂又重新決定再奪漢陽的總方針，但是此種預定的計劃始終是沒有實現！當然，統治階級之對於白蓮教暴動的發展，認爲實是異常危險的致命創傷，爲醫療這破爛的傷痕起見，不能不積極的去求消滅農民暴動的對策！

第四節 統治階級關於消滅農民暴動的對策

白蓮教的反抗運動最初爆發的時候，滿清政府已經是異常的注視，當劉松被逮以後，劉之協們領導這運動使牠脫離潛伏的狀態而變成公開的鬥爭時，統治階級的上層領袖——嘉慶皇帝曾嚴厲的責備那些討伐農民暴動不力的臣僚，如在他的詔書中說：

『去歲邪教起長陽，未幾及襄鄖，未幾及巴東歸州，未幾四川達州繼起；至襄陽一賊，始則由湖北擾河南，繼由河南入陝西，若不卽行掃蕩，非但老師糜餉，且多一日蹂躪，卽多一日疾苦！各將軍大臣身行在間，何忍貿然區劃？若謂事權不一，則以襄陽一路責惠齡，達州一路責宜綿，長陽一路責額勒登保福寧；若言軍餉不敷，已先後調禁旅及鄰省兵數萬，且撥解軍餉，及部帑不下二千餘萬！昔明季流寇橫行，皆由閹宦朋黨，文恬武嬉，橫征暴斂，厲民釀患；今則綱紀肅清，勤求民隱，每遇水旱，不惜多方賑卹，且普免天下錢糧五次，普免漕糧三次，蠲免積逋不下一萬萬！此次邪匪誘煽，不過烏合亂民，若不指日肅清，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吏？其令宜綿，惠齡，額勒登保等，各奏用兵方略，及刻期何日平賊，并賊氛所及州縣若干？難民若干？瘡痍輕重？共十分之幾？善籌安卹以聞』。

（見肅一山著：清代通史）

嘉慶皇帝這個詔令，他完全把農民暴動的眞面目抹煞了！在他的意思，以爲大清帝國是個『勤求民隱』的政府，且時常普免天下的賦稅錢糧，他以爲農民對於政府應該感謝之不遑，爲什麼他們會變成邪匪而向政府樹起反叛旗幟呢？這不是個奇蹟嗎？其實，所謂普免天下的錢糧和漕銀，并不是就會使農民們得着利益，恰恰相反，這是地主和富裕農民們所竭力歡迎的事情；那大羣失掉土地的農民，與普免漕糧是漠不相關，故其詔令主要的意義是要臣僚們貢獻消滅農民暴動的策略，至於那『瘡痍輕重』與『善籌安卹』的辭句，完全是裝飾門面之欺人的鬼話！

俗語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乖巧的孩子——明亮與德楞泰，爲的要在全個統治階級面前表示其『赤胆忠心』起見，便不惜發表其摧殘農民革命的陰謀；在他倆呈於皇帝的奏章中說：

『臣等自楚入陝，所經村莊，皆已焚毀，蓋藏皆已搜劫，男婦皆已虜掠，目不忍見！已擾者固宜安卹，未擾者尤宜隄防；查各州縣在城之民，有城池之保障，是以賊匪皆不及攻城，其村落市鎮，僅持一二隘口，鄉勇或逃不及防，或間道失守，倉皇逃避，不但衣糧盡爲賊有，且備衛之火藥器械，反亦藉寇而資盜。而各賊所至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莠草以奪騎；更換有逼脅之人，爲之鄉導負運。是以自用兵以來，所殺無慮千萬，而賊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爲急，村市已破焚掠者，若荊州襄陽有急，則房竹安康已難兼顧；爲今之計，欲困賊必須衛民，莫若飭近賊州縣，

於大鎮守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溝，其餘因地制宜，二十餘村爲一堡，或數十村爲一堡，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勞，匪所至，野無可掠，夜無可棲，敗無可脅，加以大兵乘壓其後，殺一賊卽少一賊，滅一路卽清一路，近日襄陽紳士——梁有穀等，^五堡圍守，賊屢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東各屬，多有險峻山寨，祇須令鄉民移守其中，一一如守堡之法，於以禦賊安民，必可定期撲滅！』（見同上書）

這種策略，真是代表地主富農以及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防禦暴動農民最利害的武器，地主商業資產階級獲得像這樣一種消滅農民暴動的毒辣的武器以後，對他倆的感激不僅是『絲綉平原』，并且還要『馨香禱祝』呢！

『嘉慶皇帝自獲得這樣的奏報以後，并根據各地的報告及參加自己的意見，遂決定了消滅農民暴動的總方針。在這具體的消滅農民暴動的總方針內面，包含了徵調農民與組織鄉勇（鄉勇卽是現在農村中間地主富農的軍事組織，如保衛團，自衛團，挨戶團等頭——著者）的成份，并提出准於自首的辦法以分化暴動農民的內部。我們看嘉慶五年的詔諭是這樣的說：

『治流賊如治水，水之奔潰，必隄以防之，故辦賊無出剿堵二端，不堵其出路，則剿無所施，不杜其脅脅，則多剿無益；以川陝楚情形而論，川民自結寨守禦以來，賊艱掠食，日剿日滅，卽潰竄數

隊，每隊亦止千百，未嘗有新增之賊，何以一入陝界，每隊輒七八千？良由川東川北，寨堅民奮，遇賊逼近，則各寨民百十成羣，乘夜劫營使賊不得休息，故小賊祇出沒邊界，不敢深入。漢中與安居民散處，雖亦修堡，只知自顧，而任賊寨前奔逸，或賦攻他寨，卽不相援應，是以川東川北各賊，每思竄往他境，自後以剿捕責成領兵將帥，而團練守禦，則責成督撫，務期衆志成城，人自爲戰，限期半載，修築告竣？」（見同上書）

在這「消滅暴動農民的總方針頒佈以後，統治者并爲補充這計劃起見，關於民團的組織及其任務還特別的單獨頒發一個詔令：『……至鄉勇原爲保護鄉里而設，若僅募他鄉游民，無田廬家室之戀，既去其鄉，安望其勇！目前在多報開銷，事後則易聚難散，何如省此養疲兵募散勇之資，以團練本地之鄉勇，實爲事半功倍；如果劉清尹英圖孔繼懌林嵐雒昂等之寇不能犯，又如鄖西鄉勇之擊禦齊姚劇賊，使官兵得以成功，何至民爲賊掠，兵爲賊疲？總之，他省未練之新兵，不如本地之鄉勇，而本省隔屬招募之鄉勇，又不如本鄉守堡之團勇，自後各縣練勇，各寨守堡，不許調往軍營，致村莊反招茶毒；其鄉勇固守卡寨，以塔爲寨，及州縣實心倡率者，與軍功同賞！』」（同上書）

統治階級既然採取這樣毒辣的策略去對付農民暴動，加之地主和商人更澈底的更實際的更活潑的去執行這個路線，其對於暴動農民的不良的影響，當然是非常的深刻；而農民本身又經過長期的游擊

戰爭，情緒非常的疲乏，在這期間，又沒有誕生那個領導他們的強有力的階級，故在各方面已經表現了這個暴動失敗的徵兆！同時，有很多勇敢的農民領袖如姚之富冷天祿王三槐以及那位革命的王女士，都犧牲殆盡，而馬蹄崗一戰，劉之協又爲官軍所逮捕，而這延長數年之久轟動一時的白蓮教暴動便從此瓦解冰消了！當然，農民革命的失敗，絕不是如一般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單純，彷彿和快刀斬蘆的一般，從此以後就不會有其他的問題發生；其實，革命的餘波仍然在着繼續的動盪呢。

第五節 滿清政府的供狀與農民革命失敗的餘波

以白蓮教所領導的反抗大清帝國的農民暴動，經過統治階級殘酷的屠殺以後而失敗了！但是雖然失敗，而其影響却是異常的光榮；中國一班士大夫們，對於這次暴動的認識，都是異常的模糊，不是說暴動的農民爲『教匪』，便說農民暴動是『流寇』！剿匪滅寇當然是中國士大夫們天然的任務，如果放棄了這任務，那麼，他們便不能存在。至於談到形成農民暴動的具體原因，他們使『王顧左右而言他』了，因爲這是他們最可憎的忌諱。

然而皇帝畢竟是高人一等，說到確切些他是會耍一套欺騙的魔術，他爲的催眠羣衆的意識起見，不得不說出一些形成農民暴動之似是而非的原因，最顯明的便是嘉慶皇帝在壓平白蓮教所領導的農民

暴動以後頒佈的詔令，實際上這詔令也就是牠對於農民暴動之似是而非的供狀啊！如他說：

『……國家深仁厚澤百餘年，百姓生長太平，若非迫於萬不得已，焉肯不顧身家，挺而走險；緣親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變至此！然州縣之所以剝削，不盡自肥已囊，大半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之所以勒索，不盡安心貪黷，無非交結和坤。今大憝已除，綱紀肅清，下情無不上達，各省官吏，自當大法小廉，滌除積習，民間無所擾累，亦可各遂其生。惟是教匪脅迫良民，及遇官兵，又驅爲前行，以膺鋒鏑，甚之，剪髮刺面，以防其逃遁，小民進退皆死，朕日夜痛之！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其宣諭各路賊中被脅之人，有能縛獻賊首者，不惟赦罪，並可邀恩，否則臨陣投出，或自行逃散，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百姓困極思勞，勞久思息，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清代通史）

我們看統治階級的首領——嘉慶皇帝，他也不忌諱此次農民暴動的原因；他認爲『百姓生長太平，若非迫於不得已，焉肯不顧身家，挺而走險』？誠然，這暴動是從政府壓迫中產生的，但他說及產生的原因時，則以爲『親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變至此』！不錯！這也是產生農民反抗運動原因之一，然而他的結論與其所敘述的原因則不相同了！他說：『州縣之所以剝削，不盡自肥已囊，大半趨奉上司，而督府大吏之所以勒索，不盡安心貪黷，無非交結和坤』，很顯然的，農

民暴動，是整個階級對抗的戲劇，那嘉慶皇帝把此種責任完全推倒和坤一人身上，彷彿和坤已經剷除，從此以後再也不會重演這類戲劇。其實，這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任憑統治階級要什麼轉變羣衆視線的魔術，然而事實先生告訴我們說這是統治階級的鬼話！

因此在白蓮教暴動壓平以後，而革命失敗的餘波仍在繼續的動盪；關於統治階級分析農民暴動的胡說，我想，在以下的兩次事變中間一定會給他們以正面的答覆。

於整個農民反抗運動失敗以後，牠的餘波，會有兩次劇烈的動盪：其表示於社會生活中間的，首先是寧陝新兵——鄉勇的譁變，其次，就是「天理教」的禁門暴動。

關於鄉勇問題，誠然是壓平農民暴動以後的社會矛盾之一；在確定鄉勇辦法的時期，統治階級的皇帝，一再的提出以當地農民充當鄉勇爲原則，如所謂「鄉勇原爲保護鄉里而設，若僅募他鄉游勇，無田廬家室之戀，既去其鄉，安望其勇？」又說「團練本地之鄉勇，實事半功倍！」然而事與願違，農村中大多數貧苦的農民，都加入游擊隊伍，僅僅依賴少數地主富農之子弟，對於農民暴動的消滅是很難奏效，於是乎地主官僚不得不憑藉農村中游民無產階級——即所謂「游兵散勇」的力量，去對付暴動的農民；雖然是事先感覺得這批所調「游兵散勇」之「易聚難散」，但是俗語說：「火燒眉毛顧眼前」，何況這是未來的隱憂，而并不是當前的危險呢！爲的要懲罰農民暴動，不能不招募大批的鄉

勇，在招募鄉勇的過程中，地主官僚們異口同聲的向游民無產階級宣傳：如果肅清叛亂的農民以後，你們不僅可以獲得敵人的財富，並且還有『陞官晉爵』的機會；但是這種話是不兌現的支票，在壓平農民反抗運動的第二天，統治階級就宣佈過去的允諾爲無效！

關於這種情形，最好我們可以參看嚴如煜先生爲鄉勇問題，寫的那篇帶尖刻性諷刺的文章吧；如鄉兵行的前篇說：

『紅旗悠悠上城頭，繞城畫角雲慘愁，羽檄星馳募鄉勇，大旗小旗森戟矛。鄉中豪俠子，亡命身未死；乘時得入驃騎營，誓取功名如折矢；夜宿沙場干斗鳴，酒酣高唱氣驕橫，黃巾十萬勢洶湧，來壓軍門雲不動，排弩架炮守壘營，將軍有令須持重！豈無中黃賁育士？軍令森嚴凜相奉。鄉兵憤火怒出鼻，大呼陷陣萬夫辟，頃刻驅狼若驅羊，諸軍鼓譟踵相繼。爬岩翻箐無處尋，岩縣削瓜箐屯雲，憑高負險侮我軍，仰視墮帽徒怒噴；將軍下令懸重賞，孰擒賊首千銀兩，幾輩貪賞不顧生，前者頂糜後者上，藤繩累縛獻軍門，一軍歡喜得好仗，椎牛饗士軍筵設，夜奏甘泉月三捷，幾番開庫賞鄉兵，謝恩叩頭頭有血。邇來就地作搏場，俄頃千金如沃雪，日前班師撤歸里，中有一人泣不止，千年百戰掃機槍，兩手依舊空男子，悔要銀錢不要官，那有功名誇閭里？』

又後篇說：

「大紅旗，小紅旗，大小黃旗共迷離，七星蜈蚣稱健兒，五月十日道路墜。居人慄慄行人悚，聽說前途撤鄉勇，鄉勇十人九頑劣，中有一人獨悲咽！哀哀細從招募說：憶昔苗疆歲乙卯，烏巢河畔隨征討，疊槍亂射百無虛，伙伴都死一身保，聽說妖氛起荆襄，達州劇賊尤猖狂，慚無顏面回故里，報名再吃鄉兵糧。夔府作軍探，湖北又河南，最後隨營過峽關，輾轉黑河大巴山，老林百日無完衣，時見踵決血流腓，一饜二十錢，甜米斗二千，披待包穀作晚爨，青桐樹濕燒不然。昨到興安城，糧船如魚鱗，又見守營卒，個個衣履新，殺賊要鄉勇，受賞徧說冊無名；十年欲補新兵糧額少，賞金多被領旗抽，區區微勞誰見收？功不收，亦無愁，依然無面回鄉里，甘心老向南北死！」（見清代通史四卷）

嚴先生這一段關於鄉勇生活的描寫，的確是維妙維肖，如其所說：「殺賊要鄉勇，受賞徧說冊無名，賞金多被領旗抽，區區微勞誰見收？」這種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神情，怎不使鄉勇在悲痛之餘而思反抗呢！加之，統治階級於凱歌剛奏的時候，便以全力來對付鄉勇，將各營隨征的鄉勇繳械，僅僅以銀二兩五錢作遣散回藉的報酬；那一大羣鄉勇處在這種情況之下，迴顧過去的生活與瞻念未來的前途，當然是憤火中燒而掉轉槍頭向統治階級廝殺了！他們以陳遠順陳正倫為先導，聯合左右二營的兵士譁變起來，殺掉了他們的壓迫者——副將游擊，澈底的破壞所謂「秩序」與「和平」，焚燒了壓迫人民的黑暗機關——監獄，將所有的囚徒悉數釋放，在寧陝城中公開的揭起反抗的大旗。

可是，結果因爲士兵內部的分化，如蒲大芳之拍賣羣衆的利益，以及統治階級的將領——楊芳之欺騙的宣傳，很快的就結束了這次鄉勇的事變。

至於天理教的禁門暴動，則係清代初期農民失敗的最後一次餘波；這次事變緊接着寧陝兵變以後，牠形成的主要動機，可說是農民的土地革命的要求。所謂「天理教」的產生，係導源於白蓮教，牠也可以說是白蓮教運動的一個支流，其主要的領導者，爲直隸大興縣林清與河南滑縣李文成，此種組織形成的經濟基礎，的確是廣大的破產農民，他們是站在奪回自己土地的口號之下而團結起來。

據蘭穆外史靖述記載：「……入教者，俱輸以錢，曰「種福錢」，又曰「根基錢」，事成，償得十倍；「凡輸百錢者，得地一頃」，愚民惑之，遠近踵之！……」可見這組織的形成與發展，充分的顯示出農民要求土地的熱烈！就其祕密發展的程度而論，在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農村中間佈滿了他們的信徒；在過去，他們有兩句隱語，叫做什麼「二八中秋，黃花落地」！但其時適值嘉慶十八年（即西歷一千八百十三年）閏八月，因此，他們便牽強附會的把這兩句隱語與嘉慶十八年閏二月聯系起來，并解釋成爲奪取政權的暗示，而開始組織暴動。其暴動的計劃是以精壯的農軍，裝成商人模樣，潛伏於北京城內，另一方面，又以宮中的太監劉金，劉德才，楊進忠，劉進喜們爲內應；總方針雖然

是確定了，而是實際的指揮却分作兩路，由李文成和林清分別擔任，

但是，李文成在事先沒有注意於暴動的祕密，因此，在未發動以先，李文成這一路已經遭滑縣官吏——劉斌所破獲，并逮李文成下獄。其教徒以為事機急迫，當然不能按照預定的步驟做去，不得已攻陷了滑縣，從牢獄中救出了他們的領袖。而直隸的長垣，東明，山東的曹州，定陶等處的農民，亦紛紛起來響應他們；同時，林清這一路亦規劃進攻京師。以二百人分兩隊入東西華門，并以白帕為號，乘統治階級戒備鬆懈，已衝進了隆宗門；但是人數很少，勢力異常的孤單，卒為嘉慶皇帝的兒子——綿甯以新式武器所擊退。加之，在暴動時正值大雨傾盆，那參加暴動的農民多因雨阻而潰散，結果，將暴動的隊伍擊退北京以外，總指揮的林清，亦為統治階級所誘殺！

在暴動以前，統治階級對於農民的反抗，亦加以注意，嘉慶十三年仁宗上諭中說：「……江南，安徽，河南，山東毗連各州縣，多有無賴棍徒，抽刀聚衆，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諸名，橫行鄉曲，欺壓良善。既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辦，以靖閭閻，不可養癰貽患！」（中國祕密社會史第七頁）當然，這次事變起來，統治階級是要竭全力來對付，故其對於滑縣李文成的叛亂，便派遣很多軍隊去包圍，暴動的領袖——李文成，感覺得沒有勝利的可能，於是乎便縱火自殺，最慷慨的是李文成的夫人，很多人勸她投降政府軍官，以享受物質的幸福，而她則說：「城亡與亡」，揮刀

得戰去與統治階級拚命而殺死了許多有名的軍官，這位爲羣衆利益而奮鬥的女士，竟亦以自殺結束了她的生命！

清代初期的農民暴動，以這次事變作牠的總結，而大規模的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亦將緊接此次事變而表現於歷史舞台了！

第四章 太平天國

第一節 大革命的前夜

從清代初期的農民暴動失敗的基礎上，又生長了一次偉大的革命——太平天國。這次革命是過去一切慢性事變的總和，是未來的一九一年革命的先驅，牠的形成正值十九世紀中國複雜的時代，有許多異常複雜的經濟的政治的原因是牠形成的酵母；不過，太平天國革命的真正面目到現在還未為羣衆所認識，如什麼「長毛賊」啊！什麼「髮匪」啊！「粵匪」啊！此種名稱幾乎是家曉戶喻；當然，這是由於士大夫們根據「尊王衛道」的成見所反宣傳的結果，致將真理埋沒於泥坑之中！

事實並不是這樣的簡單。當時包藏在這社會內部的矛盾已緊張到異乎尋常的程度，而太平天國的誕生，便是此種矛盾之反映於一般社會生活中間的最具體的表現；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為什麼在十九世紀的中葉（西歷一八五〇年）——道咸之間爆發呢？這一點似乎逼得我們有去說明十九世紀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必要了。

國際資本主義之侵入中國，主要的是爲吐出其過剩的生產品於中國市場。當時輸入中國的商品，最重要的便是棉織品與鴉片；大清帝國在最初對於國際資本主義之叩關來犯，很顯然是採取消極的抵制態度，如在乾隆時代，英國曾要求與中國正式通商，而乾隆皇帝的答覆，則說：「……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輔奏，皆更張定制，不便准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洋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甄器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所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日日有資，並霑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洋，於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歸國。……」（十朝東華錄）

然而，國際資本主義的砲艦，終於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像這樣傲慢不恭倭郎自大的大清帝國，在帝國主義的砲艦之前，已經是威靈掃地了！因此，自一八四〇年鴉片以後，中國已經屈伏在帝國主義的面前；這次戰爭的結果，中國蒙受巨大的損失，那不平等條約的絞繩，繼續不斷的束縛着整個的中國。其最主要的如江甯條約中的幾點：

(1) 中國賠償英國軍費及煙價銀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兩；

(2) 中國以香港全島割讓給英國；

(3) 中國開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處爲通商口岸，准英國派領事居住；

(4) 英商貨物照例納進口稅，准由中國商人販運內地各處。所過關稅，不得重加課稅（海關主權的喪失）

自江甯條約締結以來，帝國主義者鑒於中國的屈伏，所以又繼續不斷的向中國進攻；不僅英國於一八四三年又強迫要求中國訂立虎門條約，而美法兩國亦援例要求與中國訂立修好條約；甚至，比利時，荷蘭，德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都紛紛的派遣領事躡英法美等國的成規，來廣東一帶各自管理該國的商務。

在帝國主義共同侵略的情況之下，首當其衝的便是農村經濟，帝國主義那巨大的商品經濟的力量，更迅速的破壞了中國農村的後方，使農民生活更快的破產；牠將那價廉物美的商品，排擠了農村家庭手工業，使農民的血汗——金錢，因帝國主義的吸收而大量的外流。在兩廣及揚子江流域一帶，是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基礎，然而革命的爆發亦以此爲策源地。所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爆發於兩廣，帝國主義的侵略，誠然是第一個主要的原因。

也可以說帝國主義經濟的侵入，引起中國農村經濟空前的破產，牠是大革命前夜的第一幅圖畫。大革命的第二幅圖畫，便是大清帝國國內的經濟恐慌。當時這種恐慌的主要現象，是表示於『銀貴銅賤』方面，銀的價格因鴉片賠款的付出和帝國主義的吸收而日漸上漲，使普通支付流通的銅幣，其價格則日益下降。銀貴銅賤的影響及於社會是非常的深刻，逼得那統治階級的皇帝不得不去加以干涉和處理；如道光二十六年十月的上諭說：

『前因各省議覆銀錢兼用章程，或請分別款項按成搭放，或稱諸多窒礙，請照舊章；歷經批令依議辦理，並交軍機大臣會同該議奏。茲據奏稱福建省前奏未盡事宜，請飭從長計議，江蘇各省亦令一律查辦，並山西巡撫請禁空票之處，亦應令其自行妥辦各等語，均已依議行矣！惟是銀貴病民，所關匪細，必應力求通變，前降諭旨甚明，乃各該督撫之已經議覆者，率皆無可通變，即所請按成搭放之處，為數亦屬無幾，於銀貴錢賤殊未足以資補救！其尤甚者，河工人員但知用銀甚便，總以搭錢為難，即謂歲修工程及預購楛料土方等項，責令以錢搭放，恐致貽誤要公，此外俸廉盤費書吏倉役並雜交等款，何艱量予搭放，仍着各該河督，按照前項名目，悉心覈議，每年實可用錢若干？分晰奏覆。毋得固執成見，仍以窒礙難行一奏了事；其未經奏到之河南，陝西，雲南等省，亦著各該督撫通盤籌畫，總期銀錢兼用於收放并權之中，作推行盡利之計，以濟民生而裕國用，是為至要！』（東華錄

道光第五十四卷第九頁

道光皇帝的上諭，異常明顯的企圖解決銀貴銅賤的問題，他的解決方法，第一步便是搭用銅錢，可是這仍不能救濟大清帝國之銀的缺乏，於是滿清政府便採取第二種辦法，即企圖增加銀的產量，派遣許多的大員，紛紛的到四川，雲南，廣西，廣東一帶，去開採銀鑛，希望從鑛銀增加中間，以解決這迫在眉睫的經濟危機！然而開鑛的結果，因為經手的臣僚中飽了所得的鑛銀，滿清政府固然沒有解決此種難題，而新的矛盾又復產生，即是說農民因受鑛官的蹂躪，離開了農村生產的過程。雖然，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會有上諭說及預防開採銀鑛的弊端，如：

「自古足國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國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萬民之用，惟經理得宜，方可推行無弊！即如開鑛一事，前朝屢行，而官吏因緣為姦，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我朝雲南四川，貴州，廣西等處，向有銀廠，每歲抽收課銀，歷年以來，照常輸納，并無絲毫擾累於民！可見官為經理，不如任民自為開採，是亦藏富於民之一道。因思雲南等省，除見在開採外，尙多可採之處；着寶興，桂良，吳其濬，賀長齡，周之琦體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場，民間情願開採者，准照見開，各廠一律辦理，斷不可假手吏胥，致有侵蝕滋擾阻撓諸弊！該督撫等必能體養朕意，妥為籌辦，固不可畏難苟安，亦不得抑勒從事，總期於民生國計兩有裨益，方為妥善，各省情形不同，不准彼此

觀望！』（見同上書四十九卷第二九十頁）

但是，這種話僅僅是不值錢的支票。

無論是國家管理鑛山，或者是地主與商人自行開採，但其對於鑛區農民之殘酷的剝削，則是毫無二致；不僅無裨於『民生』，更未有益於『國計』。太平天國革命之爆發於西南，特別是廣西，與開採銀礦實有密切的聯系呢！

大革命前夕的第三幅圖畫，便是道光末葉十年中所發生的繼續不斷的水旱天災。這種災害在太平天國過去的十年中，不是這裏的黃河泛濫，便是那裏的山洪暴發，不是這裏的旱蝗頻仍，便是那裏的鵝鴨迭見。整個的農村經濟爲這種自然的災害摧殘至嚴重的破產，而廣大的農民們復在這破產的環境中度着飢寒凍餓的生活；雖然，統治階級在主觀上是企圖給這些破產的農民們一些安慰，如道光二十二年上的諭說：『江蘇浙江沿海州縣，轉徙流離，耕耘失業，轉瞬將屆刈穫之期，該農民輸將無力，何堪更事催！若待該督撫奏報，誠恐輟轉需時，恩澤未能速逮。所有江浙兩省……州縣，除定海，鄞縣，鎮海三廳縣外，本年錢糧業經有旨豁免外，其各……州縣本年錢糧精米均着弛恩悉予豁免！至鄰近州縣……亦恐有妨農業，並着該督撫等分別查明，請旨酌減，以昭體恤！……』（同上書卷四十

第六十五頁）

其實，此種安慰僅僅是口惠而無實際，并且，那些督撫及其下層的臣僚們，往往借此中飽；我們看統治階級關於此事的供狀吧！他說：『……各州縣歷年墊完民欠，懇恩豁免！……國家蠲免錢糧，總期實惠及民，果屬民欠，雖鉅萬不惜蠲除，如係官虧，即絲毫不容混免！官墊民欠，久爲銅弊，此項若邀豁免，將來州縣任意侵挪，毫無忌憚，且書役包攬，以完作欠，種種弊端，必致日甚一日！……』（同上書五十四卷第八頁）於此，可見統治階級對於農民的安慰，是欺人的誑語了。關於此種糶米錢糧的繳納，地主豪紳簡直是一文不名，而把他們所有的担負，完全轉嫁到農民的肩上；這種轉嫁的事實，是表現於納糧時所謂『大戶小戶』的名稱上面。例如統治階級自己也承認牠是不好的現象，而企圖以命令加以取締：『……向來完糶，紳富謂之大戶，庶民謂之小戶，以大戶之短交，取償於小戶；因而刁劣紳矜，挾制官吏，索取白規，大戶包攬小戶，小戶附託大戶，又有包戶之名，所致畸輕畸重，衆怨沸騰，紛紛滋事！……是幫船多取一分於官，州縣即多取一分於民，種種弊端，關係匪輕！若不及早整頓，貽患何所底止？……所有前項大戶小戶包戶各名目，概行禁絕，一律均收。不准旗丁額外多索幫費，儻敢違抗不遵，或州縣中竟有浮收入已情事，……從重治罪！……』（同上）

至於大革命前夕的第四幅圖畫，便是土地集中過程的加速。自鴉片戰爭以後的土地關係，已經發生了相當的變化，這變化的方向，是針對着帝國主義需要中國農產品——即工業的原料；在這一有

力的推動之下，動員了中國大批的商業資產階級，使他們把過剩的資本移動一部份投入於農業方面——購買土地。在土——商品化猛烈發展的條件之下，造成了土地集中和大批土地佔有的形式；加之連年的水旱天災，農民們爲求得目前最低限度生活的保障，逼得他們不能不賣掉所有的土地；這現象當然是更有利於地主商人對於土地的集中。

當時，土地集中的過程，是異常的迅速，其範圍之廣大，的確令人驚奇；甚至，當時的皇帝對於土地集中的現象也感覺到異常的危險而出來干涉，以預防發生劇烈的和不幸的結果。在一七八三年至一七八五年的三年中間，河南慘遭空前的旱災，而其鄰省——山西省——的富商地主，他們不但未肩起賑救的義務，甚而至於還乘火打劫利用賤價收買破產農民的土地；所以一七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朝廷曾下諭阻止，其中并有述及：『晉人有以賤價收買吾甚多豫民之田地，而不知豫民恃此以養其身家！……』的言論。同時，河南副總督亦說：『晉人以富自居，見豫民之受劫，出賤價以購其地，如是使巨量之豫地，落於晉人之手，……竊甚感不悅！……』

整個的滿清政府因此事而聯想到明末農民大暴動的可怖，所以他們想以命令去恐嚇山西的地主和商人，并希望他們將此次買的土地交還於前主，以減輕農民暴動的威脅；從這段事情中間我們很可以出河南農民之貧困和怨恨的程度，尤其是當時的統治者，在農民羣衆的怨恨和鞭撻之下，使他們不得

不以行政上的手段去阻窒土地集中的進程。

除此而外，那統治階級慘酷的壓迫，以及無情的剝削和民族間的仇視，實是構成大革命前夜的第一幅畫圖。

首先我們看大清帝國對於民衆的剝削的程度而論罷。據大清帝國的臣僚——洪吉亮在他所謂征「邪教」疏中間，非常顯明的說農民的叛亂是由於滿清政府的罪惡；他說：

「今日州縣之惡，百十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既不能消弭化導於前，及事有萌蘖，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逼至於爲賊不止。……蓋今日州縣之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恤之項，中飽於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上恩不逮下，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府縣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府，甚至督府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顛踣於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皆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

洪吉亮的意思，認爲如果糾正這個三點，那麼，不僅政治可以走上軌道，彷彿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也就從此消滅！這種說法，祇能用以去欺騙那昏庸無知的皇帝，然而說及對於解決農民暴動，那真是

等於癡人說夢一般的滑稽！固然，這三點統治階級真是無法避免其重演，假定就是完全掃除了此三種弊端，也是不能遏制農氏革命的浪濤！我們須明白的了解，每次農氏大革命的礁點，都是集中在土地問題的解決，如果捨本逐末將嚴重的土地問題不去加以澈底的解決，那麼，要說什麼消滅農氏暴動，簡直是一幕滑稽劇！不過，關於這點，不僅是統治階級不能了解，而且他們也不願意了解。

繼洪吉亮以後描寫滿清政府官僚醜態的，便是章學誠。他很坦白的將滿清政府官僚的內幕及其隱處公開的揭佈出來……

「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訖於嘉慶三年而往，和坤用事，幾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贓潰貨；始則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者，俄而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以數計矣！俄以數十萬計，百萬計矣！一時不能猝辦，由藩庫代支，州縣徐刮民財歸款。貪墨大吏，胸臆習爲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餽餉，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則不與博其一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則今之盈千百萬所以乾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縣，向以狼籍著者，詢于舊治可知；而姦骨鉅魁，如東南戶曹，西北兵驛，盈千累萬，助虐肥家，亦必而知；督撫兩司向以貪墨聞者，詢於廷臣可知；聖主神明洞鑒，亦必有知其概者，此輩蠹國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釀，今之虧空，皆其所開，其罪浮於川陝教匪，駢誅未足蔽辜！」（章學誠上執政論時務書）

像這樣對於人民之壓榨，其殘酷的程度可算是無以復加了。并且，此種壓榨形勢繼續發展，就是那未來的太平天國的劊子手——劉蓉，也不能緘默不言；如他在致某官吏的書中，曾經這樣的說：

『今天下之吏亦衆矣，未聞有以安民爲事者，而賦斂之橫，刑罰之濫，賧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國家牧民之吏，其始取之也，以記誦詞章，而不必有德行道義之實。其職之也，以科條律令，而不必有慈祥仁愛之施。其課之也，以穀刑名，而不必有撫字教化之效。是固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况夫課目之外，又難以捐納之途，使驅之使責償於民，而肆其貪婪之志也。法律之外，加以條例之煩，是借之使挾以爲姦，而制其死生之命也。考成之外，又責以苞苴之私。是教之使斂怨於下，而快其豁慳之欲也。是以才者既盡其所爲，又不顧斯民之疾苦；不才者又茫然不省。一聽滑胥之所欲爲，而因以便其私計。又有甚者，府胥吏從之屬，不名一藝而坐食於州縣之間者以千計，而名家之中，不耕織而享鮮者以萬計焉！鄉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與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民之黠者，既巧爲規避，而非法律所得制；富者又得以納獻鬻免，雖羅網禁而不刑。是以法之所及，止於愚魯貧民，而豪猾者流，日寢饋於法禁之中，而常逍遙於法網之外。……今天下避遠之邑，綠林深密之地，盜賊羣聚即據焉。……夫國家治盜之法亦嚴矣，然而令行而禁不止，此其弊二：一則縱盜以爲利，一則諱盜以爲功。……』

以所列數點，誠然是大革命前夜的幾幅畫圖。在這幾幅畫圖當中，關於未來的大革命的象徵是異常的明顯，牠已預示這個社會將演一幕歷史的悲劇！不過究竟誰是演劇的主人翁？這是值得我們深刻的注意。

第二節 革命的動力

在大革命爆發以前，一切與革命運動有關聯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條件，均已成熟，不過是埋藏在這社會內部罷了。當太平天國未出現於歷史舞台的時候，整個的農村中間，已經有許多零碎的騷擾和鬥爭，爲牠開闢一條走向歷史舞台的道路；這些零碎的騷動，具體的說來，可以分成三點：

第一，反苛捐雜稅的鬥爭——特別是抗租抗糧的鬥爭，在農村中間普遍的發展；且其他發展的程
度是時常走到與統治階級武裝衝突的頂點。如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在湖南這種抗糧運動會有廣大的發展：

『……未陽縣痞棍聚眾抗糧滋事親往查辦；……據稱未陽縣西鄉……抗不完糧，并設局斂費，阻截糧戶，經該縣獲犯訊究，胆敢糾眾撲城，并拒傷弁兵胡俊等，見尙退匿城外未散等語。匪徒抗糧滋事，糾合至于餘人之多，並敢持械攻城，拒傷官兵，實屬罪大惡極，必應迅速剿辦，淨絕根株！……』

妥速掩捕，尅期竣事，勿使蔓延，其爲首之楊大鵬等及著名匪犯，務須按名捕獲，盡法嚴懲，毋任一名漏網！……』（十朝東華錄道光卷四十九）

同時，浙江方面亦復有抗糧運動。廣大的農民，他們是極不滿意於統治階級的糧糟制度，因此，自動的起來與統治階級對抗。如：『浙江奉化縣匪徒張名淵等於該縣考試時，聚衆阻鬧，挾制完糧……經該道等前往彈壓，輒敢拒抗官兵，形同叛逆，實屬目無法紀！……該縣山海交錯，難保該匪徒等不勾結他處賊匪，附和成羣，藉圖搶擄；自當厚集兵力，趕緊撲滅！——務將首要張名淵等悉數擒獲，毋許一名漏網。……』（同上書）

我們從湖南和浙江的農民抗糧鬥爭當中，充分的看出了被壓迫農民反抗的勇氣，他們把生命置之度外，抱着犧牲的精神去和統治階級拚命！滿清政府雖然以極殘酷的手腕逮捕了他們的領袖，斬斷了他們形式上的聯系，然而這不但沒有解決了農民對於政府的反抗，結果，祇會使農民反抗運動轉變爲另一種形式！在另一種形式之上，牠益會普遍的發展起來！

第二，農民祕密組織之廣大的發展。過去歷史上的農民反抗鬥爭，不是爲他們上層領袖所出賣，便是爲統治階級恐怖手段所鎮壓，他們是始終沒有得着一個澈底的解放；然農民們在統治階級殘酷鎮壓以後，是不是從此就緘默不言任憑統治階級的宰割呢？事實告訴我們這是統治者的幻想。滿清政府

在打敗了『白蓮教』運動——農民的反抗運動以後，便宣傳從此以往在滿清政府統治之下將再不會爆發什麼農民的反抗鬥爭；但這僅僅是牠主觀上的願望，而實際上農民的反抗運動彷彿和穿山甲打洞似的一刻也不會停止牠的進行。不過，農民們在屢次失敗的教訓當中，感覺得如果缺乏組織——即團結，其結果是很難戰勝統治階級的；他們的組織在社會生產力尚未高度發展的時候，當然還帶着很多迷信的氣味，這正是表示農民反抗運動的特色。

農民反抗運動的祕密組織，最大的便是『三合會』。

考三合會的起源，在康熙十三年已經有他的雛形，而過去的臺灣暴動亦是他們所領導；在嘉慶三十年的時候，牠在數量上已有廣大的發展，曾與政府的軍隊在梅嶺對抗，武裝衝突的結果，農民遭受了很大的失敗；自此以後，他們在南中國一帶，時常與政府衝突。他們不僅借此去團結農民羣衆，並且還以這組織力量和地方政府作經濟的政治的鬥爭；因此，那些下級的臣僚，對於這一農民羣衆的組織是非常的畏懼，不得不把這些情形，上聞於他們的皇帝。

滿清政府處理此事是不成問題的按照例行公事的手續，要各省對此嚴加取締，以免顛覆了他們的政權。故與道光二十五年的上諭中，說及：『……廣州府屬盜劫日滋，商民受害！……據稱廣州府一帶土匪劫掠爲生，結黨聚會，數萬餘人。其著名積匪，如香山，新會，順德等處，姓名皆歷歷可數。

上年查拿之「臥龍」「三合」等會匪，搜捕未淨，嗣後復有新安，新寧各縣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鄉引入入會，千百成羣，肆行無忌！又香山下沙地面，近來匪類漸多，地方文武，不肯實力查拿，以致農民不安耕作。又順德香山交界之處，及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新會，三水等處，皆有盜賊巢穴，出沒無常！……並有香山司巡檢——魯鳳林被盜搶去，剃鬚勒贖！……務使盜賊肅清，農商安清！」（同上書）

觀此，則南中國一帶的三合會的組織其聲勢之壯大，真使滿清的羣狗在牠的面前發抖！甚至，這組織在當時還發展到南洋羣島一帶，以取得海外的聯絡和新式軍火的供給。

第三，太平天國的前哨戰，滿清政府既然嚴厲的取締農民的祕密結社，但農民反抗亦復隨着統治者壓迫的程度而邁進；雖然，這種反抗的範圍，還是屬於大革命前哨的接觸性質。於道光二十七年，這前哨戰的陣容已經展開，如「……湖南新寧縣與廣西全州交界地方獠匪糾黨焚搶，抗拒官兵，屢次攻擊，擒獲匪犯多名，並將廣西結會滋事首犯李世得槍斃，惟新甯匪首雷再浩與民人李輝等，竄匿深山，負隅自固！……」（同上書）至道光二十八年時，牠的範圍又比以前廣大：「湖南新寧縣地方，匪徒聚衆滋事；擁進縣城，戕害知縣，寄居該縣之前署縣家屬，同時被害。打毀衙署監獄，實屬罪大惡極，殊堪髮指，該處界連廣西，前年獠匪雷再浩勾結李輝等結會搶掠，即在新寧縣地方；經湖南廣西

兩省會拿勦辦，此次復敢進城戕官，必其餘孽復萌！……」

迨及道光三十年，農民的反抗運動已經普遍了全國，統治階級在恐怖之餘，還想作最後的掙扎：「……邪教盜賊，在在皆有，而避藏之巧，蔓延之多，惟交界處爲最；所歷舉從前查辦教匪會匪各案，以漏網餘匪，支流蔓延，近又結黨成羣，如江蘇盛行「吃棒」名目，而淮安一帶尤甚！直隸盛行「在理」名目，而天津靜海等處尤甚！在官人役，亦多習教之人，妄言禍福，煽惑鄉愚！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又如直隸滄州一帶回匪與山東滕縣，嶧縣，蘭山縣等處教匪，以盜賦爲生業，竟至父子習傳，師徒授受。近來廣西貴州均有大夥劫奪拒捕之案，直隸山東均有劫奪公東齋本摺差之案，迭經降旨嚴飭密拿，而地方文武，視若具文！……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陝西，四川，江西，廣東，湖南，廣西各水陸交界之區，盜賊公行，此擎彼竄！……」（同上書）

天平天國，就是上面這些部份鬥爭的總和。

牠的動力，既不是地主，更不是商人，我們根據上述三點，可以看出參加革命的階級成份，十分之八九是那破產的貧苦農民。這些貧苦農民，他們受生活的逼迫與飢寒的驅使，祇有流入於佈滿全國的所謂匪類中去；那班藏在山谷間流落的農民和很多留在鄉間的貧農都包括在內，並由這些羣衆組成了太平革命軍。並有很多關於所謂匪隊與太平軍關係的作品，談到那些俗稱亡命之徒的土匪與革命軍

聯合的事實。

在太平軍第一次勝利佔領了廣西的商業城市——龍州以後，有很多對於舊社會不滿意的，流亡的，飢餓的，貧窮的人民，都紛紛的加入到太平革命的隊伍。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因為領導這次革命的首領——洪秀全，他就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出身。據史書記載，凡太平軍所到的地方，他們對於有錢的富人，則令其交出自已的財產，對於勞苦羣衆，便要他們加入太平軍；假使有錢的富人不願供給他們，則沒收其財產，而對於貧民，從無強迫徵兵的佈告。很顯然的，這次革命對於生產階級是取保護的態度，而并不執行什麼必須從軍的制度；縱然是在某種情勢之下，他們對於一切城市的居民，採取了勞動義務的行動，但是，仍將富商大賈包括於內而沒有什麼客氣——倖免的。至於對於政府的倉庫和富商——尤其是典當的庫房，是無情的沒收；但是，對農民却以現錢購買他們的生產品，并且還付很高的代價；這裏完全表現出太平天國革命的農民的階級性，尤其是貧苦農民的意識。

另一方面，農民中的富裕者——富農，因鬪爭的尖銳，他們在整個的農民中間，是起了相當的分化，祇有很少的一部份是追附於革命之後；假使我們把太平軍中整個的軍隊統計一下，則我們可以知道大多數是從貧農和窮人集合而成的；強迫的勞動則有一部份在軍事搜查和運輸方面採用過，然其軍隊的主要部份我們在上面說過，牠都是從貧窮的民衆自願的，或者是附和而集成的。中國的歷史家，

關於這兩個鬪爭的階段的營壘所下的公平斷語是：「廣西廣東二省遭了飢荒（在一八四八年——四九年），因此，開始發生匪患；人民爲自衛起見，也組織了義勇隊，……差不多各義勇隊都擁有私產，在這個時代，隨洪秀全都是貧民！……」（白話全國史第四卷第二十四張）并因這樣的階級對立，使義勇隊與洪秀全及其附隨者之間的關係如同仇敵一樣。

貧農從自己的隊伍中間，產生出了一個最有能力的，猛勇的領袖——忠王——李秀成，他後來成爲太平天國的軍事首領。在他的自傳內，說他自己是從貧窮的家庭出身的：「我家之清貧，促成我離家之主因，我家無可恃之物，生活艱難殊甚！自八歲至十歲曾入塾求學，但此後我被迫於生活，不得不治農以助我之父母；迨至我年二十，始知洪秀全有創設新教之計劃。……」（曾登載於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之華北報，見中國近世史。）

革命的第二種動力，就是工人。

關於工人和僕役參加革命的問題，很可惜的，我們沒有充分的材料來證明，因有清一代對於思想上的禁錮以及文字獄的疊興，不僅顛倒了是非，并且還淆亂了黑白，這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情。例如康熙年間的莊氏史案，南山舊案，以及雍乾間查嗣庭，呂留良，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庭等都是以文字買禍，乾隆三十九年的開四庫館，下詔求書，凡是有觸忌諱的，悉被焚毀，前後燬毀二十四次，五百

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這不僅是中國近代文化的厄運，甚至還是研究中國歷史一個鉅大的損失呢！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有翔實記載太平天國革命的書籍，統治階級一定會加以嚴厲的摧殘！

雖然，根據革命的性質，我們可以無庸疑惑的工人們是勇敢的積極的來參加革命；太平革命軍的領袖之一——楊秀清，他就是一個工人。據說楊秀清他是廣東人，他幼年的時候，在廣東以燒炭爲生，其生性是異常的豪放，不拘拘於小節，因此，一般士大夫們都稱他爲無賴！然而，他是一個極聰明的人物，他具有很好的才幹，在作戰期間，能籌劃出很好的戰術與策略；佔領南京以後，於某些策略問題上，竟與洪秀全有不同的意見，因此，便和洪秀全的關係破裂，最後他復爲「天王」一派人們所刺死！

此外，參加革命的還有一部份海盜，這些海盜，都是農村中間破產的農民。他們有很好的軍事技術以及最新式的武裝，因此，他們參加太平天國的革命，的確是一個有力的幫助，比較以前的農民暴動而論，更有牠的新的特殊的軍事意義。海盜的首領——羅大綱，他的行動是完全與洪秀全一致，以後，他曾被推爲太平革命軍領袖之一；他在軍事上有許多很深刻的見解，很可惜的，這一革命運動發展到了奠都金陵以後，如果採取羅大綱的意見，那麼，就是失敗也不致於這樣的悲慘！

當然，在整個革命運動的進程中，那些投機取巧的人們，特別是地主階級的變節者以及士大夫隊伍裏面的叛徒，如韋昌輝和石達開，不過在成份上講，像他們這些成份，在太平天國的隊伍裏，實在是少數的少數！太平天國革命的動力，既然是這批素爲人們賤視的勞苦人民，牠的一切的政治戰術當然會和過去的一切農民暴動不同了！這些不同點在什麼地方？的確是有研究的必要啊。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政治戰術

太平天國在廣西金田村揭起反抗滿清政府大旗的當兒，統治階級彷彿認爲他們不過是一些零星的教匪，沒有什麼多大的作爲；因此，一則說他們『蕞爾小邑，小醜跳梁』，再則說他們是：『釜底游魂，不難殲滅』！當然統治階級這樣的樂觀，並不是無因的，因爲牠擁有六十一萬八千餘人的常備軍，必然是要有所恃而不恐啊！其實這班腦滿腸肥的軍隊，經統治階級奢侈生活所宣染，早已墮落到腐化的深坑，那裏還有戰鬥的餘力呢？！我們看太平軍自金田首義以來，而湖南，而湖北，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沿長江流域而江西，而安徽，而建都南京；再渡江北伐，掩揚州，攻臨淮，克鳳陽，而開封，而歸德，而山西，而直隸，而達天津附近之靜海，曾幾何時，已肅清滿清反動統治的半壁！如果沒有正確的，適當的，階級的政治戰術，縱然是軍事上的勝利也不會達到如此程度的。什麼是太

平天國的政治戰術呢？歸納起來說，可以分作如下兩點：

(A) 國際主義：太平天國的革命，很顯然的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幟。基督教——宗教與這次革命發生聯系的時候，遠在牠的爆發以前，牠隨着帝國主義的商品與炮艦政策而俱來；廣東是歷史上有名的國際貿易港，而基督教思想的浸入，亦以此處為最先。最初廣東人朱九濤受過基督教的洗禮，而廣東花縣的洪秀全與馮雲山等亦附和其教義。迨朱九濤逝世以後，發展中國基督教的責任便落到洪秀全的肩上。他們的組織稱耶和華為天父，說耶穌是耶和華的長子，稱為天兄，而洪秀全則自居耶和華的次子而稱為天弟，其餘的師徒關係，男性的則互稱兄弟，屬於婦女的則以姊妹稱呼。牠的思想的立場會排斥佛老，說這些都是邪教，這種一神教的主張，已經比較以前中國的多神教有進一步的意義；何況他們更提出一些迫切的農民的要求以號召廣大的勞苦羣衆呢？

很多的近視朋友說太平天國彷彿是中國歷史上的宗教革命，這種話恐怕沒有充分的根據吧？因為發動農民鬭爭的，並不是什麼基督教的未來的『天國』，而是理想的國際共產主義，他們將國際的共產主義滲於於基督教的宣傳之中，並加以東方式的發揮；如其在原道醒世訓一文中說：

「夫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皇上帝天父凡間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國是皇上帝主宰理化，遠而番國亦然；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

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併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姦邪謀閉而不興，竊盜賊亂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爲大同！」即今尙可望哉！然而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生矣！惟願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謀之鬼門，循上帝之真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砥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幾何乖漓澆薄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爲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何陵奪鬪殺之世，不一變而爲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怯之世也！」（引自世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第一百三十頁）

這一篇文章，很顯然的看出了所謂『上帝會』的理想，牠是要實現東方式的共產主義；因此，關於基督教義的成份是異常之少，而對於未來的革命前途則指示出很多的幽光。這次革命并未有忽視農民目前的需要，反之，爲擁護貧苦農民現實的切身的利益，而提出積極的澈底的土地革命的主張於廣大的貧苦農民的面前；如其在土地問題的戰略上則說：『蓋天下皆是天父皇上帝一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

我們承認，這裏有許多解釋是帶着很濃厚的唯心論的色彩，但是這一點并不能抹煞了此次革命農

民對於共產主義的熱烈的要求。

(B) 民族革命：在滿洲人的統治之下，漢族除掉那些上層份子與牠成立妥協以外，廣大的平民受着這政府一種意外的壓迫——民族間不平等的壓迫，因之，反抗滿清政府的民族意識亦潛滋暗長，有時候甚至有組織的去和牠鬥爭。太平天國牠爲吸引廣大的革命羣衆起見，爲吸引爲民族利益而奮鬥的激進份子起見，曾掛出了漢族——民族革命的招牌。這民族意識具體代表的文件，首先要推奉天討

胡檄一文：

『真天命太平天國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秀清），右弼正軍師西王蕭（朝貴），爲奉天討胡檄佈告四方：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爲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虐，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尙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目爲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纓鞭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反足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

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盡彌天罪孽！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帶，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而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悉與妖胡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語，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言，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亂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使是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欲使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是欲我中國之人貧困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雄豪傑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復興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謀中國者，無所不用極，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獨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苻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弟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惡，乘吳三桂之招引，霸佔中國，惡極窮兇。予細查滿清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并無人倫風化，乘

中國之無人，盜據中夏。冠座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沫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蠅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艷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日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連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祖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一以安九省！特招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倭權於應昌，復興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獃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有斬其首級來投者，又或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螫孤以先登，戒防風以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僞拒真，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於高

天乎？予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爲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佈告天下，咸使聞知。」（見同上書一三二——三四頁）

陳琳的檄文，可以愈曹操的頭風，我相信太平天國的討胡檄，同樣的會驚碎統治階級的狗胆！牠歷舉滿清政府壓迫漢族的事實，同時，牠又指示人們反抗的途徑，牠完全以苦的流血的經驗與材料，來充實其檄文的內容。

因此，從這兩個總路線之下出發，牠的確是集合了廣大的羣衆；牠爲什麼能支持十五年之久呢？這，這全靠牠經濟的和政治的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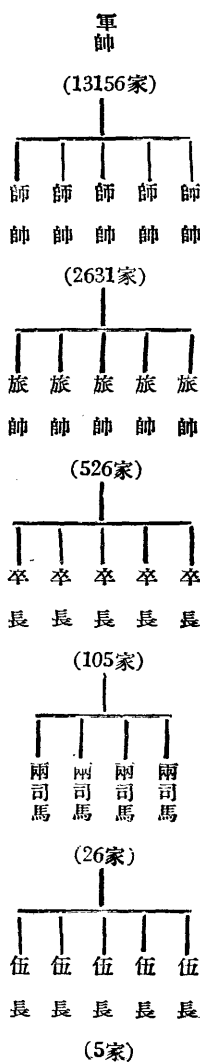
第四節 太平天國政治經濟的建設

太平天國的偉大，當然在牠的各種措施上表現出來，而首先表示牠那空前的政治經濟的建設。在整個的建設工作當中，特別是土地制度之澈底的變革，是值得我們嚴重的注意！

第一，太平天國的土地制度，係採取一種特殊的軍制形式，其每軍的組織形態則有如下的規定：

『凡設軍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次設軍帥所統五師，次設師帥所統五旅帥，共二十五旅帥；次設二十五旅帥各所統五卒長，共一百二十五卒長；次設一百二十五卒長各所統四兩司

馬，共五百兩司馬；次設五百兩司馬各所統五伍長，共二千五百伍長；次設二千五百伍長各所統四伍卒，共一萬伍卒。通一軍人數，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添多一百零五家，另設一卒長；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設一旅帥；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另設一師帥，共添多一萬三千五百十六家，另設一軍帥，未設軍帥前，其師帥以下官，仍歸舊軍帥統屬。既設軍帥，則割歸本軍帥統屬。』這軍制組織的構成，我們爲簡明起見，可以列如下表：



軍制的系統雖然是如此，然而牠的内部組織還有極詳細分工：

『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卽以師帥旅帥兼攝。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凡一軍一切生死黜陟等事，軍帥詳監軍；監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帥，軍帥奏大王；天王降旨，軍帥遵

行。功勳等臣，世食天祿！其後來歸臣者，每年每家設一人爲伍卒，有警則首領統治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爲農，耕田奉尙。」

觀此，則太平天國的革命，已經澈底的變更了農村的組織，即參加生產的農民與革命政權的聯系是非常的密切，過去人們說『寓兵於農』制度，中國歷史上祇有太平天國才澈底的實行了牠。

關於土地分配的情形，在當時是採取斷然的手段，無情的沒收了豪紳地主的土地，并把牠加以公平的分配，也可以說牠是澈底的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如依照太平天國的規定，則：『凡男婦每人自十六歲以尙，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一半，如十六歲以尙分尙尙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尙尙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尙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下下田一畝五分。』這一革命對於土地分配的原則，并將所有的土地區爲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爲尙尙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爲上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爲尙下田，可出九百斤者爲中尙田，可出八百斤者爲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爲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爲下尙田，可出五百斤者爲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爲下下田。尙尙田一畝，當尙中田一畝一分，當尙下田一畝二分。當中尙田一畝三分五釐，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釐，當下尙田二畝，當下中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

醜田，好醜各一半。其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

像這樣土地分配的原則，在當時是多麼公平啊！貧苦農民之所以太平天國拼命，實際上就是擁護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這個土地問題的解決，無怪乎要氣死中國的地主官僚！

第二，當時的經濟政策，亦是非常的適當，在最初，牠差不多染遍了共產主義的色彩：『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飽，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匀，無人不耕爰也。』同時，牠對於農村經濟復特別的注意，在最初期爲的是要救護革命的政權，於是乎便採取軍事共產主義，如『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織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芋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

但是，到了第二個階段，軍事共產主義的思想，已經不能從市場影響之下解放出來，換句話說，這個時期的生產力還沒有適應共產主義的階段，如果再繼續這種超時代的冒險政策，其結果對於革命的建設會有很大的危險！於是乎這個革命政府——太平天國，便馬上回過頭來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因爲當時的革命，在生產的破壞與飢荒的恐嚇之下，祇有這條道路才是光明的前途。

既然從軍事共產主義轉變到國家資本主義，關於農村經濟以及商業的整理，實是必要的任務；對

於生產者的獎勵政策亦復異常的重視，如「凡二十五家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從獎勵的事實中間，我們就可以看到太平天國農業經濟上升的趨勢。其次，太平天國的商業亦有大規模的進展，國家依照商人財富的多寡，來規定比例稅額。因此，商業的發展在太平天國時已很快的完成了，我們從以下幾個最主要的輸出商品出口數目字來證明它：

在一八五〇年——五一年，即太平天國開始發動的一年，中國輸出的茶，組成五七六百萬磅；在一八六〇——六一年，即在太平軍佔領了產茶區域以後，輸出的茶，等於八七二百萬磅，在第二年關與茶的輸出，竟達到一〇七四百萬磅。及在太平天國最後的一年，即一八六四——六五年，茶的輸出量已增加到一二二百萬磅。舍茶而外，就是絲的輸出，也是逐年增加，在一八五〇年——五一年，牠的輸出不過是二四〇〇〇捆，在一八五九年——六〇年，太平軍佔領產絲區域以後，絲的輸出額已有六九〇〇〇捆；迨至一八六二年時候，其輸出額竟增加至七三〇〇〇捆。可是在太平天國夭亡的一年，絲的輸出量驟降至四一〇〇〇捆，而使正在發展的中國經濟，忽又中途停滯不前。

至於政治上的建設，那更是開中國過去一切革命史上的新紀元。例如他們的官吏都是從人民中間選舉出來的，沒有什麼卑鄙的賄賂和陰謀的篡奪，他們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一直到現在，還是萬丈光芒而永垂不朽！其最重要的地方如：

「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則例其行蹟，註其姓名，並自己保舉姓名於卒長；卒長細核其人於本百家中；果實，則詳其人并舉姓名與旅帥；旅帥細核其人於本五家中，果實，則尙其人并保舉姓名於師帥，師帥實核其人於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實，則尙其人并保舉姓名於軍帥，軍帥總核其人於本軍中，果實，則尙其人并保舉姓名於監軍；監軍詳總制，總制次詳將軍，侍尉，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帥，軍帥啓天王；天王降旨調選天下各軍所舉爲某旗，或師帥，或旅帥，或卒長，兩司馬，伍長。凡濫保舉人者，黜爲農！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爲農！當陞貶年，各省首領各保陞奏貶其統屬：卒長細核其所統屬兩司馬及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其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至若其人無可保陞，并無可奏貶者，則姑置其人不保不奏也。旅帥細核其所統屬卒長及各兩司馬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詳其人并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師帥。師帥細核其所統屬旅帥以下官，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并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軍帥將師帥以下官所保奏陞貶姓名，并自己所保奏陞貶某官姓名，詳於監軍。監軍並細核其所統軍帥，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姓名

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並細核其所統監軍，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奏陞貶姓名，一同舉於將軍，侍衛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將各命欽總制及各監軍及各各軍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各姓名，直啓天王主斷。」

政治組織既然有這樣的民主精神，那種官僚化的傾向不成問題的是會一掃而空！我們看這革命政府對於官僚化的防範是怎樣的嚴密呵，如：『天王乃降旨主斷，超陞各欽命總制所保陞各監軍，其或陞爲欽命總制，或陞爲侍尉；謫遣各欽命總制所奏貶各監軍，或貶爲軍帥，或貶爲師帥；超陞各監軍所保陞各軍帥，或陞爲監軍，或陞爲侍尉；謫遣各監軍所奏貶各軍帥，或貶爲師帥，或貶爲旅帥卒長；超陞各軍帥所保陞各官，或陞尙一等，或陞尙二等，或陞軍帥；譴責各軍帥所奏貶各官，或貶爲下一等，或貶爲下二等，或貶爲農。天王降旨，軍帥旨丞相，丞相宣檢點，指揮，將軍，侍尉，總制；總制次宣監軍，監軍宣各官，一體遵行。監軍以下官，俱是在尙保陞，奏貶在下。惟欽命總制一官，天王准其所統各監軍保陞奏貶。欽命總制，天朝內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尉諸官，王天亦准其上下不時保奏陞貶，以剔上下相蒙之弊！至內外諸官，若有大功大勳，及大奸不法等事，天王准其上下不時保陞奏貶，不必拘陞貶之年。但凡在尙保陞奏貶在上，誣，則黜爲農！至凡在下保陞奏貶在尙，誣，則加罪！凡保陞奏貶賢惡蹟，總要有憑據，方爲實也。』

至於談到太平天國的司法行政，那更是有條不亂，他們在某些行動上彷彿是天王集權，而其實的確是『民主集權』。如它的司法和行政制度是：『各家有爭訟，兩造赴兩司馬，兩司馬聽其曲直，不息，則兩司馬挈赴兩卒長，卒長聽其曲直；不息，則卒長尙其事於旅帥師帥典執法及軍帥，軍帥會同典執法判斷之，既成獄辭，軍帥又必尙其事於監軍，監軍次詳總制，將軍，侍尉，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命軍師，丞相，檢點，典執法等，直啓天王主斷；或生或死，或子，或奪，軍師遵旨處決。凡天下官民，總遵守十款天條，及遵命令，盡忠報國者，則爲忠；由卑陞至高，世其官。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爲姦；由高貶至卑，黜爲農民！能遵條命及力農者，爲賢爲良，或舉或賞；民或違條命及惰農者，則爲惡爲頑，或誅或罰！』

像這樣的賞罰分明，陞貶得當的行政系統，求之現在，亦屬不能多得。復次，他們的農村合作運動，亦是獨開生面，與那些借合作名義以欺騙農民的政府，實有霄壤之別呢！如其所說：『兩司馬存其錢穀數於簿，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聚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聚彌月喜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以伍卒爲之，農隙治事。』

其他，如對於教育工作，亦是異常的注視，在一般農村中間是：『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及真命詔旨書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至於在軍隊中則更注意於政治教育的執行：『凡內外諸官及民，每禮拜日聽講聖經，虔誠祭奠禮拜，頌贊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其所統屬兩司馬禮拜堂講聖書，教化民，兼察其遵條命與違條命及勤惰。如一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至其兩司馬禮拜堂，第二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又別至某兩司馬禮拜堂，以次第輪，週而復始。旅帥卒長亦然。』

綜結起來說，以上各點，便是太平天國革命建設的模型，那些士大夫們的造謠與中傷，誣護和污辱，都不足以障蔽其光芒：——『有田同耕、有飯同吃』。牠可以說把私有制度揚棄到九霄雲外了！而土地之澈底的瓜分，更是中國農民革命史上大書特書的一筆；凡是太平革命勢力所及之處，到現在我們還不多見什麼佔有五萬畝以上的大地主啊！而關於男女的平等，他們提倡得最力，在經濟和政治的地位上，女子與男子可以說是完全平等。

（註）凡是這一節有『』標記而未加（）括弧者，都係著者從世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三五頁至一四一頁天朝田賦制度

一文轉引的。

第五節 反革命的聯盟與太平天國的夭亡

太平天國政治經濟的建設，既然如此偉大，爲什麼又會被統治階級撲滅呢？這問題的答覆，實有說及反革命聯盟的必要。當時站在革命方面的，除掉被壓迫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而外，那最前進的革命的階級還沒有形成；而反動的營壘裏，上至國際帝國主義，下及地主階級，中間還包括了商人和高利貸資本，貴族與官僚，他們對於革命的反動，已經結成了一個鞏固的同盟。

這一反革命聯盟結成以後，經過滿清政府的手，耍出了許許多多摧殘革命的魔術：第一，牠獎勵地主創辦屠殺農民的機關——「民團」，並企圖以「官半爵」的手段去分化和收買農民的上層，如：

「逆匪負固金陵分竄揚鎮豫皖，疊陷城池，狡譎兇殘，神人共憤；方其初竄浦口，不過一二人，……乃沿途裹脅，擄掠資財，焚燒房舍，滁鳳蒙毫之間，被其蹂躪。……惟該逆挺而走險，飄忽靡常，所過地方居民人等，或因猝不及防，紛紛遷徙，轉遭荼毒，是避害而實以罹害，何如自相保衛，奮勉圖功乎？本年正月特降旨諭令各省，仿行嘉慶年間擊壁清野之法，旋諭中外大員，各舉所知，襄辦團練。……當此逆氛未靖，必有忠義勇敢之士，奮跡草茅，建奇功而膺懋賞者，如從前楊遇春楊芳等，均起自鄉里，致爵通候，比年廣西湖南等省紳民團練勦賊，無不立予恩施，即如幫辦軍務之湖北

臬司江忠源，亦以居鄉勇團練屢著勞績，超擢監司，可見練勇之中，人材輩出。凡爾士民，同茲觀感；至北地民風，素稱驍勇，安徽河南山東江南交世地方，不乏奇傑之材，能爲民禦災捍患者，其有自備資斧，募勇投効軍營，殺賊立功者，統兵大臣卽覈明該士民等募勇名數，立卽奏請優獎，或給官職，或給翎支勇號，以爲急公嚮義者勸，其在本籍團練，保衛鄉閭，一過賊匪竄至，卽行合力殲擒，則禦捍之功亦與効力行間同其賞賚，地方官吏仍不得擅行徵調，致令邊地弗良，如此實力奉行，以兵衛民，卽使民自衛，俾賊進無所掠，退無所據，散其黨與，殲厥渠魁，烏合之寇，不足平也！至從前被脅之徒，或以驕橫，給怨里黨，或以桀驁，誤蹈刑章，若能勦賊自效，卽可立荷恩施，如張國樑之泅擢都司，張鳳山等之給賞頂帶，明徵俱在，卽或先被賊誘自拔來歸，但能改過自新，亦可同邀恩典！……』（十朝東華錄咸豐卷二十三第十二頁）

至於牠的第二套魔術，便是編練地主階級的軍隊。關於此種軍隊編練的全權，完全責之於曾國藩和李鴻章二人處理：『……至各鄉團練，原因保衛身家，如果得公正紳民，立法盡善，不特鄉里平日賴以安輯，一旦有事，并可協助官兵，翦除匪類，卽如長沙城外賊匪竄逸之時，白箬鋪一帶鄉勇民團俱能殺賊！著該督撫等……會同在藉侍郎曾國藩體察地方情形，應如何設法團練以資保衛之處，悉心妥籌辦理。』（同上書卷十九第一頁）當時地主階級新練的軍隊，在兩湖一帶有所謂『湘軍』，在江

蘇，浙江，安徽一帶又有所謂『淮軍』。這些軍隊，都是新練的勁旅，并有帝國主義的新式軍械作他們的後盾。

第三，帝國主義對於太平天國之直接的摧殘，是這次大革命夭亡的主要原因。當時江蘇的上海，已經形成了中國經濟的中心，因為內地受軍事的影響，各重要商業城市均有金融停滯之感，而上海則商賈輻輳、關稅的收入，幾十倍於往昔，很多豪紳地主都依洋人爲護符，視租界等於安樂窩。蘇松太道——吳煦，復跪在帝國主義的面前，要求英國的軍官華爾者，編練『長勝軍』，當然，英國是痛惡中國人民的革命，對於反動政府之鎮壓人民的反抗，他也是願意幫忙。以後，李鴻章之來上海，拚命的集中金錢，將所有的稅收機關都拿在手裏，每月的稅款的收入，竟有五六十萬金之多；他以這些大批的金錢去租用帝國主義的軍艦和去購買新式的槍砲，復敦請法國人白齊文和英國人戈登爲『淮軍』高級的軍事指揮。因此，兵精械銳的反革命的軍隊，不僅攻下了蘇州，並且，還切斷了南京和杭州之間的聯絡；最後，統治階級以全力來摧殘革命，那偉大的太平天國受着主觀的和客觀的環境的限制，也就從此失亡！

太平天國，很顯然的，是帝國主義與中國統治階級結婚的第一個產兒，也可以說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幅；牠的偉大，不僅是建立了政權，不僅是支持了十數年之久，而是在牠推翻了商業資本

和封建殘餘的賄賂法庭，取消了中世紀的笞刑，取消了普遍全國的中世紀的奴役制度的殘骸，解放了婦女，使她們在生產關係上及土地享用上與男子一律平等，實行了澈底的土地革命，把所有的土地（連豪紳地主的在內）都收歸國有，并企圖消滅人和人之間的剝削，而建立了一個全民的德謨克拉西的國家。所有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國過去革命史上所罕見的行動；然而這個少年的太平天國——土地共產公社，牠的滅亡，除掉了當時的生產關係——（生產技術的落後和普羅塔利亞特正在形成）阻窒牠而外，帝國主義的摧殘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帝國主義者感覺得這個少年的太平天國——土地共產公社的存在，將要澈底的動搖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的特權，牠們站在侵略殖民地利益的立場上，不得不和中國一切的剝削階級聯盟，以這樣一個很大的力量，所以這一歷史上偉大的產兒——太平天國竟在牠們的面前活活的絞殺！

『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這是中國人之分析歷史的直覺的觀念，他們根據這個觀點出發，即所謂『粵賊』與『髮匪』實是很自然的邏輯！然而是非常有定評，公理自在人間，那暫時的雲霧，終不能掩蔽照遍全球的太陽！我們看社會科學的始祖——卡爾·馬克斯是怎樣的評論太平天國罷！

第六節 馬克斯論太平天國

偉大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始祖——卡爾·馬克斯，他不僅在歐洲與國際資本主義作思想上的肉搏戰，并且很早以前已經注意到國際帝國主義侵入中國而引起中國的革命，以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聯系了。帝國主義侵入後的中國初期革命——太平天國的革命，在當時曾引起馬克斯熱烈的同情和精確的分析；牠在中國革命與歐洲的一篇論文中，首先便說明中國革命對於世界革命的影響：

『兩極相遇，是不是那樣一個普遍的原則，我們且不必論，但這個原則的顯明的表現，是可以從中國革命之將影響於所謂文明世界的結果上看出來的。說歐洲人民的未來暴動與其爲共和自由及政府經濟的未來運動，其關係於現在所經歷於此之天朝帝國者，將遠勝於現存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亦且遠勝於俄羅斯的威脅，以及從而發生的全歐戰爭的可能性，這似乎是奇妄的推論；但是並沒有什麼奇妄，只需詳細考察這件事實，就可以明瞭了。』

這些預言，完全爲後來的事變——一九一四——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證實，證實了牠不是奇妄之談。他對於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之客觀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原因，曾加以有力的說明：『不管什麼是牠的社會原因，不管什麼是牠的宗教，朝代，民族的形式，總之，牠產生了慢性的變亂，過去存在於中國的已有十年，現在匯合起來，成爲一個可驚的革命。牠的爆發的機會，毫無問題的是那強制輸入名爲「鴉片」的麻醉毒物於中國之英國大炮所賜與的，在英國炮火之前，滿洲皇帝的權威，掃地

無餘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完全打破了；封鎖的門戶及未曾與所謂文明世界接觸的孤立，驟然被侵入了；東西交通的開發，從此以後，在加利佛尼亞州與澳洲的黃金引誘之下，很快的進行。同時這個帝國的金錢，——牠的生命膏血——開始流入於大英帝國的東印度了。」

「一八三〇年以前，中外貿易的差額，中國方面還站在有利的地位。銀貨不斷的由印度，大不列顛，北美合衆國輸入於中國。一八三三年以後，尤其是一八四〇年以後，則銀貨由中國到印度的輸出，幾乎耗竭了這個天朝上國。於是中國皇帝嚴令禁止鴉片貿易，但是所得到的答覆，是對於牠的法定給以更強力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經濟結果以外，有關於鴉片秘密買賣的賄賂風行，完全腐化了中國南方各省的國家官吏的綱紀。假如把皇帝看成全國的父親，皇帝的臣僕就看成對於各該屬縣邑的維持親屬關係者。但此維繫國家全局之唯一的道德的綱紀的父權，逐漸爲默許鴉片密運因而自飽私囊之官吏腐敗所蝕毀了。這種情形，在發生變亂的南方各省，數見不鮮，鴉片遂適如其分的獲得宰制中國的主權，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僕，也已喪失其所有主權了。這似乎是歷史在牠把中國全民族從其傳統的昏瞶中拯救出來以前，使他們沉醉一回似的。英國棉織物的輸入，從前幾乎沒有，英國毛織物的輸入，也只有少許。至一八三三年以後，二者之輸入於中國，是很快的增加，此時爲東印度公司轉移對華貿易獨佔爲私人商賈的時期。至於此等物品之大規模的輸入中國，乃在一八四〇年以後，此時爲

其他各國，尤其是我們自己的國家（美國），各在中國獲得一份貿易的時期。這外國機製品的輸入，其影響於本地的產業，猶之乎牠從前影響於小亞細亞，波斯，印度一樣。在外國競爭之下，中國國內的許多紡織者，都遭遇很大的犧牲，而社會生活，也隨着外貨侵入的程度，呈出不安的景象。」

「一八四〇年的不幸戰爭（鴉片戰爭）以後，賠款必須付給英國，那鉅額的，不生產的，消費的鴉片，隨着鴉片貿易而生的貴金屬的流出，外國競爭對本地製造品的不利的影響，公共行政情形的腐敗，產生了兩件事：更加重賦稅，又增設新稅。這樣，在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由北京所簽出來的皇帝上諭裏面，我們可以知道有頒給武昌，漢陽等處以及南方各省督撫的上諭，命令他們減輕或延緩人民的納稅，尤其是無論如何不准有逾額的苛取。上諭上說：假如不這樣，則「貧若人民，將何以堪？」又說：「則當舉國艱憂之時，如此，則吾民或能免於苛吏誅求之禍矣。」這樣的辭令和這樣的寬假，我們猶憶在一八四八年時從奧地利聽見過，那是日爾曼的中國。」

「所有這些匯合起來，從中國的財政，道德，產業及政治構造而躍動的崩潰之動因，在一八四〇年的英國火炮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這個炮火，打落了滿清皇帝的威靈，強迫這天朝上國來與遠鄰之邦相接觸。老大中國所要保持的原狀是完全孤立，必須依着英國的媒介，才強制的終結了這個孤立。分解是必然隨之而起的，猶如謹藏在封固的棺材中的木乃伊一樣，不論何時，一經與空氣接觸，

就要立即分解的。現在英國已經造成了中國的革命，問題是那中國革命如何的遲早要反響及於英國，經英國以及於歐洲，這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依照馬克斯的分析，則太平天國的革命，其主要的原由是受帝國主義侵入的刺激，換句話說，這一個革命完全反映了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爲什麼這次革命影響及於全歐洲呢？馬克斯他是從經濟的變動上去說明這點，他說：「一八五〇年以後，讀者常被喚起注意及於英國製造品之不平行發展。在那最可驚的繁榮中間，不難逼近於產業危機的那顯明徵兆。雖然有加里佛尼亞州同澳洲，雖然有未曾聞聞的浩大的移民出境，假如無任何特殊的事變，在一個相當時期，遲早總有一天，市場的擴張不能與英國製造品的擴張一致。這種矛盾，必然要造成一個新危機，其確定殆與過去所曾經歷者完全相同。但是假如大市場之一，忽然縮變狹小，那危機之到來，還要因之而加速。目前中國的變亂，完全有及於英國的這個影響，開闢新市場或擴大舊市場之必要，是英國減低茶稅的主要原因之一，期於以增加茶的輸入，來謀對華增加製造品的輸出。現在每年由英國輸出中國的價值，在一八三四年，東印度公司享有的貿易獨佔權廢制以前，總額只六〇〇，〇〇〇磅，一八三六年達一，三二六，三八八磅，一八四四年增至二，三九四，八二七鎊，至一八五二年，則約達於三，〇〇〇，〇〇〇磅了。至於由中國輸入於英國的茶葉的總量，在一七九三年，尚不出一六，一六七，三三一兩；但在一八

四五年，則達於五〇，七一四，六五七兩；一八四六年，則達於五七，五八四，五六一兩；現在（一八五一——一八五二）已超過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兩以上了。上季的茶的收穫額，超過前年（一八五〇）不下二，〇〇〇，〇〇〇兩，已經爲上海的輸出表所明示了。這個超過，可以由兩個理由來說：一方面是一八五一年終的市場狀況，較爲低落，剩餘下來的多量的過剩物品，移入於一八五二年的輸出；另一方面是那變更茶輸入的立法的近頃的報告，傳到了中國，使所有的有利的茶，都以極貴的價錢，上了預備市場。但是關於來季的收穫，則情形大異了。這可以從倫敦某大茶莊的通信中，摘錄下列的語句來證明：「在上海，危機已達於極點。金價漲了百分之二十五，銀貨的缺乏，至於使商船對於中國應付的出港船鈔，一點也不能夠付出。因此，阿爾可克對於這應交付中國官吏的船鈔，同意於以東印度公司的票據或其他認可的担保品爲質。設若着眼於商業的最近的將來，則金貨之缺乏，乃爲最不利的景象之一。因此種空虛，適值於金貨使用的最需要的時會，以致影響於深入內地的絲茶購買者的購買，蓋此等購買，須以正在騰漲的金銀塊爲付價，而那些絲茶生產者遂得以盡其操縱的能事。歷年此季，開始收買新茶，習以爲常；可是現時除去保障人身與財產的方法而外，什麼也談不到。一切交易都已停頓，……設若在四五月中不能應用那些保護茶葉的方法，則這包含一切良種在內的紅茶，綠茶之早期的收穫，將同爲在復活節尚未成熟的小麥一樣的損耗。」現在保護茶稅的方法，

不一定是英，美，法等國的艦隊駐在中國海中可以給與的。可是因為他們的干涉，這却很容易產生一種糾紛的情形，如像切斷產茶內地與輸茶海港間的一切交易；如此，則於現在的收穫，是可以預期一個價格的騰起的（投機已經在倫敦開始了）。對於這次季的收穫，也可以同樣的確定是一個大缺乏。而且，中國人也同革命震動的時期中的一切民族一樣，雖然準備將他們手中那一切笨重的物品，賣與外國人，而又如東方人在大變動的恐怖中所作的那樣，要把所得的置之埋藏。故於絲茶的取償，除硬貨的貨幣外，其他多不願收受，於是乎英國可以預期牠的主要消費品之一的價格的騰漲，金銀貨的流出，出售牠的絲毛織品的一個重要市場的縮小，即是那威脅商業社會沉靜精神的事物的樂天咀咒家的「經濟家派」，也不能不作如下的語句了：「我們不要自信覺得一個為我們輸出品去到的中國市場，其廣大一如往昔。我們對於中國的輸出貿易，將遭蒙損害，滿切斯特及格蘭斯哥的生產，將有一個減少的要求，這是可能的。」……」

因此，馬克斯更說明因由此種矛盾而產生的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聯系以及帝國主義幫助滿洲政府去消滅中國的革命：

「在這種情形之下，因為普通商業範圍的大部分，已為英國的商業所盪盡，我們很可以穩妥的卜知中國革命將擲其火星於現在的產業制度積載過多的地雷上，而引起長期準備的總危機的爆發。緊接

這個廣布於海外的總危機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中國送來騷亂於兩方世界，而兩方列強方面由英，法，美的戰艦載着所謂「秩序」到上海與南京去。這是一個偉壯的奇觀。這些將要援助那種動搖的滿洲帝統的秩序的販客的列強，忘記了對於外人的仇視，並驅逐外人出此帝國，從前只是中國之地理的，人種的，位置的單純結果，而自滿洲韃靼征服此邦以後，纔成爲政治制度了嗎？在十七紀末，那互相競爭與中國通商歐洲各國的紛爭軋轢，給了滿洲所行的排外政策一個很大的助力，是明顯無疑的事實。此外這個新朝，因恐外人將左袒那被征服於韃靼的中國人民上半世紀間在大多數華人間存在的不平，而促其採行排外政策也更烈。根據這些顧慮，當時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許與華人交通；外人只准經由一個離北京及產業地方很遠的都市的廣州，與英人通商，而外人的通商，又只限於與行商的交易。行商是政府特許公開的從事外國貿易的商人，爲的是使其餘的人民得以避免與那可憎的遠人的接觸；無論如何，西方各國的政府對於中國的干涉，此時只能使中國的革命更加猛烈，更加延長商業的停滯而已。……』

最後馬克斯更說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環和世界革命之必然不可避免的到來，以作他論太平天國革命的總結：

『自從十八世紀以後，在歐洲的激烈的革命，沒有不先朕兆以商業，財政之危機者。證之於一七

八九年革命及一八四八年革命，此理殆全符合。這是實在的，不僅我們每天看見那些統治階級的權力者與其人民間，國家與社會間，各階級間，其矛盾之尖銳的徵兆，日益加甚，便是各強國家間現存的矛盾，亦似乎將要達到圖窮匕見的程度，最後談判的機運，亦且若隱若現了。在歐洲各國的都城中，每日都有關於普遍大戰的飛書相告，一到次日，此等消息又復消滅了，似乎又有半星期的和平的保證了。雖然，我們的確知道，歐洲列強間的衝突可以達到無論如何的極度，外交界的情形，可以顯出無論如何的危迫，由於此國彼國的多少狂熱的黨派，可以企圖無論如何的運動，可是那些王公的忿怒與人民的憤慨，都一樣的被那繁榮的呼吸銷沉下去了。戰爭與革命，都一樣的不能令歐洲爭鬧起來。除非牠是一個普遍的商業，財產之危機的結果。這個危機的信號，與尋常一樣，必要發自英國，牠是世界市場中歐洲產業的代表。注意政治的關係，是不必需的，就以英國工廠有未曾前聞的擴張，英國的公開政黨全然瓦解，法國的全部國家機關，變成了廣大的詐騙投機買賣的商行，奧地利的財政瀕於破產，到處都是招人民仇恨的層層疊疊的錯誤，反動列強間的利益衝突和那曾經一度顯露於世的征服世界的俄羅斯的迷夢，這等事實看來，在這樣一個時候，那個危機，必然產生。』

我們從馬克斯這篇文章中間，很顯然的可以看出中國之未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並且，牠還指示這個運動的途徑，即是說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一系起來，這是中國革命之標本的模式，凡是中國革

命的戰士，應該加以深切的注意和了解。

此页空白

第五章 義和團

第一節 義和團的形成

帝國主義既然積極的幫助了滿清政府消滅了太平天國的革命以後，於是乘滿清政府的昏聩更加緊的剝削中國，使整個中國民族屈伏在他的鐵蹄之下，任憑他們的宰割；可是中國的民衆并不是懦弱的馴羊，并且，其反抗的程度是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成正比例的發展。

『義和團』的運動，便是中國初期反帝國主義運動發展的最高形式。

關於義和團的運動，無論帝國主義者怎樣的罵牠爲野蠻，或者稱牠爲『東方』的『黃禍』；無論中國的士大夫們怎樣的咀咒其爲『拳匪』，或者攻訐牠爲『叛逆』與『暴徒』；但牠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反帝國主義的價值，并不因受了革命敵人的一切咒罵而降低，反之，中國和全世界千百萬勞苦羣衆却授牠以光榮的聖圈！一切的義和團運動的敵人：從國際帝國主義者以及至於中國的豪紳官僚，他們都是異口同聲的向這運動狂吠，說義和團是人類的公敵；其實，他們把義和團形成的真實的原因隱

藏起來而不肯加以說明，因為如果說出了這些原因，那麼他們所得到的結論就會反對自己。

什麼是義和團形成的原因呢？

在十九世紀的末年，國際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的政策，已經是很露骨的代表出來了；尤其是中日戰後（一八九四——九五年），帝國主義者之殘酷的剝削中國，真有一日千里之趨勢；在帝國主義之猛烈的經濟的軍事的侵略之下，更加造成了廣大農民羣衆生活的破產和痛苦。像這樣的滿清政府的統治，與所謂『洋鬼子』的侵略和剝削，的確都是促成義和團的農民暴動的動因。義和團的發源地——中國北部，是一大平原，在這個平原上居住的大部份人口是農民；其農村經濟狀況主要的是缺乏土地！如當時的山東農村經濟是異常的凋殘，就土地面積與戶口的衡比而論，平均每家約佔三十畝的土地，可是這種統計是連地主的土地計算在內，假使牠們分別開來，那麼，實際上每人所得的土地祇有一畝至四畝的程度；然這不過是指中小農家而言，至於那些廣大的貧農，是早已失掉了土地。在此種情況之下，農民們感覺土地的缺乏，不僅是普遍的現象，而其勢亦復不可終日！至於地主們的兇殘剝削，地方政府的強征暴斂，高利貸者的重利盤剝，使農民的負擔更加繁重，彷彿和千斤的石頭壓在他們的身上一樣，真是彈動不得啊！

許多的歷史家告訴我們說：『山東北部，田不肥沃，地價昂貴，糧食不足，須向他省採辦！……』

我們從這些歷史家的說話當中，很可以看出山東的地瘠民貧，農村生產的降低，糧食缺乏等等。所以有許多的農民除了耕種自己的土地而外，還要到城市中去充當苦力，或者作手工業的工人；因為祇有依靠這些副收入，方才能夠維持其簡單的生活。甚至，還有很多的農民沒有地方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兩手空空過着那流蕩的飢寒交迫的生活。

山東的商業資本是很發達的。在商業資本發達的反面，便是農村經濟的破產，因此，山東的農民生活狀況是特別的窮困。據許多調查山東經濟情況的人們的報告，說：「北京以及直隸省之東南兩邊，一切店鋪，糧食舖以及當舖，都在山東人手裏。山東河北部的抵押店（即當舖），也是在山東人的手裏。……」所有這些報告，更確切的證明了商業高利貸資本統治山東的經濟。加之連年的水旱天災，如黃河渤海的水勢時常泛濫，使農民的生活狀況愈趨於低下；而另一方面如城市手工業者和人（他們中間主要部份的人是在手工作坊和礦山裏做工的）的生活情形，亦未見得優於農民，甚至比農民的生活還要痛苦，如其從早到晚的不見天日的工作時間，低賤的工資，使他們更做了資本家的奴隸！中國東北部的許多煤礦，自被帝國主義開採後，那新式的大規模的重工業的機器，將中國內部的許多的舊式的採煤的工業破壞了。

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京津鐵路築成以後，把白河一帶從天津通州的大批的帆船生意都搶去了；這

一交通的利器——資本主義的功臣——鐵路的敷設，事實上是打碎了北方水運工人的飯碗，使許多水運工人從此以後都因無處出售勞動力而失業。並且，除了水運工人因此失業而外，鐵路更將從天津 通州運貨到北京的陸運工人攆到失業悲慘的境地，而使他們叫苦連天！至於電報的創辦，復使那傳達緊急消息的驛站走卒成爲博物館裏的古董而不復需要了。

除了上面所講的因國際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而影響到羣衆的經濟生活外，再加上中日戰爭的失敗，諾大的鉅額的賠款的担負，又要加到每個中國人的身上——特別是農民的身上來了。當時賠款的總額，共達二萬萬兩，其償還方式則分爲八期：第一期爲五千萬兩，於定約後六個月內應行償還；第二期的數目仍如上額，於定約十二個月償清；第三期的償款則爲一千六百萬兩有奇，於定約後兩年內償還；第四期的償款數目同上，惟於定約後三年內交清；第五，六，七，八各期的數目與以上一律，不過須於定約後四，五，六，七年分期償清。

滿清政府於償還日本賠款的時候，因無現金支付，不得不向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借款；因此，由於「甲午」之役所發生的外債，竟達六萬四千萬元之鉅；茲將因中日戰爭及其失敗賠款的借款數目列如下表：

款名	額數	借款年	年	息	折	扣	期	限
匯豐銀款	一千萬兩	光緒二〇年		七釐		九八		二〇年
匯豐金款	三百萬鎊	光緒一		六釐		九八		二〇年
俄法洋款	四萬萬佛郎	光緒二一年		四釐		八分四〇		三六年
克薩磅款	一百萬磅	光緒二一年		六釐		九五		二〇年
瑞記洋款	一百萬磅	光緒二一年		六釐		九六		二〇年
英德洋款	一千六百萬磅	光緒二二年		五釐		九四		二六年
續借洋款	一千六百萬磅	光緒二四年		四釐		五八三		四五年

我們看了上面這些數目字的外債，關於義和團之反抗帝國主義運動的爆發，是不難了解的。

同時，那高唱『西歐文明』的『和平』的傳教師，就是帝國主義派遣到中國來的爪牙。一切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牠固然是人類精神上的鴉片，而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牧師，其實際的作用，的確是等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棉花。有一個近代的作家，在他的義和團事件的紀載中，曾很忠實的描寫這班

教士們在中國的行動：『密佈在中國各地的天主教和耶穌教的教士們，袋子裏藏着大批的金錢，一開始便收買中國人民中間的無賴份子，這些份子並不是因為了信仰耶穌教和天主教而受洗禮，實是爲了要獲得教士們的賞款以謀其苟安的生活；而教士們亦祇以洗禮者人數之增加，而不問其實量的優劣如何。他們又不問所採取的方法是否正當，祇是濫支一切，來者無拒，對於這般新收的信徒，總是寬洪大量的臨時的或經常的發給金錢，而這些信徒也慢慢的學會了教會內的各種規矩，實際上對於基督教義，還是莫明其妙！這班信徒看見了教士，都裝做很有禮貌的樣子，一出教堂門，他們馬上便改頭換面，祇要飽己私囊，便無所不爲了！……甚至有許多犯罪之徒，爲要護得教堂之有力的祖護，以避地方政府的刑罰，所以也就進教了。有時還可得外國公使館的幫助，深藏於公使館中；因爲地方政府的命令不能及於公使館之門，如此便得以免刑。教會的此種行動，在中國社會上勞動民衆看來，何等可恨，真是信仰墮地了！同時，這教的人，在道德行動上是異常的低賤和卑下，所以社會上一般人們不僅不信仰他們的宣傳，並且還仇視他們。……這樣一來，社會上漸漸形成一種輿論：「好人不進基督教！」……」（見羅得克夫著義和團記）

因此，反基督教的運動——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一八九一年已經發生了，那殺「洋人」的事，一年之中，曾有十次之多，一八九二年，又有兩次殺「洋人」的案件，到了一八九三年，這一運

動已經是蔓延了整個的中國。

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的經濟恐慌，便是義和團運動爆發的直接因素。這幾年中間，中國的北部，遭到非常劇烈的旱災，連年的飢荒，使農民們以樹皮草根和觀音土來代替食料，因此，那飢餓怨恨之聲，普遍了整個的中國農村；米價昂貴，超過尋常數倍，這種恐慌，真為空前未有的現象。當時不僅在江蘇發生了普遍的搶米風潮，同樣的在安徽也發生掠取官鹽和強奪鹽棧的舉動；於一八八九年又復遭受了很利害的水患，這水患的結果，不僅使人畜淹斃，並且使廬舍蕩然，而避難的人民，差不多是觸目皆是，所以民衆的騷動，也是愈趨愈熾，大有不可遏止之勢！關於這一次水患之影響於農村經濟，據調查統計所得：淹沒了一千五百基羅米突的土地，淹死了十六萬五千的人口。

中國北部的農民羣衆，除了因上述的諸種原因而發生可憎的怨恨外，帝國主義在北方的侵略與剝削更使他們切齒痛恨而發生敵愾同仇的感想！例如在中東路建築的時期中（即一八九八——九九年），曾發生兩次嚴重的騷動，將沙俄政府所設丈量中東鐵路及其沿鐵路兩面附屬土地面積的『土地局』都攻毀了，把築路的技術人員——如工程師一類的東西概行加以驅逐，當時所發生廣大的反基督教的運動，便是這一些事變的總和。

然而，結果竟引起歐洲人以武力來對付中國，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在山東膠州地方，殺死了兩個

德國教士（據拉狄克說是德國當局以金錢賄買中國人作此種舉動，以便有所藉口——著者），接着又發生許多新的衝突；而德國政府的威廉皇帝，竟乘此千載難逢的機會，在保護僑民的漂亮的旗幟掩蔽之下，以武力將膠州灣佔領了：屠殺成千成萬的農民，焚毀了無數的農村！在這樣一種新的轉變和新的環境之下，中國北部的農民，爲挽救迫在眉睫的災難，不得不開始組織各種農民的原始的組織以對抗外來的敵人，而有名的義和團的運動，亦從此呱呱墮地了！

第二節 義和團的組織

在義和團（亦稱『義和拳』）運動公開的爆發以前，這一種組織於中國北方已經是很普遍的發展了。據羅惇融說：『義和拳起嘉慶時，民間私相傳習，其時禁令嚴切，犯者凌遲死，燕齊之間，猶有祕傳其術者。光緒庚子，毓賢爲山東巡撫，民間傳習義和拳，以扶清滅洋爲幟。時各省多鬧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亦憤，聞滅洋說，爭鼓吹之；義和拳自山東蔓延於直隸，聚衆稱義和團。……』（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第五一七頁）不過，關於義和團的組織內容，這種說法未免是略而不詳，因爲在義和團的總的名稱之下，還包括了許多不同的小組織：

（一）在禮教——即所謂『禮門』。加入這種組織的須遵守他們的教條，即是說要有：『正心修

身，克己復禮』的觀點；牠的目的主要的在誓不吸食從外國運來的鴉片及飲酒等等，其所崇拜的神則爲什麼『觀音老母』。自言熔所謂『儒佛道』三教於一爐，即是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習儒教之禮，在北方一帶，聲勢甚爲雄壯。

(二)保國會。這個團體主要的任務是保清滅洋，構成這一組織的份子，還有大批的安清幫徒。

(三)殺鬼會。他們認爲外國人完全是『洋鬼子』；『洋鬼子』現在來擾亂中國，我們是必須加以殺戮。

(四)沙鍋照。沙鍋照者，『人挾一鍋，遇拳民戰時，析薪浙米，炊飯饗之，沙鍋僅如巨鉢，自言飯百人不盡。此團皆乞丐，沿門索米濟軍，無敢拒者！……』(同上書第五三七頁)

(五)紅燈照。據說參加這一組織者，皆十餘齡之女童，『衣紅袴，挽雙丫髻；年事稍長之姑娘，則盤高髻，左手持紅燈，右手持紅巾，及朱色摺疊扇，扇股皆朱髻。』這個組織的創造者，傳開始於一年邁孀婦，設壇授法，集合閨女數十人，環侍受法，受法期間，則規定爲四十九天，術成以後，稱爲『大師姐』而轉教他人。其術據云：持扇自扇，漸起漸高，能夠上及雲際。然後持燈下擲，由其從女拾繳壇內；而所謂『大師姐』則獨立空中，漸化爲明星，較星差大，有光晶晶，或上或下，或遠或近，或攢聚如聯珠，或遙邇如魚貫也。當時天津一帶的人民，便將此種傳說附會而爲目覩，因此，有

許多神經過敏之徒，終夜升屋瞭望；據參加這組織的姑娘們自詡：能於空中焚西人的房屋，并能呼風助火，可以作澈底的焚毀！而天津的低級心理的民衆，關於此種傳說却不加以思索，便深信牠是事實，由此，每至夜晚，家家都是紅燈高懸以迎『紅燈照』的仙姑。

(六)大刀會。這組織是義和團的正統，與過去的義和拳一體相承，其導源遠溯於『八卦教』，山東的堂邑縣便是牠的發祥地。不過，牠還有許多支派，如『乾字拳』與『坎字拳』之區別：乾字拳的資格之老遠駕於坎字拳之上，而坎字拳不過是後起之秀；當時在滄州靜海一帶的爲坎字拳之勢力，以白溝河之張德成爲領袖，號爲『天下第一壇』；在景州，深州，冀州，涿水，定興，固安一帶的則爲乾字拳之勢力範圍，以曹福田爲統率之領袖。據說坎字拳傳自清代初期農民暴動的領袖林清，而乾字拳則爲所謂『離卦教』鄧文生所遺傳；其他又有所謂『震字拳』與『坤字拳』等名稱，但是在農村中間是很少影響的。

這些組織中間，如『保國會』『殺鬼會』和『刀會』皆以積極的滅洋爲急務，他們在政綱方面大體是很相同；但是他們對於策略和禮節方面，則有很大的區別。例如從大刀會裏面分出來的義和團，爲要戰勝洋人，所以除了號召自己的弟兄們通常的做筋肉煅煉外，還特別加上了一些從古代所謂『道教』所遺留下來的各種神祕的『精神操練』。

關於此種精神操練儀式是異常的龐雜，我們從他的祀神當中便可以看出來；如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黃飛虎，黃三太，關雲長，觀音老母，濟顛和尚，玉皇大帝，二郎神，財神，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姜太公，諸葛亮，黎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兄弟，九天玄女等等，完全根據於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榜，西遊記種種流行小說的傳說，怪誕無稽，并無定式！其練術復有『渾功』與『清功』之別，渾功百日便可成就，而清功則非四百日不能完成；據其宣傳渾功能避槍砲，清功能白天飛昇。甚之，其詞咒亦復很多，內皆虛無飄渺之談，茲錄數則如下：

(一)『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五將，後請黑煞神！』

(二)『請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

(三)『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

(四)『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公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半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以上統見中國近百年史)

羅惇融拳變餘聞一文

這些符咒，就在奇形怪狀的肉體運動的時候念唱出來，在落後的農村中間，却有深刻的印像；并且，他們更造出許多的傳說，不是說：『天津鐵路，一被童男童女接觸，即變成灰燼！』便是說：『海乾神師已令海口起沙，橫亘百里，將使外國的兵輪不能進口。』行施這些神祕的法術，不僅限於童男童女，而且還有成年的義和團，他們相信，一個人如果經各種的肉體運動及默念符咒的結果，就可以獲得各種超出自然的能力；他們除掉了以童男童女來宣傳自己的觀點外，還發出很多的傳單，這些傳單在宣傳義和團的思想，的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這些傳單中間，牠首先打破中國人畏懼『洋槍洋炮』的觀念，而說什麼：『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台，鐵盔鐵甲鐵壁寨，閉住炮火不能來！』並且，在一九〇〇年五月開始的時候，北京各街道上張貼的傳單真是不計其數，其中有更進一步的解釋消滅洋人的必要：認為『洋鬼子』給我們以旱災，以及將毒藥投入井中，使我門沒有水喝。傳單中又說：『今後天已憤怒耶穌的教義，因為他是侮辱神靈，毀滅聖經（孔子和孟子的書籍——著者）及不尊崇佛教，天已不再降雨，而要派遣八百萬天兵，準備來消滅洋人！在微雨之後，經過不久時間，便要開始戰爭，那時人民或不免於窮困，但佛教與義和團能保護國家及使人民獲得安寧。』

在傳單上還附帶的號召人民，一見傳單，便要抄寫六本散給旁人，就可以免一家的災殃，若能抄

十本散給別人，就可以解除一宅的貧困。若看到這些傳單和告示而不告訴別人，他一定就要被砍頭！假使大家不同心協力的來消滅洋人，那麼，天將會給人民以懲罰而不降大雨啊！

至於抵抗毒水和消極的撲滅洋人的方法，義和團又有一個明白的規定要人民執行；首先教人們以抵抗毒水的方法：用七個酸李，樹皮及少許茅草，放在盛水的缸內，然後可飲，這個簡便的藥方可以解除洋人的毒，如果有人飲了沒有消毒的水，那麼，他們通通都要發生瘟疫，而人民死者百分之九十，均因患了這個毛病。其次，便是殺『洋鬼子』的辦法，這種辦法，誠然是個滑稽：要人民每家供清水一盃，饅首五枚，青銅錢數枚，每家置一秫櫓，用紅紙貼在秫櫓上面，供奉五日，然後拿這個秫櫓以揮擊敵人，而洋人就此便會身首異處了！

這一組織——義和團的組織之發生於山東，很早的就成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總指揮部了。牠基本的戰鬥員是千百萬被壓迫的貧苦的農民，我們看義和團的一切的行動，完全是農民意識的反映；雖然，在這次運動當中，還包括了不少的其他的社會階層，一方面有城市的流氓無產階級，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另一方面又破落戶的智識份子，僧侶和廟觀中的道士。而參加『殺鬼會』的人們，不但有本地的巫士，並且還有販賣洋貨的商人；不過，這一組織上的領導權還是在農民的手裏。此次反帝國主義運動雖帶着很濃厚的盲目的排外性，牠究竟達到什麼程度，這也是我們必須了解的。

第三節 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展開

義和團運動一開始，就表示了牠的偉大的力量，牠的偉大點，是在於能夠不顧一切的去和帝國主義拚命，因此，毫無疑義的要引起統治階級的驚訝與恐慌。最初在山東和靜海一帶，地方政府對於這種運動曾加以嚴厲的取締，可是這運動有牠的客觀的社會基礎，其爆發彷彿和浪濤一樣，而使地方政府難以抵禦；因此，統治階級在驚訝之餘，便想轉變羣衆的視線，要他們單純的排外，並且還想將個運動的領導權抓在自己的手裏。

統治階級——主要的是慈禧太后爲什麼驟然的決定此種帶嚴重性的幫助義和團的策略呢？這決不是偶然的無因的舉動，也可以說是滿清政府內部矛盾緊張的暴露；當然，帝國主義的壓迫，使這個政府的上層常常的感覺得自已失掉了體面，借此報復亦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因爲慈禧太后於戊戌政變的時候，曾經通緝變法的首領——康有爲，而英國人對於滿清政府的通知，不惟沒有遵行，並且反暗通款曲對康有爲加以庇護，由此，慈禧便對外國人深致不滿；同時載漪陰謀廢立，以載漪的兒子——溥儀爲大阿哥，要各國公使入朝覲賀，然而復遭各國公使的拒絕，此爲慈禧太后不滿意於外人之第二點；况因廢立問題，又引起東南人士的反對，一般智識階級——特別是士大夫們羣情鼓噪，以經元善

爲首連名上書，簽名者竟達數千人之多，慈禧太后接着這個奏章以後，以爲臣民何得與國家大事，便下令逮捕其首要——經元善，其時經元善避走澳門，滿清政府屢次要求引渡，而倔強的外國人，對於滿清政府雪片飛來似的要求引渡的文件，却置之不理，使寡居的西太后更覺難堪！此爲滿清政府不滿意於外人的第三點。

綜結此三點原因，便更加促成了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以排外的決心；當時關於利用義和團的問題，曾引起御前會議中間的激烈的辯論：有一派人是反對和帝國主義開戰，這派人物以吏部侍郎——許景澄爲代表，許景澄首先發言說：『中國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款而止；惟攻殺外國使臣，必召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禦之？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牛靈於何地？』而袁昶亦力言『拳匪不可恃，外憂必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王文韶說：『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盡兵單，今徧與各國啓釁，衆寡強弱，顯然不侔，將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同時，光緒皇帝也站在反對戰爭一方面，他以爲『人心不足恃，徒滋亂耳！士大夫喜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爭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徧啓釁，必無倖全……我國積弱至此，兵不足戰，用亂民以僥倖求勝，庸足恃乎？……亂民皆烏合耳，各國兵利，亂民豈足當之？奈何以民命爲兒戲？……』

（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羅惇融庚子國變記）

反對戰爭派所持之理由，在當時是根據事實，正確的估量了帝國主義的力量，勇敢的說出了自己畏懼羣衆的缺點，但是這些理由終於不能動搖慈禧太后成見很深的頭腦，因而那主戰的論調，在這次御前會議上大逞其詞鋒；首先是倉場侍郎——長萃發表關於義和團英勇目覩的經過，他說：「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而載漪亦乘機進言：「義民據忠憤以衛國家，不因而用以雪國恥，乃目爲亂民而誅之，人心失，將不可以爲國。」

成見很深的西太后，她當然是左袒主戰份子，因此，在這次會議席上她無情的打擊了那些反對戰爭的人們，她說這些人都是『替夷人進言』，都是中國國家的公敵，她爲的要加光緒皇帝的罪名起見，便唆使義和團指其爲中國耶穌教主，故後來的義和團揚言要得一龍（光緒）二虎（李鴻章及慶親王奕劻）頭，絕對不會是無因之談。

滿清政府既然決定了幫助義和團的運動，而義和團遂變爲公開的政治的戰鬥的組織，牠借着中央政府政治力量的掩護，遂益獲得組織上龐大的發展。當時義和團的運動，不僅僅限於山東一省，就是在其他各省，亦復獲得充分的發展，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的序幕，亦從此展開了。如陝西羣衆之進攻英人和日人的時候，那銀行，關稅管理局，三個英國公司，以及日本領事館均遭當地民衆的襲擊，幾乎是焚毀殆盡！一千九百年五月二十八日，焚毀了京保（保定）鐵路線上的兩個車站

和兩座橋梁，聰明的外國人，都逃赴天津，留下來的一些不重要的外人和『洋奴』都被圍在自己的屋子內。同時，在豐台羣衆又燒毀了鐵路的製造廠；與這些運動互相策應的，還有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尤其是在福州，雲南與保定，那掃滅『洋人』的空氣，緊張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其聲勢之雄壯與洶湧，真令帝國主義者胆寒！

但是，在北京的宣傳，已經獲得很大的效果和相當的基礎，所以這一運動還是竭力的趨向北方；當時，這個運動的發展，真有一日千里之趨勢。第一次義和團便殺死了日本領事館書記杉山彬，最後，更殺死德國公使——克林德，並且還燒毀了許多的教堂；在殺死克林德以後，許多的守舊臣僚——如徐相崇綺等，皆以爲夷酋就誅，中國不難從此強盛，而滿清政府亦看到這種運動發展的危險性，將要危害到他自己的統治，便以慈禧太后爲代表，而向羣衆送『反對洋人』的秋波，企圖躲避羣衆的鞭撻。因此，牠便下詔說：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

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歸覺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卹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爲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砲台，歸彼看管，否則以武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決髓淪肌，祖宗依憑，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苦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彼尙謀詐，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饑，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資，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存，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姦，卽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見同上書）

我們看了這個詔書，很顯明的，統治階級對於義和團是採取曖昧的態度，她因爲看到數十萬人之

不期而集，便相信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而衛社稷了。義和團在她的褒獎之下，許多的落後的臣僚都來投機，如知府曾廉，編修王文龍等曾獻三策：『攻交民巷，殺盡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璧輿榷何異。』而御史徐焜復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而另外一位御史名叫陳嘉言者，他的議論則更為滑稽，他自己說是接得關壯繆的帛書，云夷人不久即可自滅！其他如蕭榮爵等一般官吏，皆說『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像這樣不值錢的恭維的話不知說了多少次，關於滿清官僚一般思想發展在農民水平線之下，於此，我們可以確信無疑了。

但是，這個運動馬上又會使他們不安，因為牠的發展的階段又有一些新的轉變了。

第四節 鬥爭的轉變

義和團的運動，一開始牠就表示了『兩重性』的特點，就是說這一個運動在最初牠的一舉一動，已令統治者感覺得不安，因為牠有從反對歐洲人侵略轉變到反對滿清政府壓迫的危險。滿清臣僚們最初看到這點的，要以李鴻章和袁世凱最為深刻，因他們時常與各國的公使往來，他們的腦神經和意識，多多少少的受過西歐新新資產階級科學的洗禮，所以，他們了解義和團不僅是迷信并且其結果會反對

政府，而另一方面復有因此召致帝主義瓜分中國的可能。當滿清政府還在徘徊歧路以電報和他們僑商的時候，李鴻章便毅然說：「此亂命也，粵不奉詔」。滿清政府本來要他們殺滅洋人，其如此倔強態度的回電，真令人以難堪！

李鴻章不僅消極的以「粵不奉詔」的復電方式為限，他看到事變發展的嚴重，於是乎更積極的聯合江蘇督撫劉坤一，湖北督撫張之洞，四川督撫奎俊，福建督撫許應騫，福州將軍善聯，以及李秉衡，鹿傳霖，王子春，于蔭霖，俞廉三，德壽和山東督撫袁世凱等共同發表奏章有：「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燹不可開」……等語。而袁世凱復單獨上疏說：「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迨至包圍公使館的第五天，慈禧太后和朝臣們就與義和團的搶劫及挑釁的行動發生了衝突，我們看六月二十四號的詔令是怎樣的說：

「昨日在東單牌樓路及長安街附近之商店與房屋，都受武裝盜賊方面之搶劫。……」同樣的，在六月二十八號的政府告示上，又表示出對於義和團的不滿：「管理京都中央城市的御史，報告發給人民米糧的必需，他申言在最近幾天，愛國的義和團，燒毀了很多的房屋，并殺死了許多的中國的教徒；現在市場秩序非常混亂，紊亂的結果，不僅人民的貧苦階級失去了一切發生的資料，就是許多中等階級，也感覺得非常貧困的痛苦。……」同時，在七月一日的指令上，已經表示出政府在設法反對

義和團了；指令上說：『義和團的團員，在開始的時候，本表現了所有的忠義與勇敢，他們以此目標，做他們的格言；我們很期望他們長此爲祖國効勞，反對外來仇敵的侵略。但近日以來，在北京近郊發生了許多搶劫的命案，造出很多的罪惡，據各方面的調查，犯這些案件的都是義和團的團員；假使再放縱下去，不加嚴禁，以糾正這些事件，除了外部的困難而外，又加上內部的紊亂及國家的困難，其前途將不堪設想。』

這種轉變的危機，在統治階級看來是異常的可怖，故當時許景澄與袁昶等曾向慈禧太后慨切陳詞：

『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之髮匪，負隅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與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里，莫不知其爲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匪而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查拳亂之始，非有鎗砲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枚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於

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扶清滅洋」四字，試問作何解說？謂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效力驅馳以答覆載之德，斯可矣！謂若國家多事，時局艱難，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安，曰扶之先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爲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氣慨。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爲橫挑邊釁，以天下爲兒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抑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爲封疆大員，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衆千百人，持義和團三字之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長官，聚衆滋事之棍徒，爲地方之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卽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妄欺君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戊刻，洋人索取大沽砲台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炮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一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吾軍

隨處截堵，義和團民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毀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避難來京之人，僉謂擊沉洋船，焚毀洋房，實無其事；而吾軍及拳匪被洋兵轟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謂二十八日洋人攻擊大沽砲台，係裕祿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於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盡淨，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效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拔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束身自愛，仰酬厚恩；乃庇匪爲姦，形同寇賊，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亦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歷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比，乃竟憤憤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在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爲吾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鋼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匪阿奸，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啓秀，謬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趙舒翹，居心狡猾，工於逢迎！當拳匪入京師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等，垂詢勦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前，面斥爲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致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願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枉，趙舒翹明知其妄，語其隨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示

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命。既解散矣，何以羣匪如毛，不勝獮薶？似此任意枉奏，朝廷盍一詰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誠無邪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月之間，勢將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斯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安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而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爲釀禍之樞紐，非若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朝臣僉爲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家三百年宗社，將任妄謬諸臣，輕信拳匪，爲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勦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勦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嘗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爲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盛，無賴之聚愈衆。使毓賢去歲能力勦，該匪斷不致蔓延至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真防堵，該匪亦不至闖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尙不敢大肆其搶掠殺戮之慘，推源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啓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輕爲之未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之縱匪孽

釁，皆謬妄諸臣所爲，并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憤痛惶迫之至。」（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第五百五十九頁——六四頁）

當然，慈禧太后對於這個奏疏，因顧全自己的體面起見是未加以採納，不過，在另一方面她又部份的向非戰派人們投降，而要嚴厲的對付義和團了。在最後七月六日的指令上，我們從她那堅決的態度與嚴重的詞句中，便可以很明白的看出來；她說：迭接御史的报告，在京都所發生的搶案，層出不窮，深爲痛恨，因此，特命令各官吏，會同義和團的軍事長官，立出訓令，告誡部屬，對於搶劫案犯，應即逮捕，并當地正法！

這些堅決的反對義和團的告示，牠的實際的內容，并不是因爲了義和團之搶劫一部份的居民，而是看到義和團鬥爭之轉變；當時義和團在北京，不受滿清政府官吏的束縛，其一切行動好像是處在主人翁的地位。他們不僅是侵犯了『達官貴人』們的安甯，甚之，在皇太后的面前，他們也要試一試身手。在六月五號的晚上，義和團的隊伍，突然衝進了皇宮，責備皇帝，說光緒皇帝是『外國人的朋友』（關於此種行動，也有慈禧太后的陰謀，主要的是向光緒示威），并要求處死那班外交官吏，認爲所有的外交官吏都是『洋鬼子』的信徒。他們在宮庭裏面喧鬧不休，其來勢之洶湧，大有不達目的不

止之趨勢，因此，逼得慈禧太后親自去接見他們。慈禧太后對他們是慰勉有加，并向他們說上了許多的好話，然後才叫退去！

迴想慈禧太后和她僚屬的關係，是異常的嚴格，她接受僚屬們的報告和對下級有所命令，都是隔着一重珠簾，這種行動便叫做什麼『垂簾聽政』。以前有許多奉詔來的太醫爲光緒醫病，都是俯伏的跪着而不敢有所仰視，因此關於皇帝的症狀全憑西太后的一紙書面來說明；可是現在，這班『村夫俗子』與『地痞流氓』居然對於那『徐娘半老』的慈禧太后，雖然不能『一親芳澤』，但是他們已經是『秀色飽殮』了！

所有這些事件湊合起來，實在是攸關士大夫們的顏面而令他們不能忍受，難怪過去和現在的中國士大夫們要罵義和團運動爲『拳匪』了。

然而事變的發展，是一天緊張似一天，說也奇怪，事變是測驗各階級的標誌，也可以說牠是各階級的分水嶺；滿清政府過去向外國宣戰的『宇宙觀』，現在已經爲事實所抨擊，即帝國主義的砲聲之由遠而近，把所有過去滿清政府想像中的十萬神兵，打得個落花流水，甚之連蹤跡全無了！那東交民巷一帶陳屍疊疊，都是義和團的份子，因此，在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很快的嚇退了統治階級而使她脫離戰線，七月十日慈禧太后下令停止包圍公使館的軍事行動，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情，用不着什麼驚

訝！

不過，這時期瓜分中國的警告已經由傳聞而見諸事實，那八國聯軍已紛紛的向北京進攻了；但是帝國主義之『文明』的面帕是不是會自行扯碎？以及整個帝國主義內部在瓜分中國的過程中究竟有無衝突呢？

第五節 八國聯軍與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

馬克斯在很早以前就告訴我們說：『所謂這些耶穌教民族，對於一切被他們變為奴隸的異教徒及異民族的野蠻行為與無恥的殘酷，較之歷史上任何時代，任何民族，即最野蠻不文明最無情無恥的民族，所做的慘不忍聞的事情，都要超過之。』資本論）此種議論我們從表面上看去，彷彿是馬克斯的過火之談，其實，這些話因為受義和團事變的測驗，已經成爲苦的真理了。

當義和團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開始的時候，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界都異口同聲的大聲疾呼這是東方的『黃禍』，這是中國人之反對文化和文明，這是中國企圖破壞全世界人類幸福與和平的嚴重事變。非加以痛創不可！但是，這些蹲伏在錢囊面前之記者先生們，對於歐洲資本主義之宰割中國與劫掠中國的事實，却一字不提。爲什麼呢？很顯然的，在義和團事變以前，中國與歐洲的經濟聯系，

還是相當的薄弱，資本主義之與羣衆的接觸，因交通的梗塞（那時的鐵路建築還在萌芽期），其現象并不是普遍的發展。義和團的運動爆發了，教徒遭戮，公使被狀，因此，引起了全世界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覬覦；在討伐『黃禍』的旗幟之下，所有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暫時的合作起來，將炮口向着中國，全世界資產階級國家佔領中國之慾望，現在已經是達於沸點了！

其實，義和團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問題，牠有牠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原因，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當然不是這樣的簡單；現在，我再引用從帝國主義嘴裏說出來的話，以答覆一切中外反對義和團的宣傳。俄皇尼古拉第二在其自己親自批的訓令駐巴黎公使的電稿上說：『我完全贊成，可是對法國還有一個急切的問題，就是關於教士們。我以為這些先生——就是罪惡之本；他們與商人狼狽爲奸以致激起中國人對歐洲人的嫉視。無論如何說法，都應該設法限制他們；藉那耶穌的聖名，以剝削中國的民衆。』（見狄拉克著中國革命運動史第一八九——九〇頁）沙皇都知道這次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是在中國的教士們與商人狼狽爲奸所促成的，爲什麼歐洲的一般小資產階級羣衆，却打起保護耶穌聖教的旗幟，以擁護歐洲文明的口號來屠殺中國人民呢？既然說耶穌教是世界的宗教，爲什麼民族的觀念又是這樣的濃厚呢？我想耶穌有知，一定會排斥這些不肖的門徒吧！

同時，德國聯軍統帥——義和團運動的劊子手——瓦德西，他比俄皇更加聰明，因爲他實際到中

國與事實接觸，事實教訓了他關於義和團運動的觀察，不得不作如下的說明：

『余對於教會問題之研究，曾經不遺餘力，據余所信……中國排外運動之所以發生，乃係由於華人漸漸自覺，外來新文化實與中國國情不適之故。鐵路建築，將使職工階級謀生之道減少。——我們於此，最易聯想到昔時歐洲方面，亦曾流行之相類思想。——更加以築路之時，漠視墳墓，以致有傷居民信仰情感。』(瓦氏原註：在中國方面，巨大墳園，如我們公共墓地者，極為罕見。乃係無數單墳，散在田野。因修築鐵路地基之故，未曾嘗嘗加以重視。)此外了解鐵路有益於國之明白人士，為數甚少，因而建築鐵路，尤易引起不良反動。近年以來，瓜分中國之事，為世界各國報紙最喜討論之題目，復使中國上流階級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最後，更以歐洲商人時常力謀損害華人以圖自利，此種閱歷又安能使華人永抱樂觀！至於一二牧師，作事毫無忌憚，以及許多牧師，為人不知自愛，此固吾人不必加以否認疑惑者。余以後尚將再為提及此事。此次中國仇外運動之所以對付牧師最為激烈者，實以牧師在一切外僑中，最易被人捉獲。所有牧師大都結為小羣，散居中國全部；換言之，實係毫無防禦之力。反之，歐洲商人，只在少數通商口岸，如廣東，上海，天津，烟台，牛莊之類，羣居租界之中，常在列強保護之下；而且租界居民自身，亦嘗有自衛之設備。至於中國內地方面，只有少數歐洲商人，彼輩雖亦設有支店，但多為華人所忽視。……關於英美教會事業，余實不能詳細批評，但

余確深信，彼等因互不相容之故，常作相反行動，每與事實有損；蓋我們對於中國人，實不能責以辨別，究竟誰個牧師所傳，係屬真理學說。復次，美國方面，常有一種巨大錯誤，——是否一切教會皆係如此，余實未能深知。——即所委任之牧師，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稱，職務方面亦未經訓練。此輩嘗以服務教會為純粹麵包問題，凡認為可以賺錢的事業，無不兼營并進。此所以牧師地位因之而低降，并使教會仇敵得以從事鼓動。余個人即曾親遇此類牧師，彼等常以商人資格前來戰時醫院及軍隊營舍之中售賣物件。此外余更熟知許多牧師，兼作他項營業（譬如買賣土地投機事業），實與所任職務全不相稱。（見王光祈譯瓦德西拳亂筆記一一五——一八頁）

我們徵引了俄皇尼古拉第二以及德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上面所述的兩段話，可見得義和團的運動並不是什麼簡單的『奉匪』的騷擾了，而是耶穌教民族侵略的反響。

可是，義和團的事件，竟引起了德國很大的影響，因為在公使當中竟打死了德國公使克林德；德皇威廉第二便借題發揮，想於遠東方面從先進的列強中間佔一個地位，因為他過去在中國是一無所得，現在藉着這個大好的機會，不妨多得到一些。根據這個觀念出發，威廉第二便自任為征伐黃禍的首領，向其他歐洲各國要求一致行動，組織八國聯軍，并提議以德國伯爵——瓦德西為聯軍統帥，企圖利用撲滅『黃禍』的口號，搶得整個帝國主義在遠東方面的領導權。但是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

德國之龐然自大的神情，是深致不滿，所以『黃禍』未滅，資本主義列強當中已經起了裂痕！

據狄拉克說：『沙皇時代的俄國，佔着最好的地位，他佔得滿洲，他不願意列強佔得像他這樣的多。他怕在中國發生了更大的共管，那麼，英國人會要佔領揚子江流域，因此，俄皇對於這個問題，便取觀望的態度。當作有人告訴他，俄國公使也在危險中，他洒一滴照例的眼淚，可是他馬上派大部的隊伍到中國；因為他知道西伯利亞的鐵路，還沒有完全修好，但是在中國戰事擴大了，英國可以從海道運印度的兵，那麼，英國仍比俄國要利害些，因為俄國連兵困難。英國爲着自己方面，馬上向德國要求：英國承認瓦德西當元帥，可是要承認揚子江流域爲英國勢力範圍。於是開始協商，這就是以後英國條約，成爲當時最重要的政治條約之一。因爲德國承認中國最富庶最繁盛的區域，算英國的特殊利益。』（中國革命運動史一九一頁）

俄國在最初，對於列強瓜分中國之事，是異常的吃醋，因爲他在中國比較其他列強實在是多得些。所以俄國公使於義和團運動爆發之時，會上書警告中國政府，說：『他國將借亂事圖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親睦，二百餘年，義當告。』（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五一九頁）現在形勢既然不同，不妨吃一盃順便之酒，結果，德，英，俄，法，美，意，奧，日本諸國的遠征隊——即所謂『八國聯軍』便在天津登陸了。攻陷了大沽口砲台，以日本軍隊爲先鋒打進了北京，把東交民巷的使館的圍也解了，

而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亦復倉皇出走，北京一帶是陷於混亂的無政府的狀態，人民的門前家家都寫着：『大日本順民』而請求保護。

可是這些西方耶穌基督的代表——八國聯軍，他們自稱爲有『文化的』與『文明的』國家軍隊，是怎樣的在着教訓我們野蠻的中國人呢？

這種所謂『八聯國軍』在北京的行動，完全出於一般人們想像之外，帝國主義者牠自己扯碎了蒙在臉上的所謂『文明』的面帕，那兇殘的偽善的面孔已經很清楚的被人們看穿了；所有的慘不忍聞的事情，如最下流的搶掠，在這個強盜軍隊的組織中，各國官佐都會加入，那劫掠殖民地國家的特點，便是帝國主義所謂『文明』與『文化』的最高標誌。

關於這些強盜軍隊劫掠中國的情形，我們可以舉出很多的事實，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文明歷史上永遠洗不去的特點！有一位俄國住北京的財政的代表——蒲兒爾洛夫，他在一千九百年八月十七日將帝國主義的強盜軍隊——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時之情形報告於彼得堡的財政總長說：『全體軍士約有四萬。其中四千俄軍，九千日本軍，四千英國軍，還有美國的，法國的。軍隊炸城之後，便佔了皇宮，現在差不多沒有事了；但是中國人還非常的反對，非常憤恨外兵，因爲軍隊壓迫中國人民，搶掠中立的，和平的民衆，並且搶掠得更利害些。其中以日本軍隊爲尤甚，他們自居爲北京的主人翁，分

配步槍，佔領國庫，雖是其中的錢不多，而日本完全收歸已有。皇太后，皇帝以及滿朝文武，不知道從北京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中國革命運動史一九二頁——九三頁』

但是同時沙皇所得的消息，不僅僅限於日本軍隊之劫掠，那漂亮的俄國軍隊也同樣的做了沒有紀律的事情。因此，在一千九百年十月四日俄國陸軍總長——枯魯帕提金致俄軍總指揮李烈威支電中說：『英國消息的電報，說我們在北京的軍隊，把宮中所有的東西，一律搬出來了，皇帝很生氣，告訴我這個消息。』李烈威支將軍回答這個電報說：『宮中的東西，什麼也沒有搬出來，英國人亂罵俄國軍隊，說搶了宮中，已非一次了，這不過是英國人罵我們的新花樣；我素常尊重同盟者，不肯攻擊英國人，現在我負責說：我親自在英國軍官那裏看見，他們搶的各種新絲貨像山一樣，直堆到天花板那樣高，其他各種的絲貨的衣服，皮貨，地毯以及各種各樣宮廷的東西，都是像山一樣。每一個英國兵都有裝各樣皮貨的箱子，馬上都運到印度。遲了的以及不能運到印度的東西材料等，在北京英國公使館裏拍賣，一天一天的，一直賣了三星期。拍賣的時候，向各同盟者，都發有廣告這樣的拍賣東西，各國及我們的軍官兵士等，都買得有。俄國軍隊，什麼也沒有得，也不能得。就是我們的兵士拾着銀錠，也是奉命交出的。……』(同上書)像這樣的俄國人報告日本，搶掠，英國人說俄國軍隊搶劫，俄國軍官又向英國反唇相譏，形容英國搶了多少多少的東西，彼此互相推諉，實際上帝國主義搶劫殖民

地的行動，真是不相上下，俗語說：『到處楊梅一樣花』啊！

至於德國，他是厚着臉皮，對於自己的搶劫殖民地的事實，不但不加以隱瞞，甚之還公開的表示出來，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登載了許多兵士的來信，這些信中的內容都涉及到搶劫中國之事實；因此，引起了威廉·李卜克內西於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國會當中激烈的演說，指斥德國對於中國事變的政策為強盜政策。譬如德國的軍隊，在義和團的事變中，把北京的天文台儀器都搬走了，直到一九一九年才歸還中國；其他各國，當然不用說是滿載而歸，歐洲的圖書館中充滿了中國古代的珍籍，至於歐洲各國的博物院內面，不知陳列了許多中國的宮廷器具，以及其他有價值的手書證據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者於一九〇〇年在中國擄掠而去的勝利品。

帝國主義的的軍隊除了搶劫以外，那強姦婦女的罪惡的行爲，更是他們的特長；關於此事，就是那強盜的聯軍統帥——瓦德西也是公開的承認：『昨日蔭昌將軍曾受李鴻章及慶親王之囑，特來余處相告，謂近來獲得美國將軍書面允許往遊禁城之人，屢欲侵入住有婦女之院宇，蓋此種院宇至今受人敬重，未加侵犯故也。所有其中婦女，恐懼達於極點，羣謂：倘若再有此種情事發生，決定自戕其生命云云。余因此事，特往訪美國將軍；彼立即贊成余之提議，出示嚴禁，並貼在住有婦女之處，而且因欲使人特別注意之故，特聲明此事曾得余之同意云云。最可惜者，吾人在此，對於此種毫無紀律之

人，有時竟非加以嚴重干涉不可；此類人無論何國國籍均有。至於婦女每見敵人將近，輒先閉死其子女，隨即自戕其生命之事，實已屢次發生，至可驚歎！」（見瓦德西拳亂筆記一四〇頁）

至於那帝國主義高唱入雲的『瓜分中國』的論調，是不是會從義和團運動壓平後而實現呢？這種『瓜分中國』的論調，不過是帝國主義者主觀上的幻想，其實，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經過此次事變以後，已越發緊張起來！我們看這種綜錯複雜的國際矛盾，首先便表示於俄德利益的衝突，在瓦德西向德皇威廉第二的報告中，特別將這個問題提出來：『皇上陛下，余與俄國皇子……之談話，不敢遺漏弗報。該皇子云：「此次對於中國開戰，我們甚感不便。我們希望西伯利亞鐵路之建築，不為所阻；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滿洲將如已熟之果實，落在我們手中。中國方面之情形，因北京之佔領，誠然大為變遷；但其前途如何，尚不可以預測。現在第一步決定，先將砲兵兩旅停止動員。使我們最為憂慮者，厥為日本。我們相信日本預備派遣兩萬軍隊，前赴高麗南部，我們亦將因此在此高麗北部，集合西伯利亞第三軍團。我們自己決無併吞高麗之心；但對於日本之佔據該地，則萬不能忍，現在我們對於此次戰事費用，再加上一部份鐵路建築被阻所受之間接損失，其數業已達二萬萬之鉅，頗使我們大受影響。尤其令我們懷疑者，究竟中國是否具有此項能力，賠償參戰各國費用？關於吾皇之意見，余未完全得知，但有一事可以見告者，即余辭闕之時，吾皇曾謂余之指揮職務，至多四個月內可以完竣

云云。」在余船上，皇子曾設法與余之各軍官閒談，故意牽入政治問題。但該皇子却未能因此僥倖，有所獲得。蓋余對各軍官曾有訓令對待一切外國軍官，均宜特別周到；但一談及政治問題，則應設法避免。……」（見同上書十六——七頁）

我們從瓦德西的報告中間，很顯然的，不僅是看出了德俄二國的衝突，同時，更可以看出俄羅斯與日本之明爭暗鬥。因此，瓦德西便很着急的要和議之早日實現，以便期望的目的早日達到，『……今日以和議條件見示，該條件明日即將交與中國和議大臣。余覺該條件十分不備，重要問題如賠款總額之類，均未加以確定。如斯作品，竟須兩月功夫之久，此真足以充分表現「聯軍各國」之一種散漫分裂情形也。大凡同盟聯合，均帶幾分弱點；蓋三人團結，已屬困難，今乃更欲十人同在一帽之下，（安能辦到）。華人方面，固深知之甚確，倘若彼等（指華人而言）即或堅持不讓，而聯軍亦復不能超出直隸以外大用其兵。在事實上，聯合各國——余想德國亦包括在內——亦真已領教夠了，直願快快結局，愈早愈妙。」（同上書）

最後，我們還可以徵引瓦德西的一篇奏議，在此奏議中間，他自己說出列強間彼此的矛盾以及中國未來的前途。我們為有系統的總結此段序述起見，茲特引錄如下：

「關於近年以來，時常討論「瓜分中國」一事，若以該國現刻武備之虛弱，財源之衰竭，政象之

紛亂而論，實爲一個千載難得之實行瓜分時機。現在所欲問者，則是各國對此問題究取何種態度？俄國方面，因佔領滿洲之故，在最近期間，當可心滿意足。假如現在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英國取得長江流域一部份，德國佔據山東，則中國方面實無力加以阻止。因此，我們對此問題，必須十分注意，倘若一旦列強對於瓜分之事，果有妥協之望。但余對於此事，却認爲絕對不能實現，英國極不願意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日本方面對於德國之據有山東，則認爲危險萬分。各國方面對於英人之壟斷長江，認爲勢難坐視；至於美國方面，早已決定，反對一切瓜分之舉。俄國方面若能聽其獨佔滿洲，毫不加以阻擾，則該國對於他國之實行瓜分中國，當可袖手旁觀；蓋彼固深信，各國對於此事，彼此之間必將發生無限糾葛，故也。因此之故，急欲促現瓜分一事，實係毫無益處之舉。據余在此所能推斷者，則幾乎所有列強，皆欲藉建設鐵路開採礦山之事，在華直接生利以自肥。其結果則各種間接利益，亦將漸漸隨之而生。譬如中國重大未開之財源，勢將由此日益發現。中國人民之幸福，益將由此益增。對於各國之商業，更將從此開一廣大活動區域。因此之故，預料各國前此參加之鐵路事業，不久即將從新着手。此項鐵路事業，在亂事以前，即已有一部份實行開工建築，一部份業經計劃妥貼。最近，余所新悉者，只有俄國對華策略一事。俄國最初用盡方法，謀得山海關北京間之鐵路；彼曾先將彼之天津租界，大爲擴充，直與東站地址相接，妥爲之備。假如爭有山海關天津北京

間鐵路之舉，係英國方面獲得最後勝利，則俄國勢將另自新築一條山海關至北京之鐵路。此外俄國尙欲再築一條北京至張家口之鐵路，并擬將來再爲引長，直穿過蒙古。……至於北京，保定，正定（？）間之鐵路，其延長路線係擬直達漢口；該路直到現在，係由法比公司所建築；惟俄國方面，現刻竭力設法收買該路股票，以便由此獲得該路之權，并得循此軌線，以達各國商業利益焦點之長江。在其他方面，則英國擬由緬甸出發，法國擬由（安南）東京出發，各建鐵路，以達該處。據余觀察，俄國之意，係欲使中國永在衰弱狀態之中，常受俄國羈絆支配。因此之故，若謂俄國之使中國經濟發達，其意係在助強中國，實爲最不合理之談。——但在他方面，余實未敢遽信，中國現在已到甘受俄國而不辭之衰弱地步；所以余料，假如俄國永遠據有滿洲，其勢將使中國皇室，取消北京首都資格，另建國都於他處，實屬極爲可能之事。中國文化在四百年之前，常有若干方面，比較歐洲爲優。但自彼時以後，遂成停頓不進之象；尤其對於火車輪船所引起之世界鉅大變遷，未能加以理會。而且，數世紀以來，未有外敵嚴重壓迫，以致養成一種不能戰爭之民族。所有上流階級，對於世界情形，毫無所知，直是驕傲自大，盲目反對白人。至於官吏人員，則爲腐敗之氣所充塞，毫無精神之可言；其在皇室方面，則又似乎不能再行產出振作有爲之人物。但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能忘去者，即中國領土之內，除開西北兩面之（蒙藏）屬國不計外，共有人口四萬萬，均係屬於一個種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

分裂，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復不能忘去者，即吾人對於中國羣衆，不能視爲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尙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認爲中國下層階級，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無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爲健全。倘若中國方面將來能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爲其領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國貢獻於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則余相信中國前途，尙有無窮希望。吾人若一觀察日本維新之迅速與成功，則此處實值得吾人加以特別注意。——至於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尙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彼等之敗，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於并火器而無之。倘若中國一旦強盛，則受其影響者，實以俄國爲最。俄國將於距其中央政府甚遠之數千基羅米突遙長界上，行見一個含有危險甚或勢均力敵之對手產生。若此種觀察不錯，則無論爲德國或英國利益計，皆宜以此之故，扶助中國，使其經濟發展，國力增強；而吾人商業關係，當然亦將隨之而進步。至於併吞土地一事，與其謂爲促進商業，則毋甯謂爲阻礙商業。蓋余之意，以爲德國若以膠州爲根據，實能享用山東利源；而且由此更將能獲得一個較大活動區域，假如鐵路建築，不僅濟南一段，而以直達南京爲其終點。假如現在俄國果真努力，以助中國發達，則該國之政策，可爲完全錯誤。近來有一中國老人，曾宣言曰：「我們自四百年以來，皆在睡夢之中；但

其間我們深覺安適無已！你們白人，必欲促我們醒覺，則將來終有一日，你們對於此舉，深為扼腕之時云云。」關於德國在山東方面併吞較大土地一事，尚有一種困難，即華人置諸德國官吏管理之下是也。就該地大抵貧乏之居民中，欲得多數稅收，可謂希望甚少；其中尤為重要者，則該地距德太為遙遠。假如中國一旦復欲奪回山東，則德國方面——除開列強特為德國而設之各種困難不計外——對於此種戰事，非至財政破產不可。（同上書）

瓦德西很清楚的，很明白的說出了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很嚴重的，很鎮靜的批評瓜分中國之不可能，他以為應當摒棄武力轉換一種經濟的方式以束縛中國，於此，才可免掉許多的危險。這種政策為後來的中國——東方式——的殖民地資產階級形成開闢了一條很寬廣的道路，不過，從這一次事變當中，中國整個民族利益損失達到了什麼程度？以及怎樣的去反對帝國主義？事變是給我們一個很可寶貴的教訓！

第六節 義和團的失敗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演習

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滿清政府殘酷剝削所造成的義和團的運動，牠在爆發不久和開始轉變的過程中，即為帝國主義壓平了；致其將待展開的陣容，使我們無從得觀。不過就當時的階級衡比來說，

這一運動之不能戰勝帝國主義的列強，這是不成問題的事情，全世界新興資產階級的砲口都向牠轟準，使安慰義和團的精神工具——符咒無靈！因此，義和團的運動便從此陷於血海。

帝國主義以武力來征服中國，這一次確是達到空前未有的成績，因為在這次事變中，帝國主義不僅鎮壓了與他們誓不兩立的義和團運動，甚之還經過滿清政府的手搜括了中國整個民族那可驚數目的賠款，并獲得列強在中國充分發展的機會。當八國聯軍進抵北京的時候，曾經提出極苛刻的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最大恥辱的議和大綱，該大綱草案雖然是很簡單的十二條，然而每一條都和緊箍一樣的束縛着中國全民族的利益；例如該大綱說：

- 『(一)德國公使克林德被害，派親王充專使謝罪，立碑於遇害地；
- (二)懲辦罪魁，由各公使指出，被害城鎮，五年內不得考試；
- (三)日本書記被戕，須向日本謝罪；
- (四)各國墳墓發掘之處，立碑雪恥；
- (五)於二年內禁止軍火入口；
- (六)賠償各國人民損失；
- (七)駐兵衛使館，中國人不得居界內；

(八) 毀大沽砲台；

(九) 京師至海道，擇要屯西兵；

(十) 人民肇亂，罪其長官，不得借端開脫；

(十一) 改通商條約；

(十二) 改總署及覲見禮節。』(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第五百七十二頁)

但是，這樣一個議和大綱草案，帝國主義還是深致不滿，因此，在牠們共同決議之下，又加以具體的毒辣的補充，始成立如下和約：

『(一) 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允謝罪使，克林德牌坊已鳩工；

(二) 懲辦罪魁，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斬監候，加恩貸死，戍新疆，永不釋回；莊親王載勳，尙書趙舒翹，左都御史英年，均賜死；尙書剛毅，大學士李秉衡；身死奪官；巡撫毓賢，尙書啓秀，侍郎徐承煜，均正法；提督董福祥革職；被害之尙書徐用儀，立山，侍郎許景澄，閣學朕元，太常卿袁昶，均復官，昭雪；

(三) 派侍郎那桐赴日謝罪；

(四) 被掘墳塋，撥帑立碑；

(五) 禁軍火入口二年；

(六) 償款四百五十兆兩，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還清，賠款由上海辦理，以關稅鹽政作保；

(七) 劃崇文門大街以西，正陽門城壕，歸使館管理，留兵保護；

(八) 大沽砲台削平；

(九) 諸國駐防之處，爲黃村，廊房，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

(十) 有違約事，罪其長官；

(十一) 北河改善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撥帑六萬兩；黃浦河道，各國派員興修，歲費四十六萬兩，一半由中國支付，中國派員會修；

(十二) 改總署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同上書)

此種條約簽定後，雖然是形式上帝國主義將北京交還與中國，可是，實際上東交民巷的領事團已經做了中國的主人；而庚子賠款之巨大，中國人民又幾乎不能負擔。

我們再看一看帝國主義的強盜們是怎樣的分贓？關於庚子賠款及國際帝國主義分贓的數目，有如下表：

國名	關平銀兩	金磅數
俄國	一三〇,三七一,一三〇	一九五五五,六六八,〇〇〇
德國	九〇,〇七〇,五二五	一三,五二〇,五七七,二五
法國	七〇,八七八,二四〇	一〇,六三一,七三六,〇〇
英國(葡萄牙附)	五〇,七二二,七九五	七,六〇六,九一九,二五
日本	三三,七九三,一〇〇	五,二二六,九六五,〇〇
美國	三三,九三九,〇五五	四,九四〇,八五八,二五
意國	二六,六二七,〇〇五	三,九九二,五五〇,七五
比國	八四,四八四,三四五	一,二七三,六五一,七五
奧國	四,〇〇三,九二〇	六〇〇,五八八,〇〇
荷蘭	七八二,一〇〇	一一七,三二五,〇〇
西班牙	一三五,三二五	二〇,二九七,〇〇
瑞典那威等	二二二,四九〇	三二,八七三,五〇

合

計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廣大的農民反帝國主義運動——義和團的運動的失敗，使中國民族蒙受這樣巨大的損失，我想一定會使人們扼腕歎息，甚至於使士大夫們捶胸頓足如喪考妣一般似的泣歎。其實，問題是要倚靠力量來解決，並不是牛衣之泣所能奏效，義和團運動雖然失敗，中國民族雖然遭受帝國主義空前未有的蹂躪；但是，患難中才能結識知交，失敗一定會給我們許多的教訓，總括的說一句，在義和團事變中間已經立下了反帝國主義的總方針——特別是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總方針。因為這次事變教訓我們義和團的運動——中國初期反帝國主義運動，牠一開始的時候，就帶着『兩重性』的鋒銳特質，一方面固然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另一方面同樣的要反對國內的統治階級；但是聰明的慈禧太后於這運動一開始的時候，便引導牠走向維護舊制度方面，然而事變的發展，實在是令統治階級難於統馭，而要侵犯到舊社會的安寧！因此，逼得統治階級很快的脫離了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她情願犧牲羣衆的利益擁抱着帝國主義去跳舞。

事變是很明顯的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先進的革命階級的誕生與領導，則反帝國主義的任務，使農民們無法完成，此種農民不能完成反帝國主義任務的主要原因，由於他們的生活習慣與思想方式之不

能針對着社會的進化，甚至於恰恰相反，把那原始的落後的意識帶進作戰的隊伍中來。同樣的，與國際無產階級及其勞苦羣衆之親密的結合，以及取得經常的聯繫，亦復成爲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中之主要點，祇有與全世界先進國家勞苦羣衆攜手并進的反帝國主義，才能保證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之澈底的勝利！

那些爲時代拋棄到博物館裏面去的人們——特別是國家主義派及其徒屬，現在他們在中國也是高喊什麼『外抗強權』，雖然因爲孫傳芳的倒台，影響到他們的喉嚨啞啞，但是，他們盲目的排外却與義和團異曲同工，如什麼『尊孔』啊！『保存國粹』啊！『太極拳』啊！『達摩劍』啊！所有這些真是五光十色，鬧得烏煙瘴氣！試問所謂中國的『國粹』能夠壓倒世界文化而獨立嗎？『太極拳』與『達摩劍』能夠戰勝飛機砲艦嗎？這不用說是一種幻想，並且是可憐的幻想！

他們在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客觀上是拾取義和團的殘餘（利用落後農民的心理如國家觀念及狹隘思想）而津津有味地咀嚼，彷彿和吃新鮮檸檬一樣的自得，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檸檬，而是那爲風吹雨灑之久經曝曬的糞渣！

極乎顯明的，凡是受過新興科學洗禮的人們，都應當承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環，牠要走向世界大同之路，那麼，中國革命便要融化於世界革命之中。

自義和團事變以來，極乎明顯的，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又復形成了東方的殖民地式的工業革命，接着這資本主義——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以後，更誕生中國的第一次革命！

拉狄克說得對：『這次農民運動，絕不是暴徒土匪的運動，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後中國革命的先兆。雖是他們被滿洲政府利用了，可是，他還是表示舊中國崩壞的一個伏流的波浪！』（見中國革命運動史一九八頁）

因此，我們看義和團的運動，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東西，他雖然是失敗，遭受了帝國主義無情的痛創，然其結果却有很大的影響；即是說他爲中國第一次的革命開闢了一條很順利的道路，使後來的革命者更容易踏着他的遺跡勇敢向前！並且，牠不僅影響於國內各階級，甚之，影響到世界舞台，主要的如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所以列甯抓住這問題竭力的反對沙皇，並向中國和全世界千百萬勞苦羣衆褒揚義和團之反帝國主義的英勇，極力的抨斥沙皇政策之不當，他將民族問題附屬於全世界革命的兩大營壘之中，其理論的內容，的確有介紹之必要。

第七節 烏里雅諾夫論義和團

在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各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中國又得着一種新的保護——庚子條約的保護，越

發肆無忌憚；故其對於整個中國民族的壓迫便無所不用其極了。然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分贓舉動，不僅引起了列強內部之間的衝突，並且還引起了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的觸動便首先伸張到俄國，因為沙俄政府要想在中國獲得更大的利益，不得不從事於大規模的軍事準備，其是將巨大的軍費用費轉嫁到人民的身上。

因此，列甯對於這個問題曾以極強硬的鬥爭態度反對沙皇，而另一方面却又表示與中國人民的友好，對於義和團運動致革命的敬意，而流露無限的同情！他曾經發表了一篇關於義和團有名的論文，標題為中國的戰爭，在這篇文章中間，他無情的指摘了俄皇的醜態以及那些征伐『黃禍』的隊伍在中國的罪惡，另一方面，他又說明了義和團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同時還說明了殖民地的政策的內容及其給與中國人民的影響，更指出俄國及全世界勞苦羣衆之未來的前途。例如他首先就指斥俄國在這次戰爭中的所做的罪惡，他說：

『俄國與中國戰爭已告終止。在許多軍事區域發布動員令所費計數百萬盧布，派遣數萬軍隊開赴中國，屢開戰費，屢獲勝利；此種勝利，不僅是戰勝敵人之常備軍，並且戰勝大部份義勇隊，尤其是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淹沉於海，并擊斃婦孺，至於強劫皇宮與商舖，那更是意中之事。而俄皇政府和仰承鼻息的報紙均大聲疾呼的慶祝勝利，俄羅斯仁慈軍隊的新戰功，歐羅巴文化降服了野蠻的中

國，俄羅斯在遠東文化之使命得到新的成功，歡欣正是達於沸點啊！然而在這種歌功頌德的慶祝聲中，曾不曾聽到覺悟工人的聲響，這覺悟工人乃是代表數百萬的工人羣衆；因爲現在政府之所謂新勝利，其擔負是完全直接歸於數百萬工人羣衆身上，既從工人羣衆中徵兵調赴遠道，并尙須徵收重稅以彌補數百萬的戰費，我們試探究這個問題，社會主義者對於這次戰爭應表示怎樣的態度？戰爭究竟爲誰的利益而戰？俄羅斯政府所抱之政策究竟有怎麼樣真正的意義。」

列甯很顯然的，他不僅要去說明由義和團所引起的瓜分中國的戰爭，并且還要說明社會主義者對於這次戰爭究竟要採取什麼態度？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在批評沙俄政府之強盜政策之餘便提出自己的意見：

『俄皇政府倡言俄國並非是與中國開戰，祇是爲征服中國的橫暴，肅清中國的反叛，及輔助中國正式政府以恢復國家的安甯而已；固然，雖無正式的宣告戰爭，但是實際上軍事行動又與開戰有何區別？我們試想中國人爲什麼反對歐洲人？英人法人俄人日要肅清中國的叛亂究竟從何產生？主戰者倡言黃種仇敵白種，中國人嫉視歐洲文化，誠然不錯，中國人是嫉視歐洲人，然而究竟爲什麼嫉視歐洲人？中國並不是嫉視歐洲民族，蓋彼此間并未有何種衝突，其所嫉視者乃歐洲的資本家和代表歐洲資產階級的政府，此輩誇美昌明的文化，到中國肆意誑騙和盜竊虐待，此輩貪欲無厭的歐洲人在中國，

豈有不使他們嫉視嗎？對中國開戰，乃為奪取權利，為要自由販賣鴉片權藉以昏迷中國人民，利用基督教假面具，藉達到盜竊政策之實；這又豈有不使他們嫉視嗎？……」

「殖民地的政策，就是盜竊政策。凡是資本主義發達愈快的國家，他便很快的侵入到殖民地在那些工業落後彷彿族長政治制度的國家中消售工業生產品以攫取利潤；資產階級的政府爲了少數資本家的貪殘即開無理的戰爭，驅軍隊於近赤道的反常氣候中以致疾病，從人民身上攫取數萬萬款項投向殖民地作爲開拓經濟，使土人不得不起暴動，使土人因飢餓而致死；試想印度土人反抗英國之暴動及現在英國的對巴魯的戰爭等，印度人之飢死者更不知幾何！現在歐洲資本家貪慾殘暴之手伸向中國去，俄皇政府不啻參與前列而尙欲竭力表示並非野心，試問奪取中國的旅順口和建設滿洲鐵道由俄國軍隊保護，這也可說是無野心麼？歐洲各國政府繼續拼命掠奪中國的領土（錯了！錯了！是租界！），所以風聞中國將遭瓜分之禍，其實揭破文飾之歌，歐洲各國政府很早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而俄國政府又站在他們的前列），祇是非公開的瓜分，而是暗中如偷兒一般，彷彿是偷兒竊屍體，而這個假的屍體忽然要起反抗，則就立刻如對待野獸般的攻擊；燒毀村落，淹沉平民於黑龍江，槍斃和殘殺手無寸鐵的平民及其家屬；此種基督教的勳功偉烈，同時尙大聲疾呼的打倒野蠻的中國人，莫非野蠻的中國人還想舉手打擊歐洲文明人麼！……」

「俄皇政府在中國實行這樣的狂妄政策有怎樣的意義呢？此種政策對於誰有利益？這就是爲了少數大資本家與中國通商的利益計，一般工廠主，以生產品運輸到亞細亞，少數大包作者因本辦製造緊急軍需品以賺得無數金錢，亦均有利益（現在有幾個軍需工廠製造軍需品，其生產率達到最高率，工人不足則又招募臨時包工）。還有一部份朝廷貴族高等文武官趁着冒險投機政策以冀得功升級而遺留聲響給子孫，故俄皇政府毅然決然犧牲全國人民的利益於少數資本家與官箴，由此可知專治制度沙皇的政府，時常跪在大資本家和朝廷貴族之前以處理國政，蓋此種政府均由於奴隸性的官僚組織而成。俄國的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者對於中國的勝利有怎樣的利益呢？是驅勞動者赴戰場，一方面增加國稅并募公債以彌補戰費，結果就是數千家庭的破產，一方資本家的實力伸張就得壓迫工人，而工人生活狀況，更一天比一天困難。至於農民每年亡者更多，在西伯利亞發生飢荒，這均是與中國戰爭之現實的效果，而將來尙不知伊於胡底呵！俄國奴隸成性的一切報紙雜誌，如不得政府官僚之許可任何消息都不得登載，故對於此次戰爭人民担負幾何，我們不能知道確實的統計，但是戰費必在數百萬盧布之數可無疑義；有人謂政府共支戰費一萬五千盧布，有未頒佈之諭旨_{在案}，現在戰費每三四天需戰費百盧布云。政府用錘銖必較的方法截斷了供給飢餓農民的救濟費，縮減了普通教育費並竭力榨取國有工廠工人和郵務職員等等的血汗，直如富農壓迫貧農一樣，將所剝削的以之彌補戰費，財政總長——波

采宣佈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國庫剩餘二萬五千萬盧布，至今已空無所有，故政府不得已發行公債券并增加國稅，因財政的竭蹶而縮減必要的政費，停止建設鐵路；由此觀察政府或將蹶於破產，但是不顧及於此而抱侵略的政策，此種侵略的政策，不但需巨大的經費，并且將來還能惹起更凶險的戰爭，蓋此次聯合攻擊中國之列強因分贓不均而彼此已有爭端，誰又能知道他們的爭端將達於如何程度哩！』

最後，列甯更坦白的攻擊沙皇之以民族的觀點來抹煞階級的觀點，企圖避免羣衆的鞭撻，他說：

『沙皇政府對於中國之政策，不但是犧牲人民利益而已，尤其是蠱惑人民的政治覺悟，蓋凡是以武力擁護的政府，必然是壓倒人民的不滿意，因此，祇有將人民對政府不滿意的傾向移轉目光到其他對象，故連用一種政策，如煽惑大俄羅斯對於猶太民族之仇視是；而下流報紙竭力噉使人民反對猶太人，難道猶太工人不是如俄國工人同樣的受資本家的壓迫與警察式的政府虐待麼？而在現在報紙上又極力鼓吹反對中國人，宣傳黃種人的野蠻，黃種人對文化的仇視，俄羅斯爲要教訓他們計，軍隊何等的勇敢與他們對戰等等，這是何等的堂皇！……中國人民自身亦如俄國人民同樣受着痛苦和危害，亞細亞式的政府，從饑寒的農民中逼迫着輸稅，對於人民之傾向自由則以武力壓制之；另一個危害則是資本家的壓迫，這個資本家的壓迫亦漸輸入中國。』

對於這一切的關於俄國內部的重要問題，列甯更提出如下的解決方法：

「現在俄羅斯工人階級逐漸由黑暗中露出頭角來了，但是人民羣衆仍然蟄伏於黑暗的政治裏，故有覺悟之工人應竭力反對蠱惑民族間之嫉視，并須反對那般遮掩工人羣衆目光的真正仇敵者，這是他們的任務，沙皇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是萬惡的政策，將更使人民破產，還更淆惑人民，還更壓迫人民；沙皇政府不但使俄國人民奴隸化，并且派遣軍隊赴其他民族鎮壓他們的反抗使之奴隸化（如一八四九年俄國軍隊干涉匈牙利的革命運動）。沙皇政府不但是輔助俄國資本家壓迫本國工人，綑綁工人手足不但彼此聯合共同防禦，並且爲少數財主和貴族的利益計，派遣軍隊到其他民族去。勞動人民羣衆若要解脫這個戰爭的新的枷鎖，祇有一個方法：「召集國民代表大會」。此國民的代表大會，卽能斬斷政府的橫暴，使他不僅在朝廷羣狗的利益上。」（列甯全集第六卷十六頁——二十頁）

此页空白

第六章 帝國主義的深入與中國殖民地式產業革命的形成

第一節 產業革命思想的先驅——康有爲變法

自義和團事變以後，帝國主義者很明顯的看到那武力的瓜分政策不僅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甚至使內部的矛盾亦復趨於緊張的狀態，這些帝國主義者內部矛盾之具體的表現，如英德的衝突，日俄的衝突，以及後來的美國與其他國家因「勢力範圍」的衝突，彼此都是互相鉤心鬪角，誠然是二十世紀初期帝國主義史上的奇形怪狀的一頁。

可是，義和團事變的經驗教訓了他們；如果要想在中國獲得更豐富的利益，那麼帝國主義的列強對於殖民地的策略便要有所改變，當然，這一個改變的意義與傾向是在不妨礙帝國主義列強利益的條件之下進行的，換句話說，全世界資產階級各自經過他們政府的路線，伸其殘暴的，貧得無厭的手來掠取中國人民的血汗——金錢。

什麼是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中國）新的策略呢？綜結起來說，便帝國主義共同的向中國投資，

建設鐵道，發掘中國未曾開發的財富（如鑛藏一類的東西），大批的運輸機製的工業品到中國來；另一方面又以賤價吸收中國農產品的工業原料，依據這些情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在客觀上最初期牠算是盡了推動的作用。

本來，在中日戰爭的前後，滿清政府對於帝國主義之扣關來犯已經是深深的感覺不滿，因此，有一部份『階級自保』的人們，企圖採取『日本式』的道路——模倣『明治維新』的變法。當然，此種變法的動機，完全限於階級自保，說得恰切些，是一種改良的烏託邦的幻想。不過，這種理想縱然如俄國『十月黨』一樣的，沒有即時實現的可能，然就其在中國全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意義而論，此種變法的理論，實是中國殖民地式的產業革命思想上的先驅。

康有爲便是變法運動的理論的和實際的領導者。

康有爲他生長於南中國最大的國際貿易港之一——廣東的南海縣，他是一個中人之家的子弟，他自幼感覺即異常敏銳，對於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是深惡痛絕。他這種意識很顯然的是代表南中國商人的心理；然而人微言輕，下情以上達爲難。他當時對於滿清政府雖有許多重要的政治意見，但是無由發表，會有光緒皇帝的先生——翁同龢對他青眼相加，於是乎經過翁同龢的介紹和鼓吹，因而與光緒皇帝見面，自此次『一登龍門』以後，康有爲的身價便十倍於往昔了！

青年的光緒皇帝，在主觀上，他們確是企圖『勤求民隱』，以便對於腐敗的滿清政府有所改革，康不爲於此種鼓勵之下，於是便積極的申述他的觀點；他首先就從國際形勢以及中國在國際地位的現狀說起，他認爲俄國當時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他說俄國有蠶食鯨吞內外蒙古及新疆的危險，一旦這些地方爲他佔領，那麼，決不是從撻俚之間所能收回，而是和『肥豕臍羊，已入虎口，而牧者乃哀詞揖讓，望其吐之，不其偵乎？！』同時，他更去估量英國，他說英國是個商業家，他是恐怖戰爭，何況英國對華的貿易占了百分之八十，幾幾乎做了中國商業的主人，他指出英國之不願意戰爭的原因（註：這是一八八七年的意見）：地理的和政治上的條件是束縛了這個大英帝國。

但是，他同時補充的說，如果俄國與中國開戰，那麼，英國與日本不但不會幫助中國反對俄國，甚至還要與俄國結成鞏固的同盟，將中國放在十字架上而共同的宰割呢！至於怎樣才能將中國拯救出來？在康有爲的意思，以爲祇有模倣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始能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羈絆；故他於日本明治政變記考敘中說：

『臣聞國無大小，民無衆寡，能修其政則強，不修其政則弱。……俄本葛爾，自大彼得起，發憤變法，而霸北球；德大非特獵起自小普，能勝俄，奧，法而成強大，威廉第一能用俾士麥治國，今乃霸全歐；薩諦尼侯國，有賢相嘉窩與其主伊曼奴核，起而勝帝國之奧，意遂以立。若夫日本，地域比

我四川，人民僅我十之一，而赫然變法，遂殲吾大國之師，割我遼台，償二萬萬！若夫印度突厥，豈非古有名萬里大國者？然今則夷爲奴隸，或割爲病夫，聽諸歐蹂躪焉！……況今者四海棊通，列強互競，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器，日出曹奏，歐人乃挾其汽船鐵路貫穿大地，囊括宇合，觸之者靡，逆之者碎，採而用之，則與化同……拒之則弱削，日本極小國，更新變用之則驟強，此其明效大驗，公理正則，無可遁逃者矣！……若以我廣土衆民，十倍於日，皇上乾綱獨攬，號令如雷，無封建之強侯，更無大將軍之霸主，片紙渙汗，督撫貫行，四海無虞，民罔異志。就今歲入，已逾萬萬，若括陋規，必可得倍，若正經界，更得倍蓰，若善銀行之用，則不可思議也！若因日本譯書之成業，政法之成績而妙用之，與我同文，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政之次第，鑒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規，悉發現于我神州矣！夫凡有興作，必有失弊，幾經前車之覆，乃得後軌之適；今我有日本爲鄉導之卒，爲測水之竿，爲探險之隊，爲嘗藥之神農，爲識途之老馬，我盡收其利，而去其害，何樂如之！譬如作室，歐美製型，日本爲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歐美覓種灌漑，日本勸艾，而我食之也。雖國勢不同，民俗少異，有不可盡用者，則斟酌補苴，彌縫救正，亦何難焉！……臣會上書言日本變法已強，將窺遼東；先謀高麗，大臣不信，猥以疎賤，九門深遠，格不上達；及東事之興，舉國人皆輕

日本之小，貿然興戎，遂致敗辱，則不察鄰國，誤輕小邦之所由也。嚮使二十年前，臣譯局書成，或十年前長吏聽臣言譯之，或六年前，大臣信臣言而入告，皇上亟變法而預妨，有一於此，其在前乎？則國民必瞭而不矇，其在後乎？則中國已強而無患！乃皆不獲，遂致喪師辱國，割地賠款，以至於此也！臣不能不歎息痛恨也……誠以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詳，觀前車之覆，至險可鑑，若採法其成效，治強又至易也。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法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衆民，近採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臣荷皇上非常之知，敢爲中國自強之計，未有過此。皇上若採臣言，中國之治強，可計日而待也！……」

（康南海文鈔第一卷二十二頁——二四頁）

康有爲是異常堅決的企圖走日本式的道路，因此，他更具體的提出一些變法的綱領；這種綱領式的變法的意見，其最重要的有如下各點：

（一）召集國會以確定君主立憲的政體：當時康有爲以爲君主專政不僅不適合世界潮流，甚之，還要引起國內人民的反抗，因此，他企圖將特謨克拉西的要求披上一重封建外套，即是說，以孔子的學說來掩蓋他變法的鋒芒。我們看他說：『中國政教之原，皆出孔子之經義，孔子作春秋以定名分，君不曰全權，而民不爲無權，但稱其名而限其分，人人皆以名分所應得者，而行之保之；君不奪民分，

民不失身家之分，則上下自安，身安而國家治矣。憲法之義，即春秋名分之義也！……今大地各國，皆已改行立憲，苟不改者，則身弑國亡，如俄及波斯；今事汲汲，而法大革命之事可證矣。此其成效得失，天下咸知，……或疑於民智未開，資格未至耳，夫中國之大，四萬萬之衆，學校之盛，當講求新學之般，通於中外之彥，殆不可數計，而謂區區數百議員，竟無此資格之人才，此不獨厚誣中國，有貶人才，亦無此理矣！……若一開國會，則人民有選舉之權，即有担任稅務之責，司農無事仰屋而憂，而經武營邊，舉行新政，自強至易；夫不開國會之害如彼，立開國會之利如此，然則何事遲疑徘徊而不立行耶！……」（見同上書第四卷十三頁）

很顯然的，要求召集國會的策略，是康有爲變法運動的總路線，根據這這個總路線出發，於是乎他更積極的提出許多問題來充實國會的內容。

（二）遷都江南：揚子江流域一帶經濟的發展，竟誘惑了康有爲先生，使他拋棄了那落後的北地燕麗，進一步的來歡迎南朝金粉。他認爲：『王者都畿，爲民所止，吸力愈大，文明更繁，英之倫敦，法之巴黎，萬國動觀，亦旣觀止，然各都之聚集民衆，實視得地與否；德之柏林，當道光十年，人民僅六萬，至今僅數十年，人數遂過三百餘萬，爲大都會第三矣，以得地而便工商故也。俄大彼得之大變法也，遷都於臨海之聖彼得境，大便工商運業而國強；日本之復王政也，亦遷都近於海之江戶而強

盛；西班牙馬得理京，憑連岡而無水，不便工商走集，故昔雖霸有南美，而京邑叢爾陋小，爲人所輕視，則宅京之失地利故也；西班牙之篩非故回京，近海廣陸，易集工商，班人不知遷都之，則繁榮難滋，蓋建都之時，或因拒敵控險致然，遂永爲後世之累矣！我燕京之能久建千年，實因金，遼，元，明便控於遼漠之故，蓋據亂世憑險之都，非昇平世阜民之地也。且飛沙積雪，盛暑祁寒，其地其時，皆與人民不便！……且今中國之人民及生產力，皆在長江流域爲多，而萬國競爭之通衢，皆注於太平洋爲盛。……以我幅員之廣，人民之衆，財力之富，當爲大地霸國，則宅京圖大，必當顧視全球，內之當思收長江萬里之精華，外之當爭太平洋海之權利。……竊謂內憑蘇州，以握江南之勝地，外臨上海，以控太平洋之通衢，北界江陰，以收長江之利賴，南襟太湖，以吸水澤之秀氣，周方縱橫約二百餘里，規爲新都。每三里闢馬車之坦途，每三十里闢一電車鐵軌之通道，凡大學，公園，博物院一切建設，皆擇勝地，而虎丘無錫，皆置行宮，……計不三年，繁盛已不可思議！……」（同上書）此種繁榮市政的主張，在現在一定有很多人們的同情，可是在當時一般落後的官僚對此主張都是冷嘲熱諷而不願加以考慮啊！

（三）要求中央集權：康有爲認爲督撫制度的存在，會助長地方割據的傾向，他說：「督撫各自爲政，無論兵餉大權之倒持也。」他并且還列舉許多的事實去說明此種制度的不當，最後，他更勇敢的

要求「裁督撫而以州府爲行政區長」。當然，康有爲之所以提出中央集權的意見，完全是針對着滿清政府之腐敗的政治系統，而企圖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

(四)鞏固邊防：在變法運動中認爲比較重要的問題，當然邊防也是當今急務，因爲帝國主義已竭力向這些荒僻的地方發展。關於邊防之具體方案，根據康有爲的意見，所謂邊防者，卽對遼，蒙，回，藏而言，處理遼蒙回藏問題，政府應當添設這四部大臣，并且要求多派官吏到這些地方去經營；主要點是從教育着手，在思想上去領導這民族。他以爲「國勢久弱，諸邊遼闊，強鄰窺伺久矣！慢藏海盜，狡焉思啓」。他從地理方面去說明這許多地方的重要，并且還以煽動的辭句來警告那些醉生夢死的人們：

「習於輕羅羽扇，豈知大雪已飛，慣於山園席眠，豈知虎熊環至！以列強之界在比鄰，日相窺伺，試問尙得以百年前之小番跳梁，遠荒無人者比之乎！近年東遼幾變爲俄人之疆，西藏幾屬於英人之土，亦既動魄驚心，談虎色變矣！乃若法窺滇桂之境，俄擾蒙回之邊，邊吏飛電，警報日聞！……」

(五)編練海軍：在提出編練海軍制度以前，他首先對於國防的趨向有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他認爲現在的中國與以前的中國迥不相同，因爲那過去的閉關自守的自治，已經是不復存在了；從前都是「經營漠北，鎮撫內地，精練騎射，足以自雄」！可是，現在這些東西在國防上已成爲不重要了，主

要的原因，是由於國防間的交通都以海運爲中心；歐洲人的海軍可遠涉數萬里的重洋，而中國對於海軍則寂寞無聞！因此康有爲認爲假使中國缺乏海軍，彷彿和魚一樣的失掉了翅，和鳥一樣的失掉了翼，和人一樣的失掉了手足，任憑人家束縛而已。他還舉出許多國家爲例，如英國之所以能夠侵略印度者，完全依靠着海軍；日本之所以能夠戰勝中國者，海軍實是日本主要的力量。他還形容中國因無海軍而遭受帝國主義者的蹂躪：『各國公使入外部而特強要索，不得輒拍案慢罵曰：「吾將調兵艦來」，吾大臣卽畏而俯首聽命，甘割地失權者，以彼有海軍故也。……』他的海軍計劃，是『擇南北之港塢，定營製之艦數，增造船廠，多開學堂，多魚雷以便守衛，增快艦以便敏速。……』在海軍計劃以後，接着他又提出徵兵制度。

(六)軍國主義：在帝國主義的嚴重軍事的壓迫之下，逼得一部份富於國家觀念的人們發憤圖強，康有爲便代表這一部份人的傾向。他以中國的積弱與募兵制度有密切的聯繫，因爲在募兵制度之下，很多的人們迴避了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工作；他一方面固然從歷史上說明中國徵兵制度的優點，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舉出德國和其他國家民族之尙武精神。他描寫德國的青年之尙武門很，說凡是一個學生他的面部如果沒有刀痕，那麼，人家就會以非壯士相笑了！因此，他的結論認爲如果中國實行徵兵制度而全國皆兵的話，經過數年的訓練，即可成立數千萬的軍隊。這時候康有爲便自豪起來：『天下

莫強，誰敢侮余！」

(七)創設工廠：『富於兵備，則爲世雄，寡於兵備，則爲人弱！』康有爲關於兵備的問題，很早他就有這樣的意見，所謂兵備，當然是包括船廠，鎗砲廠，以及一切軍用品的工廠，因爲這是與軍國民主義有關聯的設施；聰明的康有爲，他首先便引用中國歷史上管子的言論，如什麼『器械不精，以卒與敵！』以煽動皇帝，最後，他更就德法戰爭的事實來說明設置兵工廠的必要。他舉出德國之所以稱霸歐洲完全爲克虜伯砲一物而致。

(八)經濟的建設：據狄拉克說，『康有爲說，爲增加人民的幸福，必要實行四種策略：幫助農業，挽救手工業，扶助商業，周濟貧民。關於農業問題，意大利，法國的政府方面特別幫助養蠶業，在錫蘭島獎勵種茶葉，以與中國茶葉競爭。中國政府亦應作同樣的幫助絲茶商業。歐洲扶助手工業而得機器，電氣，鐵路，軍備等的發展，各國爲手工業及農業創造專門的學校，中國各省，亦應做倣行之。我們的對外貿易因而沒有幫助，雖然，我們國家很富，而不能去遠方與外國貿易品競爭，應當創設商業學校，扶助組織商業公司，取消釐金。中國大使，應當研究外國情形，中國應創辦重工業，中國因人民過剩及缺乏工業以致國民間有大批貧民；皇帝更不知道有多少貧民，爲救濟這些貧民，應當獎勵向新疆，蒙古，及滿洲等處殖民。政府應扶助在彼處組織殖民地，爲達到這目的，必要建築鐵

路，應當扶助人民的工業及手工業，應當創辦爲失業工人及在業工人的教育學校，應當顧慮貧民及孤子，爲達到這些目的，應當改良教育制度；取消中國舊式的考試制度，應當設立專門學校，扶助國民智識的發展；國民的智識就是表示國家的力量，中國人每百人僅有二十人識字者。」（中國革命運動史一六五——六六頁）

我們看了上面康有爲一些綱領式的變法意見，的確相信這些意見完全是資產階級改良式的政綱；他的中心點幾乎全部份是爲着中國未來的資產階級着想，然而康有爲自身并不是個資產階級。我們要說明這一點，因爲這是關於康有爲變法的基本概念；康有爲他是代表中國整個官僚中進步份子，他是滿清統治階級的一個左翼，不過，他在某些地方特別是受着了帝國主義者的影響，因此，他腦袋裏裝進了一些模倣的資產階級意識的成份。

康有爲的主張，經過了屢次事變的測驗，在當時愈加證明其正確，因此他的意見竟在羣衆中起了影響，特別是那些青年的智識份子，擁護他的意見。當然，那班落後的臣僚以及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她們都是不願意變法，何況袁世凱再以嚴重的「宮廷改變」的消息告她，其對於「維新運動」的仇視，真似火上加油了！歷史上有名的「戊戌政變」便在此種情況之下舉行了，那慷慨激昂的譚嗣同等所謂「六君子」，從此便作了變法運動的殉葬者。

這次變法運動雖然是沒有完成，可是，牠却留給我們很多的教訓：牠本身雖不是個資產階級的出身，然而對於後來的中國殖民地式的資產階級，確有很光榮的勞績，他替中國的資產階級在思想上開闢了前進的道路，告訴了中國未來的資產階級發展的途徑。但是，他的缺點更多，如一種政治上的改革，不僅僅以適合於中國民族的需要，同時更應當注意將這種需要與擴大的羣衆結合起來；至於革命的熱忱與鬥爭的勇氣，那是不成問題的要重視，不過，個人的英勇是不克奏效，而需要與羣衆同一步調；拉狄克說：『鬥爭不在乎以流血愈多爲目的，流血不應是個人的，不是離開羣衆的，這犧牲流血的人是要與人民羣衆聯結起來的。』又說：『我們如果站在廣大羣衆利益立場上，是沒有一滴血是空流掉的！』

我們看在康有爲提出變法的意見以後，對於中國的國民經濟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影響？

第二節 交通網的新建設

我們論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產業革命的影響與推動，那麼，首先便要涉及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之大規模的空前的交通網的建設；嚴格的說起來，如果沒有偌大的交通網的建設，中國的資本主義不僅不能發展，甚之於他的形成與否都成問題呢？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整個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完

全是尋找市場，主要的中心，當然是要求租界。因此，關於商埠的開放，便如雨後春筍一般的出現：

商埠名稱	開放年份	商埠名稱	開放年份
天津	咸豐十一年	南京	光緒二十五年
秦皇島	光緒二十七年	蘇州	光緒二十二年
北平	光緒二十九年	杭州	光緒二十二年
煙台	同治元年	寧波	光緒二十三年
蕪湖	光緒三十三年	溫州	光緒三十三年
安慶	光緒二十八年	福州	道光二十四年
上海	道光二十三年	廈門	道光二十四年
鎮江	咸豐十一年	九江	同治元年
漢口	同治元年	滿洲里	光緒三十三年
沙市	光緒二十二年	愛理	宣統元年

龍州	桂林	惠州	北海	江門	三水	廣州	瓊州	汕頭	重慶	萬縣	長沙	宜昌
光緒十五年			光緒三十年	光緒二十三年	光緒二十三年	道光二十三年	咸豐九年	咸豐十年			光緒二十九年	光緒三十年
龍井村	綏芬河	白草溝	頭道溝	局子街	臺古塔	哈爾濱	長春	吉林	琿春	三姓	海拉爾	齊齊哈爾
宣統二年	光緒三十四年					宣統元年		光緒三十一年	宣統二年	宣統元年	光緒三十一年	光緒三十一年

騰	越	光緒二十八年	鳳	鳳	城	
河	口	光緒二十一年	大	東	溝	光緒三十三年
思	茅	光緒二十三年	奉	天		
蒙	自	光緒十六年	安	東		光緒三十三年
梧	州	光緒二十三年	牛	莊	咸	豐
						十
						年

當然，在上表中間，也有一些商埠是二十世紀初期所開闢，不過，就大部份言，屬於十九世紀的是占多數。在這種情況之下，很顯然的，如果這些商埠不與交通網聯繫起來，那麼，國際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影響，在經濟方面說，還不能深入五臟六腑。帝國主義者根據此種認識，故不得不積極的來發展中國的交通事業，因為交通是工商業的命脈，牠更便利於那些強盜式的資本家投機，同時，每個帝國主義者都想做中國實際上的主人，交通當然是唯一的政治上軍事上權力集中的利器。

關於交通網的建設，在當時因航空事業尙未普遍，祇可分作兩種形式：航海線與鐵路線。先就航海線來說，當時帝國主義的經營與中國的領海權已經喪失得令人可驚；如自庫頁島之喪失而鄂霍次克海之領海權亦隨之喪失，吉林沿海一帶之割於俄羅斯，朝鮮改隸日本，所有日本海面之領海權亦復

喪失殆盡！其他如緬甸之隸屬於英國，而孟加拉之領海權放棄，旅順大連之先租與俄，營租與日，威海衛的租借於英，所有渤海沿岸都發現帝國主義者的足跡。并且，各國商船，這時候可以很自由的航行長江及東海沿岸一帶，其航海線的廣闊及其經營的野心，真是令人咋舌！然航海線在交通方面還不能作為唯一的主要利器，因為鐵路才是資本主義唯一的毒龍！

關於鐵路在中國的史略和其利權喪失的經過，我們可以約略言之：在十九世紀末期，中國之所以建築鐵路者，并非出於中國政府之本意，完全受帝國主義者的威脅和催促；帝國主義要銷售他的商品於中國內地，除了航海的運輸而外，不得不借重這一利器了。故爾於一八六三年由英美商人建議敷設由上海至蘇州之間的鐵道，可是這個建議遭受地方政府嚴厲的拒絕；然而富於百折不撓精神的基督民族，他們并不因此而對於鐵路事業有所灰心，他們仍然和烏龜一樣的按部就班的向前走去，曾幾何時，又組成了吳淞鐵道公司，由囊囊充實的怡和洋行承辦一切材料，這個毒龍（火車）竟於一八六八年二月十四日開駛與中國人民見面了！一種進步的事業，必然的引起了落後人們的反對，中國最初期的鐵路，亦復同此命運；許多的守舊臣僚與夫低級心理的羣衆，都認為這個怪物不但破壞了中國的風水，甚至於這驚動了土地龍神。因此，在這鐵道建好以後，那成羣結隊的農民都暴動起來，要求政府拆毀牠；政府對牠本來就有幾分不滿，再加上羣衆要求，於是便有所藉口了，結果，以二十八萬兩

的代價贖回這條輕便鐵道，并將所有的鐵軌和車頭加以懲罰而充軍到臺灣去。

這便是中國鐵路史上紀元的一頁，相隔二十年以後，帝國主義者又從事於鐵道的工作了；如一八八七年所完成的北京至唐山的一條輕便鐵道，牠便是中國鐵路的真正代表者。在中法戰爭爆發的時候，中國政府因為軍事上便利起見，才相當的注視鐵道的重要，而將開平公司改爲中國鐵路公司，又復在帝國主義指揮監督之下，向英國匯豐銀行籌借大批款項，以從事發展鐵道的工作。在甲午戰爭之後，俄國人逼迫日本讓出遼東半島，同時那經過黑龍江之西伯利亞的鐵道權亦爲俄國所掠取。自此以後，帝國主義爭奪中國鐵路建築權之程度幾乎是與日俱增，如一八九五年中法協定中很明白的規定法國人有在中國境內建築鐵路之職權，英國深恐自己的利益爲其他列強侵犯，所以特別的提出五條鐵路之專利權：

- (一) 天津鎮江線；
- (二) 山西河南線；
- (三) 九龍廣東線；
- (四) 浦口信陽線；
- (五) 上海杭州線；

在另一方面，後起的國家對於鐵路建築權及營業的獲得，也是急起直追。如德國之獲得膠濟路的建築權，比利時於一千九百年獲得粵漢鐵路之營業權，美國之對於京漢路的投資等等，彼此都是互相排斥。自一八九五至一九零五年的十年間，關於鐵路權之四分五裂的情形，有如下表：

國別	自由經營		享有		獨建		築權		者
	哩數	投資額	哩數	借款額	哩數	借款額	哩數	借款額	
英	三三	五〇〇	二八七四	二六、七〇〇	二、六四六	一七、六〇〇			
俄	一、〇七九	六六二、〇〇〇	一、〇七九	六六二、〇〇〇	——	——			
法	三四六	七、〇〇〇	三四六	七、〇〇〇	——	——			
俄法比	——	——	三〇、七一〇	四七〇、二五〇	——	——			
德	二八六	三、〇〇〇	一、三四七	八、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日本	六九五	一、二、四〇〇	一九五二	一四、六七	——	——			
總計	二、四三六	八九、一四〇	一、二〇六	一六九、八五七	三、〇一五	二二七、〇〇〇			

并且，當時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鐵道的投資，好似發狂一般的踴躍，如幾個主要的鐵路，可以說完全在帝國主義的手中，其投資的總額，如下：

名稱	所屬國	距離	借款額 (鎊)	備考
津浦	英德	六八六	八,000,000	
川粵漢	英美德法	一,100	六,000,000	
廣九	英	八九	一,500,000	本線有三哩通過英租界九龍歸英經營
滬杭	英	二二五	一,500,000	雖為我國所有仍受借款條約支配
京漢	日英法	八三七	五,000,000	本線本為比國代造後以借款關係歸於三國
吉長	日本	七九	二,500,000	日本繼承俄國之權利
新奉	日本	三七	二,000,000	初為借日款建築後由京奉路借款償還
合計		三,013	二二,025,500	

然而滿清政府對於鐵路的管理，却是漠不關心，於光緒三十二年始正式成立郵傳部，以前關於鐵路一切行政，概歸商部通藝司管理；當郵傳部接管由商部移交鐵路宗卷的時候，據現在南京政府鐵道

部長——孫科在青年會的報告，『舊卷僅十六宗，新卷一百零二宗』，其工作之簡單，真是令人難於想像。

有一位俄國的著作家——卡多洛維赤，他寫了一本外資與中國鐵道的作品，在這一本書裏面，我們看出外資在中國鐵路事業中的實際權威：

『第一，外國資本家根據鐵道的條約，獲得巨大的利潤。這些利潤主要的來路，就是中國實收借款數較名義借款額爲少，——通常如借一百元，實收僅九十元，利息不按九十元計算，却按一百元計算，并且每年利息還有担保。此外建築鐵道的資本團，取得代購建築鐵道的一切材料權，這樣一來，則借款的銀行不僅獲得利益，并且又在購買材料中又賺錢不少。我們知道，銀行團與外國工廠發生聯繫訂購商品時，雖然商品價格須取得中國監督官之同意，但銀行家照例稍爲賄賂中國官吏後，於是價格便可遠超過於歐洲買入的實價以上了。』

『第二，鐵路實際上落在外國人的手裏，然而中政府經常委任督辦職員，但實際管理者不是那些督辦，而是外國工程師。一般的重要職員如會計及管理工程師等等，均屬於外人；及技術上之人員亦多數屬於外人。最後，更特別的就是當政府不付給利息的時候，鐵路就爲建築人所有了。這就是說，若是在中國政府無力償付利息的時候，就拿這條鐵路的財產來抵帳。僅僅是到後來，中國政府才變動

付息的方法，用一定的國家的收入（普通用關稅的收入，因是關稅便歸外人管理了）來担保。中國政府之所以如此的企圖，原因就是準備遇着不能按時付息的時候，鐵路不會變爲建築公司的私有財產。……」（見中國革命運動史二〇三——四頁）

很顯然的，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鐵道事業所採取的毒辣的手段與狡猾的政策，可算是無所不用其極，他認爲在中國的統治可以長治久安；彷彿中國從此就衰弱下去，和果實一樣的自然凋謝了！然而事與願違，中國不但沒有如他們那樣的想像簡單，并且從此以後，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又發生了一種最前進的新的力量。

關於這種情形，拉狄克說得很對，他說：

「當歐洲資本家建築了鐵路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念及這將要造成中國工業發展的動力。他們只是那樣想；「我們建築了許多鐵路在中國，我們將要藉鐵路來售西歐的工業品，而從中國我們將要榨取許多鄉村經濟的出產品。」若是我們讀到當時帝國主義的大煽動的文字，那麼，就可以隨時遇到這種議論。譬如當機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向德國工人們宣傳不要反對資本主義侵略殖民地的企圖的時候，他們說德國的人民在六千萬以上——而德國的鄉村經濟不能供養這些人民；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德國工人向中國輸入工業品而同時藉此利用中國鄉村經濟的生產品，或者是德國輸出口口移殖到外國

去。』

「他們並沒有計算到中國將因此自己的工業得到了發展并且將造成近代的階級，下了革命的種籽，而這個革命運動的參加者，不但是飢餓而無領導的農民羣衆，同時却種下了領導農民的工人階級了。」（同上書二〇八頁）

綜之，交通的開拓與鐵道的發展，對於中國產業的向前推進，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然而在什麼條件之下帝國主義推進中國的工業，在什麼條件之下，牠又故意的妨害中國工業的發展？爲什麼自十八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忽然停滯起來而止步不前——不能進到工業革命的階段？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明確的解答。

第三節 帝國主義的刺激與中國產業革命的萌芽

帝國主義在中國既然不斷的開拓了交通利器，又復激劇的改良生產工具，不成問題的，牠這種行動在主觀上并不是爲中國作想，恰恰相反，牠是爲在中國攫取更豐厚的利潤。基於此種條件，爲要發展牠的資本起見，不得不在開始建築鐵道的時候，注意於重工業的建立；帝國主義建立重工業，他必須於鐵道線附近去尋覓各種礦坑，因此，關於中國自然礦藏便成爲帝國主義寤寐以求的標的。其實，

帝國主義者未免過分的誇大了中國礦藏的富源，根據他們的估計，中國的煤鐵可以供給全世界之用，而尤以鐵的出產更多，同時，有一部份人又估計中國的煤有德國百分之七十九，英國百分之三十三，美國百分之二十五，但是這種估計是不甚可靠。因為礦脈散處各省，如果不以科學方法去調查和試驗，而僅憑少數人頭腦的測斷，其無重大的意義已顯然可見，同樣的，說中國再經三百年以後就會沒有煤的供給，也是屬於無稽之談！

其主要的鑛藏——特別是煤礦的開發，在帝國主義直接及指導經營之下，其發展有如下表：

國別	所在地	煤礦名稱
中國	英直隸	開灤礦務局
日本	奉天	撫順煤田
中國	日奉天	本溪湖煤鐵公司
中國	日山東	淄川煤田(魯大)
中國	英河南	焦作煤田(福公司)

據一些比較確切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中國煤的產量，在一千九百年僅為六百萬噸，迨至一九一

一年，他的生產額已增至一千三百萬噸，於短促的十年中，其生產額竟增加了一倍，其前途之方與未艾，真是鼓勵我們革命青年對於中國產業前途之樂觀。

除掉了重工業以外，關於輕工業——紡織工業（即纖維工業）之經營，帝國主義者亦復不遺餘力；僅就日本在華經營的紡織業，其發展之突飛猛進，已經令人可驚了。如下表所列，便是一個顯明的例：

年	次	工場數	錠數	紡織機數
一八九五年	一	—	二〇・三九二	三七六
一九〇〇年	二	—	四五・八七二	八六六
一九一一年	四	—	七六・三六六	八六六

在這很簡單的表裏面，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帝國主義在中國關於輕工業——紡織工業的發展，是每十年增加一次；此種惹人注目的數目字，實在是刺激了中國未來的資產階級，故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客觀上便種下了殖民地資產階級的種籽，這個殖民地資產階級的胎兒，於他的歷史過程中而呱呱墮地了。

我們追溯中國產業革命之經過，不能不首先涉及中國的軍用工業。中國軍用工業的興起，完全是針對着客觀環境的需要，自鴉片戰爭以來，滿清政府的處境，不僅是內患頻仍，並且又是外侮迭至；如中日戰爭，義和團事變，可算是每一次都是喪師失地，辱國求和。當然，人非木石，對於此景此情，不無感嘆，而滿清政府受羣衆的鞭撻與帝國主義的欺侮，不禁發憤圖強；在最初，滿清政府及其臣僚們，認爲帝國主義之所以強橫的由來，無非是依據於兵精砲銳，然而，這些都是中國可以辦到的事情，而沒有什麼特殊的困難。故大規模的設廠製造軍用工業，另一方面爲養成軍事工業專門人材起見，更派遣了大批的青年學生去到其他先進國家實習，企圖以這種方式來自強中國，可惜，不幸得很，這願望是不能實現的。

至於滿清政府爲什麼不能實現這個目的呢？并不是由於他主觀上的怠工，而是帝國主義者對他有許多的障礙，其主要點如技術人員及軍用工業的機械，都仰給於帝國主義；當然，歐洲的資產階級也不會這樣的蠢，將自己的祕密的精良的軍用機器賣給中國，而使中國人用以反對他。故而中國所購來的機器都是不適合於近代的新的需要的東西，因此更談不上什麼成績。甚之同時在另一方面，從事於此種事業的經營的人們，可以說是分百之九十五是那些落後的腐敗的官僚，他們固然是缺乏新的機械管理的常識，而搜刮和中飽的本領，則是異常的高明，因爲這些官僚們都認此種事業爲優差美缺也。

經驗教訓了他們，那黃毛碧眼的『洋鬼子』之所以強盛，除了兵精械利而外，關於工商業的重視與發展，的確是他們強盛的基礎，滿清政府及其進步的臣僚們，基於此種認識，故對於發憤圖強的途徑，不得有所改變；因此，我們從下列的一些事實中間，可以充分的看出了當時經濟變動的遺跡：

〔1〕一八八二年，李鴻章奏請在上海試辦機器織布局。

〔2〕一八八三年，上海商人祝大椿於上海設立金源五金機器廠（資本金十萬元）。

〔3〕一八八六年，張之洞於廣東發起創辦繅絲局。

〔4〕一八八七年，張之洞奏請於廣東設立機鑄制錢局及銀元局。

〔5〕一八八七年，李鴻章於天津機製局購機鑄制錢，定名「寶津局」又於保定設廠。

〔6〕一八八八年，貴州省鎮遠府青谿縣設立官商合辦之製鐵廠。

〔7〕一八八九年，張之洞在廣東設織布局及製鐵廠，向英國定購熔鑄爐二具。

〔8〕一八九〇年，上海設立官商合辦之上海紡織新局（即現在之恆豐紗廠新局）。

又張之洞將前年在廣東所訂購之織布機械及熔鑄爐，移調武漢，設漢陽鐵政局（即今之漢陽鐵廠）。

又於漢陽設立槍砲廠（即今之兵工廠）。

(9) 一八九一年，上海道台唐松岩於上海設立官民合辦之紡紗局。

(10) 一八九三年，張之洞於武昌設立織布紡紗製蔴繅絲四局，後改名湖北織布官局（今由楚興公司租辦）。

李鴻章發起建設之上海機器洋布局，於前年竣工時被毀於火。

(11) 一八九四年，盛宣懷由李鴻章奏派募集民間股本，重辦洋布局，因股少改設華盛紗廠（即今之三新紡織廠）。『以上見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第六十一——六十二頁』

但是，上面所列舉各點，不過是僅指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而言，自此以後，中國產業的發展更是一日千里。現在我們祇就幾樁重要的產業來說吧：第一，於一八九八年所完成的萍鄉煤礦鐵路，這是由中國的資本家所完成的事業。其他如廣東人民以四千萬元買回在美國手裏的粵漢鐵路預備線的權利，並且於一九一〇年完成了廣東境內一百英里的鐵道線。第二，在紡織業方面，中國又有長足的進展；如一九〇五年在上海所設立的振華紗廠，在無錫所辦的振新紗廠，在常熟的裕泰紗廠，在寧波的和豐紗廠等等；一九〇七年更設有濟泰（太倉崇明），大生第二（南通），九成（上海）等廠；而一九〇八年復有利用江陰，同昌等紗廠的創設。第三，其他的一般工業均有極猛烈的萌芽與發展。第四，中國政府這時候也轉變了施政方針，即是說對於中國本國的工商業有所獎勵；『設立商部，訂定商

律，頒佈公司註冊章程，發表獎給商勳章程，新器製造獎勵章程，工商科進士稱號章程，考驗遊學章程，華商辦理實業爵賞章程等等。……又於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設立商品陳列所，於天津設立工藝總局，工業學堂，考工廠，實習工廠；於北京設立高等實業學堂，於工藝局附屬工廠設置十二科，其後，宣統二年，又於南京開過南洋勸業博覽會。」（同上書七二頁）

我們如果將這些所有的事實羅列起來，那麼，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便無待我們再去說明了。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真是出於帝國主義者意料之外，牠——帝國主義者以為強姦這個處女（中國）是沒有什麼問題，不知竟因此而惹下了滔天大禍，即是說這個處女（中國）自牠強姦以後，忽然珠胎暗結，不久便誕生了孿生的胎兒；這兩個胎兒說也奇怪，他們不但不能報答報他父親的所謂恩典，甚之，還要與他父親算一算強姦母親的舊賬。不過這兩位胎兒雖然是情同手足，然而其仇恨亦復不共戴天，在某些地方特別表現得明顯，如在共同聲討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中，那位從右邊來的大阿哥便首先變節，他為保持自己的利益，可以犧牲了民族的仇恨，并甘心受帝國主義的象養而摧殘自己的弟兄；當然，站在左邊的小弟弟，他以解放全世界人類為他奮鬥的目標，故而，歷史已經替安排好了未來的王位。

我們很冷靜的去分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生活的作用，那麼，他在最初期是有推進中國產業的

意義，誰否認了這一點，他們就不會懂得歷史發展之辯證的範疇。極乎明顯的，他的推進的作用，是在於將中國與世界之疎遠的關係聯系起來，而使國際與中國更趨於密切，如組織中國的鐵道，使國際與中國的關係由天涯變作比鄰，而造成世界經濟與中國國民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外國的資本來開發中國，使中國鄉村過剩的勞動力與工業生產結合起來，這種工業生產就造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也就是破壞了鄉村中舊式經濟的基礎。

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的作用，就在於此。

但是，另一方面，一種新的剝削民衆的方式，亦隨之而產生，他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他把愛情的面帕扯碎，什麼俠義的熱忱，兒女的深情，在這社會內面，的確是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他那種無廉恥的，赤裸裸的，極殘酷的剝削，使人民的生活格外痛苦，也可以說除了革命以外實是無路可走！

此種威脅，對於帝國主義者有很深刻的影響，他感覺得如果再不遏制中國經濟的發展，那麼，但是列強在華的利益不能保障。如一切的特權將因中國經濟發展而動搖，失掉了控制中國的作用；並且，如果殖民地的經濟離開了帝國主義的束縛，其影響所及，勢必更加促使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而猛烈的震撼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此種條件之下，實在是再也不願意發展中國的經濟

了，他障礙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式，首先便是停止貸款，如果不能澈底的保證他的利益的話，那麼，對於中國的工業他是拒絕投資；另一方面，他又緊緊的握住中國工業發展的喉嚨——關稅權。現在任何一個商人，他都明白關稅自主是中國工商業的命脈所繫，因為非此是不能促進中國的發展，那值百抽五的稅則之客觀的意義便是幫助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反之，中國如再不採取保護稅則的制度，則中國的工商業也是永遠的不能跳出帝國主義者掌握之中！

我們綜括起來說，帝國主義者在某些地方是推動了中國某一部門產業之向前發展，然而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之下，他又故意的障礙了某一部門產業之發展，就現在的情勢而論，帝國主義是障礙了中國整個的國民經濟，妨害了中國全民族的利益，甚之，對於中國經濟他還起了一些解體的作用；嚴格的說起來，帝國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之唯一的正面的敵人！

至於中國經濟發展史的回溯，他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早熟，遠在耶穌紀元以前，中國已經有很完整的商業資本的存在，其文化所被，真是馭四夷而服萬國；然而爲什麼自十八世紀以來，他的進展忽然停滯而不能過渡到產業革命的階段呢？關於此點，爲歷來的中西洋學者爭執得異常劇烈，其實，這些爭執都是沒有找着問題的中心。譬如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韋伯爾與俄國的赤色教授瓦耳加他們都認爲中國經濟之所以不發展之癥結，完全由於中國沒有自然科學的發展，但是，他倆不了解資本主義

發展之全部形態，如某些地方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然後方有自然科學的需要，方有自然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有一部份人們的意見，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資本主義，原因由於中國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去強迫農民到工廠裏去工作，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資本主義並不是中央集權的結果，而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必須建築於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啊！

最奇怪的，莫過於朱新繁先生，他在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中，關於中國產業落後的原因的分析，盡量的發揮了一些東方式的不知所云和莫明其妙的觀點。我們為表現他的具體觀念起見，特摘引其原文如下：

「……為什麼這樣一個地廣人衆，物產豐富的中國，產業反而落後？——當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到登峯造極的時候，地大物博的中國，經濟的發展還很落後而停滯在封建的農業經濟的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最先需要經過「原始的蓄積」這一個階段。原始蓄積是創造下面兩個必要條件的過程；第一，需要大量資本的存在；第二，需要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而且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勞動階級的存在。……中國雖然地大物博，可是這兩個條件都是缺乏。第一，中國雖然地大物博，可是沒有集中的大量資本。」

「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是以小農經濟為其基礎。小農經濟的特質，是自給自足，沒有大量財富

的剩餘。在農業社會裏，土地就是唯一的財富，所以即是最大的富翁，也不過因為他的土地多——幾千年來的習慣，以土地的多寡，為計算財富的標準。在西歐資本主義勢力沒有侵入中國以前，在小農經濟的範疇之下，要集中大量的資本，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中國產業落後的第一个原因。」

「因為地大物博，所以能夠自足自給；因為能夠自足自給，所以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產業之落後，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誰都知道中國歷史上是重農輕商的。例如……像這一類的重農的話，真是不勝枚舉。實際上幾千年來的習慣，都是重農輕商；這個觀念一直到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後，才逐漸改變。至於所以重農輕商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物產豐富，在一個地方，往往有具備各種的產物。農民就本地可以得到生活的必需品，毋待商人的販賣。幾千年來重農輕商的結果，使一般的觀念，都集中在土地，而忽略了經營，所以大量的資本，更難集中——這就是中國沒有大量資本集中的最大的原因。」

「至於關於第二個條件，中國也是缺乏的。中國人口雖然很多，可是因中國物產豐富，農民都能夠自足自給，沒有到都市去出賣勞動力的必要——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階級，都是受了生活的驅使，才集中於都市，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如果不受生活的驅迫，換句話說，如果非有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事實存在，決沒有近代勞動階級的存在。中國感受到失業問題的壓迫，感覺非出賣勞動

力不能生存的人數太多的困難，還是近年的事——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的事。在資本主義勢力沒有侵入以前，農民都可以自足自給，沒有這些現象發生的。中國之產業所以落後其原因就是如此！」（見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第五十七——六十三頁）

然而，朱新繁之不可原恕的錯誤也『就是如此』！

第一，朱新繁及其門徒他們主要的錯誤就是在於沒有研究中國全部歷史發展的過程，故而鬧出許多的笑話：一則說『經濟的發展還很落後而停滯在封建的農業經濟的階段』，再則說『中國雖然地大物博，可是沒有集中的大量資本』。並且，他還舉出了許多歷史上似是而非的什麼重農的論調，爲要保證他的虛偽的已經破產的理論起見，他便捏造了許多的事實去切合自己的觀點；如他說：『中國物產豐富，在一個地方，往往具備有各種的產物，農民就本地可以得到生活的必須品，毋待商人的販賣。』這簡直是當面說謊！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很久以前已經離開了封建經濟的領域，這是歷史上的事實，毋待我們在此地重複申述，就是和帝國主義接觸的初期，那中外貿易的水準，還是中國站在有利的地位，我們看下面的一些數目字，便可以答覆朱新繁們的胡說：

年	輸	輸	貿	入
	(海關兩)	(海關兩)	(海關兩)	
份	入總額	出總額	易總額	超或出超

一八七二	六七·三七〇·四九	七五·三八八·二五	一四三·六〇五·一七四	出超	七·九七·〇七六
一八七三	六六·三三七·二〇九	六九·四五二·二七七	一三六·〇八八·四八六	出超	二·八四·〇六八
一八七四	六四·三六〇·八六四	六六·七二二·八六八	一三一·〇七三·七三三	出超	二·三五·〇〇四
一八七五	六七·八三三·二四七	六八·九三二·九三九	一三六·七二六·一七六	出超	一·一〇九·六八二
一八七六	七〇·二六九·五七四	八二·八五〇·五二二	一五一·二〇〇·八六六	出超	一〇·五八〇·九三六

(註) 此表係根據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歷年輸出入貿易價值統計表改製的。

問題的解答，很顯然的是側重在中國爲什麼不能發明蒸汽機？嚴格的說起來，自蒸汽機的發明，才有科學的產業革命。蒸汽機的發明，決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決不是依賴於某一位天才的聰明頭腦，而是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的產物；英國之所以能夠首先發明蒸汽機的，他是具備了這些特定的歷史條件，走出了手工工廠的領域，而闖進產業革命的王國。第一，地理的原因，英國是個近海洋的國家，他是依靠海上商業及搶掠殖民地爲生的，他爲的適應客觀的需要，主要的是征服自然（指海面）的困難。第二，殖民地的掠取，當英國手工工業發展到極盛的時候，他已經深入和統治了東印度。

反之，當中國在蒙古民族（即元朝）統治的時候，那時可算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全盛時期，當時中

國的商人足跡遍於太平洋波斯灣及裏海各地，但是自元朝統治被農民暴動推翻以後，牟罕穆德之佔領印度和波斯，而亞細亞的市場亦從此瓦解，中國的商業資本於此僅限於一隅，不復在全亞洲大陸上表現其作用了。同時，關於海外通商，亦復是異常困難，那廣大無邊的太平洋，中國人因缺乏冒險的精神，不敢冒波濤之險而一瞻彼岸之究竟，於是乎中國的商業資本祇有沿河流一帶尋找其出路。自此以後，中國的商業大部份是限於國內的供給，而與世界市場的關係，在某種形式之下，亦復蕭疎起來了！我們歸納起來說，自十八紀以來，中國的商業資本之範圍太狹，同時又沒有殖民地的獲得，另一方面，在他停頓的時期，國際資本主義已經抬頭了，他一抬頭即克服了中國。

關於此種具體的理論鬥爭，我們很希望未來的事變能夠將牠的陣容展開，要每個中國的革命青年都來參加論戰，以便從政治思想上肅清一切反動的雲霧！

第四節 官僚資本及舊式工業的蛻化與民族工業之形成

根據上面所列舉的統計，我們可以確信中國產業在帝國主義推動之下，已經是迅速的萌芽與猛烈的發展了。至於這種發展的過程與趨勢若何？亦復成爲現在社會人們爭論的焦點；當然，一種含有嚴重的政治意義的論戰，我們爲忠於中國革命起見，勢難緘默不言！因此，關於此種經濟發展的形態與

前途——即是說由工業革命的萌芽到殖民地式工業革命之完成；其中間所經歷的過程與夫所發生的現象，仍然需要我們再作一個比較簡明的說明。

第一，當中國經濟過渡到近代的殖民地式的工業革命的時候，官僚資本會參與其間；最明顯的，莫過於官督民業的時代，那些進步的聰明的官僚，他們為模倣和排斥帝國主義經濟起見，曾不惜屢次掏腰以興辦中國的工業。「銅山東崩，洛鐘西應！」一班富裕的商人，看見那些有名的官僚也從事於中國的工業，因此，他們也和狗搶骨頭一樣的參加於中國工業的振新。同時，那介於外國資本家和中國商人中間的掮客——買辦，他懂得許多工業上的祕密，這時候也想嘗一嘗殖民地式產業革命之果的滋味。在此種綜錯複雜的條件之下，他們彼此竟互相結合起來而對於中國經濟的前途便有所企圖了；當然，他們的願望完全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彷彿和俗說「見錢眼開」的一樣，那裏談得上顧全中國整個民族的利益呢？

我們且舉幾個官僚資本家的代表來說吧：例如盛宣懷和後起的梁士詒，他們在最初對於中國整個工業的發展，很客觀的說，是不無微勞；然而其罪惡却又掩蓋了他的勞績，因為他們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賄買，早已把民族的利益置諸腦後了。他們不僅與帝國主義「眉目傳情」而暗通聲氣的出賣了中國民族的利益，甚之，還更無恥的赤裸裸的倒在帝國主義的懷裏任全世界資產階級們「真夠銷魂」！

歷史的進行，牠決不是毫無意義的過去，牠將留許多的影響與人們。此種影響之表示於社會生活中間的，在南中國以及資本主義比較發展的地方，使豪紳地主的本質都變更了；許多許多的地主豪紳，他們為賺錢的動機所驅使，往往賣掉了自己土地一部份，將所得來的代價轉投於工業方面，不是與人家合股開廠，便是自己經營輕便的工業而使自己蛻變成爲工業資產階級。

這種現象，在過去幾幾乎爲人們所忽視，其實，就中國整個經濟發展的內容而論，他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中的中軸；自一九二七年以來，著者曾在中國經濟中心區——江浙兩省沿鐵路一帶從事於此項工作的調查，根據調查所得，現在有很多的工業資本家都是豪紳地主的出身。由地主豪紳蛻變而爲工業資本家的事實，在其他先進國家可算是罕見的事情，然而在中國却甚普遍，這一點可稱爲東方方式的殖民地的經濟上的特殊點吧！

第二，由於舊式的手工工業蛻化而成爲民族工業的，在中國亦復是異常普遍的現象；這些大批的手工業者，他的數目因爲無精確的統計，我們固不得而知，不過就過去的遺跡和現在的殘留來觀察，那麼，其變遷的痕跡便明白的顯示出來：任憑那些囂強的人們怎樣的歌頌中國的手工業的繁榮，與夫過分的形容中國手工業的特點，可是這些都不能掩蓋着牠的衰頹與蛻化的事實。很顯然的，自帝國主義機器輸入以來，中國過去的手工業，便遭受了一個空前的厄運；牠不僅是摧殘了小的家庭工業，如

那種小的手搖的紡織機的沒落，以及其他許多工業之同此命運，便是那些規模相具的手工作坊，亦復是打得夠落花流水！此種情形，反映於一般社會生活中間的，首先是那些小手工工廠及作坊的主人，他們爲要維持自己的命運與發展其前途起見，在生產組織方面不得不有所改變以趨向改良產業的道路；姑無論此種改變生產組織的動機是否出於主觀上的自願，然而非此則不能切合於客觀的需要。并且處在這種特殊的產業革命交流的過程中，稍一不慎，那經濟變動的浪濤，會使他們淹沒而遭遇破產和倒閉的危險！

其次，便是舊式工業組織的窳敗，那種帶着很濃厚的中世紀的形態的徒弟制度，不但是不能增加這些舊式工業的生產量，反之，因過分的勞動和沒有勞動代價的結果，使這些佈滿全國的青年勞動者——徒弟，在生活上和思想上起了很大的變化。第一，他們那種定期的徒刑式的生活，是不願意繼續忍受下去，但是因爲條約的束縛使他不能自由行動，於是乎便採取一種消極的反抗——怠工。第二，有許多的新式工業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這些近代式的產業之在中國是需大批的工錢勞動者，經營近代企業的人們，有許多是從歐洲的資產階級那裏學會了新式的科學的工廠管理方法，工銀的水準是超出於手工工廠之上，同時，設備亦比較舊式工廠爲優；因此，有許多的舊式的工錢勞動者和破產失業的羣衆，在這些條件誘惑之下，紛紛的離開了那舊式工業的領域，而促成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總之，中國的民族工業，牠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他是受到各種因素所影響的產物，而官僚資本及舊式工業的蛻變，與牠的形成和發展實有深切的聯繫！

在地主官僚們的意思，以爲搖身一變蛻化而爲資產階級，可以獲得更豐厚的利潤，當然是心滿意足，彷彿和羽化而登仙的一般。但是，事情絕對不會這樣的安靜和樂觀，他們在躊躇滿志之餘，其對面已經站着了一大羣的敵人——饑寒交迫的奴隸！

第五節 銀行資本

隨着工業資本發展而發展的銀行資本，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牠已經在社會生活中起了作用。我們如果檢查銀行資本在中國發展的史蹟，那麼，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牠已與中國的民族工業聯繫起來，并且還站在支配的地位。中國在二十世紀以前，向無所謂銀行，關於金融市場的調劑，完全依賴於舊式的『錢莊』或者是『銀號』；這些『錢莊』與『銀號』他們雖然是發行了什麼兌現的紙幣和鈔票，然而各省的情形不一，手續亦甚麻煩。故於中國資產階級開始形成的時期——一九〇五年（即光緒三十年），滿清政府的戶部，曾奏請試辦『戶部銀行』，以爲處理中國金融市場紊亂的樞紐；當時戶部曾擬定試辦銀行章程三十二條，其主要的內容，即在於說明推行幣制及統一全國的貨

幣，這可以說是中國銀行的起源。

迨至一九〇九年（即光緒三十四年），滿清政府變更了行政的系統，將戶部改爲度支部。而戶部銀行亦因此改爲『大清銀行』。當時滿清政府對於大清銀行的性質復加以明白的確定：認爲牠即是中央銀行，牠有通用國幣，發行紙幣，管理官款出入，担任緊要公債之特權。同時關於大清銀行之資本方面，更加以大量的補充，除原有之戶部銀行四百萬資本而外，又重新再添六百萬兩的股本，合成資本總額一千萬兩（等於現在一千五百萬元——農註）。國股於一九〇九年底繳齊，而商股遲至宣統二年始全數繳定；故爾關於股東方面，該行有新股與舊股之分，自此大規模的中央銀行建立以後，而各省的分行，亦如雨後春筍似的先後設立。

當時這個大清銀行的營業是異常的發達，僅就新舊股東所分的紅利而論，往往超出於官息數倍以上，而股票市場的價格，因此亦增至一倍有奇。

銀行事業的發展，給東南幼稚的資產階級以極強烈的暗示，故於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以盛宣懷爲代表，用郵傳部奏請的方式，要求設立『交通銀行』。從這一個銀行的計劃與目的當中，我們可以很顯明的看出來牠染遍了東南幼稚資產階級的色彩；他的計劃是用中國資本來經營輪船，鐵路，電報，郵政的事業，并且還企圖管理上述四局的存款。在他的奏定章程三十八條中，屢次的說明這是商業銀行

的性質，至於銀行基金則規定爲一千五百萬元，政府方面担任百分之四十，其餘的百分之六十則歸商人分担。這個銀行還有一種特別的營業，在他的奏章第五條內，明白的規定出於京漢路贖路時，總司一切存款匯款以及支付佛郎馬克等事。交通銀行雖然是採取商業銀行的辦法，但其實質實兼國家銀行與殖邊銀行而有之，誠然，顧名思義，我們便不難了解牠的內容了。

有一位近代的俄國著作家，他關於交通銀行曾有如下的描寫：「……這個銀行還在清時所創設的。其創辦的原因，爲中國資產階級反對國際帝國主義所採取的建設鐵道計劃而起，其動機尤在徵集債款以便贖取爲比利時與法國的資本家及俄國的官僚們所佔據的京漢鐵路。中國爲抵制帝國主義之喧賓奪主統治中國的鐵道起見，特創立一財政機關，其任務爲便於管理鐵路，郵政，電報，航業等等的財政事宜。銀行基本金規定一千萬兩，即一千五百萬元。……一部份資本屬於政府，其他一部份則屬於中國資產階級。……」

「近年以來，交通銀行經受許多變更，其目的在使銀行接近市場，擴大營業，超出與中國交通事業密切相關的範圍以外。現時此銀行之十分之七的股款落入中國資產階級的手中，屬於政府的不過十分之三而已！」（見李麥麥編中國經濟第一八二——一八三頁）

與交通銀行同時發展的，還有兩個銀行：即上海的「四明銀行」和「浙江興業銀行」。根據民國

十六年和十七年的報告，這兩個銀行資本的總額，竟達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於此可見自一九〇〇年以來中國銀行事業發展的一斑了！

此外，中國還有許多的地方銀行，其活動的範圍雖僅限於一省，而與省銀行無異，然而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實屬是勢不可侮！茲將一九〇〇年以後至一九一一年之各省地方銀行及其資本總額，製如下表：

省別	銀行名稱	創設時間	資本額	附	考
廣東	廣東官銀錢局	一九〇四年	—	—	—
奉天	奉天官銀號	一九〇五年	六百萬兩	地方政府所經營	—
熱河	熱河官銀號	一九〇六年	—	—	—
黑龍江	黑龍江官銀局	一九〇六年	—	由地方政府經營	—
廣西	貴州官錢局	一九〇八年	四百萬兩	—	—
湖北	鄂省官銀錢局	一九〇八年	八萬兩	專用官票以補助錢之不足	—
河南	豫泉官銀錢局	一九〇八年	十一萬兩	—	—

吉林	吉林官銀錢號	一九〇九年	—	由官帖局與官錢局合併改組而成
浙江	浙江銀行	一九〇九年	五十萬二千兩	官股三十萬商股二十萬二千兩
直隸	直隸省銀行	一九一〇年	一百零二萬四千七百元	係由天津官銀號改組
福建	福建銀行	一九一一年	—	由福建銀號所改組
四川	四川銀行	一九一一年	—	僅以二百元為開辦費并無基金

(註) 此表係根據於中國近代發展史二〇五——八頁改製的。

我們根據上面所列論的事實和統計，關於中國的銀行資本遠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他已經形成和發展，并且還在着支配中國的工業資本了，這並不是什麼理論上的爭執，而是事實的表現。然而那大名鼎鼎的李達先生，他在說明中國「銀行資本之形成」的時候，却將事實的面目模糊了！他說：「所以國內分散的資本，不能向着工業所要的大企業方面投資，而只能用來做小規模的地方的商業投資，或者吸收地方的官僚資本做投機事業，買賣政府公債等等，總不外於商業的性質！」（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第一百六十頁）

很顯然的，這是李達先生的胡說。我們看上面的交通銀行的發展以及對於幾個主要的產業的投

資，便可正面的答覆了李達先生。同樣的，他認為銀行之買賣政府的公債，也是「商業(?)」的性質，我們如果依照這個理論推論下去，那麼，帝國主義者之銀行托辣斯的買賣公債的投機，也就是所謂「商業的性質」了！在另一方面，他又錯誤重演，以為「新式銀行資本，是適應着近代的都市生活的需要才發生的，但不能週轉於全國的大市場……」(同上書一七五頁)。全國的幾個重要市場，當然是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銀行資本果真不能在這幾個「全國的大市場」週轉嗎？爲什麼原因呢？我想一定是銀行資本的觸矢遇着了像李達先生這樣的一塊有力的盾牌了。

這些爭論，我想從此暫爲結束，反正未來的事變的發展，牠會替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現在，迫在目前的任務，便是需要我們繼續的去說明殖民地式產業革命之對於農村經濟影響如何？

第六節 殖民地產業革命與農村經濟

本來在世界上論何一個先進的國家，他本身經過了產業革命以後，那麼首要的任務便是解放農民和廢除農村經濟中的封建剝削；因爲這種行動並不是與資產階級的利益衝突，並且，恰恰相反，完全是適合於資產階級的利益。全世界資產階級解放農民的目的，爲的是獲得他的商品購買者的增加，換句話說，他們要從地主手裏去奪取農民的血汗，甚之，要全部的奪過來；例如在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

級對於農民的解放，產業革命後的英國對於農民生活的改良，這些都是充分的表現出產資階級對於農民之改良的影響。

但是，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中國的情形怎樣？

第一，中國的產業革命與歐洲的產業革命有很嚴重的區別，和歐洲的產業革命甚之有根本的不同。歐洲——特別是英國，他的產業革命的趨勢是一種內在的自發的過程，而中國則反是，中國的產業革命是在帝國主義羽翼之下形成的。其最顯明的鴻溝：一個是壓迫人的擁有殖民地的國家，一個是被壓迫的殖民地的國家。故中國殖民地的產業革命的特點，他並不是完全由於手工作坊——即手工業的進化而改變，說得確切些，他並不是由蒸汽機的發明所致，而是為蒸汽機征服的結果。他的特點主要的由於一部份進步的官僚和商業資產階級的蛻變，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們把那大批的積蓄的資本移殖一部份投之於工業，此種投資的動機，一方面固然為的是反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獲取更豐厚的利潤却是主要的原因。

此種殖民地資產階級的特質，因為他的形成及其發展之迂迴曲折的關係，我們不能用某種術語來描寫，祇好舉一個通俗的例來形容牠：中國資產階級彷彿和一個生理不健全的人一樣，他雖然達到成人的年齡，可是從表面上看去，仍如十二三歲的小孩，并且身材短小，發音很低，面黃肌瘦，萎靡不

振，而各部器官亦復發育不全：不是耳聾，便是眼花，我們關於這種『小老人』的原因如果引用皇漢醫學上的名辭來說：便是『先天不足』！

我想，這個關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譬語，如果以冷靜的客觀的頭腦去思索，大概不致於失當吧！

第二，殖民地式的資產階級與地主的關係如何？這也是對於中國經濟性質爭論的一點。事實的教訓是，在很久以前，中國的地主已經與商業資產階級以及官僚結成了『三角戀愛』式的不解之緣了；歷史告訴我們說：中國的商人，他們往往用一部份的資本投之於土地方面，并在鄉間建築起很精緻的別館，以便於農業收穫時期或者是嚴寒酷暑的時候，來此休憩，并可以獲得佃農們許多恭維的名辭——

『老爺』『太爺』的頭銜。至於地主之投資於商業，那更是數見不鮮的事情，以地主的尊嚴爲什麼而要冒『市儈』的惡名而不韙呢？打開臆子說亮話：賺錢的魔鬼在誘惑他。著者過去從事於農民問題調查工作時，曾經遇着一位地主兼商人的朋友，我很不客氣的問他：爲什麼要從事於商業的經營？他當時答覆了很多。第一：年歲荒賺，水旱頻仍，以致收穫減少，得不到很大的利息；第二：土匪蜂起，盜賊如毛，鄉居不僅夜難安枕，甚之，還有槍劫，抬架（即綁票）以至生命危險；第三，從事商業可以得着『活動』錢用，比較農業方面以季候（指收穫期）收入便當得多。這三點當然是比較可靠的原因，不過，他的佃農更有一點新的帶滑稽性的補充：『大爹爹到城裏去做生意的原因，除了上述的三點而外，那

位與大爹爹相好（即姘頭）的王大姑娘之離不開，也是一個附帶的原因！」

我們再來看一看官僚們對於商人與地主之間的關係。關於官僚與商業資產階級有關聯的部份，在上面已經說及，現在似乎沒有再行論述的必要了；至於官僚與地主之間的聯系，也可以說這是中國變態社會的一環。自十九世紀以來，主要的在太平天國的農民大暴動以後，那些鎮壓革命的功臣——如左宗棠，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及其走卒，他們為報復農民暴動的仇恨起見，曾規定兩種方式：搜刮農民的土地與『到民間去』（即是住在鄉間練團勇以鎮壓農民）。這兩種路線我們所看到的，是異常清楚，且舉李鴻章來說吧：李鴻章在他的故鄉——安徽合肥，大批的搜刮農民的土地，因此有人送他一副楹聯：『作完天下事，買盡合肥田！』這雖然未免有些過分的形容，然而我們從農民間所聽到的什麼：『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怨聲，便可以相信土地之集中於官僚手裏決不是無因之談了。所謂『到民間去』的意義，便是官僚在農村中間買了很多的土地，建築起很精緻而廣大的房屋，僱傭了許多農村流氓無產者以保衛這些財產；在所謂『解甲歸田』或者是『致仕歸來』的美名之下，那『林泉之樂』的名辭，便象徵着中國農村中的大地主。

於此，可見中國的資產階級與地主，實有密切的不可分離的聯繫。

因此，我們堅決的認定，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不但不能幫助農民反對那一切中世紀的封建殘留

的剝削，甚之，他還與這些剝削者一鼻孔出氣，而沒有幫助農民的可能。拉狄克說：「中國資產階級是利於剝削農民的階級，因此，是非封建的，而係資本主義寄生階級的性質，結果他反對解放農民的民族革命運動。」

這意見是有苦的直理！

中國資產階級的前途，祇有兩條路可以走：不是推翻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和澈底的解決土地問題，便是回過頭來加緊的壓迫農民以保持自己的生存。

出路兩條，中國殖民地式的資產階級的前途，究竟是向著那一條路走呢？根據過去的事變的發展，請讀者們自己去體會吧！

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下卷

本卷論一九二一年以後至最近之農民戰爭，不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發行

實價一元四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研究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著者 薛農山

發行者 葉中興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刷者 民光印刷公司
上海新開路虢慶里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話掛號七二七三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各省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4315B



E 18684